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蒋介石的大因徒实录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蒋介石的大囚徒实录

作茧自缚胡逸民

“清党”主席入狱揭秘——不容青史尽成灰

胡逸民

- 明白人喜得糊涂官
- 下马威通缉郭沫若
- 唱反调糊涂官干“糊涂”事
- 吃耳光丢官下牢狱

“功劳”苦倍受蒋赞许

1926年3月，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兼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说是共产党要赶走他，20日凌晨突然宣布戒严，共产党人受到逮捕和监视。听说共党陈延年等人主张武装还击，但受到总书记陈独秀的“劝阻”，最后不了了之，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其他一些共产党要人也被撤去要职。这实际上是国民党清党运动的序幕。此后，蒋介石的清党排共独裁行动，已在明白人的意料之中，只是还没听说过有什么专管清党的组织机构。

7月15日，广州誓师北伐后，我被委为总部军法要职，跟随蒋介石的北伐军一直打到上海。1927年2月总部进驻上海龙华。3月，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要人周恩来，领导、组织、发动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使正在与上海滩头面人物和洋人频频接触的蒋介石十分不安。当时我并非核心人物，对其幕后交易不知其详。据内部传闻，这突然袭击的“四一二”事件，蒋介石的把兄弟黄金荣和杜月笙帮了大忙。4月12日这天，黄、杜控制的大批帮会人物、流氓泼皮，扮成工人、学生模样，袭击工人纠察队武装。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即奉命神速进入预定地点，以“工人内讧”为由，将纠察队全部缴械。冲突中当场击毙纠察队员38人，打伤约3百人。仅11、12、13，3天就有3百人被杀，近7百人被捕，失踪者超过6千人，当时我是总司令部手执军法大权的执法、监狱两科的科长，突然而来的大量审讯、监禁和执行工作，使我无法应付，许多案件只得草草奉命执行，有的连真实姓名都未搞清楚就枪杀了。据我所知，被捕杀人大部分是一些出头露面的普通党员和工人，真正共党要人并无落网。这期间，我配合默契，办事果断，既有“功劳”，也有苦劳，因而倍受蒋介石赞许。这大概就是不久后，我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高官的政治资本。

明白人喜得糊涂官

“三二”事件的成功，“四一二”政变的得逞，使蒋介石基本上控制了局势，我们开进南京，4月18日正式宣布成立国民政府。清党在继续大规模进行，但还来不及组建专门负责清党的机构。所以，第2天匆匆宣布的第1号通缉令，是以国民政府名义签发的。名单也是蒋介石亲自圈定的。记得被通缉的全是共产党的头面人物，还有国民党中知名的左派人士，包括原北伐军政治顾问鲍罗廷、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等190人。

4月20日AB团头目邓泽如告诉我，他同段锡朋组织了一个清党委员会，只有九名成员，蒋介石自兼主席。这是钦定的核心组织，我并无跻身其中的奢想，不料27日上午接到通知，我被委为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委员会成员好象是15人，骨干有刘伯龙、伍瑾璋等人，除我而外，是清一色的黄埔系军人。我这个谙熟蒋介石内幕的明白人，居然就此糊里糊涂登上权压朝臣、手操生杀权柄的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的宝座。不过，我这个非嫡系人物何以能不费吹灰之力雄居高位？令人纳闷了半个多世纪。现在细细品味起来，大概与下列原因有关：一、清党审判委员会其实是清党委员会的执行机构，除了侦查、监禁、审讯和执行既定清党对象外，并不是权倾朝野的核心组织，说穿了只不过是蒋介石清党反共和独裁的一柄大砍刀而已；二、起用我这个也算民国元老又非嫡系的人，可以在外界造成清党并非蒋介石控制的黄埔军人一统天下的印象；三、我是由蒋介石的好友吴稚晖推荐的人，自然是可靠的，也是买吴稚晖的面子；四、北伐以来我随军执法不遗余力、配合默契、紧跟不舍，深得蒋介石青睐，况且我也是浙江人，算是大同乡，很合蒋的“用人原则”；五、还有一条，当时连国民党内也确实难找象我这样专攻法学、科班出身而又信得过的人选，由我出任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自然会给这个旨为戮杀革命志士，并不需要法律的“鬼门关”披上了依法行事的外衣。以此而言，这个“刽子手”的席位真是非我莫属了。

下马威通缉郭沫若

我和委员们偶得高官，不胜侥幸，弹冠相庆，遂由我作东畅聚一番，此举初衷，我无非是笼络人心，以利彼此和衷共济，于点名堂出来，以报效党国和蒋总司令提携之恩。上任第3天，伍瑾璋偕刘伯龙（还有一位已忘是谁）3位委员匆匆来到我办公室：“这是要你签发的，你过目一下。”瑾璋递过一本用毛笔写的名册，原来是“钦定”的通缉名单，开卷第一名“郭沫若”三字赫然在目，连邓演达都在其中，共约210名。见到这北伐军总政治部正、副主任都上了黑名单，不禁令人愕然。但想到自己是三民主义忠实信徒，而郭沫若是共产党要人，既然清党，连陈独秀都通缉了，他郭沫若当然难脱干系，况且我是奉命行事，签发之举不过是过过手续而已，所以就顺理成章地以主席身份签发了通缉令。这大笔一挥，不知使多少革命志士和有为青年惨死于血泊之中；至于我管辖下的各大监狱，非人的折磨和暴满之状，更是难于言表了。

连续的日夜审讯，把我弄得焦头烂额。经手审理的一批青年人，好象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面对我这堂堂法官的提问，一问三不知，对我的指控，矢口否认，尽管用尽酷刑也无济于事。更可笑的是，我连他们的真实姓名都无法搞清楚，根本难以形成口供笔录。我以为这有悖法律，加之对这些人的铮铮侠骨暗自佩服，不忍就此操刀，就以“证据不足”为由，陆续将他们取保释放。事实上，那时我不是、也不敢真正去开脱“异党”，更多的是从法律角度考虑。事后得知，这些人倒真正是共产党，确确实实由于我的“开脱”而免遭杀害。对人民来说，这是历史赐给我的“功劳”。

唱反调糊涂官干“糊涂”事

6月的一天，清党审判委员会举行全体例会，我以主席身份，对同僚们前一段工作做了一番嘉勉后说：“我主张被捕之人必须有证据，而进行共产主义活动的，方可扣押坐牢，如被诬告，应申明立即释放，决不可随意杀人。”这班正襟危坐的委员们嘴上唯唯诺诺“是的，是的”。唯独刘伯龙有异议，一本正经地说：“诸位，校长（指蒋介石）在南昌说过，对共党……”

“我知道！”不待他说完，我就接过话茬：“从法律程序而言应该这样。我自有主张。”此刻，经刘伯龙提头，我始知自己说滑了嘴。蒋介石在南昌确实说过“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走一个”的口谕，刘伯龙被我打断的半截正是这句话。明知自己健忘，干了糊涂事，与蒋介石唱了反调，但自恃依法而断，法官之道是无懈可击的。为维护自己这个主席的尊严，我硬着头皮，不容委员们插话，把我的主张正式抛了出去，要他们照此执行。就为这句话，我这个威赫一时的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顷刻间从高台上摔了下来，锒铛入狱，沦为阶下囚。

提起这个刘伯龙，不愧为“地煞星”。此人黄埔3期，陆大特别班2期毕业。年轻时就嗜杀成性，或以睚眦之怨杀人，或以无故杀人为乐，算得上杀人不眨眼。据说后来在康泽麾下泡制过几桩戮杀平民的“政绩”，不知有多少共产党和无辜平民惨死在他的屠刀下，故世称刘伯龙为杀人狂。1950年初在北京时就听说，刘伯龙于1949年11月在贵州被谷正伦所杀，暴尸于野，这也算是恶有恶报吧。想当年，我虽是他的顶头上司，也险些死于他手。

吃耳光丢官下牢狱

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该我倒霉的事终于到来，7月中旬的一天，蒋介石紧急召见，我匆匆来到他办公室。只见蒋介石绷着脸，背着双手在屋子踱着方步，旁若无人，室内笼罩着一派杀机，我感到有点不对头。自古道：“伴君如伴虎”，观此气势，我直冒冷汗。正想开口报告，只听“呼”的一声巨响，蒋介石击案训斥：“对共党格杀不论，宁可错杀，不可错放！你为什么要放走大批共党分子？你清党是怎么清的？嗯！”

“我……”虽想斗胆回禀原委，却已无此勇气。只听“拿下”一声怒吼，便被侍从们捆绑结实推了出去，投入监狱。直到年底才由张群讲情释放，算是了却了半年牢狱之灾。

自从1927年4月21日荣登高位到7月锒铛入狱，我在这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的宝座上总共坐了93天，这段人生浮沉，也弄不清是历史的误会还是误会的历史。该不是宦海奇梦吧！

三番建狱四次坐牢的国民党中央监狱长
胡逸民

- 初发迹操生杀大权
- 入囹圄偶度铁窗岁月
- 再入狱反招人财两得
- 得肥缺官禄财星高照
- 三坐牢义交方志敏
- 三建监出洛阳再立“功”
- 会汉奸同作虎牢吟
- 春雪动又得死里逃生
- 怕清算偕女弃家外逃
- 鬓如霜百岁落叶归根

初发迹操生杀大权

孙总理治丧事宜完成后，于右任把我推荐给当时担任福建省主席的林森，不料吃了闭门羹，于是我就投入了此时已参加蒋介石阵营的吴稚晖的怀抱。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15日，花城广州，晴空万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的口号响彻云霄。这天上午，蒋介石在广东省议会，举行出任北伐军总司令就职典礼。当场委任李济深、白崇禧为正、副总参谋长，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为第一军至第七军的军长。总司令部秘书长和八大处的处长也同时任命：秘书长马文东，参谋处长张定璠，副官处长张治中，交通处长陆福廷，军需处长刘纪文，运输处长俞飞鹏。令人奇怪的是，惟独那操生杀大权的军法处长暂缺。大概是元老吴稚晖的推荐，蒋介石居然破例在这只委任高级军职的就职典礼上，委任我为军法处执法和监狱两科科长，让我实署军法处长实权。我由一个小小广东曲江地方审判厅推事，一跃为北伐军总部操生杀大权的铁腕人物，不觉踌躇满志，飘飘然起来。此刻，虽位不列权臣，人们却对我刮目相看，成为北伐军内令人害怕的人物。背地里人们称我“刽子手”我很引以为自豪。

7月27日，北伐军挥师北上，我随军执法，好不威风。势如破竹的北伐军，9月取安源煤矿，11月7日攻克南昌，生俘江西军阀虞香亭部军长唐福山、师长张凤歧。我毅然以北伐军军法处长的身份，与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一起审讯张、唐，并由我宣判两犯死刑，立即枪决。这次对军阀初开杀戒，使我名声大震，眼看就要青云直上。殊不知，在这节骨眼上，杀出一个“程咬金”，我的形象在蒋介石这个总司令心目中，开始留下一缕阴影。

原来，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以为南方大局已定，脚跟稳了，就在这里筹建行营，开始招降纳叛，搜罗人马，准备清共。这时陈果夫、张群应邀入赣，蒋封以总参议高位。随陈、张而来的，有一人叫王振南，此人并无资历，无非是侍卫长王世和的亲叔而已。蒋介石突然委以总部军事法官兼署军法处长之职，位居我上。我这个俨然是处长的执法、监狱两科科长，从此得向王振南“称臣”，不免心中不服，耿耿于怀。

我比蒋介石早四个月投奔孙中山，论资历比蒋老，论学识，我是科班出身的民国元年法学士，且对蒋介石的底细，我了如指掌。只不过蒋介石权术过人，又深得天时。民国15年中山舰事件后，他一举连歼陈炯明、杨希闵、范石生等军阀势力，居功自重而飞黄腾达，身居高位。我则依老卖老，并不把这位总司令放在眼里，许多事有意无意要同他唱唱反调。也许这就是我一生四次坐牢的原因之一吧？

北伐途中，有一回第三军朱培德部的朱贵师长，率百余人闹军饷，包围了蒋介石驻地，侍卫团将这些人统统抓起来。蒋介石火冒三丈，下令“统统枪毙，一个不留”。我奉命传讯后，认为事出有因，就自作主张，只处决了其中为首的23人，放了70多人。事后蒋介石对人提起此事，总是似笑非笑地瓮声说：“哼，胡逸民这小子……”

蒋介石蓄谋已久的清党运动进行得很顺利。四一二政变得逞。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当时发出的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苏俄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等190余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AB团头目邓泽

如、段锡朋奉旨组织清党委员会，也许是蒋介石确实认为我追随执蹻有功，或者是因为我是党国法学士、“监狱专家”，外加点安慰之意，事先竟无风声地突然委任我为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兼江苏第一模范监狱长之要职。

我春风得意，果然爬上权力高位而出人头地了。走马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签发了对郭沫若等共产党人的通缉令。我管辖下的监狱，人满为患，眼看共产党、革命志士和工农群众的鲜血即将染得我顶子殷红，想不到竟会祸起箫墙。

入囹圄偶度铁窗岁月

清党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中黄埔系军人占多数。如伍瑾璋、刘伯尤这班人都是，他们与总司令蒋介石有师生之谊，根本不把我这个平步青云的主席放在眼里，加上我办事向来自信，很不听“忠告”，这伙人心中十分不服。可是如今我毕竟雄居主席高位，令其奈何不得。背地里他们密谋策划，千般寻找把柄，欲置我于死地取而代之。

我果然授之以柄。一次清党审判委员会举行例会，针对当时被捕人太多，我以主席自居大咧咧地说：“我主张，被捕之人必须有证据是进行共产主义活动的人，方可扣押坐牢，如被诬告，应申明立即释放，决不可误杀一人。”这班委员当面唯唯称诺。我当时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张同蒋介石一年前在南昌讲过的“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走一个”的谕旨大相径庭。

1927年7月，蒋介石陈兵津浦路，力拒南下，北军功亏一篑，汪精卫又通电反蒋，蒋军兵败徐州。此时的蒋介石心慌意烦，情绪暴躁，喜怒无常。正好此时接到几份“胡逸民有通共之嫌”的详尽密告。“岂有此理！”蒋介石火冒三丈，击桌而起。

这天，我应召来到总司令部办公室，只见蒋介石铁青着脸，眼露杀机，足足有两分钟怒目而视不发一言，周围的空气好似要爆炸一样。见这光景，我自料凶多吉少，吓得一身冷汗。“嘭”的一声，蒋介石拍桌怒吼：“你，你竟用共党分子做私人秘书，嗯？”细长的食指几乎戳到我的鼻尖。

“不，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同乡而已。”我小声回答。我的私人秘书确是永康同乡，他参加过共产党，事先我是知情的。至此我料自己并无多大过失落在对方手里，量其奈何不得。只因蒋介石正在气头上，凭经验不硬顶不多加解释，估计一旦气消即可冰释。

想不到蒋介石听了更加怒不可遏，左右开弓，“啪，啪！”甩了我两个响亮的耳光：“你受共党分子操纵，哼！”

“逸民效忠党国，尽心尽力。”

“放屁！”蒋介石目射凶焰、唾沫四溅，大声训斥：“对共党格杀勿论，宁可错杀，不可错放！你为什么要放走大批共党分子？你清党是怎么清的？”

我的几番自辩，使蒋介石越发恼怒，大喝一声：“拿下！”侍从室的三、四名年轻侍卫闻声而入，一拥而上，不容分说，将我捆绑起来，推了出去。

不过，我确定并无什么大不了的把柄留下。蒋介石拿办我，其实同当时形势有关。8月李宗仁通电反蒋拥汪，蒋介石被迫下野。9月蒋东渡扶桑，以避锋芒，军事上由李烈钧、何应钦、李宗仁负责。此时，我通过关系，不失时机地把契友张岳军（群）总参议抬了出来。1927年冬，由张群讲情我被释放了。

经过这番折腾，我开始有点心灰意懒。适好巧遇父丧，便乘机告假返里奔丧，怀着官场失意之苦，中年丧父之悲，灰溜溜地离开南京，作故乡行。

再入狱反招人财两得

丁忧届满，离乡返宁，途经杭州时，又糊里糊涂地被捕，莫名其妙地关入杭州陆军军人监狱。后被告知的罪名又是“通共”！这真使我啼笑皆非，原来伍瑾璋、刘伯龙自上次告密得逞后，以为我从此被置于死地，他们没有想到，我也来头不小，居然能从“天牢”中破门而出。他们担心我东山再起，遂串通浙江军事厅厅长蒋伯诚，以通共罪名将我在杭州截捕。

此番再次入狱，才使我这个民国以来主管狱政的人饱尝人间地狱的真正滋味。中国的监狱，大抵与佛教里的地狱有关，狱中一切似都是以要囚犯受苦为宗旨的。因为这次我无法获得狱中的什么优待，着实吃了点苦头。“太黑暗，太腐败了！”那时我想，有朝一日如能重掌狱政，定要大斧改革，非创个模范监狱不可。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在什么山唱什么歌。我后来果真重掌狱政时，搞的所谓“模范监狱”又是如何呢？我自己后半生的经历，便是最好的回答。

在杭州狱中我度日如年，几次写信求救于李烈钧，均不见动静。后来得知，李确曾致电蒋伯诚，要求立即释放我，但因伍、刘之辈从中作梗，蒋伯诚亦不买账。

1928年春天，浙江军事厅厅长蒋伯诚突然接到南京急电：“速放逸民嘱速来京晋见蒋中正”，蒋伯诚岂敢抗旨！这回又何以化险为夷呢？这同蒋介石的“双喜临门”有关。1928年1月，蒋桂联盟，汪精卫败北，蒋成为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领袖——此一喜；另一喜是蒋、宋联姻，蒋介石与宋美龄新婚燕尔。蒋介石心情好极了。此时出任秘书长的邵力子，接我求救信，及时地向蒋介石恳切陈词相求，终于获准将我释放。

昨天还是阶下囚的我，兴冲冲到了南京，先见邵力子，当天又由邵陪同晋见蒋介石。

“嘿，嘿，嘿，逸民你受惊了。”蒋介石笑脸相迎，说了一番宽慰的话，当场委我再任军法处监狱科长之职，可是那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却避而不提。我明白，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是今非昔比了。不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若以此为转机，何愁不能卷土重来？哪里还去嫌官大官小，唯有频频叩谢“圣恩”而已！

得肥缺，官禄财星高照

2月中旬，蒋军攻克徐州后，军内人犯骤增，蒋介石带着我到徐州。我连日审讯，忙得不可开支，但监狱人满为患，难免不大伤脑筋。这天蒋介石突然决定兴建徐州军人监狱，当即拨交我现洋75万元，命我火速造监。

这是一桩令人垂涎的肥缺，一本万利的好差事。我大展“才智”，监狱营造得十分顺利，还从中捞得25万元外快。我腰缠万贯，财壮气粗，常常忙里抽闲、轻车简从，来往于徐宁道上，混迹于秦淮青楼。并用这宗“地狱钱”，在南京四牌楼其昌里买下一幢豪华住宅，以金屋藏娇，纳鲍氏为姨太太。

我营造监狱倍受蒋介石赞赏，视为心腹。1929年3月12日，奉蒋密令，我诱捕李济深于南京鼓楼，立下奇功；12月3日唐生智、冯玉祥倒戈反蒋，蒋介石又处在汪、阎，冯、李、唐联合反蒋的态势之中，危急万分，我审时度势，欲再建殊功，以示对蒋忠心不二。12月下旬的一天，我秘密赴河南南阳，找到了当时任杨虎城部旅长的契友冯钦哉，巧舌如簧，劝冯倒戈，迎击唐生智，冯钦哉果真就范，欣然应允，并获杨虎城默许。除夕夜，冯玉祥军主力杨虎城部以三个团兵力，突然袭击友军——在驻马店的唐生智部，弄得唐生智措手不及，被迫于1930年元旦化装潜逃天津，流亡香港。联合反蒋的态势就此瓦解。为这事，蒋介石专门召见我，连连称赞“逸民真有两下子！”“很有才干”“此功不小呵”，允诺要好好犒赏。

不久，果然传出谕旨：新建成的徐州军人监狱可由我委任监狱长，同时又拨巨款，让我再造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还事先委于右任为监督，预委我为监狱长。这回我又捞到了几十万，买下几处别墅。洋房、汽车、姨太太……奢逸更非同一般。

从1928年春至1934年7月这6年半时间，我虽经历两场虚惊，却也能两番建狱，发了大财，出足了风头。此间我还奉命拉拢杨虎城，一度入陕，出任杨虎城主政的陕西省政府委员和杨虎城部驻京办事处主任。官运又亨通，财星再高照，在西安，由杨虎城主婚，我又将一个几乎是我女儿辈的女大学生何××纳为二姨太；在南京又独占了穆××为外妇，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三坐牢义交方志敏

1934年7月，我正在南京快乐逍遥，突然接到蒋介石发自南昌行营的召见电，还以为自己在南阳策反冯钦哉有功，又有封赏，兴高采烈赶到南昌晋见。刚见面，只听得蒋介石大喝一声：“拿下！”就被侍卫擒住，当天就被莫名其妙地甩进了南昌行营北营坊看守所。几天后才探知，我是当了替罪羊。事从杨虎城而起：彼时杨无端撤去马苑青的警备师师长之职，马是我的好友，当年是由我引荐给蒋介石的。为此事我到处张扬，大骂虎城不仁不义。而蒋介石另有盘算，他惟恐杨虎城有变，为讨好和稳住杨虎城，听信了熊式辉之言，略施弃车保帅之计，于是我便锒铛入狱。

这是我第3次造监自囚。这次从1934年7月到1935年9月，在狱中足足蹲了13个月，与方志敏同囚相交216天。

我虽为阶下囚，却也人情遍地，况且看我已三进二出，人们惟恐我再度出山，多少留些后路，看守长对我这个昔日的顶头上司很是尊重，13个月的铁窗生活，居然没有受折磨，堪称狱中特殊人物，颇有圈圈里的自由。

回想起这段牢狱之灾，其实倒应有庆幸之情。它成为我此生的真正转机，这就是狱中我做了3件事——也许这就是今天人民对我如此宽待厚爱的原因吧；义交方志敏；为方志敏策划越狱；传递方志敏遗稿。

那是我入狱半年后的一天，1935年1月30日，一群荷枪实弹的武装，冒雪押来四个拖着重镣的要犯。他们就是3天前被国民党军捕获的共产党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的领导人方志敏、刘畴西、曾仰山和后来叛变的王如痴。我目睹四位共产党大官，当今钦犯，一个个大义凛然，暗暗肃然起敬，好奇之心油然而生，便决心要伺机相聚，见见世面。

第二天，我踱到方志敏牢前，连叫了几声“方先生”，可是得到的回答是方志敏那警觉、蔑视的冷眼。但我不死心，还是想办法打通关节，得以同方志敏单独会晤。不断的见面，交情也就渐渐加深，无所不谈，彼此以“老方”、“老胡”相称。方志敏同我讲了北上抗日的意义和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事实，直言不讳地说：蒋介石是破坏革命的罪人。

有一天，顾祝同带着蒋介石要我“劝方自首，将功折罪”的口谕来狱中找我。我将此事通知方志敏。方愤愤地说：“投降？真革命者只有被敌人残杀，没有投降的。”我照实回复顾祝同。

7月，盛夏的一天，蒋介石亲驾北营坊，命人打开方志敏脚镣，叽哩咕噜谈了许久，未了怒气冲冲而去。蒋介石前脚出监，我就接踵我方志敏问：“怎么回事？”方淡淡地说：“无非是劝降，我只回了一句话‘你快下命令吧！’老胡啊，能这样死很痛快嘛！”

其实，方志敏并不象现今流传的那样坐以等死。一次，方悄悄地告诉我，决定来一次冒险的越狱行动，要我帮助安排，我不加思索，出于义气，满口答应。用五百块钱买通看守，为方志敏打开脚镣，当晚乘夜黑人静，引他逃出看守所，可是刚溜到门边就被哨兵发现，又重落罗网。

过了好几天，狱中由于越狱造成的紧张气氛稍有缓和，方志敏就拉我在他床边坐下，恳切地说：“老胡，也许是最后一次交谈了，我俩几个月的谈话不要随意外传，放在脑子里好好想一想。”说着从床底抽出一大卷纸塞在我手中，郑重地说：“你是一定能获释的，我们总算有过囚友之谊，拜托你，出狱后将这些东西交给上海四川路的鲁迅先生。”

1935年8月6日，我目睹方志敏带镣被押出监，当天被枪杀。我闻讯百感横生，有生以来第一次为朋友丧生而泪满衣襟，自己也搞不清是义气还是情谊，是愤怒还是敬佩。

1935年秋，我由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求情释放出狱。几天后，我不负亡友所托，在上海四川北路一片小菜馆楼座，将那卷纸亲手交给鲁迅派来接头的章乃器、胡子婴两先生。这就是以后由鲁迅传延安流传至今的方志敏遗著《清贫》、《可爱的中国》和《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三建监出洛阳再立“功”

我出狱不久，便官复原职。蒋介石又电令湖北省主席夏斗寅拨巨款给我，由我全权负责营建汉口军人监狱。这是我建造的中国现代第三座大型监狱。这自然又是一大肥差，事毕之后，我的长兄胡文通被委为监狱长，我自己则溜回南京享乐去了。

转眼到了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爆发，南京朝野乱成一团，居然又有人想到我胡逸民了。

大约 15 日，军政部长何应钦、陆军大学校长陆培根、特务头子戴笠 3 人突然登门造访，说要我火速北上搭救蒋介石，还说此任非我莫属。我也误为又来了飞黄腾达的机会，就以身负“特殊使命”飞洛阳去潼关。

潼关是西北咽喉之地，军事重镇，由西安事变发难人杨虎城部的十二师驻守，师长正是我那莫逆之交冯钦哉。见了冯师长，我开门见山以高官厚禄相许，巨额金钱收买，终于诱使冯军退至同州一线，潼关遂被陈诚部樊崧甫师占领，给杨虎城在军事上造成不利之势，成为蒋介石以潼关军事之优势向张、杨讨价还价的筹码。由于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策反冯钦哉倒戈叛杨，使西北军部队除十五师师长孔从周率部投共外，全部瓦解，杨虎城被迫出洋。

此番汗马功劳，朝野莫不翘指称道，万万想不到，蒋介石对此竟毫无表示，我那重入政坛的念头遂成泡影，回想起方志敏生前之言，殊觉蒋介石不仁不义，从此复出之心泯灭。

1937 年七七事变后的 4 个月零 8 天，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重庆，达官贵人都匆匆作陪都之行。连我的何姨太都跟毛人凤赴渝作了毛的抗战夫人！

这时，昔日的六朝故都，在和平门外曹后村和太平门外玄武湖畔竖起了两块招牌：“并耕农庄”“大士农场”。后者是国民党元老陈铭枢先生所办，前者正是我这个失宠军法官所创。“并耕农庄”匾额由于右任手书，还为我亲书“心积和平气，手成天地功”一联，意欲从此在铁蹄下偷生，躬耕自食不问政事。此刻的陈铭枢先生与我同气相投，不谋而合，所见略同，来往甚密。又谁知这竟是 4 年牢狱之祸的契机。

会汉奸同作虎牢吟

抗日胜利，国民政府浩浩荡荡“凯旋”南京，蒋介石说要整顿纲纪了。8年抗战，投敌将领有多少？可是首当其冲的却又是我，胡逸民！其实是蒋介石排除异己，罹罪于人。蒋介石召见我时连问三罪：一、为何不随国府至重庆；二、为什么与陈铭枢勾搭；三、资敌为奸。不几日，南京最高法院院长赵琛果真以汉奸罪传审，以世人皆曰可杀的罪名，名正盲顺地判我10年有期徒刑，押解南京老虎桥监狱。这里就是当年我当过监狱长的江苏第一模范监狱，牢房阴暗潮湿，臭气冲天，狱卒随便打骂囚犯、敲榨勒索，无所不用其极，被非人生活折磨身死者常有。此时自己成为囚徒，这才领略了“模范监狱”的滋味，面对铁窗寒影，不禁黯然苦笑，酸泪横流。命运之神同我开了一个如此大的玩笑，是讽刺，还是报应？这回我确实确实明白了自己营造和曾经主管过的监狱“政绩”了。

其实细细回忆起来，3条罪状也不无“道理”——除汉奸这顶帽子属“何患无辞”外，条条都“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陈铭枢素与蒋介石政见不和，我与之相处甚密，自然有“勾搭”之嫌；1942年后，我躬耕金陵时，曾在敌占区浙江金华开了昇永和公司，经营棉纱、布匹、针织品，聘同乡共产党人卢汉朝统管司政，外加那时不通法币，交易均以白洋、铜元流通。若以银、铜为战略物资论，似是授之资敌罪之把柄；最主要的一条，此时雄居最高法院院长的赵琛，正是我当年弹劾犯有贪污罪的政敌，此番公报私仇，存心陷害，似在情理之中。想到这里，自觉旧仇未报，新恨又添，对蒋介石和他控制的官场更切齿痛恨了。

不过，纵有千张嘴也辩不清，既是“汉奸”，就该与汉奸为伍。事有凑巧，竟与鼎鼎有名的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江亢虎、刘乙青、周作人一班人同监，交谈起来，彼此大有落魄英雄之感慨，几个“大人物”你一言我一语，吹捧我是“国家之柱石，民族之英雄”。可是那时我已看破人间事，看透世态沉沦，再无非分之想，决心跟江亢虎学诗词，以度铁窗岁月，“飞来横祸谁怜汝，唯有诗家解我忧”。长相聚，日日吟，不到3年居然也凑成200余首，集成一册，江亢虎题名曰《虎牢吟啸》，周作人写了序（此集1978年曾在香港自费出版）。还写了本《我和江亢虎先生》一书，由周作人序。

春雷动赖共产党重见天日

白雪皑皑的严冬，南京城一片混乱。我这个“汉奸”却在1949年1月23日糊里糊涂被释放出狱。一位朋友告知，原来是人民解放军三十八军军长兼郑州警备司令孔从周将军通过共产党内线营救的结果。此番死里逃生，不知应如何报答共产党和孔从周将军。

当时南京国民党主力已南逃，大官小官卷财而去，惶惶如丧家之犬，市井人心浮动。陈铭枢先生联合马苑青等人组织了一个维持会，我也积极参与，四处奔走，张贴布告，安定民心，保护六朝故都。

4月23日，南京解放。当天孔从周将军派车把我接到他的驻地，共叙旧情。孔将军对我备加慰勉，他说，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过了不久，当时南京出版社的《新华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出消息，称我和陈铭枢先生是保护南京，迎接解放的有功之人，对马苑青却未提及。此后我便经常出席由刘伯承市长召开的一些座谈会。8月接中共中央邀请，同陈铭枢先生一起到北京。

刚抵京，不待中共安排，我便跑到冯钦哉家去住了下来，意想摸摸共产党的底细。冯是我的姻亲，我的侄女就是他的儿媳，彼此无话不谈。冯早已弃戎经商，开一家仁昌银庄，一副商贾派头，不问政事。直到10月1日国庆大典，才知陈铭枢出任农林部长，而我还在冯家逍遥。殊不知冯比我捷足先登，银庄早已献给政府，改组成中华实业公司，他曾劝我参与其事，我始终未置可否。到1950年开业典礼时，果然由林伯渠、董必武提名聘我为常务董事，送来了董字第二号聘书。

我自命为三民主义信徒，虽对共产党人士的情深义重五体投地，但对“无产阶级专政”却心意惶惶。眼看邵力子、孙蔚如等过去党国要人都追随中共大展宏图，认为是被“荣誉所惑”，自己历尽铁窗风云，早已身衰力竭，索然无志，于是婉言退聘。

又是一个严冬日子，爱女告急说，南京的开罗饭店，后曹村的并耕农庄，四牌楼其昌里和塘坊桥别墅“均被指定清算之列”，急得我如锅上的蚂蚁，病急乱求医，求救于已当上部长的陈铭枢。农历正月15日，接陈复函云：“逸民兄，奉书不胜惊叹。弟不日即返，当待尊书面询当局。兄一面向南、王诸先生请教可也，匆烦日好。”被婉言拒绝。信中所说“南、王”是指南汉宸和王炳南。二位与我交情甚深。1930年王炳南出洋留法时，我任杨虎城驻京办事处主任，出国护照都是我给办的。我知道眼下是“人民翻身”的日子，女儿说：完了，完了，家不能保，人不能保，有人说你是反动派，弄不好又进劳改场终身监禁，不如逃走了吧！我自恃求情无着反成话柄，遂于1950年旧历4月底偕南京外妇穆××所生爱女，怀着“茫茫天涯何处容身”之心弃家外逃，端午节抵达九龙，从此几经波折，在香港过了30年寓公兼菜农的日子。

鬓如霜家山乡路情谊长

30多个寒暑，一万多个日日夜夜，我身在他乡，哪一天不想千里家乡一日还。可是“山色湖光跻脚底，秋客晚景触心头”，“欲上高楼还却步，怕将老眼望中原”。在香港与曾在民国元年时同登龙虎榜的国民党老外交家谢湘重聚，谈及一生如履薄冰的宦海生涯，想起家乡一草一木，每每唏嘘良久。

俗语说：好有好报。果然人民没有忘记我。1980年秋，囚友方志敏之子方兰专程来港问及方志敏遗稿传递详情，我婉言流露思乡之情，很快，我得到党和政府的帮助，不久就回故乡定居了。

那一日，回到故乡浙江省永泉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在招待所宴请我。忆旧睹今，酸甜苦辣一齐涌上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激动得只说了一句话：“伟大，伟大，共产党伟大！”

去年，全国政协邓颖超主席得知我以百岁高龄走完坎坷之路，落叶归根，备加关怀，赞我追随孙中山，为孙中山扶灵和传递方志敏遗稿有功，中央办公厅还发出专函，嘱当地政府从优安排，免费分给三室一厅新住宅，颐养天年。

路，曲折的路，迷茫的路，幸运的路。世态沉沦，是耶非那已有分说，我这个不普通的百岁老人——一个三番建狱，四次坐牢的国民党中央监狱长，如今算是“大器”晚成，才真正懂得了一些为人哲理和人生的真谛。

从拥蒋到反蒋的李济深李济深汤山被囚经过

李达潮

- 盛传三陈倒李
- 五老甘言诱骗
- 忍无可忍
- 获罪反抗中央
- 群龙元首
- 我们当萧何好啦，让他去做刘邦罢！
- 谁打算和蒋争江山？

1928年，蒋介石卷土重来，爬上了“国府主席”地位。他一方面通过所谓“训政时期”开始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另一方面复召开“国军编遣会议”，阴谋削弱非嫡系武装势力——冯玉祥之第二集团军、阎锡山之第三集团军，李宗仁之第四集团军，——而壮大自己的嫡系部队——第一集团军。但其时各地政治分会尚存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势力空前膨胀，他们不仅拥有十多万兵力，而且控制了北平、武汉两地政治分会，最招蒋介石之嫉视。李济深是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并兼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统率陈济棠（第四军）、陈铭枢（第十一军）、徐景唐（第五军）等粤系部队。由于李是广西人，故经常缠夹在蒋桂之间，且被目为亲桂系人物，因而也受到蒋的猜忌。当时蒋桂关系既紧张，蒋在阴谋削弱李、白势力的同时，也暗中进行分化李济深辖下的陆海军势力。这是一场由蒋介石挑起来的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斗争。由于蒋介石不顾信义，诱骗李济深入京加以扣留之后，使斗争更趋尖锐化，直接间接演变为粤桂战争、蒋阎冯中原大战及宁粤分裂对立。在李济深被扣汤山期间，我以昆季关系陪他生活在一起，但由于我个人刚从欧洲返国，且一向专心医务，平日不问政治，故对此次事变前的复杂内幕，了解得还不深透，下文所述只是个人当时所接触到的一些片段回忆。

1928年间我还在德国学习，那时我名义上还兼任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军医处长。是年冬，我在柏林接到总部副参谋长张文的电报，催我立刻回国筹划陆军总医院。我便于12月间离欧经西贡回国。回到广州后。我接任潮（李济深字）自南京来电嘱我在粤候他一同回乡做先母逝世周年忌祭。不久，他便动身回粤，同他一道回来的有古应芬（国府文官长）。我见古应芬时，他对我说：“蒋主席派我代表他前来致祭令堂，我理应到你们贵乡一行的，但年纪大了，近来身体又不大好，沿路要坐山兜（上山轿子的粤称）很不方便，因此决定不去了。现在我把蒋主席赠送的祭仪三千元交你代办一切好了。”（事后证明，古正是受了蒋命，故意逗留广州和陈济棠、陈铭枢、陈策三人秘密勾结倒李任潮）古既然不去，我便陪同任潮回到广西梧州大坡乡老家，在乡中办妥家祭以后，才一同回穗。

其时广州已有谣言，盛传“三陈倒李”，我回穗后医务界有人获悉这一消息，告诉了我，并请我转劝任潮切勿入京，去则恐有不测。我因出国日久，对国内形势认识很模糊，只觉得一入国门，又见到有发生内战迹象，心中感到惶惑。我把消息对任潮说了，任潮说他对此有所闻，去京虽然可能有危险，

但目前蒋介石与李、白方面关系如此紧张，自己不出面调停折衷，则蒋、桂之间可能因破裂而导致大战，那时岂不更糟。我听了心里也以为还是入京一行对大局有好处。

那是 1929 年（民国十八年）2、3 月间的事，其时国民党在南京一方面召开中央会议，另一方面又召集了国军编遣会议。任潮对于“编遣会议”心里很不以为然。在他说话中常流露：这次会议是蒋用来打击桂系和阎、冯的。他还说，如果要编遣，就必须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除了汰弱留强这一条之外，还该照顾到各方面部队按比例平均编遣。这些主张当然是和蒋介石的削弱异己、壮大自家的阴谋打算相矛盾的。在任潮决定赴南京之前，据我们一班属于任潮左右的亲信人物估计，任潮主张外有阎、冯、李、白支持，本身又有粤军将领拥护，蒋未必敢一意孤行。从政治形势看，任潮负责广州政治分会，李、白控制北平、武汉两分会，阎冯又控制了太原、开封两分会，大家联成一气。加上滇闽两省当局也倾向于任潮，因此，蒋介石格于形势，谅不敢对任潮有什么不利。此时陈济棠、陈铭枢亦奉召入京开会，任潮离穗之后，负巩固广州后方者更是他的亲信徐景唐所部第五军。因此，大家便没有什么顾虑，赞成任潮入京出席会议。任潮离穗前把八路军总部付托给参谋长邓世增，副参谋长张文二人主持军务。

我当时没有陪任潮北上，事后听说任潮到上海之后，就有一些友好力劝他不要入京，免被老蒋扣留。当任潮在犹豫之际，蒋却派来了所谓“五老”——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继。过去任潮对这几个国民党老头儿是很尊重的。在他们的甘言诱骗下，就上了大当，毅然和他们一起入京见蒋。但不到几天，便被蒋扣留了。

事后任潮曾谈过被扣前一些情况是这样：

任潮入京见蒋时，曾当面向蒋建议不要继续向湖南增兵，以免与桂系部队发生冲突，希望一切问题通过谈判解决。蒋当面答允，也赞成和平解决。任潮即去电李、白告知蒋的态度，并劝李、白有所抑制。不料蒋并不履行诺言，事实上仍继续向湖南增兵，加紧向李、白部队进行压迫。李、白见蒋如此不顾信义，便电任潮提出诘责。任潮知道已受老蒋欺骗，也忍无可忍，忿然复电李、白，大意说：如蒋军继续入湘相迫，可予迎头痛击。不料该电未拍出便为蒋特务截获。蒋即指任潮蓄意勾结李、白反抗“中央”，下令扣留任潮于汤山。

任潮被扣后，蒋与桂系之间已失去一个缓冲人物，结果，蒋、桂之间爆发了战争，李、白等原在北平、武汉一带拥兵十多万，但也由于内部被蒋分化收买，终于吃了一系列败仗而退守广西老巢。

任潮被扣留消息传至广州时，八路军总部在参谋长邓世增主持下曾开了一次紧急会议，那天我也参加，会上众人情绪激昂，多数人主张对蒋采取强硬态度，甚至不惜一战。但讨论结果又觉得陈济棠在京未回，陈铭枢在香港养伤（陈在赴京过港时寓皇后酒店，因酒店失火，跳楼而足部受伤），还是等他们回来表示态度之后才好有所举动。

不久，陈济棠便由京回港，海军司令陈策派了海虎舰赴港迎接他返穗。陈济棠抵省河时并不立即登岸，只分别约八路军总部人员到舰上见面，表示自己决定就蒋所委任的广东编遣区主任职务，并劝大家不要因任潮被扣而过于激动。尽管陈在表面上也骂蒋不对，并说了一些同情任潮的话，但他的取而代之的意图，是大家看得出的。记得那时徐景唐最恼火，他曾当面警告陈

济棠不要开军队进广州，否则冲突就不可避免。当时徐的第五军负责巩固广州，桂系黄绍雄所部已挺进三水肇庆，在这样情况下，广东境内是有爆发战争可能的。

由于三陈反李的态度已明显，在广州的亲任潮人物都感到局势严重，徐景唐虽然慷慨激昂，但参谋长邓世增却徘徊犹豫，举棋不定。当时大家还指望冯祝万自沪回来能提出一个积极的办法，但冯祝万回来后却不主张打。记得我去见冯时，冯对我说，事情如此糟糕，完全出他意外，说时还淌了眼泪。至此，八路军中虽不乏同情拥护任潮之将领，但由于群龙无首，结果，在陈济棠、陈铭枢、陈策的联合压迫下很快便软化了。陈济棠登陆后即宣布就任广东编遣区主任新职（后来蒋又发表他兼任八路军总指挥）。我当时曾去见陈济棠一次，陈要我仍留任八路军军医处长，又要我去三水一行，劝阻黄绍雄军不可东下。我退出后即将意见告知李民欣：我不但不去三水劝阻黄绍雄，且要请准我辞去军医处长职去南京探视任潮，并请他转告知陈济棠。李民欣见陈济棠后，陈也同意我入南京，便派温泰华接替了我的军医处职务。

我到香港候船赴沪入京。过港时曾到医院看望陈铭枢，陈那时还躺在病床上。他对我说：“任公事情并不要紧，安全上一定没有什么问题”，对我入京也表示赞成。

到了南京，我便上汤山见任潮。那时吴稚晖也陪任潮在汤山居住。据说吴在任潮被扣后，曾假惺惺地和蒋吵了一次，并向任潮表示自己很不同意蒋的做法，并说他也留在山上相陪，蒋不让人，他也不下山。实际上看来，吴老头子当时留在汤山，显然也是蒋布置下来的。任潮被扣留后，蒋的一切意见都是通过吴老头子传达给任潮，任潮有意见也只能托吴去转达。

由于我初到南京，吴便殷勤地带我去漫游京郊名胜。记得有一次，我随吴游紫金山时，吴在聊天中曾说：“我们还是当萧何好啦，让他去做刘邦罢。”我当时听了很不舒服，也率直地问他：“谁打算和蒋争江山？”

任潮在汤山居住期间，每天都是下棋、读书、写字、做诗，生活是闲适的，但却和外界断绝了接触。这样他被软禁了几个月之后，吴稚晖向蒋建议，让任潮回南京市内居住。蒋同意了之后，在吴的布置下，任潮离汤山那天，首先便去见蒋介石。记得那天由吴向导，我也作陪。三人同车到了蒋的官邸，在客厅候了一会，蒋才出来相见，但态度很冷淡。任潮就过去事情谦虚地说了几句之后，蒋冷然答道：“我是为党为国的。”当时我听到他的说话，心中非常愤怒，因为他扣留任潮，不过是企图消除异己，哪里是为党为国呢？这一次见面时间不过半小时。任潮辞出后便回到鼓接五号私宅，但当时也并不自由，蒋派了一排兵驻在附近，名为保护，实则监视。

任潮在这样的失自由情况下，一直过了两年多，直到1931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宁粤双方在沪举行和谈，达成了协议，任潮才和胡汉民一道被恢复了自由。蒋那时也一度被迫下野，林森继任国府主席，任潮旋被任为军事训练总监，仍留在南京工作。

我作李济深先生的家庭医师

谭守仁

- 李宅大门外，宪兵戒备森严
- 蒋介石下野，李先生获释
- 蒋介石眼里的“钉子”
- 秘密保护叶挺
- 痛斥蒋介石
- 高举反蒋旗帜
- 奔赴解放区
-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 “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
- 诤友

李济深先生逝世已经 26 年了。

从 30 年代起，我即做李济深先生的家庭医师，直到 1959 年他逝世为止。在长期相处的日子里，我们彼此了解根深，尤其使我难忘的是，我参加民主革命，曾得到他的指点和教诲，因此我一直尊他为师。现在，我把珍藏心中 20 多年的记忆写出来，用以寄托我对李先生深切的怀念。

—

说起来，我和李济深先生的交往，开始于 20 年代中期。

1925 年，我是北京医学院的学生，当时，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北方革命出现了高潮。我同许多爱国学生一样，满怀爱国的革命热情，参加了国民党友派。1926 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方革命局势急转直下，进步同学纷纷南下参加北伐。我因已决定赴德留学，悄悄潜至武汉，去见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彭泽民。由他介绍，我一到柏林，即参与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驻德支部的工作。不久，又担任了驻德支部书记、常委，兼中欧通讯社社长。

中欧通讯社是国民党在柏林设置的一个宣传机构，它的总领导人，就是国内的广州后方总司令兼北伐军总参谋长李济深先生。通讯社雇有外国工作人员，每天负责把李济深先生从国内发来的关于北伐进展的电讯，翻译成各国文字。编好的新闻通讯稿，由我签字后发给各国通讯社。通讯社的经费由李济深先生寄汇，每天一千马克。当时中国革命在德国等欧洲各国的影响很大。天天有北伐胜利的消息传来，德国的工人们总要欢欣鼓舞地聚集在车站上举行万人庆祝大会，其情景实在令人感动。在中欧通讯社的这段工作，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那时我虽然还不曾与李济深先生见面，但我对他这位驰骋疆场的将军，怀有一种景仰之情。

没过多久，事情发生了变化：国内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彻底断送了。我那时候并不知道事情真相，但是眼看中共同志陆续退出国民党驻德支部，德国工人兄弟对北伐的消息也不再那样欢欣鼓舞了，国民党在欧洲的声望一落千丈。我看国民党不再实行孙

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很失望，于是离开了驻德支部和中欧通讯社；以后也没有参加国民党的重新登记。从此一心一意从事医务工作。

二

1930年我从德国回到南京，在卫生部任职。有一天，我的老朋友、李济深先生的胞弟李济汶来看我。济汶和我不仅是北医时的同学，而且是驻德支部时期的同志（那时他正在德国考察医学）。他比我回国还晚一些。他气愤地告诉了我李济深先生被蒋介石软禁的消息。他说，本来，李济深先生是拥蒋的。1928年以后，国民党内部矛盾日趋激化，李先生目睹蒋介石独裁卖国、排除异己的卑劣行为，对蒋深为不满。蒋介石觉察到这点，因此怀恨在心。1929年蒋介石通过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四人，“请”李济深先生到南京调停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设想到，他刚一到南京，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就把他扣在了汤山。后来在吴、张、李、蔡的力保之下，他才被“放”回家，从此软禁在南京鼓楼头条巷他的私宅内。

济汶希望我以私人医生的名义照顾李济深一家。我很乐于为李先生服务，在济汶的陪同下，我去见了李先生。

我们在李宅大门外，被戒备森严的宪兵拦住。宪兵查问我是干什么的？济汶说：“是医生，刚从外国回来的！”宪兵这才放我们进去。李宅院内是一座小别墅，有一个排的宪兵驻在院内下房，日夜站岗，严密地监视着李先生的行动。李先生一家住在上房。

没见到李济深先生之前，我以为他既然是赫赫名将，必定威风凛凛，严肃可畏。一见面才知道他个子矮矮的，胖胖的，和蔼、谦虚、平易近人，完全不象个军人，倒象是个政治家。当时和他住在一起的有他的两个夫人及孩子们，龙飞群副官也追随在侧。

第一次见面，我们忆起中欧通讯社和北伐的往事，谈得很投机。李济深先生很愿意我来作他的私人医生，这件事就这样说定了。后来，我特地辞去了在卫生部的职务，由李济深、张治中、王宠惠、胡定安出名，公开登报开业行医，以便自由出入李宅。我和李济深先生一家人很快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李济深先生被软禁期间，一直泰然自若，从未气馁。由于宪兵“挡驾”，除了他的老部下和亲戚舒宗鎏偶尔去看望他外，其他朋友们很少能来他家，他的行动被严格限制在自己的私宅内，决不允许越“雷池”一步。有一次他牙痛，我是内科医生，看不了牙病，在当局的允许下乘车到外面就医，但仍有宪兵“保护”。可见他当时已完全失去了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李先生几乎同外界隔绝了。他是个爱孩子的人，每天都要和儿女们一块儿寻乐，除此之外就是下下棋、打打台球，看上去日子过得倒也平静。其实，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他始终都在关心国家的形势，一直也没向蒋介石的高压政治低头。他很注意看报纸，我和舒宗鎏常常给他带去一些外界的消息。记得我们常常在一起谈论时局。“九·一八”以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李济深先生后，李先生十分愤慨。他这个人修养很好，平时绝少冲人发脾气，但是那次他可是真动气了。他那激愤的神态，至今还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1931年冬，石友三兵临浦口，扬言要炮击南京。整个南京人心惶惶。李济深先生在软禁中不能走脱，嘱我将他的夫人送到上海邓家彦家里暂避（邓

时任国民政府委员，与李先生私交甚笃）。我到上海后向邓先生讲了李济深先生的近况。邓透露说，蒋介石因主张不抵抗，受到国民政府内多方指责，已进退维谷。他要我告诉李先生千万静心等待。果然，没过多久，蒋介石宣布下野，李济深先生获释。他更加坚定地从事反蒋抗日活动，大力支持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并且于1932年春组织了福建人民政府。这一段时期，我由于携眷回重庆原籍行医，没有和李先生在一起。

我在重庆时因患吐血症，生活窘迫。李济深先生得知这个消息后，接济我路费，让我回南京治病。于此可见，李先生是很爱帮助人的。

三

抗日战争爆发，我在江苏医学院任教授，率领学员在苏州、无锡一带救护伤病员，一直未得到李济深先生的消息。1937年11月，我逃难至重庆，没想到竟与李济深先生重晤。那时他暂住在神仙洞附近。

我去看他时，他告诉我，为了实现他“坚持抗战”、“实行民主”的两大主张，他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凡主张抗日的，应当不分党派，一视同仁，加以任用；凡不抗日的，不管是谁，一律不予使用。他举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的领导同志，认为应团结他们，共商抗日救国的大计；而对国民政府里那些亲日派们，他认为绝对不能任用。蒋介石表面上勉强接受李济深的意见，组织了一个包括冯玉祥、周恩来等在内的“战地党政委员会”，蒋自任主任，邀李济深先生来渝任副主任。但是暗地里，他对李济深始终没有放松提防。他既怕李的威信在人民群众中上升，又怕李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李济深先生在他眼里一直是一根“钉子”。1940年，他终于把李先生调出重庆，派往广西作桂林办公厅（前身是桂林行营）主任。

从李济深先生调离重庆后直到抗战胜利，我一直没再见到他。后来听说，他到广西后，坚决支持抗日民主运动，掩护民主人士；各民主党派在桂林得以自由活动，以至后来发展成为抗日民主同盟。香港沦陷后，从香港及各地逃到后方的爱国民主人士，许多都不去重庆而滞留桂林，这同桂林浓郁的民主空气不无关系。李先生还主张敌后抗战，他在广西组织了民众的抗日游击战，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遥相呼应，互相支持。

解放后，舒宗鎏亲口告诉我这样一件事：1941年皖南事变，叶挺将军不幸被俘，曾被软禁在桂林。后来，蒋介石命令用汽车把叶将军从桂林经贵阳押往重庆，阴谋在押解途中秘密杀害叶将军。李济深先生洞烛其奸，密令办公厅二处处长舒宗鎏改以飞机护送，使叶挺将军安全抵渝。蒋介石闻讯大怒，责备办公厅为何违抗他的命令。舒宗鎏回答也很巧妙，他说叶挺系“要犯”，为了防止中途脱逃，才改用飞机押解。这么一来，蒋介石也无话可讲了。

四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满怀胜利的喜悦和希望从重庆到了上海，满心以为从此可以一心一意地重振我的医业了。没想到上海街头，美国大兵代替了日本兵，继续横行霸道，中国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使我感到很失望，也很愤慨。

1946年，李济深先生也来上海了。他派龙飞群副官，把我叫到他下榻的

陈诚公馆里。久别重逢，喜出望外。畅叙别情之后，我们的话题自然转向国内国外的形势。李先生痛斥蒋介石撕毁重庆协议、阴谋发动内战。他说，此次来沪之前，他曾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他多次劝告蒋介石不要发动内战。蒋介石拒不接受他的忠告。李济深先生看透了蒋根本无意实行民主，迟早是要打内战的，于是借口要为儿子沛金准备赴美留学的事宜，来到上海。

李先生在上海住了不到一年，我继续作他的私人医生，经常到愚园路陈诚的公馆里去看他。他来上海到底干什么是很秘密的，对我并不曾说起。但我见沈钧儒、谭平山等民主党派的首脑人物，常来陈诚公馆找李先生，暗自猜测他们可能是在从事某项秘密活动，不过他既然不说，我也从不问。记得我们还曾在愚园路的花园里合影留念（可惜这张照片“文革”当中丢了）。李先生常常鼓励我，要为民主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使我深受启发。

不久，有一天，我又去看他，只见人去楼空，李先生已经秘密潜离上海。以后大约半年多的时间，不知他去向，音讯全无。

1947年冬，我从报纸上见到他在香港组织民革、举起反蒋旗帜的消息，备受鼓舞，同时也证实了我原先的猜想：他在上海期间，的确是在秘密从事反蒋民主活动，为了便于掩护，他才住在他的老部下陈诚的公馆里。

当时适逢重庆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云集上海，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振奋。自此，香港、上海的反蒋民主运动，同全国各地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结合起来，汇成一股革命洪流，冲击着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我也投身于这一革命的洪流。

这时，原民盟重庆召集人董时进正在上海组织筹建“中国农民党”。董在重庆时是我的老病人，因得知我与李济深相识，再三邀我参加筹备，董毕业于清华大学农业经济系，后留学美国。这个党多数成员都是研究农业问题的知识分子，它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标榜“要为占全国人口85%的农民解除所受的经济、政治上的压迫”。我通过酆云鹤，向在香港的李济深先生报告了上海农民党的事，并且请示我是否可以参加这个党。酆很快带来了李先生的信。李在信中表示，同意我参加农民党，并说由他向在香港的中共华南分局连贯同志介绍农民党成立的情况。他捎信要我劝说农民党和在沪的其他民主党派，向中共的统一战线一边倒，彻底放弃“中间路线”的幻想。李先生说，我们从事的民主运动，是向反革命势力的最后决战，在这场决战中，一个政党不站在革命方面，便站在反革命方面，没有“中间路线”可走。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革命力量的联盟，我们都应当“倒”向这一边。

李先生的这些话，对我启发很大。我参加农民党以后，照他的指示去做，积极向各党派人士宣传他的这些思想。我在农民党内担任中央常委兼外务部长，经常与张澜、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谭平山、汪世铭、章乃器、伍宪子、张云川、储安平民主人士联系，互通消息。李济深先生从香港给我们送来的革命宣传品，也是通过酆云鹤带来的。当时上海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许多民主人士都失去了自由。我有一辆私用吉普车，车身挂一个红十字标志，能在街上自由地跑来跑去。酆云鹤在虹桥机场下飞机后，我就开着吉普车去接她，国民党海关光注意查走私了，这些宣传品一次也没出过“漏子”。李先生送来的宣传品和转达的中共华南局的各项指示，对于我们开展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1948年5月，李济深先生通过管椿树给我送来有他和其他12位在港民

主人士签名的响应中共“五一”文告的通电，通电中说：“乃读中国共产党‘五一’劳动节号召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电达中共表示同意外，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李先生还捎信告诉我说，中共华南局希望各党派的朋友们在国内造成拥护“五一”文告和召开新政协的舆论。

接到通电和李济深先生的信后，我很振奋，立即遵照他的指示去做，农民党很快就公开发表了响应“五一”文告的宣言，董时进也在《现代农民》杂志上发表了拥护文告的文章。1948年秋，董时进前往香港，通过李济深与中共华南局负责人潘汉年同志联系。1949年初，我同董时进一起，再次去港访问李济深先生，想共商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事宜。不想，由于信息不灵，到香港后方知李济深等30几位民主人士已于1948年12月26日乘船离开香港北上，奔赴我东北解放区。我们迟了一步。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李济深先生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他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为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奋斗。

建国后不久，我应李济深先生之召来到北京，继续担任他的私人医生，他主张我继续开业行医，为此，他亲自给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写了50余封信，向他们介绍我的情况，嘱我为他们服务。

作为一个军人，李济深先生的大半生是在旧中国战场上度过的，他身经百战、历尽艰辛，更曾为反蒋而遭受种种迫害，身心受到摧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给予他崇高的荣誉和极大的尊敬，他心情格外舒畅。他容光焕发，身体健康，时常精力充沛地出席人大、政协及最高国务会议，参与国家大事的领导工作。他曾对我说：“现在是我平生最愉快、最幸福的时期。”他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对党的领导充满信心。他对我说，在参与国事的协商时，他总以坦率、诚恳的态度，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自己的意见，赞成也好，反对也好，绝不隐晦。他还提出过一些建议或批评，大多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采纳。他热情地推荐有代表性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参加政协或民革组织，其中有旧军政人员、科学家、演员、棋手等，甚至还有和尚。我参加民革也是李先生亲自推荐的，他为我1947—1949年期间在上海参加反蒋活动的历史，开具证明，推荐我做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李先生曾因他所推荐的人有“历史问题”而受到牵连，但他并不为此懊悔。他有两条原则，一是“一视同仁，任人唯贤”，一是“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即使在“民革”内部，他也从不搞私人小圈子。因此他在各民主党派人士当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在香港的时候，各党派公认他和他领导的“民革”为各党派的首脑；195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先农坛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大家又一致推荐李济深先生向大会致贺词。我觉得李先生称得上是共产党的诤友，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解放前，李济深虽身任“要职”，却很少购置私产，据我所知，他只在

上海、南京、香港有三处私房。解放以后他卖掉了这三处房产，钱都捐作农业化肥用。党和政府给他优厚的待遇，但他依然生活简朴，平时以弈棋、书法、赋诗、打台球自娱，很少举行宴会。

我与李先生私交甚笃，他家人生病亦由我看。每遇年节或生辰庆日举家团聚时，我常被李济深先生邀为座上客。他对我的孩子们也很关心，我的两个儿子新华、卫和出生时，名字都是由他取的。记得1954年卫和儿出生时，李先生亲笔为之题写了：“卫和，保卫和平乃每个人的责任和致力的目标，有积极的意义。”这时他的小儿子也出生了，他为之取名为“保和”。李先生还亲自给陈毅、陈士榘同志写信，介绍我的长子时霖前去投考华东军政大学。

六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一直很关心李济深先生的健康情况。李济深先生自己很善于保养，平时他除了血压稍高外，没有发现有什么器质性疾病。1959年初，他忽然食欲不振，面容消瘦，中医诊断为胃肠消化不良，服过一时期中药后，未见好转。我发现他血压下降很多，于是提高了警惕，立即反映给警卫秘书，送他到北京医院住院检查。当时院方并没有告诉我检查结果及诊断情况。事后才知道，李先生不幸患了胃癌。为了让他尽情欢度10年大庆，周总理亲自指示，李济深先生的病情要严格保密，以免他本人增加精神负担。

1959年国庆节，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0周年。李济深先生暂时出院。他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来自全世界各国的朋友们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杯庆祝祖国10年来的伟大成就。他还带着全家儿孙，观看了人民大会堂丰富多采的文艺演出。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癌细胞在他的肌体内正急剧扩散。

国庆节后的一天深夜，家人发现他沉睡不醒，唤我去急诊。我立即送他到北京医院抢救，可是已经晚了，他从此再也没有苏醒过来！

李济深先生弥留之际，周总理曾亲往医院探望，并向家属讲了话。大意是：我已嘱医院苏联专家尽力抢救。任公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很多贡献，能保持晚节诚属幸事。我们也有一个晚节问题。

当时我也在场聆教。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先生去世了。他的灵柩停在中山堂，毛主席深夜亲临哀悼。党和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抗日勇将方振武宁死不向蒋介石低头的将军

陈敏之

- 方老总就是这个脾气
- 愤怒！愤怒地踏过泅口大铁桥
- 策动倒蒋，机密泄露
- 囚禁——改变不了将军的意志

继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后，7 月 15 日，汪精卫集团亦公开叛变革命，在武汉地区疯狂地残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大批青年学生被逮捕、杀害。当时我在武汉，就在这阵腥风血雨中，我摆脱了敌人的追捕，投奔了西北军方振武部队。

强悍的部队

方部第一军军长阮玄武是我的同乡、世交和前辈，当我来到驻军所在地湖北樊城的时候，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他问我多大岁数，我说24岁。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爽直、健谈，有儒将的风采。当他知道我是从武汉前来投奔部队时，便笑着说：“会干政治吧？咱们部队也有政治部。”不几天就正式委任我为第一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一天，方振武将军从对岸襄阳来到樊城检阅部队，当他看到满城都是五彩缤纷的标语和“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军阀”，的大幅漫画，部队的政治工作国有一批年青人而显得有生气时，便露出了满意的微笑。阮玄武身材高大，戴着深度的眼镜；方比阮稍矮一些，身子结结实实，方脸、浓眉，两目炯炯有神。两位将军都具有朴素、爽朗的军人性格。他俩相处多年，袍泽情谊根深。部队流行着习惯的称呼：“方爷”、“阮爷”，既显亲切，又含崇敬。

我在部队中经常找些人闲聊，了解到方振武是贫寒人家出身，幼年家贫如洗，长大时以挑卖凉水为生。他的寿县同乡说：“方爷从小就打穷光棍，大热天挑着担子在镇头上叫卖，‘水不凉不要钱’，谁会想到一个穷小子今天能成为统辖五万大军的总指挥呢？”

我来到这个部队后，既感到好奇又感到新鲜。天麻麻亮，营盘就红火起来，号角声，歌唱声把人从睡梦中唤醒，政工人员也不例外，都要准时参加西北军特有的传统“朝会”。我最感兴趣的是“大刀队”，操练起来，威武雄壮，系着红布条的大刀“唰、唰”地飞舞着，煞是好看。据说在战场上每当短兵相接的时候，敌人遇到大刀队便闻风丧胆。部队素质很好，多是直、鲁、豫人，年轻力壮，英勇善战。部队的骡马队也很骠悍，在运军粮、辎重等方面担负着繁重的任务。我感到这个部队的战士富有中国北方豪放强悍的气质，生命力旺盛，战斗力很强。

一次阅兵，我好奇地观看广场上整整齐齐的部队，发现兵种相当齐全，有步、骑、炮、工、辎，这使我深感意外，一向认为西北军底子穷，装备差，实则不然，军队边打仗边扩充，不断地吃掉敌人，壮大自己。当时方振武部队拥有3个军，还有新兵师、骑兵旅、特务团等等，这支军事力量不可小看，好比下棋，小卒子过河，可以拱掉老将。为什么蒋介石老是算计着方振武，原因就在这里。

“方老总就是这个脾气”

方振武从来就瞧不起蒋介石，他常常对自己的心腹将领说：“当我参加革命的时候，蒋介石还在上海搞交易所呢！”方振武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曾经带兵进攻南京城。尔后又广州追随孙中山先生举兵北伐，带兵攻入江西，立过战功。他自恃老革命，当然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可是蒋介石拥有政权、财权、兵权，在力量的对比下，他又不得不巧予周旋，保存自己的实力。而且在新旧军阀的混战中，鹿死谁手尚不可知，方振武也很机智，从容不迫地对付蒋介石的纵横捭阖。不过他从来不称呼“蒋总司令”，而只是勉强地称呼“介石同志”。方的将领常常引此为笑谈，说这就是“方老总的脾气”。其中也有些老于世故的僚属埋怨：“胳膊拗不过大腿，人家是总司令，你不过是一个方面军的总指挥，拗得过去吗？”不过，我们当政工作人员的，反而十分赞赏方老总的这个脾气，因为这样可以避免直接挨到蒋介石的两把刀子：一割灵魂，二割脑袋。

曲折的演变

这支部队原来属于西北军，以后又脱离了西北军。方的老部下都能熟背这段历史。

1926年1月15日，方振武对他的部下说：“我方某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多年，从今天起立即行动起来，同冯玉祥的国民二军靠拢、合作。”接着他在山东鄆城发出了通电，宣布改为国民军（即西北军）第五军，并由冯玉祥通过当时的“执政府”，任命方振武为直鲁豫边防总司令。2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方在顺德还召开了军民大会进行纪念。

方振武自从加入西北军后，在与奉军、直鲁联军反复较量时，都身临前线负责指挥。由于国民军一再失利，冯玉祥宣布“下野”赴苏联游历去了。

当西北军处于困境，精锐部队和重要装备损失很大的时候，独有方振武所带的第五军还保持着完整的编制，于1926年8月开到五原进行休整。

1个月后，冯玉祥从苏联归来，他偕同共产党员刘伯坚和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人来到五原。9月15日那一天举行阅兵式，冯玉祥和苏联顾问特别称赞了方振武部队。9月17日，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誓师大会，冯玉祥宣布国民军全体参加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接受孙中山亲手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冯玉祥、方振武、阮玄武等都庄严地宣了誓。当时的政治气氛很浓，革命热情很高。可是，到了1927年4月，政治风向突变。蒋介石背叛大革命，施行各种反革命策略，从而导致局势恶化。冯玉祥同蒋介石联系后，遂把国民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并把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刘伯坚等“遣”走。经此大起大落的历史性演变，全国呈现出大小军事势力时分时合，混战不已的态势。

由于历史的曲折，方部曾几易番号：初为“国民第五军”；在冯蒋合作时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部队到达湖北襄阳、樊城后，遂正式宣布脱离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接受武汉政府委任的“国民革命军中央直属第九方面军”。当时方部中的有识之士，都为如此大起大落的历史性演变，不胜唏嘘叹息，他们担心日趋激烈而又复杂的混战局面何时才能结束？可他们对“方老总”还是有信心的，相信他不会背弃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把部队引向祸国殃民的邪路上去。

火车上的一次会见

大混战中走马灯式的人物，时而“下野”，时而上台；时而联合，时而分裂；时而握手言欢，时而火拼厮杀。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宣告“下野”，9月东渡日本。实际上，行前他早已把讨伐唐生智的军事部署策划好了，由桂系部队开进武汉，并拉拢方振武，由“军事委员会”给以“讨逆军北路军总指挥”的名义，兵分三路分由汉水和襄阳花园公路向武汉进军。其实，所谓“讨唐”并未接火，这不过是一个小小插曲而已。

我随军出发到达武汉，故地重游，回想一年以前大革命时代的火红年月，不禁感慨系之。当部队开拔时，我又匆匆上路，想不到就在开往孝感的火车上，方振武特地约我到他的车厢里作第一次的正式会见。

“阮军长早就同我谈到你，你们搞的宣传品，我也看到过，唐孟潇（即唐生智）的标语不要再贴了，我的意思你懂吗？”我点点头。他又说：“你读过《三国演义》吧，你顶佩服谁？”当时我很难作出回答。接着他又笑着说：“我们搞过五原宣誓，开会挂过列宁像，可今天我们同蒋介石搞在一起，打唐生智，你说怪不怪？”说完他叹了一口气。当时他的表情给我的印象很深，分手时他讲的话我也记得清清楚楚：“我们部队开到孝感、广水休整，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也要集训一下，你年轻，要多担当一些责任（到了信阳我果然被委任为集训大队长）。记住！我们这个部队很穷，靠对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信仰，靠严明的军队纪律，我们才能站稳脚跟，才不至于被人家吃掉。孔明这人真了不起，对付曹操，对付孙权，他都有一套锦囊妙计。难啦！棋错一着，满盘皆输。”分手之后，我在和方的老部下谈天时，他们说：方爷碰到蒋介石这个对手。的确难办，他真把心操碎了。蒋介石有地盘，有实力，有金钱，有美人，而且又有外国老板撑腰。更叫人感到十分棘手的是，蒋这个人毫无信义，什么样的毒辣手段都能使得出来，稍不小心，部队即被吃掉。所以他提到孔明，意思是说对付蒋介石要老谋深算，谨防受骗上当，我来到这个部队几个月，敏感到大家都有一桩心事，担忧时局乱糟糟的，能不能找到一个既能生存、又能发展的立足之点。

不久，我调任第九十五师师政治部主任，师长是余亚农。时值1928年2月，蒋介石下令北伐。这时方部又改了番号，编为“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指定由砀山经单县、金乡向济宁进攻，正面的敌人是旧军阀孙传芳。全军在鱼台、金乡、羊山集一带布下了坚固的阵地，余亚农师归第三十四军军长阮玄武指挥，阵地摆在金乡一线。

我来到九十五师以后，受到了余亚农师长的欢迎。余师长对人很热情，他中等身材，长脸，额上刻有几道皱纹。我们谈了一阵，他的坦率，使我消除了突然改变工作环境的种种顾虑。我从下师部第一天起，就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在这个部队里，将会带兵，兵会打仗。以后在同余亚农共事中了解到他和方振武同是安徽寿县人，也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同盟会会员。他对西北军掌故很熟，我提到冯玉祥，他说冯同方在带兵、统军、治军以及指挥三军作战方面都是高手，并且两人都有雄心壮志而又足智多谋。可惜的是，冯在五原誓师大会上表现很“左”，后来同蒋合作，态度就变了。不久，方振武率部出师襄樊，正式脱离了冯部第二集团军。余亚农说：“这回又跟蒋介石搭在一起搞‘二次北伐’，前途妙与不妙都很难说。当然，以我们部队而论，将是良将，兵是好兵，打掉孙传芳、张宗昌是不成问题的，可是，仗打

赢了,蒋介石的地盘可能扩张到山海关以外,我们这个部队又上哪儿安身呢?
唉,天知道!”

愤怒！愤怒地踏过泺口大铁桥

我们的部队在攻打孙传芳的战役中，以羊山集一带的作战胜利而告终；接着转向津浦线以东的直鲁联军进攻，张宗昌溃败而逃，我们乘胜追击，很快就到了济南附近。4月30日，部队进入市区。5月3日清晨，我和师政治部几位军官也随后续部队赶到了商埠，边走边贴标语。突然，枪声大作，商埠乱成一团，日军追杀过来，政工人员小孙朝敌人放了几枪，接着眼上来的士兵同日军交上了火，我们几个人退到通远门内一所小学校里暂时隐蔽起来。此时枪声、炮声不绝于耳，战斗异常激烈。我军工兵连和手枪连在战斗中伤亡很大，尽管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但我军官兵义愤填膺，坚决要打。

日军在济南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军民，又杀害了我国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并向蒋介石提出最后通牒。在如此严重的关键时刻，蒋介石竟然无动于衷，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对日方一味妥协，屈膝到底。5月5日蒋介石在离济南城不远的党家庄召集了各将领会议，冯玉祥、方振武赶来参加，并一致主张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打退日军的进攻。但蒋介石抱定宗旨不准抵抗，下令绕道渡过黄河、继续“北伐”。我军全体将士极为愤慨，眼里含着热泪，愤怒地踏过泺口大铁桥，向德州进发。

在行军路上，大家议论纷纷：“什么‘北伐’、‘北伐’的，还不是给蒋介石打天下，扩充地盘。”“蒋介石是新军阀，比旧军阀好不到哪里去，为他卖命真不值得，”部队憋着一肚子气和牢骚过了黄河，经禹城、平原来到德州。

我们政工人员不顾行军的疲劳，立即投入慰劳部队的准备工作。这时我又从师部调到总指挥部担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工作更加紧张。我们迅速动手搭起土台子，准备表演一些节目；同时组织力量，把凡是会画画的，会编大鼓词的，会说山东快书的，会演活报剧的都调动起来，宣传的中心内容是突出“五三”惨案和党家庄各将领会议。这个部队有一股潜在的力量，将士们都有爱国的热忱，确实是一支可以信赖的队伍，但它走向何处去保家卫国尚难意料，连方振武自己也常为此而困惑、苦恼。

混战中的暂时喘息

“二次北伐”快要接近尾声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撤回徐州以南，只有杂牌部队渡河继续北进。残敌直鲁联军张宗昌被迫放弃天津，孙传芳也逃往东北。不久方振武部队到达天津、北平，分驻黄寺、古北口一带。总指挥部设在北平西直门内旧庆王府。这座清朝王爷住过的豪华屋宇，室内雕梁画栋，陈设古色古香，到处可见“龙飞凤舞”，引人遐想翩翩。方振武深恐总指挥部八大处官员“享受过分”，削弱斗志，所以经常在“朝会”中发表演说，告诫部下不能忘本，切不可忘记了老百姓的疾苦，丢掉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他在列举反面的例子中，往往影射蒋介石及其政府，并加以谴责，有时还动起肝火，激昂慷慨，怒斥向日本侵略者屈膝投降的可耻行为。

在北平驻防几个月，方振武让我接任总指挥部政治部代主任，三军和各师的政工人员部分散在黄寺、古北口、密云等地，我只能顾及留在北平的一小部分，日常的工作也不过同一些群众团体和有关政府部门打交道。有一次我陪同方振武到辅仁大学演讲，美国教师把他同冯玉祥同等看待，称他是抗日的著名将领。当他走出校门时，受到学生和教师的热烈欢送，他最感到欣慰的是青年学生对他在山东济南坚决主张打退日本侵略军这一爱国行动的肯定和拥护。因此他对于学生爱国运动表示出深切的同情和理解。

在北平时，方振武已是42、3岁，正处于壮年时期。他饱经忧患，阅历很深，治军有一整套经验。但对复杂的政治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还“缺乏主动性和战略远见”。他防范蒋介石甚严，决不让一个特务和坐探混进他的部队进行分化瓦解活动，与此同时他又与蒋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暂时忍让以待时机。方最忧虑的是惟恐他的部队被人吃掉，所以他尽量争取“军事联盟”，以免陷于孤立。他在旧庆王府设了个招待所，有食客，有谋士，有来来往往的政治掮客，其中包括冯系、晋系、桂系等各方面的人士。方所委派的“参议”，有郝兆宣、楚明善等人，都是纵横捭阖的谋士。这些，在当时都是保密的。

1928年初冬，有位国民党元老（西山会议派）张继来到北平，专程看望方振武，昔年同是同盟会会员，少不得要招待一番。方亲自主持宴会，我也在座。闲话农村混乱情况时，张继把一切罪过归咎于农民的“暴乱”，当时我略略讲了几句：地主拥有武装，私设公堂，压榨农民，这些也是事实。张继怪我顶撞了他，回南京后宣扬方部有共党分子潜伏，并给方振武来了一封信。方接信后颇费踌躇。有一天，我去见他，他说：“你还年轻，才20几岁，提拔是快了一点。南京方面传来的指责，不会改变我对全军政治工作人员的信任，包括共产党员在内，不管南京怎么指责，我都不会做出过头的事。说句良心话，共产党就是穷党，孙中山先生主张联共，就是这个道理，何况我出身贫寒，不能忘本。”在方部确有党的地下组织，党员有王梓木、廖运周、史直、王汉三、方略等人，他们分别是总指挥部参谋处、政治部或军部、师部的骨干力量。方振武对这些同志很关心，很爱护，不时有人告密，南京官方多次来电要人，方均以“查无此人”，回电了事。

囚禁——改变不了将军的意志

蒋介石在“二次北伐”取得胜利后，又说通了张学良于1928年12月宣布东北易帜，很快腾出手来，谋划暗算他的大小对手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方振武等军事实力集团，第一着就是召开编遣会议，“编”是加强自己的嫡系实力，“遣”是裁减异已的力量。方部只被编为两个师，方原来是总指挥，编后成为一个师的师长，同他的老部下阮玄武平起平坐了。蒋介石蓄意抬高阮玄武，从中制造矛盾和磨擦，以达到分化瓦解方部的目的。阮玄武识破了蒋的离间之计，仍然以第四十四师师长的地位接受第四十五师师长方振武的指挥，蒋的阴谋诡计暂时未能得逞。

编遣之后，中原逐鹿的混战局面就开始了。1929年3月，蒋介石软禁李济深于汤山，随即下令讨伐李（宗仁）、白（崇禧），原来被“讨伐”过的唐生智又出来为蒋效劳了。方振武也被委任为“讨逆军第六路总指挥”。这次讨伐李、白，通过蒋对桂系的分化、收买，意外迅速地收场了。在讨伐李、白时，冯玉祥两面都不插手，坐山观虎斗，蒋恨冯入骨，又决心声讨之。是年5月下讨伐令，又同样使用分化、收买的老一套诡计，把冯的两员大将韩复榘、石友三收买过去了，李宗仁、冯玉祥都是被蒋介石的收买政策搞垮了的，方振武明明看在眼里，但却没有警惕到下一步该轮到他了。

原来方振武曾经渴望当上山东省主席，幻想自己拥有津浦铁路大动脉和烟台、青岛等出海港口，可以有回旋的余地，逐步摆脱蒋的控制，自成“气候”，一则以求生存，二则以求发展。可是，蒋介石却偏偏委任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方振武为安徽省主席，其实这是擒虎的诱饵，把包围圈缩小到可以随手擒拿的地步。方振武虽然有所戒备，但他也有个想法：钻到蒋的肚皮里，见机行事。方本人自信甚深，还是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在他去安徽以前就和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刘镇华等人暗中做了反蒋的酝酿和准备。

1928年8月，方振武把部队调遣好，陈兵蚌埠、合肥、安庆、芜湖等地，蒋介石也作了针对性的调防，双方的部队犬牙交错，成了互相防守、牵制的局面。

方到安徽就职，只有三五旧属，如方植之、苏宗輶、孙着癯、郭子清等人作为省府委员，省府的秘书长徐衍东、民政厅厅长吴醒亚、财政厅厅长袁励宸、建设厅厅长李苍一、教育厅厅长程天放，全由蒋介石派定。但“皖人治皖”的呼声和家家户户的爆竹声，把“我们的方总指挥”迎接到了安庆，盛况空前，比农历玩龙灯接财神还要热闹得多，当时我作为方的随行人员之一，亦想不到多少年后能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来叙述当年这一番热闹的局面。

蒋、方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池塘中的微波翻腾起来也可以成为大浪。一天，我到厕所去，意外地看到三五名脚戴镣铐的青年，经了解是“共党嫌疑犯”。方振武知道后不假思索地下令释放。这可不得了！c·C·分子头领邵华便借此大做文章，攻击方包庇“赤色罪犯”，并利用安徽省党部办的《安庆日报》，对方指桑骂槐，造谣污蔑。方看到报纸后极为震怒，更加对蒋齿冷，决心在蒋的心腹之地举义。此时，全国反蒋的空气日益浓厚，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在南北酝酿策动倒蒋。方观察时局动静，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动手了，于是他派出代表同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刘镇华等人取得联系。不料泄漏了机密，这是方振武始料所不及，万万没有想到会有

这种事情发生。

9月中旬的一天，方振武应蒋的电话邀请到南京开会，次日清晨乘安丰兵舰东下，到达南京后蒋把方拘押起来，我离开安庆到了上海后，听到了有关方振武被囚的经过，蒋一度要枪毙他，但他很倔强，始终没有改变反蒋的意志和初衷。

我在这个部队不过1年零几个月，时间是很短暂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接受了极其深刻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令人高兴的是，1938年我在汉口天主教堂医院会见了阔别数载的老上司方振武将军。在我们亲切的谈话中，了解到他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脱离缙绅之灾，获得了自由；1933年同冯玉祥、吉鸿昌共同组建和领导抗日同盟军，这次举义又被蒋介石勾结日军，内外夹攻搞垮了；失败后他突破蒋的罗网逃至香港，漂泊海外，在英国、意大利做了大量的宣传抗日工作，并结交了很多进步的朋友。在分别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蒋介石是民族的大罪人，有好多机会都没有把他搞下来，包括冯玉祥和我在内，都对他防范不严，斗争不狠。苦的是我手下的人才太少，那时你也太年轻了。这次我从国外回来，作为冤家对头，蒋介石怎样也不让我掌握军权参加抗日战争。”他苦笑一下，又说：“只给我军事参议院参议的空头名义，我告诉他们，想把我姓方的关进画眉笼子里，这可办不到，我还是要飞的。”

飞到哪里去呢？最后他还是被蒋介石暗害了。写到这里，我不禁深深地怀念这位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和民主革命的斗士。

方振武三次遇难实录

侯鸿绪

- 郑州 5 人结义，蒋先拿方开刀
- “上海寓公”的庐山真面目
- 抗日救国军总指挥
- 弹尽粮绝，英雄落难
- 蒋电令法办
- 又一次虎口脱险
- 终陷魔爪

方振武，这位开创民国的勇将，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海军陆战队司令的青年先锋，曾毁家纾难组建“抗日救国军”任北上抗日的总指挥，曾与冯玉祥将军高举“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大旗，并任前敌总指挥，却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必欲杀之而后快，然而方振武将军都一次又一次地从虎口中脱险出来。有道是：明枪易挡，暗箭难防。正当方振武从香港回来，满腔热情地准备再次奔向抗日战场的时候，蒋介石的魔爪又从黑暗的角落里伸了出来。残暴地杀害了这位杰出的爱国将领。这里记述的，是方振武将军三次遇难的前因后果。

1929年6月，蒋介石任命第六路军总指挥方振武兼任安徽省主席。接到命令后，方振武把驻防在许昌的第四十五师和驻漯河的第四十四师旅长以上军官，召到郑州总指挥部，方振武宣布了自己的新任后，说：“安徽是我的家乡，我们第六路军不少兄弟也都是安徽人，回去治理家乡也好么。我先去就职，这里的军务请又玄兄代为照管。”第二天，方振武带着一批文官幕僚直奔安庆走马上任去了。

一路上，方振武兴致勃勃地谈起自己建设安徽家乡的抱负：

“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是中山先生的理想，要在安徽实现。”

“要多办几个学校，出几张报纸，杀几个害民的土匪头子！”

“建一座辛亥革命淮上军烈士纪念碑。”

可是到了安庆，方振武心中燃烧着的一团火突然遭到了迎面浇来的一盆冷水，这“冷水”不是别的，正是蒋介石刚发来的一封密电。电文是：

叔平兄：

又着民政厅长吴醒亚、财政厅长袁励宸、建设厅长李范一、教育厅长程天放赴任。

中正。

实际上，这是一道手令。方振武气得一捶桌子：“好家伙，原来把我方振武当猴耍，我不干这个光杆主席！”说着就要动身回河南。方植之急忙站起来，言道，“叔平，不可！”方植之是方振武的堂叔，是一群幕僚当中最有资望者，他不紧不慢地言道：“古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想你刚投靠老蒋，闹翻了有你什么好处？我们不妨来个‘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办法。”

方振武：“请老叔言明。”

方植之捋捋胡子，言道：“安徽大权在你手心里，老蒋只是派了几个厅

长，他是想架空你，你又何尝不可反过来架空他们呢？”

“妙，妙！”胖敦敦的孙光普手舞足蹈。他是方振武的表兄、第六路军政治部主任，他言道：“老表叔言之有理，咱们不能走，一走岂不是和老蒋翻脸了，咱们来个‘霸王硬上弓’，赶快委派一批人下去当县长、警察局长、税务局长，把实权抓过来，叫老蒋的那几个厅长坐在安庆喝瓜片茶吧。”

方振武哈哈一笑，言道：“好，好，就这么干！人手不够从河南两个师里要。”然后又转向孙光普说：“横牛兄，请尽快把名单拟出来给我。”

孙光普点点头，说：“即刻去办。”

这么一折腾，几个御定的厅长反而变成了光杆厅长，一个个叫苦连天，纷纷到南京去告御状，蒋介石听了不耐烦，干脆下令撤换了这几个厅长，电告方振武自行任命。难道蒋介石就这么软弱无能吗？不。那时张学良拥兵关外，阎锡山屯兵西北，李宗仁挥兵两广，特别是势力最大的冯玉祥坐镇中原，所以蒋介石就不愿意为几个文官的得失去开罪于握有兵权的方振武。尽管心里憋着气，但也只好对方振武采取了敷衍的态度。

有一天夜里，阮玄武突然神秘地来到安庆，急匆匆地走进省主席官邸。阮玄武是方振武早年戎马相从的老部下，关系非同一般，用阮玄武自己的话说：“方振武当旅长、师长、军长，升到总指挥、总司令，官越做起大。他每升一级，我也水涨船高地提升一步。”阮玄武突然出现在方振武面前，他先是一惊，心知必有急事，忙问道：“又玄，什么事？”阮玄武也不说话，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便笺递过去。方振武打开信笺一看，原来是蒋介石的手笔：

又玄兄，可来宁一晤。中正。

方振武拿着纸条子，思量了一下，言道：“既然总司令叫你去，你就去看看他吧。”阮玄武何等机灵，他跟随方振武十多年，知道在人权、财权方面他是不喜欢别人过问的，特别是军人单独行动，最易引起他的猜疑，所以阮玄武回说：“我没有功夫去，要去我随同总指挥一道去好了。”方振武笑笑，也未置可否。

这件事再一次刺激了方振武，他知道，蒋介石正在施展手段拉拢他的旧部，拆他的台。想到这里，方振武联想到远在河南的两个师，若不趁早拉到身边，迟早有一天，会被蒋家一口吃掉。为了这件事，他一夜合不上眼，思考着良计妙策……

第二天一早，方振武把秘书长方植之、民政厅长苏宗辙请到官邸议事。方振武把蒋介石的勾当和自己的心思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话音刚落，苏宗辙急忙言道：“主席所言极是，近日来，南京方面政府大员如吴忠信、何成俊等常来往于宁豫之间，想必其中定有奸诈，不可不防。若把两师人拉到身边，可免除后顾之忧，此乃上策！”

方植之捋捋胡子，嘿嘿笑了两声，言道，“只怕这是一厢情愿的事噢！”

方振武有点激动，站起来剪背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猛然间一挥手：“无论如何也得拉回来，拼着这个主席不干！”

蒋介石的办公桌上，第六路军总指挥部请求把第四十四师、四十五师调回安徽驻防的公文摆在那里。蒋介石露出一丝笑意，提起笔在那张公文上签署：同意第四十五师调防安徽，然后走到一张大军事地图前面，观望了一阵，面对地图命令道：“速派王均第七师去寿县，方鼎英第十师去蚌埠。”说到这里，突然转过身来，对正在记录的侍卫官说：“命令王、方二部三天之内到达防地！”

安庆省主席官邸，四周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会议室里正在召开着军事会议。一位军官捧着公文夹在报告：“王均第七师进驻寿县，方鼎英第十师进驻蚌埠……”方振武扔掉手中的铅笔，大骂：“这是姓蒋的信不过咱！好，咱们干脆来个老虎拉碾子——不听那一套！”冲着鲍刚，“你的第四十四师立即从源河拉回来！”

鲍刚面有难色，低下头一个劲地弹着手中的烟灰。

方振武怒道：“怎么，姓蒋的给你多少钱？”

鲍刚扔掉烟头，站起来言道：“老总，我从光着屁股跟着你，还能不听你的吗，只是咱们四圈子都是蒋家的人，弄不好就全砸了，这叫：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呀！”

阮玄武：“鲍师长，你我跟随方老总，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给谁低过头？你低头，试试看，人家会把你的头按到裤裆里夹着走。”

在座的中间有几位军官笑了。

方振武一本正经地：“有什么可笑的，这是大实话。咱们手中有枪，有枪就有一切，眼下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在南北酝酿策动反蒋，我们坐观形势，如何行动，一切听我命令！”

郑州。

韩复榘官邸。一间密室里，烛光闪闪，香火燎绕，一张描金供案上，摆着三牲果品。这时，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刘镇华和方振武并排跪在案前，正在举拜金兰之交。拜完之后，韩复榘拱手言道：“各位兄弟，如今咱们就是一家兄弟了，有道是：‘想兄弟情，亲如手足’咱们要互相扶持，互相帮助。”

石友三心中明白，这五个兄弟，都是从冯王祥手底下跑出来的，可是如今性蒋的也信不过咱们，想到这里，急忙言道：“对，只要咱们五兄弟抱成一团，谁也不靠，看谁敢惹咱们！”

韩复榘乐呵呵地招招手：“好，好，各位兄弟，请后堂赴宴。”

郑州五人结义的事很快便传到了蒋介石的耳中。是“五兄弟”之中有人告密了呢，还是为特务侦知了呢？笔者不详其情。总之，蒋介石知道了这件事。“五兄弟”都是西北军的人，与冯玉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稍有风吹草动，这“五兄弟”就有可能变成刺向自己的五把尖刀！于是，蒋介石决心先拿靠自己最近的方振武开刀了。

9月22日，南京电召方振武去南京述职。方振武当然不会去，便派民政厅长苏宗辙代行述职，另暗使孙光普去南京探听蒋的动向。

9月25日，蒋介石突然打来电话，要方振武亲自接话。

蒋介石在电话里十分温和地问道，“叔平兄，南京会议为何未能出席呀？”

方振武：“我病了。”

蒋介石：“嗯，这样的。你是否能来一趟，我有要事相商，已派安丰舰接你去了……好，好，见面再说吧。”

电话“咔嚓”一声挂上了。

方振武放下电话，犹疑不定，去，还是不去，他想起了三天前去南京探听情况的孙光普，立即拍发一份密电给他，询问情况。

这孙光普是一个聪明挂在脸上的人，实际上头脑简单，办事粗心，而且特别喜欢听奉承话，某人当面说一句：“横午先生，您此事办得可谓如汤沃

雪呀！”这位胖主任一听就糊涂了。所以这位“横牛先生”还有一个绰号“叫“横牛”，说他一糊涂便会午（舞）出了头。这位“横牛”先生到了南京之后，便四处打听，想尽快摸到一点蒋介石的底。“横牛”的活动很快为特务侦知报了上去，蒋介石来个将计就计，便请出“德高望重”的元老戴季陶去拉这条“牛”。孙光普一听有这样大的头面人物来请自己，顿时飘飘然起来，眉飞眼笑地随着来人乘车去了。

戴季陶是蒋介石智囊团的核心人物，只三言两语便把这位“横牛”说糊涂了。戴言道：“横牛兄，蒋先生如今正在用人之时，想叔平兄乃身经百战的勇将，蒋先生岂有弃之而为他人所用之理！请横牛兄转告叔平：他与蒋先生同为中山信徒，切不可为北洋军阀余党所挑拨。横牛兄八斗之才，想从旁相助叔平，蒋先生是不会忘记你的。”

孙光普点头连连称“是”，脸上不敢笑，可心里却已经笑开了一朵花。然后讨好地说：“院长高见。方振武所以迟疑应召，正是担心蒋先生另有处置，只要……”

戴季陶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接着言道：“这是叔平兄过虑了，我戴季陶以生命担保。如何？”

所以孙光普在南京接到方振武的密电之后，立即复电：“已见戴院长，所言中肯，劝方总来宁勿惊，愿以生命担保。”

方振武是信得过戴季陶的，有良好的印象，接到孙光普的密报后，便决定去南京了。临行前，急召阮玄武晤谈，方说：“又玄，我决定去一趟南京了，否则，老蒋更疑心了，我去解释一下也好。你代行主席吧。”

阮玄武一听连连摆手，言道：“不行，不行，我没搞过政治这一套，另请高明吧。”

方振武说：“此事已报老蒋核准了。”

阮玄武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9月26日，方振武带着卫队乘安丰舰直驶南京。

就在方振武乘坐的兵舰在长江中行驶的时候，蒋介石接连下了两道手令：

命令方策率陆军第六师速达安庆接防；方鼎英率陆军第十师速达合肥接防。

命方策速将方植之、苏宗辙、孙养彊逮捕，押送南京。

方振武被蒙在了鼓里。所以他到了南京之后，乘车直抵羊皮巷6号家中，稍憩片刻，便对高夫人说：“我得先去见一下蒋先生。”高夫人说：“也是。我们等你回来吃晚饭。”

方振武乘车直驶中山陵园四方城蒋介石官邸。早有人通报进去，方振武在侍卫官的引导下走进一间豪华的会客厅，侍卫官说：“请方主席稍坐片刻，”便退了下去。方振武靠在黑丝绒沙发上，欣赏着壁上的古字画，正在看得入神，只见蒋介石芽一生长衫悠闲自得地从旁门走进来，边走边说：“叔平，你来了，好好。请坐，请坐。”说着坐到靠近方振武的一只沙发上。

方振武欠欠身，说：“总司令，我是来向您述职的。”

蒋介石说：“嗯，好，好。你来了，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都可以解决了。你不是说有病吗，可以在京休养一个时期，嗯，这个……回去还当你的主席嘛，至于总指挥一职，就交阮玄武好了，嗯？”

方振武是个火爆性子，一听此言，顿时怒气冲冲地说：“我什么也不干

了，都交给阮玄武吧。”

蒋介石并不生气，只是笑笑点点头，说：“好，好。”就站了起来，那意思是说：“你可以走了。”

方振武也不想再说什么，忍着气便告辞了。

方振武的车子在中山东路的大道上，往西奔驰，卫士长报告：“老总，后边有辆车一直盯着我们。”方振武掀开窗纱一条缝，果然看见一辆灰色轿车死死地跟在后边，便打消了去会旧友的念头，说了声：“回羊皮巷。”

车子开到羊皮巷6号家门口，方振武从车上下来，举目一望，巷口门外布满了军警，方振武笑了笑，昂首走进家中。从此以后，方振武就被软禁在6号院子里了，尽管也可以外出“自由活动”，但无论走到哪里，后边都有人盯着，方振武气得骂街摔东西，但有什么用呢？后来索性他就不出门了。

蒋介石软禁了方振武之后，下令石友三兼任安徽省主席，这是蒋施用的离间之计，也是想稳住石友三。可是石友三自有自的打算，暗地里与“五兄弟”频繁来往，表面上应付姓蒋的。蒋介石一看不妙，又下了一道手令，命石友三部开往福建。石友三的幕僚纷纷表示，这是老蒋借刀杀人之计，切不可上钩。石友三迟迟疑疑，拿不定主意，决定亲自到南京去观望一下。

在南京，石友三拜访了许多军政大员，蒋介石还专门接见了，自然说的都是一些慰勉的话，离开南京的头天晚上，石友三专程去探望方振武，为了免除蒋介石的猜疑，石友三还特地请了周佛海、贺耀祖陪同，这也是“石头”的一片苦心经营吧。

方振武一见石友三来了，又惊又喜，看看石的身后还跟着贺、周“哼哈”二将，心里又沉了下来。

石友三打起哈哈来：“叔平兄，你现在安逸啰，这叫：少操心，多活命。”

方振武苦笑着，说：“对，对。”

坐了一会，石友三便站起来要告辞了。

方振武亲自送客，他向夫人高玉昆递了个眼色，高夫人十分机灵，热情地陪着贺、周走在前面，拉寒暄话，方振武瞅个空子，暗里拉拉石友三的手，低声说：“汉章，快联络兄弟们，机不可失！”石友三点点头，然后有意地大声说：“叔平兄，多加保重，”接着急行两步，赶到贺耀祖眼前，说：“请转告总司令，我部遵令明晨过江，开赴福建。”贺耀祖握着石友三的手，说：“好，一定转报。”

石友三回到浦口，立即下令部队过江。与此同时，余亚农率第四十五师在安庆兵变了！鲍刚率第四十四师在芜湖兵变了，镇江要塞四十门火炮脱去炮衣，昂起炮口；常州铁路的道轨扒断了！一场进攻南京的战斗就要打响！

突然，石友三发现从上游开来两艘轮船，夜色茫茫，看不清目标，他误认为是两只兵舰，大吃一惊，心想蒋介石已经有所戒备了，于是急令已过江的一团人返回浦口，割断通江的所有电话线，向南京方向放了几炮就急匆匆地朝北退却了。

蒋介石接到安徽方部兵变和石友三在浦口兵变的报告后，立即派兵镇压，同时，命令宪兵团即刻把方振武从羊皮巷抓起来，他估计，这一切兵变的行动都是方振武幕后策划的。在军法处，宪兵给方振武钉上脚镣，戴上手铐，方振武大喊大叫：“总理啊，总理在天之灵啊！我犯什么罪？！我什么罪也没有啊！”

蒋介石下令枪毙方振武，戴季陶、吴忠信等一批国民党元老出面说情，

周佛海、贺耀祖也出来作证，说明石友三在羊皮巷6号和方振武没有什么不轨行为，方振武才免于死，但从此失去了自由。

193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接着，宁粤会谈，“蒋汪合作”，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故作姿态，把关押在南京郊外汤山的胡汉民、李济深、居正、蒋百里释放出来；汪精卫为了拉拢方振武，增加自己与蒋“合作”的资本，特意请蒋也同时释放了方振武。

方振武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有一幢洋房，于是他便住在这里当了寓公，而且留起了一把大胡子，表示退避三舍，不问世事了。

果真是这样吗？不，方振武一颗爱国的心，一颗不甘于自己失败的心，使他不可能安静下来，他在与张发奎、黄琪翔秘密来往；与吉鸿昌密谈；派人携四万元巨款去山西接济鲍刚、张人杰部队；多次与阮玄武密谈，嘱其抓住鲍、张两师人马，准备抗日力量。

这，才是这位“上海寓公”的庐山真面目！

1932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方振武剃去长长的胡须，身带十万元巨款支票，无声无息地离开了繁华的上海。不久，全国各大报登出了“抗日救国军总指挥方振武通电全国”的消息，还配了一张发表演说的特大照片。举国震惊，拍手称赞！然而最为震惊的第一号人物当数蒋介石，他大骂宪兵团、警察局，大骂特工头目，说中央一名大员“失踪”了多少天都一点不知道，简直是一群猪猡！于是急令北平行营主任何应钦火速派兵堵截。

为了避开蒋军的堵截，方振武率领抗日救国军沿长城古道，翻山越岭，继续北上。为了鼓舞士气，在行军的路上，方振武咬破食指，用自己的鲜血在一条白布上写了“有我无故，有敌无我”8个大字，用竹竿挑起来，走在队伍前面。顿时，全军振奋，高呼口号：“跟着方振武打日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真是声震天宇，气壮山河。

抗日救国军走了1个多月，在张家口与各路抗日队伍汇合一起，在冯玉祥将军领导下，组成一支号称10万大军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不久，冯任命方振武为同盟军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方振武在北伐时是有名的“铁铜司令”，英勇善战；吉鸿昌是西北军中有名的“吉大胆”，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他们的指挥下，先后收复康保、宝昌，攻克多伦。捷报传出，全国舆论为之一震。但是对于这个胜利，南京政府蒋介石不高兴，因为这一仗牵动了他们与日本签定的“塘沽协定”的大局。于是，跟着捷报后面而来的，是“赤化”、“破坏中央统筹策略”、“土匪、乌合之众”等等污蔑之词，泼向同盟军，同时，南京政府调兵遣将围攻同盟军，同盟军动摇了，瓦解了，冯玉祥将军被迫通电宣告下野，第二次上了泰山。

但是，吉鸿昌表示，绝不倒旗，坚持战斗！

方振武宣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抗日反蒋，我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方振武、吉鸿昌联合起来，他们高举“抗日讨蒋军”大旗，战斗在华北平原，横扫冀北日寇。北平吃惊！日寇恐慌！京津地区报纸出现一连串醒目大标题——

“日领事柴山晋见何应钦主任”

“日机散发传单，威胁方振武将军立即撤出非武装区”

“黄郛访日驻华公使有吉，就华北政局并方、吉军队问题交换意见”。

方振武与吉鸿昌不理那一套，哪里有日本侵略军，就挥兵打向哪里，杀

得日寇丧魂落魄，步步退守。蒋军从四面八方扑向抗日讨蒋军，日军开来了第八师团；一场恶战即开始，但是日军兵临前沿，却停止了攻击行动，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日军此时做了一个小小的动作，也是插曲一段吧：方振武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后来跟随孙中山推翻清政府，创建民国，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所以日军想笼络感情，助方攻蒋，并进一步争取方振武充当“统一”华北的傀儡。所以日军按兵不动，派出一名大佐高参来见方振武。这个日军大佐见了方，不免流露出一副占领军的骄横样子，方振武用眼扫扫这个日本人，用手拍拍自己的军衔，喝问：“我是上将，你是大佐，为何见了我竟如此无礼！”那个大佐被方振武突然当头一棒，方才清醒了一下，连忙回答“哈依！（是）”急忙举行手礼。方振武这才指指椅子，说：“坐下谈吧，”日军大佐恭而敬之地欠欠身说道：“我们十分钦佩方将军的胆略与才干，愿与方将军携手合作，只要贵军继续攻打北平，你们需要什么，我们保证大力援助。”

方振武哈哈大笑，突然一捶桌子，大骂一声：“放你妈的狗臭屁！”可惜这句话是方将军一时气愤，脱口而出说了这一句中国话（当时没有日语翻译，由方振武自己直接对话）。日军大佐不明白，但从动作上可以看出方振武动气了，所以眨巴眨巴眼睛望着方将军。方振武用日语说：“我们打蒋介石，是因为他不抗日；我们是先打蒋，然后再来收拾你们。你们侵占中国一天，我方振武就要打你们一天，全中国老百姓就要打你们一天！”

日军大佐不敢多说了，站起来，立正，深深地给方振武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日军飞机大炮对抗日讨蒋军开始了狂轰滥炸。蒋军关麟征、黄杰、万福麟、庞炳勋的队伍，杀气腾腾地沿长城扑过来。抗日讨蒋军伤亡惨重，弹尽粮绝，方振武、吉鸿昌终于被商震部缴了武器。一支坚强的抗日队伍，就这样在日、蒋军的夹击之下瓦解了。

蒋介石在南京接到方振武、吉鸿昌被俘的报告后，立即电示北平何应钦：“吉放方办。”他恨透了方振武，决心这一次要把这个坚决反对自己的人杀掉，以做效尤。何应钦接到电示之后，当即给在牛栏山的商震挂电话，命他速将方振武押解北平。

商震左右为难，把方振武押送到北平去吧，那不是送人家上断头台吗？姓方的为了抗日就该砍头吗？商震说：“我商启予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可要是不送去吧，有违抗军令之嫌，特别这又是蒋介石点名要办的“御犯”。商震左思右想，整整思考了一夜，最后终于想出了一条万全之策。

第2天中午，吃罢了午饭，方振武换上了一身便服，在满载荷枪实弹士兵的五辆军车在押送下，从牛栏山司令部开出向北平进发了。当押车行驶到孙河镇一个坡地时，从北平来接“犯人”的宪兵迎面碰上了，宪兵头目跳下车来大声喝问：“方振武在哪里？”方当时坐在第一辆军车的司机旁座上，他把手伸出车窗外，向后一指，说，“在后边车上。”一帮宪兵一齐拥向后边几辆车，就在这时，方振武溜下车，一头钻进了满山遍野的青纱帐中。那一帮宪兵在后边咋呼着：“喂，方振武呢？……哪位是押送的长官？”正在吆喝着，突然前面车上枪声大作，士兵们喊着：“方振武跑了！”顿时车上的士兵纷纷跳下车来，遍地乱窜、到处搜捕，哪里还见到方振武的影子？

就这样，方振武再一次从虎口中脱险了。

方振武悄悄地进了天津，隐居在同盟会老友、国民党元老徐谦（季龙）

家里，过了几天，便由天津乘外轮去香港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各党各派，团结对敌，共御外侮，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国民党政府为了实现“共赴国难”的诺言，撤销了对一批爱国进步人士包括方振武将军在内的通缉令。

此时，方振武正流浪在意大利的威尼斯，消息传来，他恨不得立即飞回到那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挥起战刀，率领抗日健儿，冲向敌阵……他以最快的速度回到祖国，急忙去南京见蒋介石，表示愿尽快带兵奔赴抗日前线，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血洒疆场。

蒋介石“嗯，嗯”了两声，笑着言道：“很好，很好，请叔平兄在南京稍事休息几天。”

于是方振武在南京住下“休息”了。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没见一点动静，恰巧这时宋哲元来看他，说是明天要回北方前线去。第二天，方振武就随他一起走了。

他不走没有事，一走事就找上门来了，你说奇怪不奇怪？方振武从北方前线回来之后，第二天，戴季陶就上门了，他冲着方振武说：“嘻，你南北瞎跑什么呀？弄坏了整个抗日阵容，蒋先生又会不高兴了，你刚回来，要注意关系。”方振武一腔抗日热情却迎来了一盆冰水，他气不过地说：“我回来是抗日的，老把我闲着。我坐不住！”

戴季陶微笑道：“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可是孔老夫子的话嘻，叔平，千万不可急躁。”

果然不久，方振武接到了一纸委任状，是张群先生亲自送去的。委任状上写着：“任命方振武为军事参议院参议兼办公厅主任”，面对这一纸空衔，方振武冲着张群苦笑了两下，说了声：“蒋先生这是要把我姓方的关进画眉笼子里去啊！”不禁又苦笑两声，凄然泪下……从此，在武汉、桂林、重庆，方振武挂着这个空衔，无所事事，过上了半寓公式的生活。

很显然，蒋介石还未消除对方振武的仇恨和疑心，他是绝对不会让方振武重握兵权的；这一点，方振武心里也有数了。为了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生活，方振武撕碎了委任状，悄悄地离开重庆到香港去了。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英美宣告正式对日宣战。香港乱起来了！达官要人、商绅富翁，纷纷外逃，而地痞流氓却乘机打劫，骚扰地方。12月25日，香港陷落了，日军到处搜捕抗日分子，方振武携带全家避居到九龙丹桂村的一位朋友家中。方振武对朋友说：“我是抗日的，在日本人那里是早已挂上号的，我得赶快离开这里回内地去。”朋友劝道：“老蒋还记恨着你呐，依我看干脆还是到国外去吧。”方振武说：“不行。现在英美起来了，老蒋会跟着英美干，情况不一样了。我是抗日死硬派，他是知道的，这回一定会用我的。”第二天，方振武化装成农民模样，离开了丹桂村。在广东省中山县境内过河的时候，突然听到身边有人轻轻地喊了一声：“方老总。”方振武没有答理，继续走路。那人靠近身旁说：“方老总，我是陈策。”方振武扭过脸来一看，果然是曾在总部手枪团里当过营长的陈策，此人也是寿县人，和方振武是小同乡，所以比较熟悉。但方振武却不知道此人在队伍瓦解以后已经当了军统特务，现在忠义救国军中当一名团长。方振武问他：“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陈策叹了口气说：“老总，一言难尽呀，我现在是被逼得没点主意，跑跑单帮混碗饭吃。”方振武是个十分重情义的人，特别是乡土观念重，就说：“那你就跟在我身边吧，我回来了，再去打

日本鬼子！”陈策说：“好。”两个人便一起向中山境内走去。走不多远，陈策说：“方老总，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再说吧，这里我有个常落脚的熟悉地方。”方振武说：“好，你带路吧。”

陈策左拐右弯，来到一个山沟的小村子里。这小村子四周高山野林、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原来是个废弃的村庄，早已没有人家居住了，方振武心想，到这里来怎么主活？便回过头来问陈策，可陈策早已无影无踪了。方振武高喊：“陈策！陈策！”突然从树林中窜出一批人来，枪口对着方振武，喝道：“你是方振武吗？”方振武反问：“你们是哪部分的？”一个头目厉声说：“我们是忠义救国军，戴老板的人，该知道吧。”方振武怒道：“好，你们把我带会见戴笠吧。”那头目一挥手，上来几条汉子，把方振武铐了起来，说了声：“先委屈一下将军了。”就把方振武押在一间破草房里。

第三天，那个头目走进破草房，命令手下人：“把他上衣扒下来，捆在柱子上。”方振武大骂：“蒋介石你这小子，背叛孙中山，残害忠良……”那头目歪歪嘴，只见一条大汉手握尖刀对准方振武心窝猛刺过去，接着又连刺几刀。一位杰出的革命志士，一位英勇善战的抗日将领，就这样牺牲在蒋帮特务的屠刀之下了。

党国元老胡汉民

胡汉民被囚秘录

卞稚珊

- 胡汉民与众不同
- 蒋介石陵园官邸鸿门宴
- 书生之见，不知流氓之毒——立法院长作囚徒
- 蒋手令“严密保护”胡汉民
- 西南联合援胡反蒋
- 蒋介石玩弄民主
- 策划营救胡汉民
- 时局急转，胡汉民解禁

胡汉民对国民党忠心耿耿

1931年，我在南京担任首都保安警察总队长兼南区域防指挥。主要任务是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及其所属各院、部、会机关的警卫及首都各城门的治安工作。因此，为要对国民党特权阶层人物的安全负责，就不能不了解他们的政治生活、社会关系、生活习惯，做到心中有数。当时在国民党内部，一般对特权阶层人物的印象是：认为胡汉民自从1928年蒋介石为了实现其反革命大联合，组成一个全党性的中枢，把胡汉民拉进五院院长行列（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担任立法院长以来的3年中，为国民党政府撑持门面，维护中枢，在政治上卖了不少气力，对蒋介石能够在军事上打败阎锡山、冯玉祥等之后，放手向江西红军进攻，起到一定作用。单从旧的政治生活、道德观念这一点来看，表面上胡汉民3年来是足不出部门的，确不象其他权贵那样每星期日都要到上海租界过那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主活。谁都知道每星期六和星期日两班沪宁铁路夜快车的头等卧铺，都为这些达官贵人所垄断，一般老百姓是无法享受的。就连一些道貌岸然的老朽，如绰号刘佬佬的吴稚晖（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美髯公于胡子右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等职司监察的也不例外，每周都要避开群众耳目，跑到上海租界这个大观园去乐一乐。因为胡汉民有其与众不同的旧道德观念和生活作风，因而在特权阶层中，享有较高声望。蒋介石、胡汉民之间的分工合作，尽管是同流合污，需要相互依存，但也存在矛盾。由于各自争夺名利，因而决定了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从合作到分裂的局面。

蒋介石陵园设宴软禁胡汉民的真相

1931年2月28日深夜，同我住在南京明瓦廊三道高井的吴礼苍（同盟会员，曾任刘伯承元帅在川军时的秘书，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秘书）公毕回家，张惶地告诉我：“老弟，出事了！”我问：“什么事？”吴答：“展堂（胡汉民号）先生被扣留了！”我说：“哪里会？”吴说：“真的，就是刚才的事。”又问：“哪个扣留的？”吴答：“除了老蒋（蒋介石）还有哪个敢哟！”再问：“为啥子？”吴答：“不知道。”当时我们都为这一突然事变感到震惊。因吴在东京留学时对胡较有好感。彼此相对唏嘘者久之，但总猜不透这两根所谓国民党的支柱为啥会闹到这样地步。由于这时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已失败，军事上的噩耗不断传开，因而在政治上又增添了一层阴影，不能不使人担心会影响我们的未来。

我又继续探问：“消息从哪儿来的？”吴悄悄对我说：“只能让我们两人知道，老蒋那股火发了，不知要株连多少人，就是老总（指办公厅主任朱培德）都闷在葫芦里，现在中央（国民党）各要人都为这一事变提心吊胆，不知火石（祸事）还要落到哪个头上来！刚才，老总匆匆从陵园官邸回来，要我马上通知办公厅人员，对于胡院长因病休养的事，不准对外说，并叮嘱我特别要告诫我们的人（指随朱从江西省政府调到办公厅的亲信，吴亦其中之一）不要乱说，不要乱走等语。”吴又说：“老总平时战时应对事变都很沉着，这回特别紧张，而且历来各院、部、会长官因病休养，根本不同办公厅打招呼，既要打招呼，又要不准谈，这中间明明有文章，我始悄悄去问随朱赴宴的黄副官，他才告诉我到陵园遇到的情况。”

“黄副官说：委员长今晚在陵园官邸宴客，有两桌人，还是象往常一样，到了8点钟，客人差不多都到了，我记得有，戴季陶、于右任、孔祥熙、宋子文、吴稚晖、朱家骅、叶楚伦、邵元冲、邵力子、陈布雷、陈果夫、张静江、张群、何应钦、吴铁城、谷正伦和朱培德等，都被一一引到官邸左边的餐厅里，济济一堂，谈笑风生，这时委员长还在楼上没有下来。侍卫长王世和跑来招呼我们所有侍从人员都到侍从室休息，并郑重宣布：“等一会会有什么发生，不关你们的事。千万招呼同来的卫士、司机不要乱动等语。同时我们已经发觉各处警卫不同寻常，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猜不出要发生什么问题。我就借口送公文皮包给老总，溜进餐厅，把外面情况悄悄告诉他。同样有其他几个侍从也进去传递消息。这一下，弄得热热闹闹的餐厅顿时鸦雀无声。有的人惊惶失色，有的人闭目凝神，各想各的心事。隔了不久，胡院长最后到了，王世和赶忙亲到车前，把胡院长引到官邸右边的会客室，让胡一人留在室内，紧接着来了两个卫兵，守住门口。胡院长一见情况有异，脸色骤变，但很镇静，不言亦不坐下，一直在室内背起手踱来踱去。当王世和引胡院长进入会客室的时候，另有几个侍卫队官兵，以两人监视一人的办法，强制随胡院长来的侍从副官、司机、卫士等到警卫室，要他们缴枪，他们不肯，初而言语冲突，继而摆出架势，准备动武，声言非有胡院长命令不行。这时王世和将胡院长安置好后，转来见此剑拔弩张的情况，吓得他急忙退入里面，他怕的是对方同他拼命，万一枪声一响，惊动主子，怪他草包，要受责备。王世和见硬的不行，才另派一个侍从出来，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宣称奉委员长命令，胡院长已被扣留。此言一出，更激起胡的侍从人员的义愤。大声质问‘胡院长犯了什么罪？’这位王世和的代言人根本不知胡院长犯了

什么罪，糊里糊涂地说：‘这是他们（指胡蒋）两人在闹别扭，根本就不关你我的事，犯不着扯肉皮，只要交出枪，等他们把话说清楚，枪，还不是会交还你们’。停一停，他又带着威胁的口吻说，‘请你们想一想，在这个地方要耍枪，还行吗？’胡的卫士终于悻悻地把枪扔出来。”

“黄副官继续说：大约又隔半小时，委员长才从楼上下来，态度严肃，迳入餐厅，随即招呼大家入座。接着餐厅里只听委员长一人好似训话一样，中间有些话，语音特别大。如‘展堂近来精神失常，已有病态，我要他休息一下。我考虑过，不这样办不行！这几年来，我把中枢重任托付于他，不但没有减轻我的麻烦，反而一再反对我的主张，他忘了他这条命，不是我救他，哪还有今天……’。只听委员长讲了好一阵，全场静悄悄的。最后戴院长才说了一句。‘让展堂休息一段时间也好！’宴会就此不欢而散。”

至于留在会客室的胡汉民那晚的情况，后来在胡恢复自由离开南京前我问他，他说：“那晚从会客室设置卫兵起，到餐厅宴会客散止，等到外面汽车开动响声都静了，还不见蒋介石进来，我才向卫兵要笔墨，写了一张条子交卫兵送上去，我一定要同蒋介石面谈。大约又过了一个钟头，蒋介石才下来，走进会客室，彼此心中有数，他先开口说：‘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我被激起了忿怒，立即狠狠教训了他一顿。我问他：‘你想要干什么？总理（孙中山）在世时，我是怎样替你说话，直到近几年，我又怎样苦心孤诣把中央局面稳定下来。你以为冯、阎就甘心失败了吗（指1930年结束的蒋、冯、阎中原大混战，冯、阎佯称下野出洋，实际是企图保存实力，退守西北）？张汉卿（张学良）真的拥护你吗（指中原大混战中，蒋派吴铁城、张群等到东北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和平津地盘为条件，拉拢张学良派兵入关，冯阎受威胁而失败）？江西军事失利是小事吗（指蒋低估红军力量，认为第一次‘围剿’失败，仅仅是指挥不得其人）？你以为军事万能，可以解决一切，那么，江西军事就不应该失败！在政治上共产党抓着我们一些弱点攻击，影响越来越大，你每次在纪念周会上（每星期一上午各机关都要集会纪念孙中山）宣读总理遗嘱，都要大讲特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提倡新生活，改变社会风气，以抵制共产党的宣传，我不是说做得不对，而是说做得好。可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能够服人吗？今天不管那一个，要关要杀，全凭一个人的高兴，究竟国家还有什么法纪，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这样做，将会带来怎样后果，你想到没有？’可是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他最后想出一句无赖的话来搪塞：‘讲，我讲不赢你，总之你对不住我。’紧接着他就硬逼着我，气势汹汹地问：‘究竟愿不愿起草约法？’这是违背总理建国大纲的，遭到我的严词拒绝后，他就拂袖而去。当晚把我送到汤山。”

以上是当年胡汉民答我所问的情况，我没有进一步追问。后来为了进一步弄清蒋、胡之间矛盾激化的关键所在，曾请教过同胡一道参加辛亥广州起义的老战友但懋辛先生。据他所了解的情况是：蒋介石之所以不顾一切扣留胡汉民，是因为民国十九年打败冯阎之后，曾经召开过一次会议，目的是商洽一个约法，然后根据约法于次年召开国民议会制订宪法。胡那时看出了蒋的武力专横，别有用心，未予正面驳斥。只说：“可以照建国大纲的训政时期办事就行了，不必再拟约法，俟机会成熟，即召集国民会议创订宪法”。因为那时约法应由立法院起草，不通过国民会议，在宪法未施行前，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相等。正如辛亥革命时，南京成立临时政府，由临时参议院行使立法权制订约法一样。但是，当时南京已经是正式政府，就不可再用法，

只是召开国民会议，制订永久性的宪法就行了，所以胡不干。胡事前还向人表示过：军人的政治知识浅薄，武断专横，动辄耍刀，要效美国宪法精神，现役军人不能参加总统竞选。蒋闻之大不以为然，认为胡在立法上和选举上都是他的对头。但是胡在那次会上并没有正式提出他的主张，只是强调没有草拟约法的必要，而蒋则非草拟不可。由于两人都坚持己见，那次会议没有把这个问题决定下来。以后蒋约胡单独谈（即陵园设宴扣胡那一晚），一定要他在立法院草拟约法，胡一再说明理由拒绝。蒋沉不着气了，就威胁胡一定要写。并说：“胡先生如不答应，那就会对你不起。”这就把胡惹冒火了，他拍着桌子说：“随便你，杀头，我胡汉民也不怕。”蒋就一冲上楼，立命卫士把胡扣留，押到汤山与外地隔绝起来。

上述情况，在但懋辛先生生前，我曾专函征求意见，据复：“民十七，胡自俄国归，经上海去南京时，我因事不能去会他，熊某（指熊克武）要去会，我请熊转达，劝胡不要去助纣为虐。胡答云：不能把国民党看成是蒋介石的。熊以此告知我，我说书生之见，不知流氓之毒，必无好下场。”

从以上胡汉民对我所说和但懋辛先生的回答看，蒋、胡之争，关键在于制不制订约法，而制订约法之重心又在于要不要现役军人竞选总统。蒋既有心，胡亦并非无意。蒋怒胡之下作驯服工具，胡则愤蒋之日益跋扈专横。胡欲以法制蒋，而唯我独尊的蒋介石，则视胡为眼中钉。胡之被扣，渊源在此。胡被扣后，由蒋一手包办草拟的约法就不再提现役军人竞选的问题，从而为蒋于 1948 年窃据总统宝座，扫清了道路。

假惺惺，蒋介石下令“保护”胡汉民

1931年3月7日，首都警察厅长吴恩豫电话约我立刻到厅里谈话。到达时，警厅的核心人物楼文制（主任秘书）、李进德（督察处长）已先在座。吴即出示蒋介石手令：“胡院长应即移住双龙巷孔宅（孔祥熙部长公馆）。着由首都警察厅派保安警察严密保护，具体部署和行动同王世和密切联系。中正，3月7日。”

我看了手令后，给我思想上第一个反应是胡汉民还在，这足以证明了近来外面一般人所猜测的胡已死或出国都非事实；第二个反应是立法院历来就是由保安警察警卫，为什么这回蒋介石要亲自下手令，不要胡汉民回立法院或胡公馆，而指定要住孔宅？第三个反应是保护上层人物，布置警卫，保安队平时都是独立行动，为什么这回要王世和插手？而所谓“严密”保护，使我回忆起吴礼苍告诉我的消息，结合这些天来西南激烈反对的情况，未必不是蒋介石迫于形势，对胡汉民杀既不敢杀，放又放不得，只得把人交给我，名为保护，葫芦里又是另一包药。就我的职责来说，不能不执行命令，但从我的真实感情来说，则又是有抵触的（我与胡的关系，另文补叙）。

正由于我对蒋介石、胡汉民之间抱有不同的观感，因而我一看到蒋介石的手令，就联想起蒋介石把居正（号觉主，原司法院长）禁锢在南京周必由巷时所给我的手令，不也是明明白白写的“保护”字样吗？蒋介石一惯使用书面一套，实际一套的手法，我不能不把这手令的真实意图弄清楚。我就直截了当问吴思豫：“委座（蒋介石）还有其他交代没有？”吴亦开门见山地回答：“胡汉民反对委员长，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不住汤山移住城内，不用侍卫队而用保安警察，名为保护，说穿了就是监视。但又要在有我们的人监视之下，允许他在南京到汤山这个范围内活动，这都是为了对付西南和外面一些人的责难，所以对外要说成是保护。委座还交代除了戴院长（传贤）、邵副院长（元冲）、吴委员（稚晖）三人之外，其他任何人非有委座条子，一律不准与胡会晤。明天傍晚，即由王世和把人送到双龙巷，此后就是保安队的责任了。为了把这一工作做好，要做到连胡本人都说不出所以然来才对。”

根据蒋介石意图，经过大家仔细研究，吴思豫最后决定，由我负责选派一个中队布置双龙巷孔祥熙公馆警卫；由楼文钊负责会同该管区警察局于明午将孔宅及其周围有关楼房让出备用；由李进德负责与王世和联系，商定交接时间和手续。会毕，我即往双龙巷现场视察拟订布置如下：以一个班担任门答，形式上与一般要人住宅的警卫同。孔宅西面、北面、东北角楼房，各派潜伏哨一组，暗中监视孔宅内部。加强双龙巷西口通黄泥岗、东口通丹凤街的交通岗，注意来往行人和车辆。将孔宅原有电话拆除。中队部位于黄泥岗工商部兼任该部警卫，原派警卫归还建制。我即交代第一大队长胡绍韩（吴思豫的亲信），选派一个浙江籍、黄埔军校出身的中队长担任，目的是为了预防发生意外事故，可以减轻我的责任。

午后，我又召开担负这一任务的有关队长会议，并向全体士兵讲话，主要是强调这次委员长亲自交代的任务，既不同于一般保护，又不同于一般监视，既要达到委员长的意图，又要做到胡院长无话可说。要求对外保密，严守纪律，遇事上报，不得擅自行动。上述我这些安排的用意，与其说是防胡，毋宁说是防蒋。一方面防的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另一方面防的是这些警察

老爷们狐假虎威，嚣张成性，不能不用蒋介石这块令牌来将一将军。

我将布置情况向吴思豫汇报，同时楼文钊、李进德也交流了联系情况。诸事齐备，只是胡汉民提出要带他的女儿胡木兰和一女佣随伴。请示蒋介石得到同意。到下午6时许，王世和将胡汉民从汤山押来，由胡木兰扶持下车，跟即踉踉跄跄地到孔宅楼上沙发上一躺。我问他：“需不需要什么？”他把眼一瞪，头一摆，大有天下乌鸦都是一般黑之感。此后，我隔三几天前去巡视一次。胡总是心事重重，抑郁寡言，我也只得对木兰三言两语即去。

西南援胡反蒋，蒋介石的对策

胡汉民坚决拒绝蒋介石的非法要求，蒋介石恼羞成怒，把胡汉民软禁起来。当时作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的胡汉民与外界隔绝，很快就激起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如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统一政府的胡汉民派、孙科的太子派、张继的西山会议派等首脑人物都明白蒋介石权迷心窍是不择手段的。为了避免株连，纷纷潜去上海商谋对策。而在广州，与南京国民党中央貌合神离的政治分会的元老派，如邹鲁、古应芬、肖佛成、邓泽如和两广实力派李宗仁、黄绍竑、陈济棠、白崇禧、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等对于他们作为政治支柱的胡汉民无端被扣，更是激烈反对。这时在香港的前北平扩大会议主席汪精卫，不甘心他在不久前同阎锡山、冯玉洋联合反蒋的失败，又利用西南反蒋机会，企图东山再起。于是年5月间与西南合作，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成立西南国民政府，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唱对台戏，借以迫使蒋介石释放胡汉民。

西南这一行动，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计划，使他扣留胡汉民的阴谋，遭到中途挫折。在此以前，正当西南酝酿军事反蒋之际。蒋介石也曾考虑到这将不利于共同制订约法，更不利于团结反共。因而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除了原派戴传贤、邵元冲、吴稚晖3人对胡汉民进行劝说外，旋又增派陈布雷、张静江、于右任、叶楚傖、宋子文、孔祥熙、张群、吴铁城等前后共11人对胡汉民进一步施加压力，要他放弃反对制订约法的主张，却始终遭到胡汉民的严词拒绝；另一方面，趁胡失去活动能力的机会，积极准备召开别有用心的国民会议，以图得到在胡汉民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因此，为了对这一会议增强压力，他又拼凑了20万大军向江西红军进行所谓第二次“围剿”，并下令前线必须于5月5日前，即国民会议开幕前，攻下中央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瑞金等地，消灭红军，以显示他的威力，借以消除对他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怀疑和动摇。结果，遭到比第一次“围剿”更加惨重的失败。尽管蒋介石因西南造反而采取的两个对策都宣告破产。但是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并不因此作罢。

所谓国民会议，蒋介石玩弄民主

蒋介石并不因胡汉民作梗，西南分裂，江西军事一再失败，而放松对党、政、军权的独揽。一方面，他认为冯阎业已下台，张学良又被拉拢过来，这几股当时最大的实力派，都在他的纵横捭阖权术下屈服，正宜抓紧时机，从政治上为将来的总统梦找根据。所以必须召开国民会议。而另一方面，他明白，如果不是张学良投顺过来，他早被冯阎打垮。现在冯阎名虽下台，但是遗留下来的几十万军队，仍然保持相当强大的实力。而张学良进驻平、津，实际是取冯阎而代之。由于东北军与西北军早有多年的历史渊源，两军上层人物之间，也各有各的深厚关系，因此，蒋介石这时既怕张学良独自吞并冯阎部队，壮大了别人，孤立了自己，但又不能不依靠张学良。为此，蒋介石采取了分化、利用、限制的毒计来对付这些杂牌部队，企图借刀杀人，消灭非嫡系部队。这就是蒋介石要在 1931 年 5 月 5 日急急忙忙地于南京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会议，标榜民主政治的内幕。

国民会议召开时，我被派充国民会议的警卫官。我清楚地记得那时作为蒋介石最重要的上宾，就是张学良，他是蒋介石御用的国民会议最有力的配角。蒋介石心目中，只要把少帅（张学良）敷衍过去，就万事大吉。因此，他贯注全神，抓住这个关键，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保证会议安全，严防捣乱破坏。对胡汉民加强看守，既不让一点消息传给胡汉民，也不让胡汉民有一句话透露到外面。为此，特命我抽调两个大队和机枪、手枪、骑巡、车巡各一队，配合宪兵担任会场内外警卫。会场在中央大学，是专为召开这次会议而设计建筑的。主席台下面筑有钢筋水泥的地下室。会议期间，要布置一个中队在地下室。担任警卫的官兵都要经过严格选择，每人要具 3 人连环保结。主席台顶设有了望台，有钢筋水泥掩蔽体，东西南北各置一挺重机枪。场内各要道有全副武装的岗警，各进口处有门警，转弯抹角有暗探。场外附近街道有骑巡队、车巡队分段巡逻。主席台、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休息室完全由侍卫队警卫，除持有特许证的人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入会场。此外，会场出入证分四种颜色。红色的可以上主席台；蓝色的可以进会场；黄色的只能到旁听席；白色的是工作人员证。警卫人员的行动都有一定限制。警卫处长（吴思豫兼）可以上主席台、进出休息室。警卫官也只有工作需要才能出入会场，其他服务人员只准在指定范围内活动。就这样，几乎是用人盯人的办法，保证了会议的安全。

其次，防止夜长梦多，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保证议案的顺利通过。蒋介石用尽心机，宣扬这次是最“民主”的“会议”。他这个所谓“民主”，实质上就是一党专政，一人独裁，一手包办。所谓“会议”，就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他充分估计到除了“少帅”一伙人之外，不会有人持异议的，因此，他用全副精神对付“少帅”。针对“少帅”有吗啡癖、舞癖，就精心安排一套疲劳轰炸的日程。使“少帅”一伙人夜以继日地奔忙于“三会”（开会、宴会、舞会）之中。

再次，最突出的是办好招待。特派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任总招待。为了争取“少帅”一伙人的欢心，他们需要大批的舞女、歌妓和香槟、白兰地、金山橙、巧克力、雪茄烟、人头土（印度鸦片烟）以及山珍海味、点心罐头等等，应有尽有，都是用火车整车皮整车皮从上海运来。招待对象，主要是张学良一方，从上到下分别指定专人负责。如张学良由吴铁城、张群招待，

于凤至（张学良妻）由宋美龄、宋霭龄分别陪伴。高级幕僚如王树翰、莫德惠、刘尚清、刘哲、沈鸿烈、鲍文樾等则由各院、部、会每日轮流设宴招待。宴会后，备有舞会、戏剧、杂技、清唱、电影、台球以至烟赌等各式各样的娱乐场所，各投所好，各尽其兴，不到鸡啼，不会收场。娱乐场分等级，高级的设在宋子文、孔祥熙、张群、吴铁城、吴国桢等人的豪华别墅内；一般的则设在励志社、中央饭店、安乐酒家等处；至于中级以下的随员、副官、卫士、司机等都安排有相应的人员陪吃陪玩，不使一人向隅。这一幕独出心裁的“盛会”闹得满城乌烟瘴气，使得张学良同他的幕僚之间，也难得机会碰头。至于下级随从更是有吃有玩有收入。如宋美龄第一次私人欢宴于凤至，赏给于的随从人员就是三千银元。还有奉命陪赌的人员，只准输，不准赢，输掉的准到总务处作特别费报销。蒋介石就是采用“金钱万能”的办法，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上述布置下，使得张学良这一方，对会议的进行毫无准备，也无暇准备，而蒋介石那一方就大大不然，每晚深夜，蒋介石都要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亲信，亲自主持秘密会议，有计划、有准备地安排次日议程。提什么案，哪些人发言，如何监视表决，均作了布置。并有意识地安排座位彼此交叉，以便于控制。就这样，张学良连文件都来不及看，更谈不上提不同的意见，就糊里糊涂，随声附和，赞成！赞成！通过！通过！蒋介石毫无阻碍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可是，他的日子并不因此而好过。他忧心忡忡的还是不甘心于江西军事的一再失败，使他坐卧不安的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发展壮大。因此，在国民会议闭幕后，他又重新调集更多的运输队，妄图火中取栗。突然，“九·一八”事变爆发，震动全国，形势逼人，终于打乱他反共反人民的如意算盘。

西南内部矛盾重重，援胡反蒋同床异梦

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以后，蒋介石并不因此而轻视扣留胡汉民的作用。特别是西南正在造反，控制胡，就可以发挥控制西南的作用。当他去江西“御驾亲征”的前夕，还一再询问胡汉民的生活情况，并嘱咐我不要使胡受到刺激。胡的一言一行都要向侍从室汇报。只要抓住胡不放，不愁西南不买账，等到江西军事胜利后，无论采取软的或硬的一套，西南问题不难解决。这可以从以后红军向西北长征后，西南海空军离粤，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投蒋，迫使统治广东多年的陈济棠垮台，蒋介石仅仅花了几个钱，甩出几个官，又重新统治西南，得到证明。

当时被困在双龙巷孔公馆的胡汉民，一方面愤恨蒋介石手段毒辣；另一方面担心蒋介石随时可以下毒手，因而终日徘徊楼上，足不下楼。本来蒋介石允许他可以在南京至汤山一段路上自由逛游。但他明知这是蒋介石耍的花招，故从未要求一次出游，把唯一能够恢复自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西南方面，可是随着时间的消逝，消息依然渺茫。精神上的折磨，内心的痛苦，加剧了他身体的日益衰弱。

西南国民政府的成立，是国民党内部权力争夺的激化，是以原来半独立状态的国民党西南政治分会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这一局势，在政治上是以胡汉民派为核心，在军事上是以陈济棠为柱石。蒋介石对此，尽管大不满意，但他不甘心于江西军事的一再受挫，无暇兼顾西南，致使陈济棠坐大、独霸一方。当胡汉民被扣，陈在政治上失去了靠山，不得不转而利用汪精卫，以资号召。汪历来就是随风倒的投机政客，领袖欲大，不甘心于“扩大会议”的失败。现在蒋胡闹翻，正是捞取政治资本、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他利用西南国民政府主席这块招牌，表面上是援胡反蒋，实际上恰恰相反，一切是为自己。他同胡汉民的政治主张，从来就是各有一套的。因而他援胡是假，为己是真。而对蒋介石则是相互利用。蒋需要利用汪作他的政治傀儡，汪需要利用蒋作他的军事支持。因而与其说汪要反蒋，毋宁说汪的反蒋是为了投蒋。正如1927年宁汉分裂后，“七·一五”以汪精卫为首的集团举行的所谓“分共会议”，公开背叛革命，投靠蒋介石一样。

至于陈济棠援胡反蒋的态度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援胡是真，反蒋亦不假。两者都是他盘据西南不可缺少的条件。结果，他援胡援不了，反蒋也反不成。症结所在，是他虽有援胡的愿望，但因力量不足，终难实现，而汪精卫则是别有用心，心不在胡。轰动一时的西南援胡反蒋活动，并没有迫使蒋介石改变原意，恢复胡汉民的自由。而在广州的国民党元老派，如邹鲁、古应芬、肖佛成、邓泽如等倒是十分关心胡汉民的安危，没有袖手旁观临危不救。他们深知汪陈两人都不可靠，才派专人到沪，委托驻沪的曾经同胡一道参加过辛亥革命黄花岗之役的老战友熊克武、但懋辛、余际唐、喻培棣等，就近设法援救胡，终于找到援胡反蒋的另一途径。

熊克武、但懋辛积极策划营救胡汉民

大约在 1931 年 8 月上旬 喻培棣由上海专程到南京三道高井我的寓所访我，照例住在我家里。他恳切地对我说：“我奉锦公（熊克武号锦帆）和老二哥（一般对但懋辛尊称）之命来营救胡先生（胡汉民）。为这件事，西南已采取各种办法，老蒋（蒋介石）仍顽固地拒绝释放。现在远水不能救近火，还要考虑到投鼠忌器的问题（指用军事行动有顾虑）。所以才迭次商请在沪诸老同志就近设法，最低限度要暗中保护他的生命安全，最好是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出险。我们总不能忘记蒋当年欠下虎门那笔账（详后），使成千上万的旧袍泽到现在还流离失所。当时胡先生亦在老蒋的监视之中，虽对我们很关心，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老蒋旧性不改，又以同样的手段陷害胡先生，无论私谊公情，我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但如何入手，则很费踌躇。锦公想到老蒋既把胡先生交你负责监视，可能从中想出一个两全的办法，多年患难至交，相信你也不会坐视。因此，要我亲自来走一趟，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你身上！”

我当时被华伟（喻培棣号）这一股真挚热情所感动，立即严肃地说：“去年我同你们到武汉反蒋（详后），今天当然义不容辞要设法救胡。不过需要仔细研究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不能草率，以免打草惊蛇”。我当即将胡的健康状况，蒋临行前的交代，以及警卫布置情况，一一告之。喻深感情况颇为复杂严重，不能再拖。当向我提出需要设法先同胡一晤，把内外情况交换后，再作计议。我当时同意有必要这样作，应考虑的是保安队上上下下对我无恶感，但也无特别好感。而蒋介石对人，惯用权术，今天用我，不一定信任我。各级都有他的耳目，不能保证没有人盯住我。因此，要喻准备好谈话内容，时间不能多耽搁，而且要见机行事。翌日，我照平时一样前往孔宅巡视，喻化妆随我前往，以请胡书写为名（胡长于汉碑）叫喻把宣纸递上楼去，喻即趁机上楼晤胡。

事后返家，喻对我说：“胡先生很惶急，正如我们那年被囚虎门那样，满腔激愤，我扼要将粤沪情况和此来意图向他说明，最后征询他的意见。”

“据胡先生说：前后到来看我的人（指蒋选派的 11 人）语调不同，用心则一，可以说都是蒋介石的传声筒。这也难怪，我尚且如此，他们不如此，自身亦难保全。他们的意图，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国民会议（指 1931 年 5 月 15 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召开以前，要我放弃主张，不再反对，仍然可以恢复我的名誉地位。当然我不能为他（指蒋介石）开此先例。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法制的根本问题。我们不能忘记总理（孙中山）建国大纲精神。最后我答复他们，他（指蒋）坚决要一意孤行，由他自己负责。这是前一阶段。而在西南成立国民政府以后，这些人又不断前来噜嗦，理由是：“顾全大局，一致对外（指共产党）。要我亲笔函劝西南，恢复统一。然后他们才有向蒋转圜余地。可恨这些人完全把我当成人质看待，亏得他们想得出来，说得出来，自从蒋去前方后，最近他们也不再讨没趣了。我想：蒋介石还不敢公开杀我，顾虑的却是暗害。特别是近来各方面形势紧张，这一手，蒋介石是做得出来的。我并不是怕死，所不甘心的的是死得不明不白。你（喻）同锦帆、怒刚诸兄热情可感，不知此来有无妥善办法？”

喻又继续说：“从胡先生的话里，情况确是迫切，近来沪上亦有此类消息。无怪胡先生有此忧虑。我当即告诉他：‘熊先生和但先生对于整个形势

已经缜密考虑过。不管局势如何演变，一致认为目前救人第一，此来正为此事。由于熊、但两先生想到有一人可托，所以要我亲来与先生联系’。胡先生马上追问：‘哪一个？’我答：‘就是卞椎珊。’胡先生一闻此言，反而失望地说：‘他！他把我看得这么紧，哪里能够！’我说：‘今天与昨天不能同日而语，你知不知道他就是卞小吾烈士之后，与我们一军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关系，是一个能够共患难的朋友，去年他可以同我们到武汉反蒋，今天又能让我单独进来会你，这难道是一般朋友所能做得到的吗？’胡先生听至此，兴奋地说：‘你们既有这样的热情，我被关在这里情况不明，也没有成熟的意见，最好是趁蒋忙于江西军事，出其不意，给他一个措手不及。你们商量怎样办，就怎样办。你们商量好，我希望请他（指卞）明天能够亲来同我谈一谈’。”

喻培棣、卞稚珊营救胡汉民的计划

我同喻培棣从当时的局势，熊、但二人的期望，胡汉民的想法以及我们能够做到的客观条件，进行了分析，经过日夜反复密商，决定以救人为主。而救人的办法，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西南局势的演变上，还必须同时考虑到别的途径。根据个人权力所能及的有利条件，初步拟订以下的营救计划：

计划之一：

情况分析：自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排斥、打击、残杀共产党人；破坏、践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大政策后，引起国民党内部分裂，特别是互争所谓国民党党统和各省地盘。使国民党本身分裂为南京的蒋介石国民党、汪精卫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及广东派等。以美、日、英为首的各帝国主义，为了争夺势力范围，支持各派发动了一系列内战，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几次战争：

1927 年 10 月至次年 1 月有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的战争。1928 年 2 月间，为了争夺华北，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形成蒋、桂、冯、阎四派的联合，发动对张作霖的战争，后来张在皇姑屯车站被日本炸死。这时美国为了企图和日本争夺东北，又策动张的继承人张学良和蒋介石合作，于是东北又承认了蒋介石的统治。蒋、桂、冯、阎联盟刚刚结束，新的矛盾又不断产生。1928 年 3 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为了争夺华中统治，又爆发了蒋桂战争。是年 10 月到 1930 年有唐生智和石友三联合反蒋的战争，紧接着是年 4 月到 11 月有蒋和冯、阎的大规模的中原大战。

这些战争之所以都以蒋介石方面得到胜利，主要原因是蒋介石派挂着中央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旗号；取得了美英帝国主义大量的援助和上海江浙财阀的支持。

就这样，蒋介石表面上统一了全国，实际上，两广、四川、西北、东北各地方军阀都保持半独立状态，分裂割据一方。当然蒋介石对此很不满意，为了巩固他篡夺的党政军大权，实现他多年幻想的“总统”梦。因而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迫胡汉民由立法院制定一个符合他意图的约法。但胡不为利用，不怕威胁。蒋则权迷心窍，一怒而扣胡，为包办国民会议扫清障碍。在国民会议召开以后，蒋已如愿以偿，扣胡已失去原有作用。但因此而激起西南成立国民政府以相对抗。使蒋在政治上暴露出弱点，在军事上不能实现两广军队在南面包围江西红军的计划。在此以前，胡曾拒绝蒋要他函劝西南撤销国民政府的要求。现在江西红军一再胜利，蒋更需要西南的合作。这并不意味着蒋放松了西南，而更重要的是解决江西红军这个心腹之患。

而汪精卫念念不忘的是国民党中央的党权、政权。过去联合冯阎策动反蒋的中原大战，目的亦是为此。而今虽然当上了西南国民政府主席，但他并不满足于偏安西南一隅的局面，只要满足了他的欲望，那就什么也做得出来。

至于胡汉民，此时自身难保，无暇他顾。只有希望脱险以后，再谈国事。

以上是我同喻培棣对当时情况的分析。基于救胡出险为当务之急，决定以暂时妥协为上策，主动满足蒋、汪的需要。和平解决的办法，就是建议西南由元老派出面，以恢复胡汉民自由为条件，撤销西南国民政府组织。

计划之二：

目的是准备在计划之一不能实现时，运用个人权力，布置心腹，选择有

利时机，离开孔宅。

具体行动是：

首先，由胡慎选精干可靠人员，秘密介绍给我，我即利用批准各队补充缺额的职权，把介绍来的人员安插到警卫孔宅的中队值勤。表面上是保安队警士，实际变成了胡的侍从人员，这就为胡汉民提供了随时可以化妆溜走的条件。

其次，决定出走之前，必须做好3项工作：

一、在双龙巷东西口，越出监视线外的黄泥岗或丹凤街选定适当地点，准备好接运汽车，或布置接应站，以保证胡汉民溜出孔宅后，能安全开往上海。

二、严格要求冒充警士的同志，利用值勤机会，沉着地掩护胡汉民溜走后，留在原岗位照常服务。必须在胡去一日后，始能自由行动，因胡从不下楼，警卫人员也从未上楼，门警不逃，则使胡汉民到上海就有充分的行车时间。

三、胡走后，胡木兰和女佣还需暂时留下，照常在上楼活动，以麻痹孔宅周围潜伏哨的监视。事后，即使蒋介石迁怒木兰，毕竟她是女眷，料蒋也不至于下毒手。

计划之三：

这一计划是在计划之一、之二条件还不成熟时，预防蒋介石突然袭击，为确保胡之生命，迫不得已而采取的紧急措施。具体行动是利用我有权准胡出游汤山这一有利条件，届时由我亲自出马，与胡同车表示亲自监视，选择中途预定的接应地点，多备现金，以备对随从卫士进行收买。万一不听指挥，即先发制人，用武力强迫服从，同到上海。要钱给钱，要官给官。以我所知保安队的素质，在重奖之下，而又有我负责，正好求之不得。蒋介石愤耍金钱万能的伎俩，收买异己。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大快事。不过这一计划还不能期其万全，而有冒险成分，非不得已，不能采用。

我把以上计划同喻培棣商定后，次日我即以取胡写的单条为由，上楼直到胡的书房（此房不比会客室，可以避开周围视线），胡闻声，立即由木兰扶出，趋前紧紧握住我的手。他明白，我此来会给他带来希望。这与过去对我的冷淡态度大不相同。他先开口说：“昨天华伟来，才晓得令尊……。”我不等他继续谈下去，马上截住说：“用不着再客气，他已经详细告诉我。为了国家前途，宁肯少一个我，不能少了胡先生。换句话说，可以牺牲我，不能牺牲胡先生。我来会胡先生，就是表明我的决心。”紧接着我把营救他的三个计划提出请他斟酌。他听后很激动地说：“这几个计划只有你才想得出来，也只有你才做得到。第一个计划虽能适应目前形势的要求，但有汪精卫，操之过急恐难成事，还担心夜长梦多，发生意外变化。第三个计划，固然我们可以不惜用钱，但不能保证不牺牲人，现在还用不着，我看还是第二个计划稳妥、可行。最难得的是你的决心。有了条件，没有决心和毅力，还是不行。现在我把全部希望完全寄托在你身上，你看怎样？”我说：“单凭我的决心还不行，还需要准备两个条件才好办。”

我紧接着问：“有没有对你最忠实可靠的人介绍给我？”胡答：“此事情转托伯琅到上海一趟，必要时找陈融约李文范会同商量。为了我的事，现在又是紧要关头，他们一定能够物色几个可靠的人。我想为了避人耳目，来的人可以用化名，就以伯琅名义介绍给你。至于接应的汽车等，都告诉他们

妥为准备。最好你要怎样办，就叫他们怎样办。”

我继续又提出第二个应具备的附带条件。同时把我的视线，注视到木兰身上。我问：“照第二个计划执行，木兰女士有无顾虑？”胡一听此话，神色显得很难过。谁都知道他们父女是相依为命的。还好，木兰不等她的父亲开腔，就坚定地插话说：“为了家父，卞先生都这样古道热肠，我们是父女关系，只要对家父的安全有保障，我是不辞任何艰险的！”我说：“既然木兰女士有这样好的孝心，外面一切我负责，问题就这样决定。不过从今以后，胡先生还有必要伪装有病，连会客室都宜少出，对麻痹他们放松监视有好处。”同时我又将警卫散布情况指给他们看。胡才明白，四面八方都有监视他们的人，不禁紧握拳头愤怒地说：“蒋介石丧心病狂，已无人性，看他能够横行到几时！”我见他感情冲动甚剧，当即安慰数语，要他善自珍摄，准备应付未来事变，胡感慨地说：“老友难得，请为我谢谢华伟，并向锦帆、怒刚诸兄问候。”我即起身，拿着他写的单条辞出。

归来，即将会晤情况和胡对3个计划的选择与委托之事，转告华伟和伯琅，他们都认为这样做，比较有效而安全。当晚即联袂去沪，分头进行。大约相隔一周后，伯琅先后函介两人前来我处，我即按照预定计划先安排他们在总队部服务。到8月底，各队缺额表报报来时，我立即把这两个人补进一个中队充警士。旋即有意识地将这个中队调到双龙巷孔宅接防，待机行动。

时局急转直下，蒋汪合流，胡汉民获释

在我按计划安排好人事不过一个星期，突然“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遵循蒋介石不抵抗的意旨，节节败退。东北沦陷的消息不断传来。与此同时，蒋介石进行的所谓第三次“围剿”，又遭到失败。而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响亮口号，正获得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蒋介石在这样内外夹攻的情势下，仍然顽固地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依靠国联，希望列强保持在中国的均势，从而迫使日本的侵略适可而止。对内把中国共产党当成心腹之患，是一场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为此，对付西南又变换了一副面孔。他明白汪精卫提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意图，正是迎合自己团结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真实意义，因而乐得丢出几块臭骨头，换取西南撤销独立，这样，宁方派出居正、叶楚傖等为代表，粤方派出汪精卫、孙科等为代表，在沪举行和平谈判。很快就达成了宁粤合作。胡汉民恢复了自由。汪精卫重新当上蒋政权的傀儡。汪、蒋合流，加深了中国人民的灾难。

在这以前，宁粤两方派代表在沪进行和谈的前夕，蒋介石突然下令给我，派兵保护胡院长去沪。当我将这一消息往告胡汉民时，胡反怀疑说：“刚才季陶、铁城、元冲诸人都来转达蒋介石之意，要我到沪休养。我正为此事忐忑不安，你来正好，是不是蒋介石又在耍花招？”

我说：“不错，刚才我同伯琅诸人对时局的急转直下，交换了意见。也认为蒋介石还在继续耍花招。不过这次花招不是在你头上耍，而是耍在汪精卫头上去了。”胡问：“此话怎讲？”我解释说：“这几天，侍从室的人传出消息有这样几句话：‘老头子（指蒋介石）成天大发脾气、骂人，我们也怕接近他。’另一消息是汪精卫已经决定来上海，蒋介石正在派人去沪，准备和谈。再有一个情况是各方面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激烈，对蒋介石坐视不出兵非常愤激。侍从室传出话来，认为是共产党在捣乱。综合这些情况看来，蒋介石这几天弄得确是手忙脚乱。对内对外都难应付。所以说花招耍在汪精卫头上，还不是要他背死人过河吗？刚才我接到命令，还问过吴思豫：放就放，为什么还要派兵保护？吴说：‘胡院长来的时候是叫派兵保护，今天放，仍叫派兵保护，前后一致，是有委员长的道理的。’我又进一步问：‘外面谣言很多，究竟中央决策如何？’吴说：‘委员长这几天来，很伤脑筋，大致已经决定，采取分别对待的办法，东北问题用外交解决；江西问题用军事解决；西南问题用政治合作解决’。”我将以上情况告诉胡汉民，胡愉快地说：“不料我们准备实行第二个计划是备而未用，而认为远水不能救近火的第一计划，反而提前实现。形势变化，殊难预料。不过这个所谓政治合作，主要不是为了我，而是便宜了汪精卫。情况现已摆得很明显，那就决定尽快走，先到上海再说，国难严重，蒋介石一意孤行，要负完全责任。”

又隔了两天的早晨，双龙巷气象一新，冷落已久的孔宅，又车如流水地载着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各部门的文武大员，除蒋介石外，几乎都到孔宅送行。当胡汉民由木兰扶持跨出大门时，排列在两旁、笑容可掬的大人先生们，争先恐后地趋前向胡汉民问好。但是胡汉民一见，反勾起了一向蕴积在心头的怨忿，不瞅不睬，旁若无人地直趋座车，弄得大家颀颜相向，啼笑皆非。但最糟糕的是，他刚一上车，抬头见我遥立远处，他情不自禁地又下车来，走过来同我这个小人物握手，连声谢谢！这本来算不得一回事，但是在当时那种

尴尬场面下，就突出了，以至引起全场侧目，弄得我亦忐忑不安。这与我此后不到两月，就被蒋介石免职，乃去香港同熊克武奉胡先生之命奔走于天津、北平、包头之间，支援冯玉祥、吉鸿昌等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是有前因后果的。

胡汉民从此以后，虽没有重登政治舞台，但他对蒋介石的仇恨，并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他一直住在香港妙高台上，仍然不失为西南政治核心人物，继续领导着西南坚决反蒋，积极抗日。到 1936 年 5 月 12 日，因操劳过度，突患脑溢血病逝。由于胡汉民先生跟随孙中山先生参与辛亥革命，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国，功垂史册，因而逝世后移葬广州近郊，广州各界人士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在移葬那天并推我指挥有 10 万人参加的送葬行列，可见是有由来的。

熊克武、但懋辛援胡反蒋的历史渊源

熊克武、但懋辛、喻培棣、卞稚珊援胡反蒋，是有一段历史渊源的。熊、但自从参加 1911 年 3 月 29 日震动满清王朝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到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他们在四川执政十多年。经历了“讨袁”、“护国”、“讨贼”诸役，都是秉承孙中山之命，对北洋军阀作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我从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后，始终都在熊、但所部任职，连年苦战，生死与共。1925 年军次常德，适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伐受阻，乃又转战湘、黔、桂、粤边境的丛山峻岭，历时五月，行程万里，全军三万多人中，沿途病死、饿死、战死的达六千之众，满以为返回革命的老家广东，就可以得到休养整补，参加北伐。不料军抵粤北连县、连江、三江和星子等地，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等已蓄谋瓦解熊克武率领的建国联军川军，竟以会商军事为由，诱熊等到广州，由蒋出面设宴招待，亲自动手，将熊囚禁于虎门要塞。随熊前去广州的余际唐（建国川军第一军军长）、喻培棣（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陈古枝（总部秘书）等高级领导人员，也无一幸免。与此同时，蒋已先遣朱培德军、谭道源师向连县进逼。朱要的是人，谭要的是枪。那时我亦率领随营干部学校学员千余人到连县。见全军虽失去领导，每兵所配子弹也不到十发，更无隔宿之粮，但对蒋汪咄咄逼人，竟图分割革命力量的行径，全军激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愤慨，奋起在星子一战，将朱、谭两军击退转道湖南，将全部武器送给唐生智，而四川第一军至此亦告寿终。

从此，熊、但以下官兵始终坚持反蒋立场，作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后来熊被释放，养病于上海紫阳里，蒋却假惺惺地与张静江同往看熊，一见面就提起虎门那桩事是误会，表示歉意。熊马上制止蒋勿提往事，提也无用。蒋大惭，不欢而散，可是蒋并不因此而放松对熊的拉拢。在蒋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以前，曾而度亲笔函请熊赴宁会谈国是，蒋拟以川政饵熊，借熊、但声望以收拾川滇黔局面，完成统一。熊、但不为利用，断然返沪，策动军事反蒋。1930 年当蒋冯阎中原大混战时，熊、但、余、喻潜赴汉口，联络驻襄阳的滇军范石生部、驻沙市的陕军李虎臣部以及川军郭汝栋部等配合冯阎反蒋之战，在武汉发难。当时我虽在南京任首都保安警察总队长兼南京南区城防指挥，但一闻熊、但召唤，深感义不容辞，毅然首肯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潜赴武汉，参加反蒋活动。结果，随着冯阎的军事失败而告终。然而并不因此停止反蒋。熊、但、陈古枝等又于次年夏天，亲到山西河边村访阎，并到汾阳峪道沟柳林去看冯，目的是在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反蒋到底。当胡汉民被扣，熊、但早已领会过蒋介石手段之阴险，同时也看穿汪精卫的别有用心。尽管自己是单干，也要尽个人的力量营救老战友胡汉民。“九·一八”事变胡恢复自由，增强了熊、但反蒋的信心和力量。次年夏初，胡在香港函熊约但参加西南行政委员会，代表西南到云南联络龙云、到贵州联络王家烈，策动他们与西南一道反蒋，反对打内战，揭发蒋的“先安内后攘外”不抵抗政策的反动实质；提出抗日救国的主张。但去云、贵之后，紧接着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遭到蒋介石、汪精卫的阻挠和破坏。熊愤极，立即代表西南偕陈古枝、卞稚珊等到天津积极策动各方面对抗日同盟军的支援。并派卞稚珊到太原联络阎锡山，到包头联络孙殿英出兵抗日，共赴国难。结果，仍以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终不免于失败，从而吸取教训，认识了要革命，必须依靠谁的问题。这可以从四川解政前夕，尽管蒋介石用

尽心机，企图劫持熊、但到台湾，由于熊、但思想有准备，熊事前避居乡下，但则卧床不起，使蒋的阴谋不得逞。

至于我们之所以积极援救胡汉民，一方面熊、但与胡在辛亥革命整个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特别是在后期，与蒋站在对立面；另一方面，孙中山逝世后，胡留守广州，代理大元帅职，熊率建国川军一军到达湘西保靖时，决定不回川而去广州，正是因为胡在掌权。殊不知喻培棣代表全军先到穗，晤胡时，广东局势已变，蒋竟以“廖仲恺被杀案”，诬胡而软禁之。因此，对熊等被扣爱莫能助。只是说了一句：“可惜来迟一步。”这句语重心长的话，使其至今难于忘怀。以上这些历史渊源，促成熊、但积极营救胡汉民，反蒋到底，更主要的是，蒋介石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这是稍有爱国心的人都不能宽恕的。这亦可以说明我之所以对喻培棣一来，即唯熊、但之命是听，对蒋则阳奉阴违，决不是偶然的。

一代英豪邓演达

邓演达被捕始末

灼华

- 邓勉励的话语竟成讖语
- 狱中通信
- 移往紫金山的荒屋
- 满腹的疑惧
- 窗口一面竟成永别
- 赤血点燃革命之火

“革命是站在大众前面为大众而牺牲的事，中国为封建的政治势力所笼罩着，为帝国主义经济势力所束缚着，在这种二重压迫之下，平民大众要奋起是何等困难，何等艰苦的事啊！特别是要站在平民大众前面，在此种反动极盛的局面之下为农工平民大众而争斗，随时都必须准备着被捕，随时都必须准备着被残杀，被捕被杀是革命者应有的觉悟，尤其是我们该充分的准备着，准备那最后的一刹那……。”这样勇敢坚毅的勉励词语还好象我们对谈一样，不幸，邓演达先生竟被惨害了。以上的话竟成讖语！

说起这事——邓先生和其他 12 个同志钱福光、黄锦耀、方矩、邓文、黄素、张小山、李文英、王素清、张昌等 9 位是为了训练班的教育问题而被捕，时间是 1931 年 8 月 17 日午后 3 时，地点在愚园路愚园坊 20 号。因为当时在愚园坊的集会仅只是一种关于学术上的讲演，邓先生亲自出马演讲已是那一班最后的一次。任树宣并不曾参加那个班却是因为与巡捕吵嘴，同时是同情于我们而被捕。陆志宁虽不参加集会却是训练班中一个跑腿的人，他因为收到外间两个电报和几通报告要送与邓先生过目，所以跑到愚园坊去，竟至同时被捕。还有一位朱丰庆原是我门牌错了，丝毫没有关系而冤枉被捕，许生祥则在搜查的时候被捉着的。程朴同志则在麦根路 32 号被捕，他单独的囚在戈登路巡捕房，邓先生和其他 12 人则被囚于静安寺捕房。当大家被捕之始，他们因为十分重视邓先生，所以特别把他和西探洛思同一个手铐锁着：其他的人，到了捕房之后，则一同关在一间宽不过一方丈的牢里；又是夏天，汗蒸如雨，坐狱倒是平常，没有水喝真是件难过的事。

17 日下午 6 时左右，巡捕房的人特别把陆志宁叫出来到爱文义路和西摩路两处地方搜查一次，把所有的书籍文件一律拿了去，说是作什么证据。其实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以至史记，汉书，和说部丛刊，以及经济学全集等都拿去了；甚至自来水笔和一些款项也在犯罪之列！两处地方搜过之后，再解回捕房。

于是一个个的盖手印，把身上的裤带，皮鞋上的鞋带、手表等类的东西都一一解去；然后才把这些人一齐关在捕房所设的临时监牢里。这个监牢，三面是水门汀所造成，外面是砖墙，一面是比大姆指约粗一倍的钢条作的槛门，地面和层顶都是水门汀所造成的，门口坐得有一个守槛门的巡捕，但他也是关在大槛门以内，不能自由出入。我们进了监牢之后，虽然仍是怀念着外间的事，特别是有关系的许多同志，不知道他们到底怎样？不过身体上得

到了略有休息的时间，所以也有谈话的机会。当时与邓先生曾谈到两件最要紧的事：

一是要设法把被捕的消息传布开去。

二是要设法安慰同难的同志。

对于第一件事我们已算尽了我們力之所能，算没有完全埋没；第二件则我们迄今回思也觉着惭愧没有充分的做到。在巡捕房监牢里，邓先生非常沉默，轻易不肯说话。不过我们曾经谈到如果南京要以你投降作释放的条件，你的意见怎样？先生回答的话是：“决不！它要我投降，要我抛弃我的主张，那它拿刀子来好了！”但是他同时又估量着如果这事情公开了，则蒋不致于加以残害。

18日早晨9时，我们被解到江苏第一分院候审，在途中囚车上遇见了程朴，才知道他不过后我们4、5个钟头被捕。当在法庭受审时，就完全明白全案计有15人，其中有两个人：一个是任树宣，仅只一面之缘；一个是朱丰庆竟至我们全部不认得。经他们自己一再说明，但还是丝毫不能取得法律上的保障；我们13人自然更是“大逆不道”了！邓先生当时于简单叙述他的年龄籍贯及履历之外，曾反诘法官，为什么逮捕我们？他的答案是你们反动。问他什么是反动？他说反对政府就算反动。他并不曾认清政治争斗是什么东西，甚至并不曾了解什么是政治？所以他们对于法律只有曲解，对现实也不敢正视，不懂得正视。所以他只晓得所谓中央的命令，从不曾想到法律应该不要偏倚；可是现在不但是偏倚，而且是枉法殉统治阶级之私，所谓“公道”，“正义”都只是白纸上的黑字，拿来骗骗人，作敷衍门面的东西而已。所以对我们一场审问和裁决，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去，都只有敌对的政治关系，决没有什么法律。我们自己的说话固然不能发生任何效力；即是律师根据他们所定的法律说话，也是毫无用处；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执行其所谓中央的命令实行引渡。虽然法官曾问我们对于引渡移提的意见，但这仅只是一种面子话，甚至我们所说的话他们竟不曾听见亦未可知。律师的抗告，据他们的答复说是中央要提的，抗告是无用，从此即无异乎宣告法律非特不能独立，司法决无所谓尊严，恐怕法律简直是一种附属品，不然就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杀人害人的工具，只拿来统治平民，拿来压服大众的东西，其他绝没有别的意义。这恐怕是历来如此，特别是在中国，关于政治争斗，对政敌总不惜以极残酷极野蛮的手段相对付，转弯曲折也要去比附法律，是满清专制时代罗织人罪的方法，现实竟是赤裸裸的说是中央的命令，乃以命令代替法律，以命令支配法律。这种中国平民大众的耻辱，不晓得还要用多少赤血才能洗涤干净！

在8月18日所以还把我们留在捕房不曾引渡的原因，是警备司令部的公文还不曾备齐，手续未能完备，于是又决定把我们解回捕房去。在宣告暂时休歇的时间中，我们感觉着最难过的，是从17日晚间起到18日早晨听审都没有喝过一滴水。从早晨9点站到下午1点半，也不能不说是疲乏；但是邓先生还是精神一贯，虽然不吃不喝，仍能保持其严正从容的态度，这使我们同难的人十分惊诧与敬畏；同时使持权力的法官也不能不表示若干的同情和敬意。后来经过律师的转圆才送与邓先生一杯茶，但是邓先生只轻轻地吸了一口，即递与同难的人，他说“请大家稍微润一润口罢，”同时先生更要求律师再设法弄几杯茶来，那真是甘露一滴，比琼浆玉液都觉着有味，假如那时候能许我们各人尽量的一饮，则虽小便旁边的自来水龙头，我们也决不嫌

厌的。（在候审室旁边，没有进候审室之前，我们先关在一所临时的大监牢里，这所监牢大约见方两丈五尺光景，我曾留心细数关在里面的人，竟有 280 多个，其拥挤可知，小小的宽约两尺，长有 8、9 尺的小便地方，真是川流不息，一对一对的去小便，因为都是两个人同带一对手拷，当时与邓先生同锁在一对手拷的大概是方矩同志。凡是去小便的人都不见得是为了小便而是为了借此在自来水龙头跟前喝一点冷水，以解自己的渴）我们但愿把我自己的血化作清泉供给世人的狂饮，洗涤中国一切政治的社会的污秽。然而我们自己还是饥渴当前，纵然努力自行克制，究竟是肉做的身体，还是免不了受饥渴强烈的刺激。

18 日的审讯，我们不知道是预审是什么……就又马马虎虎地解回捕房的小监牢中去，我们从此知道引渡是必然的了！同时我们推度这次条件发生的来源，为什么巡捕房会这样知道得详尽，与我们有关的几个地方他们都一齐晓得？关于被捕的事，邓先生亲自对我说：“这事情 99% 是陈敬哉告密；因为他进到愚园坊后，听我谈话不过半点钟，他就说肚皮痛，请先告假，他走了不到 40 分钟，巡捕房的人，侦探等等就来了。……”我又回想到：在训练班刚开始的时候，上海市负总责的张亦荣即对我说过 3 次，说是陈敬哉要听邓先生最后一次的讲话，经请示过邓先生得到允许之后，才嘱咐他 8 月 17 日 12 时半先到观森里 1089 号去，自有人同他一块去，我记得同陈敬哉一路去的是邓、黄夫妇。那时候陈敬哉虽然卸去了上海市组织的责任。但仍旧住在那个机关里，仍旧与上海市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开诚布公的邓先生对他并不曾怀疑，更不曾戒备，以致让他告密的诡谋成功，革命前途遭受莫大的打击！

当 19 日复审的时候，都以为任树宣是二房东的儿子，并且年龄不满 16 岁，事实上丝毫无关，应该能够保释或者无条件释放，再一个朱丰庆既全不相干，更该释放，许生祥是厨子亦无关系，最多也只不过取保释放。但是当时警备司令部探员王斌陈述：“这个案子他们都是一伙的，决无疑义。因为一两个月之前就有人密函警备部，问我们要不要邓演达他们这一批人，如果要的时候，则请登时事新报广告一星期，约定接头地点。后来登了 1 天、2 天、3 天都没有人来接头，到第 5 天上才又得着复信，第 6 天才遇见了人。今天他们本来在观森里聚会的，愚园坊是后来才移去的。任树宣是他们一伙的，他虽然年纪小，但他的父亲和他和邓演达在一桌子吃饭，可见他们是一起，说是房东，那是他们的谎话。许生祥是他们送信的。朱丰庆也是他们同党，所以开释和保释的事，都请钧院不可允许。况且这是中央交下来的案子，尤其不可轻纵。……”

由此我们更明白，更证实邓先生的说话和我们的假定自己人告密是最痛心，而且是最难防备的事！当我们回到捕房关于小牢里的时候，邓先生说：“以耶稣为民族解放而争斗，13 个门徒中有一个人告密，我们也是有一个告密。……耶稣最后的结果是流了血的牺牲，以他的鲜血来洗涤犹太人的污秽，以他的鲜血来表明他的伟大，他的崇高”。不幸邓先生的话竟成讖语！

19 日再度受审之后，在江苏第一分院再打过一回手印，警备部就用一乘中国搬场公司的搬场汽车，把我们解到西门白云观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侦察队去。去的时候他们却很优待，送茶给我们喝，送饭给我们吃，……对邓先生个人另自给他一间房子，不让他与我们同室；但他的屋子与我们的相邻，并且可以时常说话。先生总是沉默，总是闷想！在 19 日下午在警备司令部侦

察队，我们各人都曾留影，那些像片中又以邓先生的相片为最从容。

8月20日早晨，据邓先生告诉我们说：“王伯龄来看我，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我自己作事自己当，决不推诿，但我不是共产党。其他就是随便胡扯一气，并没有旁的要紧的说话。”我们当时曾问，据您看这个案子结果何如？先生的回答是，“南京决不至于杀我，但3、5年内决没有出来的希望，借此机会多读点书也是好的。……”然则我们如何呢？先生说是：“你们顶多一年半载定要出去的。……”总有一两个人要被杀罢？先生的意见：“他杀你们作什么？有什么用处？所以你们放心，不但杀是绝对不会，即长久的监禁也不至于的，因为事实上没有这种必要。……”

8月21日早晨9时光景，侦察队的人就来说，要请邓先生到南京去，请他预备。大约10点钟光景邓先生去了，临行时他对我们说：“你们安心，我到了南京之后，我总设法子告诉你们我的情况及其他的一切。……”这是最后的面谈，最后的声音遗留在我们脑子里！

于是我们就此关在白云观从8月19日起，到9月初间，其间经过了一些小风波，多数的人都不曾在白云观受过审讯，并且不几天，杨允鸿，陈石，沈惠昌，黄金章，和其他两位工友都从法租界引渡了过来关在一起。我们诚然都不同房间，可是每天大小便的时候都可以彼此看见，也可以在相问一声祝君早安，晚安之类，有时也可以在毛坑边蹲着说两句话。9月初为了一笔款子的关系，又发生了一点风波，他们早发现了陆志宁是假名，他的真名是罗任一。经过了3次的残酷拷打，终于被他们榨去了7千元，其他6百多块钱的零钱，我们自己抽烟、吃菜用去不少，又支还了一点作零用。所换得的特别优待是准许与家属接见，剃头修面。在9月15日午后就决定把我们解到南京去，路上押解我们吃住不愁，穿衣服却未尝没有问题，茫茫的前途，又与车站上的难民相差几何。然而我们究竟是百事不管，纵使在忧郁的氛围中，在绝对的压迫之下，可是一般农工平民又何尝不是在同样状态之下呻吟！又那里去求得暂时的安慰，又那里有新的希望？从窗上一面以后，就已经有了特殊的方法，透过看守，与邓先生通信，第一信（大概是9月25以后的，）原信说：

亲爱的××：得到你的信，使我异常安慰。你们在那边生活怎样？很是忧念！我将要求他们好好的优待你们。我的生活比在外面反而好了，我的饮食得丰富，以前从来没有的。我相信你们在那边的生活，不曾象我这样好。

当局决不会杀我们，这一层大家都不必忧虑！他们差不多每天有人来看我的，同我谈话很多，意见是要我软化。日本已于9月18日占领了沈阳，这几天外交问题极紧急。昨天他们有人来问我对应付日本的意见？我想我没有软化的必要，我仍当坚决的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我曾答复他们，这不是私人的争执，而是为社会为中国。只要他们能接受我们的主张：“开国民会议，解决土地问题，我即可表示与他们合作；否则个人的屈服是无用的，无意义的。”

我每天读书，同时还可与同狱者谈话，不觉得怎样苦，请勿为念。……
第二封信大概是10月初几写的：

亲爱的××。过去一切情形，我都已明白；这次事变的来源我也知道了。事情已经是如此，愤恨是无用的，时局更加紧张，据说粤方已与宁方接洽和议。或者不久我们就有恢复自由的希望。大家宜乘此时机，多读书，好好修养。我们出去时必有更大的使命给我们担负。我们的时候，或者快要到了，希望大家安心修养，读书，这是最要紧的事。我对于过去的和这次的事情，自然比你更感觉着难受。但是你们不必再愤恨！

你们的饮食何如？天气冷了，你们大家恐怕都还没有衣服；我将要求他们送些衣服给你们。或者

你们亦可写信出去要。零用钱亦可写信出去要。我这几天没有钱了，过几天我也可以送些给你们。

我更忧虑你们的健康，希望你们务必保重。

隔了两天“看守长”果然代传命令叫我们写单子要东西，无论被子衣服都可以的。我们写了几条棉被，几个热水瓶，几件棉衣，送了出去。但是结果不过说了这样一句话，究竟只是镜子里面的花朵。同时邓先生又来了第三封信：

亲爱的×：你们饮食不良，使我非常忧虑。应该由你设法告×兄要他多多的设法，这是他的责任。顶好能叫××来南京专门为你们办理关于衣食等事。

我们的时间万不可空过。特别是你应该负责任督率

同人读书。这就是我们的训练。如果没有书，你也该设法去弄一点书来。我在这里有书可看。并且他们允许我看报，我从报纸上可以得到一般的消息，现在告诉你们：

(一) 日军已由沈阳侵占到吉林，东北事变愈见扩大；

前途的应付更加困难。

(二) 宁粤讲和大约会成事实。

(三) 民众运动已经勃发，现政府的能力决不能加以制止；可是我深虑领导的势力薄弱。恐怕撑持力不能长久。

我以后得到消息必然告诉你们。务须注重你们自己的健康。

接到这封信之后，我们即又回一封信，请问他以下几点：(一) 时局今后的转变何如？(二) 我们对于日本问题——东北事变的态度是否可以站在民族的立场说话？(三) 如果当局者以此相询，我们当如何回答？是不是可以就民族关系发言？(四) 和议如成，我们对它取什么态度？(五)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似乎该温和一点以取得我们自己的方便？(六) 听说天天有一位女士给你送东西，有人说是你的夫人，的确否？希望先生便中给我们以较详细的答复。这封信写起了好几天，才得到方便交出去。

第四次信(时间约在10月20日左右；)

亲爱的×：来信已经收到，时期竟延长了这许多，可见传送的困难。我们以后非有特殊特殊的必要不可通信，以免启人疑窦。关于你们的衣服用物等我已和他们要求过，他们已经答应为你们设法，现在何如？

你所问我的事。(一) 今后中国的趋势，南京无疑的会走向绝路，旁的新势力也一刻起不来，现在我们既遭受挫折，虽然我们的使命很大，可是困难也更多。所以今后国民党的联合政权，在事实会要形成，并且还会有相当时期的续特性。

(二) 东北问题，不单纯是外交问题，决不能靠外交来解决；必须顾到内在的种种条件。而且现政府也决担不起这个责任，和他们谈民族问题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坚持解决土地问题真正“国民会议”的主张，特别是我们自己的政治主张。

(三) 在这时候不可随便发表意见，特别是你，更不可乱发言。这一点我们该十分注意。

(四) 宁粤的和局是逼成的，究竟作得成多少事，有怎样的成绩，恐怕他们自己都不敢预断，我们还是要认定我们的主张，到了相当时期，我们的主张会为他们所认识，所同情的；到那时候他们有许多人会谅解我们的。现时不必太注意太费力去求别人的谅解，因为这种的谅解不容易用人工催促。

(五) 现在我们处困难境地，但是家教还是很要紧！这是万不能放过的事。

(六) 送东西给我的不是我家里的人，是另一位朋友。同时付来款子××元，这是前天才得到的，特分送给你们用。其他的费用，还是由你负责，找×兄设法。当现在这种时候，不可把时间空过，总要使大家用功读书，虽然在这种苦时候，也是训练兄弟们的机会，这一点你尤其是该负责。

收到他这封信以后，我们还回过一封信。即遵照他的嘱咐不写没大关系的信，我们依然是枯坐冥想和谈天。却是买到了几本线制书大家随意看看。

11月3日,听说是邓先生要搬家,搬到什么地方去呢?传说的人也不甚确实,但说是有监狱官,监狱员各一,听差一人,看守2人,连一切用具甚至坐的藤椅都一齐带去,当时我们格外担心,十分的怀念,更猜想,这到底为了什么?后来他们又说从前某人在这也是搬来搬去搬了几个地方,谁也不知道他搬到那里去了,并且外间都传说×××已经枪毙。就是我们在外边的时候也是听说过×××已死,但是他依旧还在,并且还将列席于某种会议。邓先生比他们当然不同,所以我们想该不至于被杀罢?何况蒋杀邓先生是件蠢笨的事,留到他在的作用比杀了他大得多。所以我们大家一致的推测都以为是平安无事,不过他们借此遮掩众人耳目,怕群众为外交问题牵连到内政方面去,所以把邓先生搬开,以防意外。其他似乎找不到适当的理由。

11月5日,听说邓先生临走之前给我们留得有一封信,这使我们更挂念了。不晓得这封信说的是什么?急切要看这封信。这封信终于来了,大家看见了。

第五信(是11月3日写的:)

我已被移往紫金山的荒屋上,以后通信将不可能。

这封信字是红色铅笔写的,看字的样子就带有几分神秘的意味,使我们在安慰中,感到有恐怖的境象,觉着这事非同小可!

一天一天的这样子下去,时常听见说监狱里与邓先生送东西,甚至火油(点灯的油)也常听说有人送,于是恐怖这才减轻了些;一线光明,若隐若现的露在我们的意想中。可是总以为悲观的想法多过于乐观的;不过有几位都觉着乐观的成分多,所以总保持着乐观的疑想。那时候正是国民党所谓第四届代表大会的时候,可是我们却被封锁得滴水不通,公开的送点食物衣服都遭扣留,只剩下一条特殊的道路了。这条路又不敢随便使用,恐怕惹起旁的连带问题,引出意外。

到了12月1日对我们的封锁突然开了,和议也有成议了,可是有一个惊人的消息发现了,就是看守邓先生的监狱官一齐都于11月29日午后回到军法司,连听差的都回来了。这使我们无限惊异,无量难堪,堆积满脑的疑惧,陡然有一天,大约是12月5日光景,传出说是邓先生已经遇害,地点说是在陆军监狱,对外极端秘密,这是陆军监狱官与看守长说起的话,被人听见了。由此我们非常着急,但着急又有什么用!设法向外面打听,外面的回信都说没有这事,我们又宽了一点心。到了12月15日确信来了,知道邓先生被害了,12月17日上海的报登出来了。这是决无疑义,今生今世再不能面晤坚苦卓绝,忠勇奋发的邓先生了!不幸窗口的一面竟成永别!虽然民国二十一年正月我们出了牢门,再进到社会,但是失去了我们的导师,暗夜潜行中没有了照引我们的星光。

然而他的遗教还在,他的精神长存,他的赤血点燃了革命的火焰!同志们!我们的使命今后更加重大,我们该更努力的猛进!

营救邓演达

王仰清许映湖

- 宋庆龄直接找蒋介石要人
- “我只能为国家用，不能为个人用”！
- 秘密营救
-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1931年8月17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会同公共租界工部局静安捕房，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总干事邓演达等“密谋在沪捣乱”为由，逮捕邓演达及其党人15人。第二天，邓演达等被引渡，由淞沪警备司令部“提回处理”，关押于南市老西门白云观侦缉队（8月27日被单独移押南京）。

邓演达被捕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紧急行动起来，准备竭尽全力进行营救。营救工作大体上按三条线分别进行：

一条线是联络宋庆龄先生，由宋直接找蒋介石要人。从邓演达被捕到被害，甚至在邓被害后——因蒋介石卑鄙地暗杀且封锁消息——宋“奔走最力”，“仆仆于沪宁之间”。1931年12月14日，宋再度由沪赴宁责蒋，坚持要见邓，蒋才不得不吐露戕邓实情。宋悲愤交加，于12月19日，用英文草拟了一份宣言，由临时行动委员会的谢树英翻译后送《申报》发表，是为著名的《宋庆龄宣言》。宣言愤而痛斥蒋介石的残忍无耻，对“忠实革命人材必欲置之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

另一条线是通过邓演达的胞兄邓演存，由邓演存以家属的身份活动于南京有关方面的上层人物，企图保释邓演达出狱。由于“南京方面有人反对释放邓演达”，致使营救未果。“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宁粤妥协、共赴国难的呼声日高，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的反蒋派人士，如胡汉民、李济深等先后获释，邓演存存在“满以为他的弟弟也将平安出来，特地准备好了一应衣物”。岂料不但是一场空等待，而且由于蒋介石秘密把邓演达移押紫金山麓富贵山炮垒废墟，从此失去了与邓的一切联系。此后，邓演存预感邓演达会遭不测，几乎天天去找时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的陈铭枢打听下落。陈以“蒋介石已快被迫下台了，他还敢冒此大不韪吗？只要蒋离开了南京，孙科确实掌握了政权，释放邓演达还不容易吗”为由，一再劝慰邓演存“放心”。可是，蒋介石就在下台的前夕，对邓演达下了毒手，以致陈追悔莫及自己的“疏忽”，“没有提防”蒋会暗杀邓的“这一着”。而邓演存亲为胞弟所置之棉衣，竟成了辨认证实邓演达尸体的一个证物！

再一条线是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及其所掌握的营救渠道。该渠道大都主张采用武装劫狱的方式。邓演达被捕之初，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负责人即在上海举行了紧急会议。会议分析研究了邓演达被捕的缘由，判断系叛徒出卖。叛徒是谁？综观各方材料，认定当是参加训练班听课之陈敬斋。事实证明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的判断是准确的。1931年7月间，陈敬斋因作风问题被调往福建，陈拒不受命，乃以“知道邓演达的行踪”为投靠条件，写信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挂钩。接着便同特务密谋“伺机而动”。陈事前探得8月17日下午1时，邓演达将在愚园路愚园坊20号干部训练班上讲课，便给邓写信要求听讲，得邓允许。孰知陈到会听讲未及1个小时，便佯称腹痛离席而奔赴告

密。邓演达被捕当天羁押于捕房时，亦料断是叛徒出卖，曾对一起被捕的同志说道：耶稣为民族解放而斗争，13个门徒中有一个人告密，我们也是由一个告密。耶稣最后的结果是流了血的牺牲，以他的鲜血来洗涤犹太人的污秽，以他的鲜血来表明他的伟大、他的崇高。会议讨论之最紧要者，则是决定营救邓演达的方案。其中有一位黄埔三期生叫许源圃的，力主采用武力，并准备赶往杭州，请绝对听从邓演达指挥的贺越芳带上10几个持枪便衣，袭击白云观，劫出邓演达。遗憾的是，许尚未动身，而邓已于8月27日被蒋介石下令单独移解南京，于是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遂打消赴杭搬兵的计划，委请许源圃转往南京去打探邓演达的下落，以便作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许源圃在南京，经多方活动，终于从他的一位在军法司任职的好友处获悉邓演达被关押在陆军司令部军法司监房内。旋离宁返沪复命。其间，临时行动委员会属下各地党人，大都亦主张武装劫狱。其中如武汉的胡伯翰，十分焦急，派曹金轮到沪建议劫狱；南京的樊少卿，义愤填膺，要求劫狱；南京教导总队的邓克敏，自发地组织了武装营救队，不幸事败，被蒋介石通缉。

1931年9、10月间，临时行动委员会部分中央负责干部与邓演达存晤于上海大东旅社。邓演达把他在南京托人营救未遂的情形约略作了报告。关于邓演达的情况，只是听说邓演达在狱中闻知日寇侵华，义愤填膺，上书请缨杀敌，收复失地；还听说陈立夫、陈果夫秘密探监，诱邓演达为蒋介石用。邓正气凛然，答曰：“我只能为国家用，不能为个人用！”邓演达认为，用正常方式进行营救已属无望，如能采用非常手段，把邓演达营救出狱，然后潜往有关军队，举义抗日，倒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会议决定用非常手段进行营救，还决定由朱蕴山率领许源圃、戴鹏天赴南京负责主持营救工作。并初步拟定了营救方案。

在离南京城约数里之外的江宁县，有朱蕴山的一家周姓亲戚，系当地保安团团总，有人马有枪弹。从江宁县到南京城，有水陆两路交通，颇为便利。从南门进城，有一小客栈，地处偏僻，朱等拟以此为营救工作秘密据点。如能设法把邓演达营救出狱，则由周团总一路护送，出南门，经江宁，沿句容、镇江一条僻路而入吴江县境；在吴江则由江苏省委的毛啸岑负责备好汽艇，由水路直趋上海；在沪隐藏一个时期后，再秘密赴开封，率领军队起义抗日。

计议定发，朱蕴山、许源圃、戴鹏天三人即乘次日夜车赶赴南京。抵宁后即按计划分头行动；朱致信江宁县周团总，约其进城在南门小客栈密商。周团总一口应诺负全责护送，并初步约定于行动数日，由周带了马来，养在南门城外，随时备用。许源圃则继续从军法司那位好友处着手，弄清羁押邓演达之狱中详情。关押邓演达的军法司监狱为一院子，邓单身一间监房，房壁有一朝向院子的窗口，房内有床、有桌、有椅子。一日三餐由伙夫送入监房。用饭时，监房的门是开了锁的。由监房到大门，共有三道关口：头道关口即监房的门锁，二道关口是院门的警卫，三道关口为大门岗哨。经过深入的了解，那个送饭伙夫的面目、身形，与邓酷似的。据此，朱等三人分析决定用金钱买通那个伙夫，趁吃晚饭时监房门未上锁，且光线昏暗之机，让邓化装成伙夫混出前后两道岗哨。这样，风险较小而成功的把握较大。

为确凿掌握邓演达被关押的实地情形，以最后确定化装营救的计划，许源圃又装扮成一高级军官，以“往访”朋友为名，去军法司侦察，“告辞”时，许故意走错方向，闯入二道院门。当警卫告以这里是关押人犯的地方时，许一边问关押的是什么人，一边已走近关押邓演达监良的窗子。邓正手夹雪

茄，走近窗口。当许以手抚胸，以目示意之际，邓即用手指弹了几下雪茄烟灰，返身朝里走去。经此番实地侦察，朱等三人对化装营救更具信心。

不日，在重金之下，那位伙夫终于被卖通了，并对事后他的去向也作了初步的安排。朱等三人即着手拟定具体行动步骤：营救时刻定在晚饭之际：是日下午，由周团总的老母亲携带两个小外甥，坐轿车去军法司附近的大光明影戏院看电影，小轿车即停在那儿。傍晚电影散场，再坐上轿车，车上有老有少，不易使人生疑。俟邓演达化装出狱，即驶出南门，旋由周团总护送潜逃。同时，还准备在城里租一房屋，以备万一情况紧急而不能出城时，供临时藏匿之用。待轿车和房屋落实后，即由戴鹏天先期返沪通知迎接。

正当朱蕴山加紧办妥汽车和房屋的时候，一天清晨，许源圃惊慌地从城里赶到南门小客栈，说是军法司的那位朋友刚才告云：昨日半夜，邓演达突然被密令移押，去向不明。朱、戴两人闻之亦愕然！颓然！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至此，由朱蕴山主持之营救工作被迫中断。从此，临时行动委员会失去了有关邓演达的一切消息。

七君子之狱

七人之狱

沙千里

- 没有拘票
- 关进了大鸟笼
- “本案情节重大，禁止旁听！”
- 7个死刑
- 4天内经历3个监狱
- 监禁中的血的纪念日
- 爱国有罪
- 羁押生活的感想

没有拘票

初冬的夜里，薄薄的棉被已经不能抵御寒气的侵袭，我拥被睡着，在梦中，母亲走进房里来叫醒我，说有朋友找我，神色非常惶惶。时候已经深夜2时，冒寒寻我，我想朋友们会有什么不幸发生了。自从参加救亡运动以来，同志遭受不幸的，为数已经不少，我当时以为又有朋友遭遇了同样的事故，所以跑来要我去设法的。谁料到结果是我做了这一幕悲剧的主角。

母亲房里的窗子半开着，窗外伏着一个看不清的人影，当我走到窗子面前的时候，那个影子便发出声音，叫着我的名字。我起初当真以为朋友叫人来找我，还查问他什么事情；待我定睛看清这影子的时候，面目是狰狞得可怕，在窗子外面象等待择人而噬的样子。一刹那，窗外又发现了几个人的声音，突然进入我耳朵里的是：“我们行里来的！”

接着便是严厉而急迫的叫着“开门！开门！”

我那时已经知道他们的来意，母亲更惶急起来，我身上仅穿着单衣，一面请母亲去开门，一面自己去穿衣。

开了门，5、6个彪形大汉和一个高大的西探，一拥而进了我的房中，其势汹汹，形如虎狼！有的把电筒四面照射；有的翻查我的书架。那西探一再问我姓名，好似恐怕错捉了人似的；后来见我书架上放着的银盾上刻有我的名字，才不再问我。我也一再问他为了什么事，但是他极力催促我穿好衣服，跟他们走，而且厉声地催促，置我的问话于不理。我心地是那般明白，除了救国会之外，没有其他缘由的。然而依然法律，除现行犯得以当场逮捕外，对于非现行犯，执行拘提，必须将拘票出示被告。因为拘票上载明拘提的理由和应解送的法院，如此则被告方知因何被捕，否则毫无原因，滥行拘捕，不知道到哪个法院去，再说什么法律保障人权的话！所以他虽催促我非常厉害，但我并非现行犯，如要捉我，一定要有拘票，因此我一再要他们拿出拘票来看。因为没有拘票，法律上规定可以拒绝他们的。可是狡猾的西探，推说到捕房里去给我看。我一想一切没有法律的世界，尤其在法权被帝国主义铁蹄蹂躏的现在，中国的法律虽然可以拒绝拘捕，但是在此汹汹的形势之下，“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我被迫得不得不走。捕房虽然违背协定，没有拘票，随便拘人，但是却出诸中国公安局的请求，我是中国人，教我简直

无话可说！

67岁的母亲在万分惊慌中，还保持着相当的镇定，命我穿得暖暖的。桂灵本来酣睡着，被大声叫醒了，当见到这许多人在房中，似乎莫明其妙地呆住了半晌。她看清了这样的形势，知道是什么一回事的时候，便陡然起来，脸色泛着青白，看住我穿衣袜，帮我穿上长袍大衣；悲痛和惊骇的神情，在她含着泪珠的眼里可以看出来。孩子们也醒了：呆呆地望着许多凶暴的探捕，在他们嫩弱的小心里，不知起了什么想念！

我安定母亲和桂灵，告诉她们我没有犯什么罪；最大的原因，只有救国会的关系。我留下沈钧儒章乃器二位先生的电话号码，叫她们关照他们二位，请他们二位替我想法。我不曾梦想他们——还不止他们二位——同时也被捕；而且时间和情形也没有两样呢！

母亲坦然地叫我安心，说她在外面会替我想法，我听出她的声音，虽是安祥镇定，不露一丝慌张，但知道她心里的悲痛和焦急，是难以宣述的，只是在态度上故意不要她儿子看出来罢了。

近几个月来，母亲和桂灵不断地叫我留心，不要闹出什么乱子，尤其是母亲，她经常把年迈不堪惊吓的话来劝止我参加运动。但是她明白国家灭亡了，家庭不能存在的理由；她更理解救国是被压迫民族的人民的天赋权利；却不料救国会变成犯罪。

我嘱咐过了，在探捕急迫的催促中，从容地随着他们出去。出门的时候，桂灵跟着跑出来，坚决地要跟着一起走，我因为她去了也没有用，极力劝止她，她才快快地痴痴地望着我跟了大批探捕去上了汽车。

没有拘票，没有罪状，我从被窝里被叫起来，送到爱文义路捕房。

关进大鸟笼

11月22夜2时半，我从家里被捕，原来是上海市公安局请求捕房协助的，所以我到家里的公安局人员，处在主动的地位，人数也比较多，而也是最凶暴的，最狰狞的几个。捕房方面，是一个西探，一个华探，还有一个华捕，一共8、9人捕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没有罪状的“罪犯”。

到了捕房，我先经过了“写字间”，问明了我姓名，便被带到“西人包探间”。那时一间正方形的办公室，摆着3、4个写字桌。壁炉中熊熊地燃着火，室中温暖得很。只有一个中国职员在用打字机打字。我被叫着坐在一张写字椅里。那个西探走进走出，一会儿打电话，一会儿与公安局人员谈话，看他们的证明文件，特别装出一种忙乱的样子。当这时候那个打字员和善地向我问是什么案子，我告诉他我也莫明其妙，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故意地叫他去问公安局的一伙儿，说他们要捉我，并不曾告诉我捕捉的原因。到底为了什么案子，只有他们才知道。我说了以后，那打字员果真问他们。可气又可笑！他们竟然也说不知道，说是奉了命令来捉，只知道捉，不知道别的。但是他们说的时候，面孔上好象表示有些隐痛似的。其实，他们都明白的，只是说不出口来我是犯的“救国罪”罢了，“人皆有羞恶之心”，只有没有了天良，丧心病狂的人才无所不用其极地摧残爱国运动，稍为有些良知的人，做了违反良心的事，也有说不出的痛苦的。他们这样说了以后，我实在再也忍不住了，便告诉那职员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现在也没有一些可以当作犯罪的行为，况且我自己是执行法律业务的一个人，我知道犯了罪，在法律（真正的法律）上应受怎样的制裁，我决不会以身尝试。我相信我不曾犯罪，所以他们也说不出我的罪名。但是据我的猜想，我最近很努力于救国抗日运动，也许我的罪状就是如此，也说不定。因为有许多救国会会员，曾经屡屡被捕，被加上种种不相干的罪名，来诬陷他们，恐怕我的案情也是那么一套。

我说完了这话，很想抓住这个机会，对这一伙直接毁坏救国运动的做了盲目的工具，而还不曾明白的可怜的人们，给以一个唤醒。所以趁此，我便老实不客气地发挥一些凡是中国人都应该共同救国，不应自相残害的理论给他们听。这个时候，我知道他们对于拘捕救国分子，衷心也不是愿意的；所以 I 有意说他们是执行命令，还可以原谅。果然，这种话很有灵验，有两个伙伴给我打动了，立刻说出“我们也没法子”的话来，我深深地相信凡是中国人，谁也不愿做亡国奴的。本来，这一辈被生活压迫的人们，都是抗敌的基本队伍，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他们却不自觉地做了日人的工具，替日人在清除反抗者，那是多么痛心的事！

公安局的人员去后，隔了一会儿；那个西探便要我的口供。我们二人面对面坐在一个写字桌面前，他问一句，我答复一句，他把我年岁、籍贯以及受教育的经过，教育费的来源，以及职业的情形，一一都写了。最后加上一句是救国会的执行委员。仅仅是这样，便成了这“犯人的供单”！

这时候，我已经非常疲倦，就在椅子上作假寐，但不上几分钟，我又被移到楼下“写字间”去。那间屋子的一半，被柜台围绕着。二端靠着墙壁，柜台成为一个L形。对面沿窗口的中间，造着一个六角形的铁笼，三个角靠着外面的大天井，原本是这间屋子里的窗户，不过加上密密的铁梗和网眼铁笆。其余的三个角，都是长条铁柱，从地板直通天花盖顶。沿着铁柱的周围，也包满了铁网。另有一扇同样的铁门，以通出入，完全象一个大鸟笼。我从

前在这外面，接见犯罪的当事人，现在变成被接见的人了。我走进这屋子后，便被关进这铁鸟笼，键了铁门，还加上铁锁。

这六角笼的全面积大概只不过三尺光景，地上放着一个铅桶，还有一些肥皂头，在铅桶旁边。一个值差的华捕，要我打手印，教我在铅桶里洗手；我首先觉得桶里的水不洁净，没有听他的话，但是后来知道打手印是非洗不可的，所以洗了手，走出鸟笼，在一只指模台上打十个手指的指模，分别的，合并的，打了一大套，足足费了五分钟，又量我的身长，然后重新把我送进鸟笼去。华捕也跟着进来，教我交出袋里所有的东西之后，和马路上“抄把子”一般地又在我周身摸了一遍，把我留在大衣袋里的眼镜也拿去，还把我的皮鞋带子取下。我担心走路不便，要他不要拿走，他告诉我本来连裤带都要解除，照例不能有一根绳子或带子留在罪犯的身上，我是被特别优待了。的确，第二天我在笼子里过夜的时候，捉来许多的人，每一个都被命令把衣裤脱得精光，一丝不挂地由他们检查，衣服的夹层边缘，都细细看过，甚至连口和耳都检查过，怕有什么夹带似的。我连衣服都没有脱下一件，要算不幸中的幸事。

早上将要七点钟的时候，鸟笼里又送进大批的人来，一个个在笼里加上了手铐，两个人一副，我也不能例外，和另外一个人左右手铐起来。值差又点过名，预备送到法院“解公堂”，但不知怎样，我铐好了的手铐，忽然由写字间里的值事西人关照，解除下来，单独铐了一副，说是另行送到法院。于是那一伙都由巡捕押了“解公堂”去，我仍留在笼子里。将近九点钟的时候，我和一个西捕、一个华捕和一个华探坐了汽车，被送到法院去。据说，这也是优待的缘故。这是第一天我在捕房里的情形。

说不出犯罪事实

当我解到法院去的时候，捕房里便不知道把我送到哪一个法院，一会儿说送地方法院的第五庭，一会儿又说送高二分院的第一庭。这证明了我犯的什么罪，到送法院的时候，还未弄清楚。虽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然而无罪可加，当已显然！公安局固然不能辞滥用职权、违背法律之责；但是捕房毫无根据、滥捕无罪状的居民，岂能免徇私枉法之讥。

我被捕的时候，满以为是我单独一人的事情，所以在第一篇里我曾说过在我跟探捕出门以前，曾嘱咐家里人通知沈钧儒、章乃器两先生替我主持公道。一直到去法院的时候，还是这么想着。不料，我正在“捕房律师休息室”听候他们发落到哪个法院去的当儿，另一簇探捕拥着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3位先生也到这休息室来。我要求主持公道的人，现在也被“公道”所弃，一起被捕了。我们一见之下，说不出的感慨，只有热烈地紧紧握着手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悲愤。那时候，我才知道同时被捕的还不止他们3位，在法租界的还有章乃器、邹韬奋、史良3位先生，一共是7个人。

后来总算决定把我们4个人解到高二分院第一庭。当我们走到那边的时候，一个广大的法庭，已经挤满了旁听的人和重重叠叠的法警探捕，空气很为紧张，戒备也比平日严重。两个很长的“律师座”上也挤满了律师，有的是我们的朋友，有的是我们的辩护人，合并计算起来，至少有二三十人之多。律师这样地拥挤，这在法院里也是不多见的，形势严重，可以见得出来。我们4个人，每一个有3位辩护人，我也已经由我的表弟邵文炳和我的同事杨天逊律师，在一夜里替我请好了蔡六乘、汪葆楫二律师，连杨律师自己在内，在法庭里全穿上了“法衣”，预备保障我们法律上的权利。

法庭里的人愈挤愈多，空气也愈来愈紧。旁听席里和两旁站着坐着的许多人，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他们把目光不断投射到我们的座位那边来。法院里的职员，也三三五五地来来去去，都到法庭里来探头张望，好象事件特别严重似的，我们坐在旁边的长凳上，大约恭候了一点钟之后，从法庭后面走出了5位法官：那是3位推事，1位检察官，1位书记官，高高地坐在法案上。

坐在中间的审判长，第一句话开口，就说：“本案情节重大，禁止旁听。”于是旁听席里的许多人，不得不一一退出。法庭通出入的门，由法警闭上了，里边的空气，愈形肃穆起来！

因为沈先生他们3位都住在愚园路一带，系由静安寺路捕房去拘捕的缘故，所以他们3位先我而被传到“被告栏”去。最先是华、西探捕的报告拘捕情形，其次是公安局代表陈述请求协助拘捕的原因。那是一个穿西装的青年，大概也不过30多岁，意态傲慢，好象以拘捕救国分子为荣的样子，走入“原告栏”。但是也许这位代表不大上过法院，他说话不无有些颤抖。一会儿说他们3位有反动嫌疑，一会儿又说是鼓动工潮；说了半天，没有确定的说出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再其次，便问到他们3位。他们最先就提出对于非法逮捕的抗议，并承认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常务委员，主张抗日救国。第三说明公安局的诬蔑，因此反对移提。最后由他们的辩护人9位律师根据种种法律，轮流辩论，提出立即释放的要求。结果是由法院裁定责付律师，担保出外，改期再讯。于是他们得以暂复自由。当他们退庭走出门外的时候，外面一阵欢呼和拍掌的声音，震颤了我的耳膜。

于是传到我，我便走入“被告栏”。所谓审判长者的一个推事，照样地问了探捕和公安局代表。那位代表，我很清楚地认识就是到我家里捕我的那个侦缉员。他依然一脸横肉，凶狠地走上前去，和前面那个代表一般地说了那一套话。审判长问到我的时候，我也承认是全救的常委，并同样驳责公安局代表的陈述全属虚罔，毫无根据。我的辩护人蔡六乘律师在我说完以后便站起来，操着他圆熟安详的国语，说明我的为人，决无反动行为。并根据《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协定》第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即“在公共租界内发见之人犯经各该法院之法庭调查后，方得移送于界外之官署”，反对公安局的非法主张，反复论述移送公安局必须先行“调查程序”，查明是否有犯罪事实，并提出证据，证明以后，才能决定移送与否；如果不经调查，不问是否有此事实，不问有无证据，仅凭空洞的言词上的陈述，而贸然逮捕并移送，实属违法，有失中国法院司法独立的尊严。他说得异常精确透辟，同时并经汪、杨二律师加以补充。最后因为和沈先生等案情一致，也裁定责付律师保释，他们3位争着签字把我保出，送我到了家里。

“绑票”——第二次被捕

侥幸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得到了“责付律师，案子改到25日上午再行讯问”的裁定，我颓丧但又高兴地回到家里。

我走进母亲的房里，啊呀！满室围坐着来探视的亲戚，母亲满面泪容，躺在卧床上。她病了，自出事起，她的心震荡得一直没有停止过；她怕冷，身体软软没有力气可以坐起来。我有什么话去安慰她呢？唯有相对默然而已！但我并不悲痛，我只有愤懑！这成什么世界！救国变成犯罪！非法可以随便拘人！

仅仅10小时之间，家里的情形已经大变。我眼见着母亲的惊悸成病，桂灵苍白而颓伤的面庞，孩子们呆若木鸡的态度，亲友们面面相觑的种种反常的悲伤黯淡的情景，心里是酸是苦，什么都不能辨别！

案子决定在25日上午再行讯问，还有整天半的时间；我要趁这时间，做一些准备。因为这案子虽然已经由法院受理，好象可以获得法律上的保障，但是我私想既然对我们动了手，陷阱一定会布置得很周密的。许多年来事实昭告我们，法律原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司法不能独立也是多数人周知的事实；要靠法律作保障，其程度是有限的，没有拘票，没有罪状，可以随便拘人，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事实例证吗？——我在法律界中混了几年，事实和理论的教训，我有了这个理解。所以我虽光明磊落，俯仰无愧，却不得不深具戒心，不能不准备一种牺牲，因此趁还有一天半的时间，把私事布置一个妥当，准备入狱。

大概是7点钟的时候，突然一个生疏声音在电话里响着。他告诉我法院里又出了拘票，今天夜里重新要把我捉起来，拘票快要送到捕房去，叫我立刻离开家里。

我得到了这个我认为正确的报告以后，便立刻向其他各位去报告，和商酌应付办法。可是他们都忙着别的事情，没有回过家，我家里人知道了，都逼迫我暂时离开家庭，在母亲和桂灵再三逼迫之下，我在10时左右决定到朋友家里去暂过一宵，准备依照法院指定的讯问日期到庭就讯。

孩子们都已睡熟了，他们不知道今天深夜又要有虎狼们来滋扰他们尚未回复的惊碎的小心。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父亲，连这一夜睡眠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我无心再一个个去吻别他们，黯然地辞别躺在床上颤栗着的老母，和眼泪将要夺眶而出的桂灵。

弄堂的人声，已经寂静，若明若暗的街灯，凄惨地高悬在半空，我走出弄口，刚刚踏上车，出人意料之外的，弄口一片泡水馆里突然奔出几条彪形大汉——就是昨天那几个——真如猛兽扑人般一齐冲上车，把我包围起来。来势凶暴粗鲁得非常可怕，简直要把瘦骨嶙峋的我吃下的样子，此推彼扯地把我拖下了街车。我正严厉责问他们的时候，一个管马路的租界警士（上海语称“立角嘴巡捕”，其主要职务为立在马路中管理车辆交通。）悠闲地从原来那个泡水馆的茶桌上踱了出来，不问情由地要我“行”里去。

“绑票！”从稀少的行人中发出这样的呼声。真是再适当没有了，既非中国官厅的警察，又非租界当局委任的人们，竟然无法无天到这样绑架掳人！租界巡捕委弃了应尽的职务，坐在泡水馆做埋伏，莫明其妙地叫人“行”里去。这是租界警务当局命令他这样做的吗？我真不明白居民纳了市政总捐所受到的结果却是这种绑架！使我不得不怀疑，租界巡捕是不必守法的了。

我这样重新被捕之后，大约是 10 时多一些我又到了捕房，仍旧在鸟笼里过了一夜。那个值差西捕对我还相当优视，当我依然无力支持坐到地上假寐的时候，他嘱咐华员送进一只椅子，和一个车垫来。我如获至宝地，用以勉强过了一晚，疲乏得以稍为恢复。在捕房的 3 夜中，这一夜要算是最舒服的一夜了。这个西捕常常和他的同事谈话，谈到我的事，很象表示同情的样子；我反而觉得万分的惭愧，中国人救自己的国要成犯罪；外国人却来同情，使人真有哭笑不得之苦！

提前讯问

第二次审理本来定于 25 日上午 9 时。但是保出之后，突然又把我们捉了去，便不得不提早于 24 日的下午开庭，我和沈、王二先生在前夜重新被捕，分别从捕房里移到法院：李先生则未住家里，免了第二次的被捕，但他在开庭前的一刻钟，自己投到了法院来。这一天的讯问是公开了，并不禁止旁听，但是警卫特别严重，中、西探捕密密包围了宏大的法庭，旁听人也分外拥挤，我只看见法庭里所有的凳子都坐满了，站着的也分做了前后几排，空气紧张，比昨天更厉害。推事“升座”之后，依旧先行讯问沈先生等 3 人。审判长就宣说他们 3 位是住在越界筑路区域，高二分院没有管辖权，应即回复逮捕时原状，当时并把拘票撤消。所谓回复原状者，换句话说，就是由逮捕时的公安局人员把他们捕去罢了。这原是很巧妙的办法。因为这样一来，法院方面可以借此推御责任，说起来法院并不把他们移送公安局，非常冠冕堂皇，但实际上却是交给公安局的意思，同时也合了公安局的原意。却不料事情弄巧成拙，竟留下了法律上难以补救的缺憾。第一，他们 3 人是由租界捕房直接逮捕的，公安局不过请求捕房协助，而非由公安局自行拘获。如果回复原状，那末他们便完全回复自由，而且拘票业已撤消，捕房没有拘票，便不能再行逮捕他们。他们应该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拘束，公安局根本不能移提。第二，李先生是自行投案而非有拘票拘来；根本已无拘票，捕房当然没有权力限制他的自由。这种理由，是非常合法而且强有力的，所以他们 3 位自己，和 7、8 位辩护人此起彼落地根据这几从法律上、事实上详为推阐，对于这种决定，加以严厉的辩驳，使得法院和公安局代表噤口无言，双方招待，为时很久，窘迫之状，顿使法院空气更形紧张，全法庭里的人，脸上都呈现着激忿，一时不能和缓下来。

但是结果怎样呢？在法院依法撤消拘票之后，在中国法院里面，在高线法座的法官目睹之下，业已恢复自由的中国人民，被没有中国法院拘票的租界外国警员非法带去。把法院出票拘提中国人民的法权，轻轻送给了他人，全国人民数十年以血汗换来的这一点点的国权，一旦付诸流水！

法庭里立刻起了动乱，我突然看见一个人站起来，同时我耳膜上仿佛响着一个“岂有此理！中国还有法律吗？”的激昂的呼声。

他们由捕房探捕，拥着出去以后，便进行讯问我个人部分。我是住在租界区域内的，情形和他们不同，不能这样“巧妙”地把我交给公安局，所以公安局坚决地要法院把我交给他们提去。可是他们一点也不能把我犯罪的事实说出来。依照昨天我的辩护人的论断，没有移送之前，应先调查事实，有无犯罪，所以审判长重问我姓名年龄籍贯等等后，开始进行调查，便问我救国会的种种情形，当他问到救国会的宗旨时，我那时的情感，突然激昂起来，我不再觉得法庭上有着尊严的法官，我放着喉咙告诉他，“日本帝国主义五年来不断的侵略，要灭亡我中华民族。这铁一般的事实，凡是中国人，没有不要挽救这亡国的惨祸的。”我大胆地说：“眼看着强敌抢我土地，杀我民众，一天天紧迫，一天天残酷，如此而不想抵抗，不主张抗日，还能算是‘人’吗？”我的话显然是含着强烈的嘲讽意味，但是法庭里仍旧静寂得很，这一个投石，不曾引起一些微波。

审判长又把公安局给我加上的种种罪名，如鼓动工潮、参加九一八纪念殴击警察等事情，问我有没有做过。我坚决否认这种凭空捏造，要求法官命

公安局代表陈述具体的事实。我理直气壮地说：“工潮是很多的，我究竟鼓动哪一个工潮？是哪年，哪月，哪日的事？是哪一个工厂发生的？……这许多问题公安局既然这样说我，那末他们一定知道很详细，应该一一说出来。至于九一八纪念游行，那末这一天我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样与警察冲突，哪一个警察受殴等，也一定有事实，有证据，尽可详详细细，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决不能一无根据，含糊其词，随便乱说。”

我说了以后，法官果然问公安局代表；可是，事实胜于雄辩，他简直瞠目不知所对，只有“顾左右而言他”。

回押捕房

沈先生们3位毕竟“迂回曲折”、“莫明其妙”地被公安局如愿以偿地移提过去。我呢，公安局不仅不能说出我到底犯了什么罪，甚至连怎样犯罪的情节和事实都没有，法院对于沈先生们的处置，已经闹了一个笑话；也许是不好意思再把没有犯罪事实的我，给公安局平白地移提，说是尚须“调查”，所以又改期明天，再行开庭，命令把我回押捕房。

本来由捕房到法院，由法院到捕房，我们都铐着手铐；到了法院和回到捕房就把手铐解除。无已有寒意，铜铁质的手铐，冰冷而又坚硬地扣在手腕之间，给我以无限的精神上肉体上的刺激。虽然爱国受罪，即坐牢犹无所怨；区区手铐，何足挂怀。但是爱国应该无罪，受此待遇实觉有所不甘，今天大家特向法庭提出要求免除。法庭总算在认为被告系有身份者的理由下准予免铐。所以这次回到捕房的途中，双手恢复了自由。

捕房中今天的值日西捕和华捕，都换了人。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那位年青热情的华捕，当我回到了捕房仍旧关进鸟笼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几个人在里面，这位青年正在检查他们的身上。他一见了我，便问我是不是沙律师，好象知道我似的。他大胆和热烈地对我表示深切的同情，严厉地批评摧残救国运动的等于自杀。他一边检查，一边不断问我救国会的种种情形。又告诉我，捕房中的人员虽然是被目为最没有国家观念的，然而在他们2、3百人中，也有着7、8个同志头脑清楚，爱国思想非常浓厚，新思想的书报，也常常阅看。他那种谈话，充分流露着真情，使我精神上得到了无上的安慰，两天来的愤激和疲惫，都归于消灭。

他殷勤地问我有无吃过东西，问我是否腹饥，要我指出要吃的东西，由他去买来送我。从被捕到这时整整两天，除吃了一二口面包以外，什么东西都不曾咽下过；又想到家里送东西，受捕房种种限制，虽然还不觉饿，同时也不愿辜负他的美意，便告诉了他，请他买了一些鸡蛋糕。到了晚上，他偷偷地买了送给我吃，我是感激得说不出话来。

他曾经问我前两次如何睡法，我告诉他说就是睡在这“鸟笼”里的，他暗暗地对我说想一想法子，使我更舒服一些。我当时真欣幸遇到这样一位同情的朋友，得到如此的便利。心中以为两天来受罪的“坐卧”，今天也许可以得到些进步。不料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从“鸟笼”被送到“拘留处”的牢房去。直到最后，不曾掉换地方，粉碎了我的幻梦。其实这倒并不是他欺骗我，他没有权力一定使我住得舒服适意些，我是非常明白的。

那牢房是一连三间的水门汀的屋子，傍着“写字间”的东面，前面就是广阔的大天井。屋子三面都是厚墙，靠天井的一面，有二重走廊。每一重面前，都是一道铁栅栏。第一重的栅栏上更装满了铁网。右边一端，每重各有一扇铁门闭锁着。这倒象特别的“保管库”，不过人在里面，从铁栅网可以很清楚望着外面。在外面望里面，则只看见衣衫褴褛，蓬首垢面的人影憧憧往来，有所不同。

第二重走廊里面铁门的旁边，另有一个小间，那是大小便的地方，虽然在外面看守的巡捕可以把装就的抽水机关，一抽拉，加以冲洗；而溺粪还是狼藉满地。室外的门旁边，有一方寸地积满了灰白色臭药水，四边吐满着涕痰，一见令人作呕！

至于走廊里面的牢房，地上完全是水泥做成的，没有地板。踏进门，是

一条和门一般宽的狭带似的行走道，其余五分之四是水泥高炕，离地约一尺光景，白昼可以坐着，夜晚则睡在上面。室中除了墙壁和水泥地以外什么都没有。光线除从门里射进一些之外，白天不亮灯，简直暗无天日。后面墙上高高的地方虽然也有二尺长方的玻璃窗，但那玻璃厚得透不出一丝光亮来。

到了晚上，水泥地里好象渗出蚀骨的寒气，令人颤抖。临睡的时候，由华捕分送每人薄布似的破棉毡二条，其污秽齷齪，更属不可名状。牢房里床椅都一无所有，每个人都席地而卧，我本来决定“坐以待旦”，等许多人都在高炕上排列着睡好了以后，就在行走道上坐下，背靠着墙壁，等待天亮，但是疲倦腰酸，愈坐愈下，身体渐渐接近了地面。幸好穿上的春季大衣，便把大衣作为垫褥，不得不横在这狭带似的走道上。只觉得夜气侵骨，苦楚难挨；但是疲乏过度了，也糊里糊涂地过了一宵。这里面一二十人，除当天关进去的以外，都是面容苍白，憔悴可怕，因为家属接见，既所不许，自备衣食，也被拒绝，不得不挨此非人的待遇。其实，这样对待未决的嫌疑人，不但与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完全违反，也是毫无人道背离公平的非文明的举动。在这里我们更认识了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次殖民地人民残酷的行为，他们在自己国家里对待他自己的人民，决不容许如此的。

至于吃的问题，也是恶劣到无以复加。第一，每人都有一定的“限度”，有人吃着不够饱。第二，和糠一般所煮的所谓“饭”，稀薄粗劣得使人咽不下口。第三，盛饭的铅皮罐满是铁锈和垢秽，看了就令人作呕。这样还不许家属送来。关在里面不吃要饿，吃了不免要病。我因那位青年华捕送我的蛋糕还可充饥，宁饿不吃。但是有一个姓曹的什么印花烟酒税局局长，简直不象人的样子了。据他说，他在里面关了三四十天，既不解法院，也不释放，他哀哀地恳求我出去的时候，写信给他的家属营救，“关了三、四十天，不解法院，不释放”，我首先不相信这事实，但是看他长长的头发和散乱的胡须，披满了一头一脸，决非短短的日期所能假装的，虽然不可轻率地据这“一面之辞”断定确有其事，但也不能一定否认绝对不会有此事情。中国人在租界中受着非人的非法的待遇，显然已有事实摆在眼前，我不禁要问一问“谁去救救呵！”

这样，我愈觉得抗日的神圣战争的重要；无疑的，整个民族一旦得到了解放，这些枝节问题是不会不解决的！——至少是解决起来非常容易的！

移送公安局

离开法院，很快地我就到了公安局。

汽车在局里停下，我由原来的两个便衣探员（？）（其中一个就是那代表）领着，上了楼上一个休息室模样的屋子里。

3天来的折磨，使我羸弱的身体，感到不能支持的苦痛，我看见墙角里放着一只藤椅，当我走进屋子去，里面的人让着我坐的时候，便老实坐下了，靠着椅背，伸舒一下。这里并不象巡捕房那样严肃正经，我猜想不出是什么地方；后来才知道隔壁一间屋子是挂有一块“特务股”的牌子的，我猜想这一间总脱不了是特务股的房间了。茶房还倒茶给我喝，我已两天没有进过一口水，见了茶，如获至宝，顷刻饮了3杯，也不能管忙着那倒茶的了。

那位“代表”把我安置在这里后，我在里面坐着，陆续有很多职员模样的，在门外探头张望，我只听见低声的语音，好象是说着我的名字。我看不见沈先生他们，呆呆地坐着等候给我的发落。大概经过一小时光景，一位穿中山装的职员跑来，教我跟着他走，我不知又到什么地方去。

跑下了原来走过的扶梯，转了一个弯，走上了石阶，又走上一个很堂皇的大扶梯，穿过铺着地毯放着沙发的一个会客室，我见着沈先生他们了。大家又紧紧握着手，互相慰问，尤其沈先生慈爱之情，溢于言表。王先生穿着长袍，外面罩了一件西装大衣，内长外短，依然不失他大学教授的风度，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我纵眼一看，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朝南出入的地方，是左右四扇落地的长窗。中间砌着一片小墙，光线还相当充足。北面是粉刷着的墙壁。靠着墙，直放着3个矮铁床，床上铺着新的被褥。在中间一只铁床的前面，放着一个屏风，离开屏风前面一二尺，是一只小圆桌。靠左面的墙壁面前，放着3只藤做的睡椅，全房间大概20尺深，15、6尺阔，所以并放着3只床，还有相当的余地。到了晚上，他们在3个床位里，又加上了一个，预备给我用的。我便和李先生2人分占东西靠壁的两只床；王先生在我的右边，沈先生又在王先生的右边。

朝南通出入的地方，是一个阳台。在这里3、4个背着盒子炮的“武装同志”分站四角，严密监视着。房间里另有两个人，是我不认识的，原来一位是工友，穿着中山装，虽然是布的，却很挺直，显得年青英俊。另一位是特务员，我已经记不起是怎样一位人物了。因为他们3小时换一班，人又常常更换，一天24小时，就须换好几次，每次的人又不同。今天这一班，这个，明天那一班，又是一个，我住在里面九天，换的大概不止1、20人，记也记不清。所谓24小时者，就是夜里，我们就寝以后，他们还依旧监守，在房间里张着眼睛看我们。

经过了一夜，我感觉比了巡捕房的确优待得多了。但是我奇怪，如果说我们是犯罪的话，那末同一犯罪，就不应有优待不优待的分别：如说没有罪，那末根本就不应该拘捕。我知道依法只有有罪无罪的区别，而没有优待不优待的差异。为什么要优待我们呢？不就是不应该拘捕的表示么？我这样怀疑着。

七个死刑

我们在公安局首先几天，看报尚有自由，上海各种报纸，都得向他们要求阅读。我们感到寂寞无聊的时候，就拿来消遣解闷，尤其是《华美晚报》登载我们的消息最多，我们都以一睹为快。所以我们早上一起身，晚上上灯，便要那位工友去拿了。有一天，大约是我到公安局第二天的早上，我们4个人又大家分着看报，不知谁发现了一则关于我们的新闻，于是我们便围拢来挤在一起看。那是本埠新闻栏里的第一段，用大号铅字排着醒朗的题目；我们一读，原来是上海市政府的布告，完全是为着我们的事而发表的。换句话说，是在宣布我们的罪状，什么组织非法团体，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工潮，颠覆政府，危害民国，……等等，凡是足以成为罪名的，惟恐或遗地一一都加在我们身上，好象非此不足以耸动视听似的！

但是，惭愧得很，我们并没有这种神通，也没有这种企图。布告上这样他说我们，我们倒有些“受宠若惊”！

第一，所谓组织非法团体，当然是指教国会而言。那末救国会是不是非法团体，可以用事实来说明，去年（民国二十五年）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即所谓二中全会的时候，救国会为了要求大会决定方针，一致抗日，曾派遣代表团，向该会请愿。我记得在开会的第二天，大会接到代表团的呈文后，便由主席团派了南京市市长马超俊代表大会接见，并接受请愿团的建议由他带向大会报告。这一事实充分证明，救国会并非“非法”而且是“合法”的团体。因为大会曾经颁布过一个规则，就是凡人民请愿如为非法团体，概在禁止之列。救国会既经由大会接受请愿，其不是“非法”非常明显的。

其次，所谓煽动工潮，日本工厂里的工人，受尽非人的压迫和剥削，要求改善生活，增加工资，原是无可非议的事情。况且中国纱厂早已加过工资，而日本纱厂赚钱比中国纱厂更多，不但不如，反而加紧剥削，加重压迫，工人忍无可忍，爆发了工潮亦为理所当然。然而日本纱厂雇用大批流氓，增加武装陆军，横施摧残！并且关闭厂门，断绝工人生计，以致几十万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濒于饥寒，而说中国人不应予以同情，或者稍为捐了薪水去救济救济他们，便是煽动工潮，成为犯罪，那末人类的同情和互助，不是都变成罪恶了吗？

再次，所谓勾结赤匪，所谓颠覆政府，所谓危害民国等等，这在当局简直成了呆板的一套，凡是主张抗日的，凡是参加救国会的，都适用这一套，可以随便加在一个人身上，无须乎事实，无须乎证据，“救国即是危害民国”，成了新的逻辑。

我们自信光明磊落，我们看了之后，倒也并不惊异，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很觉坦然。我们还说着笑话，假使照此说法，真有那样的行为，一共7个罪名，那末倒真是罪该万死，至少有枪毙的可能。不但如此，只须有其中任何一个罪名，已经可以枪毙一次，我们共有7个罪名，那末每人应该枪毙7次，合算起来，我们7个人便要枪毙49次了。为了我们的缘故，要使中国消耗49颗可以打击敌人的子弹，我们是不愿意的！

对质

第二天晚上，一群职员忙着在我们房间隔壁的一个办公室里搬东西，搬床铺。我们大家都明白在法租界被捕的三位，今天得移来这里了，我们觉得他们比我们已经多吃了一天苦，很希望他们早一些来。同时我们的案子，归并在一起之后，也许可以早一点解决，所以我们看着那些职员们忙着，大家都引长了颈项望他们3位来。我们并商量史律师的铺位问题，想先替她安排好了，她一来便把我们的意思贡献给她。但是等了又等，到了10点钟他们依然没有来。我们不能明白是什么原因，大家互相猜疑着。

27日晚上，他们来了，不过他们仅仅来了2位，缺了史良律师。本来他们可以在我们等待的那晚由高三分院移提过来；所以迟了两天的缘故，第一天因为法租界捕房认为他们3位毫无犯罪行为，不予起诉，依照法租界当局与中国政府所订的协定，捕房不起诉的案件，嫌疑人犯便不能移送界外。换句话说，他们2位便已恢复自由。但是高三分院却把他们交给检察官去侦查，所以他们又在那边多关了1天。到了第二天，江苏上海地方法院又去了公文，说他们有妨碍秩序嫌疑，向高三分院移提。于是他们又到南市江苏上海地方法院去兜了一个圈子，住了一夜。据他们说，4天内他们游历了3个监狱，觉得非常幸运。

他们在高三分院被宣告不起诉，被交付检察官侦查，又被地方法院提去，在法律上的确做得面面周到，天衣无缝，没有闹成笑话。但这种曲曲折折的戏剧性的情节，令人看来仍不免要认为真是一出戏剧在串演，只觉得“法律”不过是“袍笏登场”而已。

还有，《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警察机关将人犯移送于法院——审判机关，——却没有法官检察官将侦讯的人犯移送于警察或公安机关。不要说懂法律的都该知道，就是稍有常识者都可以推理得之。他们2位的移到公安局来，据2位告诉我，当他们决定移送过来时，他们曾经当庭提出质问，回答的理由很巧妙，说是与公安局里的我们来对质的。对质，把警察机关的人犯提到法院去对质，才是正常的办法；由法院提向警察机关去，岂非上下颠倒，置法院的威信于何地？

他们来了以后，我们减少了一些寂寞。一天晚上，大约离市政府发出布告那天，不过两天吧，那位专任招呼我们的袁主任，告诉我们晚上局长要送我们一席菜，我们觉得日常的饭菜，已经很够好的了，大家正不安着用了公家的钱。到了晚上，局长也来了，我们边吃边谈，据他个人的见解，以为抗日救国，政府与人民并没有两样，所以这件事，实在出于“误会”。他们希望能把“误会”解释，便没有问题了。这虽是他一个的意思，但是和市政府布告上所说的不是相差太远了吗？“误会”不知究竟误会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误会竟到这样的程度！虽是市政府下的局长，恐也说不出所以吧！我们随便地谈，谈的也相当痛快，没有象法院里那样严肃呆板。

这一席私宴，在私谊上是很融洽的，但我们猜想这一席也许具有作用的，不过在“公事”上却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

散席以后，我们不免又想到前天市政府那个布告，和今天这样的情形好象太矛盾了。我们竟不知是阶下囚还是座上客！我们中有人说着笑话，这并不是矛盾，也无足为奇，大概执行死刑前，犯人都要吃一个饱的，我们既是优待，所以特备一席。大家笑了；准备明天“从容就义”！

夜审

我们到公安局，沈先生们3位最早，我次之，章、邹二先生最后。最早的6天，最迟的两天，都已过了好几个24小时，但是我们并没有被传问或侦讯过。我深深知道，凡是有犯罪嫌疑被捕拘禁的，至迟必须于24小时之内移送审判机关，这是明明白白规定于中华民国的根本大法《约法》和《刑事诉讼法》上的，现在过了几个24小时，而并不移送审判机关，而且也不侦查讯问，这不晓得还是国家的法律不生效力呢？还是有人在破坏国家的法律？我们本来很明白这件案子是政治的，而不是法律的，实在不必牵涉到法律问题去，而当局则必欲深文周纳，迂回曲折地弄到法律上去。然而毕竟因为谈不到法律，——依法律便无法可以拘我们，——以致一举一动，无一不是违背法律，乃令法律尊严、司法体面、国家法权，扫地无遗。所以我对于本案必定要指出种种违法悖理的地方，让人们也知道，目无司法，玩弄法律，是怎样损害国家的举动！我的原意，并不是为了我个人或我们几个人，发泄一些牢骚来指摘法院或个人，以取快一时。一直等到30日的夜里，——从沈先生们到了公安局后的第6个24小时，司法科长来告诉我们，今天要和我们谈话，这无疑是“依法”讯问了。讯问就在铺着地毯的那间会客室里。那间客室，布置得本来很富丽堂皇的，我们白天在那里接见我们许多亲友，今晚是被司法科“接见”了。我们在自己房里静待着，沈先生最先被请去，谈了一个多钟头。他老先生把救国会的组织宗旨以及一切主张等，源源本本对那科长谈了，并由书记笔录了下来。其后依着法院里的次序，循次讯问。科长非常和蔼谦逊，每人问毕后，都是自己跑来请次一位的。

临到我，我便跑到会客室。问话在后半间举行。一只原来的小圆桌作为“问案”。科长和书记左右分坐着，我坐在他们2人的中间，面对着后面的玻璃窗。科长前面的桌上放着许多案卷，因为桌子过小放不下，其余还有许多的文卷，放在靠墙壁那个长沙发上。他手里也拿着一束，向我和缓地问着，我依问逐一地答复。我想假使一切法庭都能做到如此，我相信“冤狱”也许可以减少许多的。问话的内容，除关于总的救国会的一般问题外，对我个人特殊的几点，大概是这样的：

“职业界救国会你在内吗？”

“我是发起的一分子，现在是理事之一。”

“还有谁是理事？”

“很多，但是在‘救国有罪’的环境里，我不愿宣布。他们都是很有地位，很有学问，赤诚爱国的分子。如果今天宣布救国不是犯罪的，那末我明天就可以宣布。”

“会员有多少？”

“1、2千。同情而未曾加入的，多到不可计算，并且一天天在发展。”

“有没有共党分子？”

“不知道。救国会素来的主张：是不问党派，不问职业、地位，不问信仰；只要主张抗日救国的，都应该团结起来。所以职业界救国会里，在职业方面，有经理、老板、买办，也有伙计、学徒、老司务，以及一切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师、新闻记者等。在信仰方面，有基督教、天主教，也有佛教和反宗教者。在党派方面，除国民党党员外，因为环境不允许他们宣布，他们也不肯宣布，救国会里无从知道他们是属于哪一党派，所以有无共党分子，

简直不知道，即使有了，也和国民党党员一样，大家一律以抗日救国为目的，不是实行某党某派的主义或政策，当然不必拒绝，况且他们也不告诉救国会说他们自己是共党，脸上或外表上又无共党的标志，所以无从知道有无共党。”

“火花读书会你加入吗？”

“不知道有火花读书会这样一个团体。”

“它是职业界救国会的一个会员。”

“职业界救国会只有个人会员，没有团体会员。”

问话到 10 时以后才完毕。我们预料对于我们的处置，可以“揭晓”了。

苏州途中

在报上，一则小小的新闻说：沈钧儒等一案将移江苏高等法院“依法”办理。“依法”这是我们所愿的。但是章、邹二先生从高三分院移提的理由，是“妨碍秩序”嫌疑，这个“妨碍秩序”罪，“依法”应由地方法院管辖第一审，如果移到江苏高等法院，显然是管辖错误；换句话说，是不合法的。假使说不是犯的“妨碍秩序”罪，应该送高等法院也未尝不可，但是以前的移提理由，便不合事实了。所以无论应不应该送高等法院，总有一个不合法的。

看了报，大家猜测到什么时候实行移解。我们以为这一晚半夜里，我们说不定又要从被窝里起来，重温十天前的“功课”，可是我们不曾料着，还是经过了平安的一夜。

午饭刚刚完毕，——这是第10个24小时的那一天，——司法科科长匆匆地跑来，低声和沈先生说，立刻要动身到苏州去，我们虽觉突兀，但是昨天早已知道了；所以倒也很镇定。我们想到家属们一些都不知道，他们不免又要惊慌；因此要求通知家属一见后再走。这个意见“依法”没有被容许。大家没办法，只得急急忙忙收拾行李，好象逃难似的，把衣物胡乱向箱子里塞的塞，打包的打包；一面又要留下条子告知家属，形色非常仓皇，说得不好听一些，简直有些狼狈。收拾好了，局长也来招呼着。预定好的团体客车，也停到了大无井里，我们不由火车，而从沪锡公路向苏州前去。

看守我们的弟兄们，经过10天，情感一天天增长，他们都对我们表示同情。我们到苏州去，他们也被派做“押解”的任务，一位早夕相处的工友，更是依依不舍，一定也要送我们去，招呼我们。并再三要求我们把他留在法院里，跟我们在一起，其盛意热情，我们每个人都感动得很。

团体客车虽然很宽畅，但“押解”的人员，却超过我们两倍以上。武装同志和他们的小队长、侦缉队员，连我们6个人，满满地装了一大车，还留下几个弟兄另坐“小车”。局长、科长们招呼送上了车，科长也坐了流线型的自备车，随后赶上来。另外又有一部装行李的汽车，一共4辆，如飞地驶向苏州。等到家属在“接见时间”去探望我们的时候，我们早已过了南翔了。

车子由徐家汇路绕中山路走向沪锡公路，我们走过丰田纱厂。红圆的太阳旗，高高地悬着，迎风飘荡。围墙内机声轧轧，仿佛告诉我们，他们正在日夜无休止地压榨我们劳苦大众的血汗。我想起前几天澎湃的工潮，那时成千成万的大众，为了饥寒，怒吼一般喊出他们要求改善生活的呼号，震颤了侵略者的心胆，慌乱了陆战队的手脚。那时候警察的皮鞭铁棍，陆战队的铁甲车与枪弹，和千万的穷苦大众，血肉模糊，混作一团；而现在静悄悄只有这轧轧的机声，表示着压榨，压榨，无休止的压榨！

车子过了真茹，显现了一片带着微黄的原野，四望无际；久蛰在房子里的我们，心胸为之一畅。李先生坐在前面，口里微微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的调子，章先生也低低地和着。大家正感着长途的寂寞、将要感觉烦躁的时候，听到了都有点兴奋，所以也跟着唱起来。于是声音渐渐响起来，而且越来越响。我们的情绪跟着也激昂起来。车里许多弟兄们和侦缉员，和我们相处已久，这时候，也被歌声融化在一起，因此我们要求他们和我们一起唱，我们把歌辞的意义，——特别是《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详细解释给他们听，由李先生做领导，一、二、三、“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前

进！”“前进！”大家唱起来，几十个声音并成了一片，激昂雄壮，有如万马奔腾，怒涛汹涌。一曲歌罢，弟兄们互相击掌，情绪的热烈，熔解了囚犯和押差的界石。

将到苏州之前，我们又推李先生代表向他们致临别辞。李先生说到沉痛的地方，竟然流下泪来。据他说，他先见弟兄们中有的在流泪，所以也忍不住了。这可以证明民族思想，都潜伏在大众的心头，现在是被压制着不获发泄呀！

到了苏州的平门。汽车不能进城，于是我们6人和携带案卷的职员，换乘了黄包车，随来的弟兄们，前后左右围绕着步行，我们的车子在中间跟了弟兄们缓步在大街上移动，这情形象我们在游行示威，也象被游街示众。有一位弟兄在车旁对我们说，他们不是押解或监视我们的，他们是在保护我们，做我们的卫兵。这一句平常的话，我们深深地觉着充满了同情的气息。在中途，弟兄们也坐了车子，如此一共3、40部黄包车，一条长蛇阵似蜿蜒前进，引起了市民们很大的注意。

车子进了高等法院里面大天井，一齐放了下来。法警们有的认得我和沈先生，忙着打招呼。我们被引入女待审室，外面许多弟兄交代清楚后，我们大家点头作别，有不胜依依之慨。那位年青的工友因格于法院规章，不能留住，我们不得不忍痛握手分别；我们没法成全他的好意，却是一件很大的憾事！

到了江苏高等法院

我们由公安局移送到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这在我是觉得非常怀疑的。因为我们是不是应该由它来管辖，是个很大的问题。

怎样来决定哪个法院管辖？第一要以所犯哪一种罪为标准。我在第3节里曾经说明，高等法院管辖的案件，除不服初级法院判决而上诉的以外，其余不过是很少的内乱、外患，和特种刑法规定的危害民国罪数种而已。那末我们犯的何罪，即以法院加给我们的来说，高二分院方面的4人——我和沈先生等3位——是“危害民国”，假定作为没有问题；在高三分院方面的3人，“危害民国”已由法租界捕房侦查明白，不成立犯罪，他们移往公安局的罪名是“妨碍秩序”，这个犯罪行为，其管辖权属于地方法院而非高等法院，这便成了绝大的问题。我已在上节指出，不再赘。现在姑再退一步来说，假定移送公安局的罪名，虽是“妨碍秩序”，而侦查的结果，也是“危害民国”，——这个说法当然是假定的——那末他们，在高三分院老早宣布不成立了，依刑事诉讼法上“一案不再理”的原则讲，不论送哪个法院，在法律上都是说不圆转的。

坐在待审室里，看看墙壁上、玻璃窗上写满了的种种文字，全是些愤懑不平的字句，对于“法”字，充溢着不满和怨忿。文字虽粗俗，却都是真情至性之言，我们大家欣赏着，不免暗中叫好！等了好久，天也渐渐黑了，电灯在阴暗的待审室里，发出微弱的光辉，显得阴森森的，法警跑来请沈先生出去，说是连夜开侦查庭。沈先生去后，又依次一个个传讯，这一次问话和公安局里所问的大同小异，大概可以分成四项：

第一，说救国会反对政府，甚至有推翻政府的企图。我们的答复是，救国会主张救亡图存，团结全国力量一致抗敌，我们决不攻击任何势力或推翻任何势力。我们是主张联合战线的人，决不作妨碍联合的行动。我们希望国内所有各种势力，都好好团结起来，统一起来，巩固起来，作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巨力。我们对于任何势力，都不愿它有丝毫的损失。救国会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没有争夺政权的企图，纯粹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超然的地位，作全国团结的呼吁，以尽一分人民救亡的天职。我们对于政府的政策，不惜有严厉的批评，这也是任何国家的国民都有的权利，决不是政权之争。既然没有政权之争，哪里会反对政府，推翻政府？

第二，说我们主张停止内战，有袒护共产党的嫌疑。我们的答复是，我们主张集合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国内任何力量，不应该在自相残杀的内战下，有一丝一毫的消耗。尤其不愿中央在国内的冲突中，消耗了它高度优势的实力，积极毁灭自己的力量，消极加强敌人的力量。所以我们主张停止内战，而且这个主张，早在西南问题发生之初，即已公开表示，应以保存国力为前提，不应以武力为解决的途径，所谓袒护，显见不合事实。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在于不耗国力，一致抗日，共产党现在尚有很多的武装，无可否认的，也是中国的一部力量，并且它已一再通电表示愿意在中央的指导下共同抗日，为加强抗敌的实力计，自以停止讨伐为宜。我们这种主张，完全出于民族立场，毫无其他作用，并非对共产党有所偏袒！

第三，是关于鼓动工潮。我已在第九节说明，这里不再赘述，以免重复。不过我特别觉得这工潮是日本纱厂的工潮，我们的“民国”不是日本，与“危害民国”的罪名，有些牛头不对马嘴。除非我们的法院是日本的法院，或者

还可以说我们是“危害‘帝’国”。

第四，是提倡人民阵线。我们的答复是，人民阵线是日本报纸的有意诬蔑，随便地把这名词加在救国会身上，以为挑拨离间的工具，我们从来不曾用过“人民阵线”四字，我们所提倡的是民族阵线，是救国联合阵线，是人民救国阵线。在国外如法国和西班牙，他们的人民阵线，其目的是在应付社会的危机，它所包括的党派，只有左倾各党，所包括的只有工农和小资产阶级。而我们主张的民族阵线或救国阵线，是应付整个民族的危机，反抗全国人民共同的大敌，内容比人民阵线复杂得多，民族阵线在纵的方面，团结社会上的各阶级，横的方面，团结各党各派，是全民性的，——汉奸当然除外，与人民阵线有着根本的不同。

以上种种主张，都有我们历来公开发表的文件和刊物，可以覆按。

问话经过2小时以上。那位检察官正襟危坐地坐在一个很小的法庭里，进行他的“侦查”。当问完了大家，一起重新被传去看笔录的时候，有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完了笔录，大家就在旁边当事人的席上坐下。那是一张不长的长凳，几个人一坐便满了。所以最后看好的韬奋先生，他看见没有座位，就一屁股在律师座上坐下了。后来我们告诉他，通常在法庭里，被告如坐错了座位，是会被庭丁呼叱下来的。他听了，立刻现出怪难为情的样子，到现在想来，还是很有趣的。

押解看守所

沈先生被传问回来的时候，他被引到隔壁一间待审室去，把我们隔离起来；那时王先生在法庭上被侦讯，我们4人围在一处在谈论着沈先生究竟被问了什么。突然一位穿长褂子的先生推门进来，爽朗而谨严地自己报着他的姓名、职务。他身材适中，虽然在黑黯的光线里，他的面貌看不十分清楚，但从他洪亮的语音和爽直的态度上，我已推测出这是一位热情的朋友。他告诉我们说，等侦查过后，将往看守所去，并说一切都预备好了，叫我们放心。我们对于入狱应受的待遇，本来倒并不怎么关心，他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就更不用担心了。

等到侦讯完毕以后，黑暗的大天井里，又停了很多的黄包车，穿着黑布制服，但不一致的法警，也挤作了一堆，准备出发到看守所。

又是长长的一连串的车子，两旁随着服装不一致的法警，走在狭隘的街道上，影响了行人的交通。两边店铺大多已放上了板门；没有放上的，柜台里的人们，见我们走过的时候，都投以惊异的目光。

不到一、二十分钟，到了看守所，这是高等法院的看守所。位在吴县横街。一进门，便是一个小天井。两旁的厢房是办公室，我们在门外下了车，便站到天井中。这时候许多法警和观看的人挤满了门口。地上堆着我们的15件行李，益显得地方的狭小。不久一位漫画上“王先生”型的“所官”，手里拿着一本中国账簿，高高放在眼梢上，眼睛从眼镜的角里斜出去，凑着簿子看，逐一叫着我们的名字。这情形我猜想我们是被“点收”了。过后他又走回办公室，隔了一回又出来，走在前面领着我们走向监房去。

一条狭长的甬道，两边都是高高的墙，约莫走了三四十步，转了一个弯，又是一条比较宽的长甬道，又走了几十步，迎面一个木栅栏，进去便是一个很大的庭院，比刚才初进来的天井，要大过3、4倍。庭院的一面，是很高的高墙，一面是一列6间的平房。房子面前，是水泥的走廊，木的栏杆拦着，两旁是浴室和诊察室。原来这并不是监房，是为着守中的被告患病时预备的。自从造好后，病人还没有过，所以一直空着无人住，我们来了，做第一号的病人，——算是政治病吧！

6间平房，早在我们未来之前，已经布置好了。靠近栅栏门的第二号一间，作为我们的饭所和会客室，另外3间，作为我们的卧室，每间放置2只单人矮床；床的中间放着一只小茶桌。其2间里，一间置放所里的杂物，一间作看守居住的地方。

房间是长方形的，两头都有二扇玻璃窗。临着院子的一面，有一扇木门。门上挖了一个人头般大小的圆洞，铁门反装在门外，并有置放被告人姓名、刑期、罪名卡片的铅皮夹子。在二室之间的墙上，高高地开了一个小方洞，电灯装在方洞里，夜里两个房间就合享这一“方”的光明。房间的后面，空出一条很宽的隔弄；隔弄的另一面，又是一垛很高很厚的墙。这是看守所特殊的建筑，用来防备犯人脱逃的。

我们6人分占3个房间，沈、王二先生一间，在会客室的隔壁，是第三号室。邹、章二先生也是一间，是第五号室。我和李先生2人合住一间，夹在他们4人的中间，是第四号室。每间两个床位，一个靠窗些，一个靠里些，我们2人议定我用里面的一个。那床很别致，铁的架子，搁着木板，硬梆梆的，我瘦骨嶙峋地睡在上面，木板与骨头相碰，常常大吃其苦。而木板的阔

度也不够，胖胖的王先生，睡着翻身的时候，也有跌落的危险，所以他一直没有好好地睡过一晚。不但如此，章先生也很不舒服，因为他的个儿比较高，而这个床的长度，也不够他伸直了腿睡，所以他不得不学着虾的样子，蜷曲了身体过他的“夜生活”。

我们在看守所，报纸是不许看的。虽然我们在法院时，检察官曾经说过或者指定一二种，但是后来也没有实行。甚至连杂志一类的刊物，也被扣留起来。因此我们在里面感到万分的苦闷，我们每天忧心焦虑的，是绥远战事的发展怎样，敌人的侵略，到了如何程度？起先，我们因为尚有接见的自由，可以从亲友口里得到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后来连接见都停止了，弄得什么都不知道，简直变成了一个木头人。中国的刑事政策，是取感化主义的；然而这个情形我实在有些怀疑，要说“木头人主义”那倒名副其实呢！

羈押生活

我们到了看守分所以后，想到中国的司法从民国以来，从不曾脱离过行政或其他势力的干涉，又以在上海经过的各种情形来推测，我们虽然已经移归司法来办理，而且司法界虽然也会主张正义、维持尊严，却也不许我们存有多少奢望，以为可以即行解决。所以我们安样镇定，预备“长期牺牲”，我们的生活，也就不能不使它组织化，规律化。

第二天，我们便组织起来。6人里面，沈老先生年龄最高，经验最富，在救国运动中，是最热心的领袖，而且爱护我们有如赤子。所以我们便一致请他老先生做我们的“家长”。本来我们曾经拟议叫做主席，但是一想到我们被指定的罪名中，有一个是“颠覆政府”，这样一称主席，那末“图谋不轨”便成“查有实据”了。并且在事实上，我们只有6个人，也仅象一个家庭，称他“家长”，是非常确当。所以便这样决定了。但是他老先生陡然增了5个小辈，而且牵牵拉拉的还有许多小孩子（统计起来约有十六、七人），再加上各人的夫人，假使真是家长的话，恐怕也有难乎其为家长之慨了。

除了家长之外，我们分做会计、文书、事务、卫生、监察五项职务，各人分任一项。会计由银行家章先生担任；我们说笑话，他既是银行家，所以会计的任务，是包括筹措经费在内的，不单记记帐便了，一切“资源”的开发，都在他职务范围之内。王先生救国会本来担任文书一职，为“驾轻就熟”起见，就由他担任。率先生办理补习学校和图书馆，擅处理事务之长，不得不请他屈就事务一职。邹先生呢，他的态度，是那么严肃、正经，颇有“肃政史”之风，所以请他做监察，随时监督我们是否忠于职责。他文名满天下，我们以为他如椽之笔搁置不用，是非常可惜的，所以要他兼做文书，以分工先生的责劳。我被派做卫生一职，用非所学，不免觉得手足无措，有亏职守。幸亏没有干薪可领，得免监察委员提出弹劾。

我们每天7时半起身，大家运动半小时。运动也分成几种，一种是跑步。因为室外有一个很大的庭院，或叫它大天井，在天井中间有一个大圆圈，用砖石砌成牙齿形的圆圈。里面全是泥土，可以种植花木，我们便绕着这圆圈，沿了墙根跑步，每圈约有15码左右，连沈先生在内，我们天天大兜其圈子，最多的可以跑65圈，约略计算，有一英里光景。

第二种是拳术。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因为身体衰弱多病，曾经加入精武体育会练过1、2年。那时精武还在提篮桥培开尔路，有着很大的广场，空气充足而清新，我于早晨6时去9时回，仅仅随意的学习，使我得以逐渐走向健康之路，免做了肺癆病的俘虏；这是我生活史上最愉快的一页，深深镂镌在心坎。这一次，沈、章二先生都在练习他们平日所练的拳术，引起了美丽的回忆，也就跟着他们重温十余年前的课目。

除此之外，还有柔软操，和打球、推手之类。有的于下午傍晚行之，有的随意玩弄。我因为在6人之中，身体最差，他们都鼓励我，督促我把身体锻炼得好好的，将来可以多做一些事。我当然完全接受，不敢稍懈。所以我入所以后，早上练拳从未有过间断，对个人身体的获益无可否认是很大的。

运动以后，即进早餐，工作则早餐后开始。下午与夜晚，也都在吃饭之后工作。工作之前，大都是休息闲谈，间或唱唱歌，说说笑话。

起先一星期，大家心绪不定，而亲友们也接续不断来探视，所谓工作者，大部分是招待探访的朋友，或在自己的房间里与自己的夫人娓娓谈心罢了。

自从法院里下令禁止接见以后，漫漫长日，我们感到极大的无聊。这时期，写信作了我们经常的工作。一方面和家属互通声气，以免两地的挂牵；一方面因为书信又须法院检查，我们便决定通过信纸上的文字；来把我们平素的主张，唤起检查者的觉醒。所以有时我们每封信，有长至 10 余页的。写给家里和朋友的信，几乎都变成了论说。

老实地说，在现社会里，学法律的，不，以法律吃饭的，特别地保守，甚至只晓得捧牢了饭碗，不晓得其他一切的。虽然他们日常所接触的，都是社会上最现实、最尖锐的问题，然而尽在法律的圈子里沉浮，除了死板板的法律条文以外，对于当前的问题，有的简直毫无认识。国难如此严重，法律应该怎样地以共赴国难为目的，与解救国难的大业配合起来。若犹以守牢法律范围为努力本位，欣欣然自诩，这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又有什么两样？甚至把救国的纯洁青年，置之囹圄，抗日运动，判作为危害民国的行为，如“民国”真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那末为虎作伥犹算“名正言顺”；奈何尚未到此地步，其痛心为何如呀！

但是把写信当做工作，过了几天之后，大家觉得太浪费时间了，于是大家规定了固定的事情。从事著译的，有邹先生续写他 10 余万言的《经历》；王先生译他的拉斯基的《国家论》；章先生写《救亡运动论》。沈先生精于书法，亲友求他“法挥”的很多；他长教的上海法学院，因募款建筑，要他 50 份书件，所以他便以此为经常工作。我和李先生读书的读书，写作的写作，大家埋头努力，生活更有规律，而且各人也都有了相当的收获。

禁止接见

在上海公安局的 10 天，虽然限定时间，接见是有着自由的；而且对于家属的探望，尤有相当的便利。这不仅是人情上所需要，也是被告在法律上应有的权利。到了苏州，起先也同样可以接见，法赋的权利，侥幸没有被剥夺。所以家属由沪到苏，由苏到沪；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往返跋涉，不辞奔波，无非减少挂虑，求精神上得些安慰，同时各人的家事和职业上有着种种必要的接洽，也就不惜费时费钱，常来看我们。

法律是准许被告与外人接见、通信、受授书籍的，然而法院为了维持羁押的目的，对于接见和通信，可以加以监视或检阅，法律上如此规定，原是很公平的，当然不得随便禁止。如果一定要禁止，那末，一定也要合乎法律规定的条件，稍有欠缺，即不能随便滥于引用，这是法律防止滥行职权，以保护被告人利益的至意。否则，职权在握者，随心所欲，要禁止就禁止，要不禁止就不禁止，生杀予夺之权，操于一人一机关之手，其危险奚堪设想。所以法律订明禁止有禁止的要件，依“法”，而不是依“人”或“机关”的意志。

不料于 12 月 14 日突然宣布不许我们接见，甚至家族都不许。是不是以前都没有勾串或伪造、脱逃之虞，而 13 日那天法院发现了这种情形呢？如果是的，那末依法办理，我们又有何话好说，但是事实说明并不如此。

自那天起，我们从栅栏门望外面，甬道里增加了 3、4 个武装的岗位，肩背上挂着长枪，雄纠纠地往来逡巡着。本来看守所里也有看守守卫着，然而这几个新到的“老乡”的制服，和所里的显然不同，而且带着武装，武装也似乎“神气”得很，不问可知，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我们费尽了方法才知道，他们并不是法院派来的司法警察，却是行政机关苏州县政府保安队里的士兵。

又有一天，忽然有 3 个不认识的人走进院子来。因为自禁止接见起，除了“看守”和工友之外，我们 6 个人，不能再见面生的人，不，面熟的人也不得见了。这 3 个人进来，尤其在禁止后不到 1、2 天，我们觉得尤其奇怪。他们虽然穿着长衫，但另有一个典型，这个典型，和 11 月 22 日夜里急叫开门的人物，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们当时便怀疑禁止接见之后，怎么还有人可以进来。起先我们以为是所里或法院里的同事，偶然怀着好奇心来观望的，但是后来证实了原来是宪兵司令部派来的，而且每天还在看守所门首，替换落班地来抄摘探视我们的朋友的姓名住所呢。

自从禁止接见以后，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精神上大受苦痛。于是我们不得不依法据理力争，要求接见我们的家属，要求依照法律在接见的时候派员监视，或限定时间，但是一次又 1 次，3 次 5 次，7 次 8 次，给我们的答复，都是一个“不”。我们每次的请求，都是用书面由看守所转呈法院，从送去至回复，总须经过相当的时候，在每次拟稿的当儿，我们每人都怀着无限的希望，以为这一次的请求，依情、依理、依法，不论哪一样都应该准许了吧！在等待回复的时候，我们幻想着准许的“圣谕”到来时，大家商议怎样使家属立刻就来苏州。有的建议写快信，有的主张打长途电话。总之，渴想见到家属之殷切，是不可以言语来形容的。然而每次得到的回复是一桶冷水。这种不管法律，不顾人情的残酷的赏赐，我们有领受不下之慨！史良先生曾经说过，我们是“鱼在网中”；照这种情形看，我觉得这譬喻还不够相象，应

该说“鱼在釜中”才对！

侦讯了 5 次

自从移到高等法院，一共经过 5 次侦讯，第一次是在到苏州当晚在法院里进行，其余 4 次，都由检察官偕同书记官到看守所来讯问；每次都以我们的会客室权做法庭，我们吃饭写字的桌子，当作了法案。检察官是一位未过 40 岁的壮年，坐在正中，苍白的脸死板板地，似乎很不自然的样子，虽然好象要装做笑脸来问话，但是“一本正经”的程度却一点也不减少。有一次，他来监视接见人谈话的时候，偶然谈起，知道他却直接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炮火的牺牲。原来他以前在沈阳的法院办事，九一八事变发生，便不能不挂冠南返，到关年来做法官。虽然做官，我们想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印象，该比我们深刻，抗日情绪该比我们浓厚吧！

书记官坐在桌子的右面，我们也坐着答复检察官的问话，这是和在法庭上不同的。

到我现在执笔为止，在看守所里的侦讯，前后 4 次。首先 2 次，都只隔了 5、6 天；第 4 次和第 3 次相隔的时间，便有 20 天之多。原来 1 次 2 次以至 3 次 4 次，问来问去，老是问那一套。三翻四覆地问不出新花样来，尤其关于人民阵线和民族阵线的问题，差不多没有一次不问，没有一人不问。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明，说得简直有舌疲唇焦之苦；而还是法兰西、西班牙，西班牙、法兰西这样不断地问。这个情形，直象一桶水在两个桶里倒来倒去，一会把水倒在这桶里，又一会把这一桶的水倒到那一桶去，倒去倒来，倒来倒去，依然还是这一桶水。

邹先生去年在香港刊行《生活日报》的时候，在《生活星期刊》里曾经答复过一个读者的询问，说明人民阵线与民族阵线本质上的不同。中国所需要的是民族阵线而不是人民阵线。文字上写得非常流畅明晰，因此邹先生特地向家里要了全份来，送给检察官请其附在卷里，免得我们的话说或者说不清，检察官的耳朵或者听不懂。结果，送了去，还是继续问。有一次，邹先生答复问话，说这两个阵线的分别，和他主张哪一个阵线，在他写的那篇文章里说得非常明白，可以覆按。不料他所得的答语，却是“文人著述全是‘言不由衷’的”。这一句话，直气得邹先生跳起来，他坚决否认他是“言不由衷”，他声明他的文字，负百分之百的责任，没有一篇没有一字不是“由衷之言”。说他“言不由衷”是侮辱他的人格，他要求记明笔录。我们 5 个人那时正被叫着进去签名。将近会客室前，里面邹先生的声音一句一句响起来，我们进去时，觉得空气非常紧张。看见 2 人的脸色都发了青，一个连续地说着“我要抗议”，“我要抗议”，另一个也不断地说着“我有权这样说”，“我有权这样说”。

这一次的争执，双方还有许多话，我都没有记下来。这许多话，我觉得根本与本案无关，在法律上实在都没有说的必要。不说，对于本案并不会失了什么；说了，也并不会对于侦查有所补益。又何况邹先生那篇文章，不是在被捕以后做来欺骗别人，想来解脱罪名；他做的时候，也不曾梦想过这篇文章要有这样的用途。

我们的案子，侦讯了 5 次，时期长至两个月；但照我推断讯问的经过，到第 2、3 次便已没有可问的事，似乎早该决定有罪无罪。但是我们在 2 月 29 日接到了江苏高等法院的裁定书，根据检察官的声请，裁定：

“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之羁押期间，自

民国二十六年 2 月 4 日起延长 2 月。 ”

延长羈押，在我们原只有遵守法律，可是法律上的规定，和司法行政部一再的告诫，对于羈押嫌疑人，应该衡情酌理，慎重考虑有无必要，不许滥押，并且应该厉行保释责付办法。然而对于我们则拘羈两个月不够，“必要”延长两个月，既不能免于羈押，也不能适用保释责付办法，令人“百思不解”。现在一般人民看起法院来好象变成了“冤”藪，不能不说是有由来的。

监禁中的“一·二八”纪念

“一二八”这一个血的纪念日，一天一天近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帝国主义。给我们飞机大炮的赏赐，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十九路军、第五路军英勇的抗战，粉碎了3天亡国的理论和不能抵抗的邪说。我们虽然幽禁在看守所里，对于这揭开民族解放序幕的壮烈的日子，和包含着积极意义的伟大的日子，仍决不轻轻放过。

3、4天前，我们就筹议怎样来纪念，我们暗中想法叫史律师也贡献意见。她虽因女性的关系，关在女看守所里，离开我们很远，但是我们间的通信还有相当的可能。所以我们要她对于纪念这一天的办法发表意见，以供参考。此外，我们经过几度的商量，决定到那天要举行一个简单而庄严的仪式。最重要的是要请检察官莅临看守所来讲述“九一八”事变时他所亲历的情形。第二，要买100余条印着“一二八纪念”，或“毋忘国耻纪念”字样的面巾，分送给这里看守分所的全体难友。因为检察官曾经说过，他以前在沈阳当法官，因“九一八”事件而回到南方，他身历其境，讲来一定足资警惕，所以议决由文书草拟信稿，正式邀请。后来大家再三考虑，认为我们虽同属中国人，可以一起来纪念；但被告是被告，检察官是检察官，还存在着不可破灭的界限。如果真能把这块分界石拔除了，我们早就不坐牢狱了！所以起稿邀请的决议，经过复议取消了。至于第二件分送面巾扩大宣传的办法，也因印字的面巾无处可买，如送无字的面巾，又无意义，又不得不忍痛“牺牲”。

但是在那天，我们又庄严又悲痛地举行了我们的“一二八”五年祭。

早餐之后，会客室里特别收拾了一下，做我们纪念的“会场”。把两张方桌拼成一条长台，台布也换了新洗的，显得整洁严正。长台的两旁放了6个椅子。3个人各坐一边，两头均空着。

表上的指针指着10点钟的时候，我们从椅子上一齐站起来，大家挺直了腰背，目不转睛地站立着，态度异常地严肃。首先由李先生领导唱《义勇军进行曲》，我们复唱第二遍时，6个人的声音，变成了一个声音，越唱越高，越高越激昂，我觉得我仿佛已经在枪林弹雨之中踏脚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仿佛我的躯体，在这激奋的歌声中消失了。

歌声一止，满室立刻肃静，没有一丝声息。接着便静默5分钟，为“一二八”被难的将士民众，和历年因抗日救国而牺牲的同胞、同志们致哀。每个人头沉沉地低着，眼睛深深地合着，四周静穆得如死寂一般，只听得立在旁边一位的细微的呼吸，这样沉痛肃穆的情形，我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静默完毕的时候，我睁开眼睛，看见李先生用手巾在揩眼泪，我知道他感动得更深了。

我们复归原座，由沈先生用沉重的语调说了他的感想，他说得非常简单，仅仅是两句话：“一定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对于救国运动决不退缩。”这是多么有力，令人振奋的话，我们大家又深深地感动着，我们的仪式便告终结。我紧张过分的情绪，过了半天才渐渐恢复。

史律师的意见，来不及转到我们那里，过后她告诉我们，她和她同牢的一位爱国的同志胡家志君，也举行了一个庄严的纪念。据说，这位胡小姐的入狱，更属奇妙。她在上海念书，因为写信给她的男友，说了一些“中国人应该救中国，尤其受国家育养的人，吃的着的是老百姓的膏血，应该为了解除老百姓的苦痛，去打走侵略的帝国主义者”的话，她就变成“危害民国”

了，就被捕了。因为她的未婚夫，在一个军事性质的学校念书，她的信被检查出来，所以由司令部捕去，后来解到江苏高等法院住了2、3个月；史律师投案，便和她同在一个“号子”里住着。这一天她们也和我们一般，唱《义勇军进行曲》，同时在她们看守所的“弄堂”里，走了几圈，作为游行示威。

请愿慰问代表团

我们被非法拘捕的消息一传布以后，国内外的朋友，不论识与不识，都担心我们的安全，函电慰问，奔走营救，在外面起了很大的震动。有的更由远道专程前来探望，有的馈赠食物，援助经济，热情厚意，逾乎常情，使我们精神上获得了无上的安慰。但是这样逾格的待遇，我们实觉“受之有愧”！尤其使我们梦寐不安的，是许多朋友们，为营救我们而受到牵累，挨了重大的苦楚。如北平同学们到京请愿，即被押解返籍，又某君代表其本地的朋友乘轮到上海来，替我们设法，尚未上岸，即被押赴某处，险遭枪决。我们闻到消息，真是心如刀割。我们何罪？罪及无辜？法律即使已经回复到“诛九族”的地点，也“诛”不到九族以外的朋友。而现在究竟尚未到此地步，那末根据什么法律呢？

尤其我们的会员同志们，比我们在里面的，更焦急、更担心，天天望着我们恢复自由。1月20日的下午，正是上空密布着阴霾，气压很低，雨意浓厚的一天，4点过了些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会客室里各做自己的工作，所官拿着一张纸条儿，急匆匆地推门进来，口里嚷着上海有人来慰问我们。

自从禁止接见以后，凡是来探望我们的人，不论谁，都不许进来一见；不过可以简单地用笔写一些作为谈话，算是网开一面。所官手里拿的纸条儿，便是来的人写的。我们一看，却是我们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请愿慰问代表团，他们一起有21人，每个人都签了名，虽不全是我们所认识的，但名字中间隐约可以看出有职业、学生、妇女等各救国会的代表。他们为了要求从早释放我们，备了呈文，从上海来向高等法院请愿。纸条上告诉我们已经到过法院，因首席检察官外出，未获得见，仅留下呈文便带了许多水果和食物到这里来慰问我们。他们要求这里所官许予接见，交涉好久，没有效果，只得写条要我们把生活情形告诉他们，使他们回上海的时候，可以转告全体同志。我们读了这热情洋溢的字条，想起他们许多人不辞长途跋涉，冒着危险来替我们请愿，并安慰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感动，我的心也不自觉地跳动起来。我们急忙地写了回条，表示我们的感谢，并告诉他们在这里的生活尚属安好。但是他们看见“尚属”二字，认为我们定有不安好的地方。他们向所官提出抗议，一定要到里面来看一看情形，才能安心，他们的殷切关心，使人多么感动！但是他们格于“法律”，终于未能和我们一见，不得不挟着无限的怅恨回到上海去。这时候，雨已下得很大，滂沱淋漓，真苦了他们。同时也好象告诉我们，救国事业正在阴霾的风雨中，有如今天的天气。我们的同志不辞艰苦地在奋斗，也象征着风雨不足畏，风停雨止之后，便是我们光明灿烂的世界了。

他们去后，大家想着他们秉了一腔热诚，堂而皇之地用了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的名义，向法院递送呈文，请愿释放我们；还留下各人的姓名住址，真不禁为他们的安全着急。各界救国联合会虽然公开，他们的态度虽然光明，然而我们的被捕，我们的“危害民国”就是为了救国会的缘故。法院侦讯我们的时候，屡次用了引逗诱骗的言词，要我们说出其他的人来，以兴大狱。现在既有21位自己送入“虎口”，他们遭受不幸，当然非常可能。他们在担心我们生活的不安好，而我们却焦虑他们的安全发生问题！

这种不安的心理，笼罩了我们整个的谈论。忽然不知谁打开了送来的食物，发现逃过了检查的他们的赠言。在食物盒子盖的底面，和包扎的“招牌

纸”的反面，他们都写了简单热情的辞句：如“希望你们早日恢复自由”等等，尤其使我们快慰的，是告诉我们“救国会的组织愈加健全，工作依然不懈”的话。的确，救国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专利，而是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大众的事业。捕了我们几个人，决不影响整个救国运动。反之，因为捕了我们，恰恰使救国运动越发蓬勃起来，救国的阵线越发巩固起来。我们被幽禁了，却幽禁不了全国几千百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

扣押证人

不幸而言中，第二天早晨，检察官果然又驾临看守所了。问话的中心，都是请愿代表团的问题，他并且拿了代表团的名单，一定要我们指出认识的人来，我因为顾留馨先生在那天单独地写了名片向我慰问，所以说了他。这就是我在“侦讯了5次”一节里所说“要紧”“不要紧”一段的情形。其余几位也说了任崇高先生等。虽然知道说了，对于他们的安全，更发生问题，但我们以为救国会代表请愿，光明坦白，无需用其隐蔽；况且国民有“请愿”的权利，是《约法》所规定的。他们行使国民的权利，也无所畏惧。所以一起说了4、5人。

然而，我们太乐观了。对于法院的估计，还是太书呆子气了！2月4日，我们所说出几位中的任、顾2先生果然被江苏高等法院扣起来了。

大概是1月29日，他们2位先生在上海被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传问，后来又接到江苏高等法院的传票，传他们到苏州来作本案的证人。他们来了之后，便被法院扣住押起来。据说是要他们两人交保，因无保而被羁押的，我写此的时候，犹在看守所中，不知实际的情形如何。如果上面这种传说属实的话，那末中国的司法，简直太暗无天日了，证人而可以羁押，真是法律上破天荒的奇闻，令人骇怪，无过于此了！我不能相信中国是一个有“法律”的国家了！

世界各国，任何有法律的国家，——除非是野蛮无文化的国度，从无可把“证人”——证人犯罪当然例外——羁押起来的规定。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也是如此。至于对于证人的制裁，却并不是没有的。譬如证人经合法的传唤，而没有正当理由不到的，法院便可以加以制裁，而制裁的方法，也没有可以羁押起来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制裁，仅不过两种：第一种是科以50元以下的罚款；第二种是可以拘提被告到场。——这是拘提不到场的使其到场，而不是将到场的羁押起来。——除此之外，全部《刑事诉讼法》中找不出第三种的规定，而且这种制裁，仅仅限于无正当理由而不到的，其有正当理由而不到场的，便不能适用，何况应传到场。——从上海到苏州来应讯，显然没有引用制裁办法的余地，岂有进一步把人羁押起来的道理！现在任、顾两先生的被押，违法悖理，真是旷世奇闻！

提起公诉

时间飞一般的过去，我们被捕后，已经4个月多了。在这4个月中，我们关在看守所里，所看见的是高高的厚墙，所接触的是堂堂的“看守”。不知外面的世界，已经起了难以想象的变化；中国的命运，已经有了极大的转机。西安事变的圆满解决，三中全会的成就，使中国民族获得了新的生机。全国的抗日形势，继续增高；国内的磨擦，已告停止；团结御侮，也露了端倪；联合友邦以求集体的安全保障，也成了今后对外政策的准则。反观我们的往昔所主张呼吁，成为被捕之原因者，也不过如此，无多差别。在此期内，救国会又曾一再公开地剖切说明，愿在政府领导下，努力抗日救国工作。照这种情形观察，不论在法律上，政治上，我们的恢复自由，我们的被“处分”“不起诉”，更为毫无问题。我们固然是这末想，全国人士也莫不如此想法。但是不幸得很，于4月4日羁押四个月，侦查期满的最后一天的晚上8点钟，检察官送达起诉书，正式提起公诉。

自从三中全会以后，各方面——南京的、上海的、苏州的，——不断带给我们的消息，都说我们要出去了。我们几次购买箱篋，整理行装，预备“动身”。家属们也三番四次地赶来等候我们出狱。可是由于种种的阻碍。结果还是押在看守所中。在侦查将要期满之前，司法和政治方面，更传说着本案决不提起公诉；恢复“自由”之后，由我们自动或被动地前往首都，长期或暂时地住在那边，和当局开诚谈话，使政府和人民，当局和救国会间的隔阂消除。大家“言之凿凿”，因之我们也不“听之藐藐”。到了3月底，离法定羁押期，仅剩3、4天的时候，自己、家属、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不以为就可自由了——至少是离开看守所——所以都集中到苏州来。有的跟我们开好出狱后暂以安顿的旅舍，并且排定了行程，怎样洗澡，怎样访谢亲友，怎样赴京，一一都安置妥当；有的备了爆竹，预备出门时燃放；种种情形，只须“不起诉处分书”一送达，便可依照而行。

可是，等等等，一天过去了，又等一天；看看只有两天了，法院方面，依然没有动静。直到最后的一天，上午10时12时过去了；下午1时3时、5时6时，又都在企望疑虑中消逝了。法院的办公时间早已完了。究竟将把我们怎样处置呢？还是谜一样地神秘。虽然在4点钟左右，我们得到非正式的传闻，说是检察官的“不起诉处分书”是没有“不”字的，真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然而，未曾证实之前，我们还冷静地等候最后的揭晓。七点半钟，我们夜饭也吃过了，法院送达的文件已在外面的消息传了进来，但是不到3分钟接续而来的，是法院又打来电话，命令送达人将原件带回去，说是弄错了需要改正。这时候，我们猜想会不会在这最后的刹那，整个地变更了，大家在会客室中推量估计，急于要明白究竟的情境，有如大旱之望云霓，又象持有航空奖券者，在“开彩”之日，等待“头彩”号码的“摇出”一样急迫！隔了半小时，“头彩”“开出”了，蓝油墨、钢笔板印刷的簿本子，送入每个人的手里，依然是没有“不”字的“起诉书。”一切希望和估量全成了幻梦。

我们在“送达证”上签了字，交还法警并把法警打发去了，便细细“捧”读代表国家、行使神圣职务的检察官的起诉书。第一个印象，是起诉书完全不了解政治上的新形势，和肆意诬蔑救国会的主张，不但咬文嚼字、断章取义，曲尽罗织的能事；而且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惟恐我们的言行不构成犯罪。《刑事诉讼法》实质的真实发见主义，完全为其抹煞，被告有利的情形，

竟然无一注意，我们万不料侦查 4 个月之久，起诉书理由竟然如此空洞、歪曲，真是诬蔑了国家，诬蔑了神圣的职务！

我们这种印象，并不是因为我们被起诉了，情感上愤激的反映，我们有种种根据，我们要依据法律上赋予我们的答辩的权利，一一提出答辩。我们痛惜的是起诉书关于我们的利害小，而给于全国人民的失望却大。客观的事实告诉我们，本案已为全国人士所注意和重视；而救国是否有罪，是千千万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所要知道的，起诉不起诉，影响民族的心理至大且巨。我们如果天良未泯，试闭目一思，爱国有罪，还有谁敢爱国？但是话虽如此，我却深深相信民族思想和救国行为，决不是起诉书或牢狱所能阻遏或消灭的，我要高呼：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作息表		值日表	
时间	作息	星期	值日者
八时前	起身	一	沈
九时	早餐	二	邹
十时至十二时	工作	三	章
十二时	午膳	四	李
二时至五时	工作	五	沙
六时半	晚饭	六	王
七时半至十时	工作	日	合作
十一时前	就寝	二十六年元旦立	

七个人的羈押生活的感想羈押生活

上表为公朴所书。公朴习字最勤，每日必临《张女志》数十字，此书极工整有致，颇似一纸公文书也。我辈自沪移送来苏，二十五年 12 月 4 日午后，到分所时，已傍黑。所屋一排朝南 6 间，前面有一天井，尚空敞。西一间为第六号室，看守等居之，五号韬奋、乃器卧室。四号千里、公朴。余与造时处第三号室。二号室则为公共阅览、作事及会客、餐饭之所。第一号室，由所内储藏杂物，与我辈无涉，初时作息各人自由，嗣觉须有一共同规定之必要，故公朴所书之纸，已为二十六年元旦日矣。表内规定早晚餐饭及就寝意义，一望即知，无待说明。惟工作到底所作何事，据我辈实际情形，可以阅书写作四字包括之。早晚餐饭后，所余时间完全归之休息，不准工作。唱歌、说笑话，往往闹得不堪。5 时后至晚饭以前，为运动时间，最近大家喜玩排球。在院内东西以一绳代网界，3 人分南北对打，乐此不疲。作息表所未规定者尚有 2 事：一、洗澡于每星期日晚行之，其入浴次序，以拈阄决定。一、室内扫除，所内为我辈专雇一人，姓名叫王树山，司杂役及清洁打扫等事，我辈认为不够，因定每星期各卧室，应须清除一次，拖地板、抹墙壁，皆由我辈躬自分任。又每室靠北窗下，设有便器，外形似方凳，中置瓦缸，破其底，通于壁外，初时臭气颇甚，后每大便后，须由本人用水冲刷令净，遂无臭气，亦为清洁重要工作。至所谓值日者，其规定责任，一为唤起各人注意，遵守时间；例如早晨应起身时，何人未起，可以手敲击窗户令醒等类。二、每餐饭前须将各种食物支配停当。三、每日零碎事件如某物缺少，应须伤人添购等类。再在规定作息时间内，我辈还有一种经常的事务分配，乃器主管会计，造时主管文书，千里主管卫生，公朴主管事务，韬奋及余则仅于各事负补助之责。此为我辈整个实际羈押生活，特加详释念。

二十六年 3 月 22 日钧儒记于

江苏高院看守所第二号室北窗下

去年 12 月 4 日系星期五。昨 21 日，为自移苏羁押后之第 16 个星期日。计算到今为止，已经过羁押 109 日。

钧儒又记。

自从和几位朋友，同过羁押生活以来，对于同舟共济的意义，愈有深切的感觉。一人的安危，就是 7 人的安危；6 人的安危，也就是其他任何一人的安危。同患难、共甘苦，这种同舟共济的意义，推之于民族，与全国同胞，便是团结御侮的精神。

朋友相处日久，对于彼此个性的认识，也愈益深刻。

这种深刻的认识，倒不在乎什么大处，却在平日造次，一语一动之微。这也是在这时期内所得到的一种感想。

3 月 28 日韬奋写在苏州

在羁押中，使我特别心领神会有两点：其一，为集体生活之可贵，其二，为哲学信念之不可或缺。有许多人恋家庭，就因为家庭是与生俱来的一个集体，但是善于处群的人，可以到处为家。社会进步了，职业群、思想群、娱乐群，以至社交群等，形形色色的集体生活都发达了，家庭的重要性，就慢慢的减少了。牢狱之所以不似外间想象的苦闷，也就因那里面一样的有人群，一样的可以过集体生活，只要我们善于处群。所谓处群之道无他，只要把自己当做人，把别人也当做人就行了。

哲学的信念，不管是好的，或是坏的，对于自己都是有益的，都可以使人在危难中处之泰然，持之弥坚。历史上一切视死如归，从容就义，可泣可歌的事迹，都是哲学信念所造成的。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最好的，最正确的哲学，一个颠扑不灭，而可与人类共始终的哲学。不正确的哲学，固然一时也可以使你心安理得，然而一旦被事实揭穿了，那个彷徨的痛苦，是很难堪的。这也就是你意志顶顶薄弱的时候，恶魔在这时候乘机毁灭你的灵魂。

二十六年 3 月 25 日章乃器

羁押生活不自由，不自由后才知自由的好处！自由自由，大众的企求。

羁押生活不自由，不自由也有好处；若非如此，好友怎能长欢叙。

在羁押生活中，大家利害相同；6 个人是一人，彼此互相诉苦衷。

在羁押生活中，并无彷徨的烦恼；因为过去的一切，没有什么做错了。

自知不易，知人更难；在羁押生活，友谊增进无穷！

不要怨人不了解你，只怕你不了解人；四个月羁押生活，我于此领悟重重！

羁押生活单调，大家不妨“胡闹”！引吭乱叫，轰然大笑，所为何事，莫明其妙！

前因看了几首陶行知先生的白话诗，不觉也破天荒的诗兴勃发起来，曾乘兴写过一篇处女作，替代了信寄给他。“家长”要我写一点羁押中的生活感想，我又大胆的来做这第二次的尝试。对于诗毫无研究的我，或者会被人骂“胡闹”罢！

二十六年 3 月 30 日公朴记在苏州看守所

在这里，物质方面的享受，实在比我在家里好得多，可以说是回国 7 年以来所没有享受过的舒适生活。精神方面，对于案事本身，因为我自信没有犯罪，俯仰无愧，所以没有什么忧虑。译著之暇，我所焦思的，乃是今后救国的切实计划问题。在过去，我对于中国的前途，虽有粗枝大叶的主张；然而在国事剧变已演进至另一阶段的今日，那些主张，是不够精密的，必得有进一步的详细办法。这些办法，不仅要顾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且还须看清国内的情形，与国际的环境。我很感谢这次事件所给我的冷静深思的机会。

民国二十六年 3 月 31 日造时写于苏州

我起初为着反抗非法逮捕，准备做个亡命者，暗中继续着救亡工作。后来知道我们救亡集团里，并不因我们被捕，停止工作；相反的，为着我们的被捕，更引起了大多数人的同情。而且同案六人，已解送苏州高等法院，依法审理；我是中华民国人民，当然有受法律审讯的义务，于是在二十五年 12

月30日，向苏州高院投案，开始着犯人生活。

为着性别关系，我不能和其余6位，羁押在一块，只有和一般未决女犯，共同生活了。但是仍蒙看守所优待，特辟13号一室，给我居住，派了服役的替我做事。除了我晚上睡觉后加锁替我保护外，终日房门开放，任我出入自由，不受一般犯人的封锁限制。

我入所时，所中羁押女犯59人，分居7个房间，有的怀着肚子，有的带了孩子。中间判决死刑者7人，无期徒刑者9人，10年20年，1年2年者都有。这样大大小小60多个人共同生活的大集团，杀人、放火、强盗、绑匪、通奸、扒手、骗子、拐歹，各色各样的人才，统统具备。他们虽然都是违法的犯罪者，可是彻底的讲，她们都是争取生存的战士，都不是甘心等死的弱者。

当我入所的2、3天，她们看着我受特别优待，都私相窃议，探问我犯的什么案子；后来不知在什么地方打听到我是为着反对东洋人吃官司，她们都很不平的替我表同情，大家不断地骂着“东洋鬼子真害人”。有的说：“与其关我们在此地，还不如放我们出去与东洋鬼子拚个命。”我看到她们这种抗敌情绪，我简直疑心自己又到了一个新的抗敌集团去了，但是为着遵守所中的规则，我当然不能采取公开演讲的呆方法。后来她们又探到我个律师，于是生意兴隆。她们时常都来请我做状子，有的要我看案情。我呢，为着研究犯罪学，实际调查犯罪原因起见，也乐于做她们的义务律师。尤其借此接触机会，把侵略者的野心，扼要讲解，深刻她们抗日的印象。将来当真集中全国力量抗敌时，她们恐怕还是英勇的先锋；因为她们都是多半不怕死的好汉。

我自从入所和外面隔离后，我抱定用功主义，把看书放在第一着，次之就是礼记写作了。我目前研究的范围，是各国犯罪学、各国警察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哲学。到现在还有社会学和经济学刚刚开始，假如还有一年半载留我在此地，就可以照我的计划研究下去了。我的运动，有跑步、早操、扫地、揩窗、洗衣、烧菜。我的娱乐，是学她们唱山歌，教她们《义勇军进行曲》等。

3个月来，我和她们处得和家里人一样，无形中又给她们推做头脑了。她们遇到什么困难事情，总要请我做顾问。她们争吵哭泣，到不得解决时，就要我去判断，或解劝。但是她们很爱护我，在我用功的时间，她们很少来打扰我。最近她们听到我有出去的消息，有的代我高兴，有的躲着哭泣，有的绣花送给我，有的做菜给我吃，有的要我住址，有的索讨照片。她们都是有良心、有情感的同胞，谁说她们是犯罪者？当真放我出去，我倒觉得有些舍不得她们。

二十六年4月2日史良于苏州女所

4个月的羁押生活，最简单的一句话，可以说是在矛盾的统一中过去。想到卧病2月日夜焦虑的老母，有时候真是心如刀割，坐立不安！但是贤师益友，朝夕相处，过着有规律的集体生活，又觉得愉快兴奋。对于身受非法的蹂躏，怀着无限的忿激，并且深痛国家法律的毁灭，但是一想到关外同胞，在敌人铁蹄下粉身碎骨，家破人亡的遭遇，与我们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又不觉心平气和。况且历尝铁窗风味，得以更深的认识讼狱的真相，于个人生活上又多一番经验，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稍受一点磨难，也不是不值得的。不过一天天迁延下去，却又不愿长此不决，希望迅速的恢复自由。这种种不一的矛盾，不断在羁押生活中潜滋暗长，如果不能解决的话，说不定将入苦闷的深渊。但是，一个坚定的共同信念，却把这种种矛盾不断的统一起来。那就是大家相信：联合战线的主张，终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而爱国无罪，必成为大众和历史一致的裁判。所以安闲宁定，不知不觉把悠长的时日度过去了。我相信，即使关上我们3年5年一定还是如此的。

二十六年3月28日沙千里在苏州押所

“七君子”受审旁听纪实

陆诒

- 法院“优待”别开生面
- 被告阵容，堂堂正正
- 辩护人义正词严，震惊四座
- 审判长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 法庭群情激愤

1937年6月25日上午，我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的旁听席上，采访审讯全国瞩目的“救国有罪”的“七君子”案。尽管我坐在旁听席上，但我当时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员之一，既是上海《新闻报》的记者，又是救国会半公开的机关刊物《救亡情报》的编委之一，这就不仅是作为旁观者来此听审而已。现就回忆所及，记其梗概。正是江南霉雨季节，风雨凄切的一天，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先生等七人的案件在江苏高等法院的第一法庭公开审理。被告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等六位先生，由法院派一名书记官会同法警用小汽车从看守所中接到法院。法院也用汽车将史良女士接来了。此案，同时受审的还有罗青先生，另有顾留馨和任崇高两位是自己到法院投案的。为了审理这一件“救国有罪”案，苏州高等法院这天特意租了三辆出租小汽车迎送被告。当时，在苏州每辆小汽车租一天要付租金法币50元。法院如此“优待”，也许是别开生面，但略一沉思，也就由此可知他们的案子决不是私人问题，而是有关我们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

候审室门口，警察戒备森严，被告们都在上午9点以前到达。候审室中的“七君子”却谈笑自若，态度从容。真理在救国会，有什么罪？

9点30分，审判长朱宗周、检察官翁赞年以及陪审的两个推事，分别穿了不同的制服，坐上法庭的正面，周围的法警板起面孔站在各人应站的岗位，被告的家属和一批新闻记者挤坐在旁听席上，注视着法庭的动静。辩护律师一共有20多位，那天出席的有18位，由长髯飘扬的刘崇佑律师领队到庭，分别坐在两行律师席上。被告最先进来的是沈钧儒先生，其次是史良女士，再次是章、邹、王、沙、李、罗、任、顾等人。据事后采访，他们曾在候审室中经过民主协商，按照尊敬长者、尊重妇女的次序，组成堂堂正正的阵容。

审判长先把各人的姓名、住址等问了一遍，继由检察官翁赞年站起来宣读“起诉书”。尽管他装模作样，指手划脚，但大家都投以轻蔑的嗤笑。他读完，其他被告暂时退席，独留沈老在庭上。其时，法庭壁钟，时针刚指到9点五十分。审讯沈老历时最久，沈老精神奋发，从容答辩。当问到“要求释放政治犯”时，他特别声明：“个人从事救国运动不自今日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上海就有各团体救国联合会，那时我也参加的，在这个会里也有过‘要求释放政治犯’的提案。我还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我记得在国民党的历届中央全会中也有过这种提案，即使到了今天，在党国要人中还有一部分人作如此主张，我们救国会有此主张是理直气壮的。”最后，审判长朱宗周问沈老有关上海学生罢课的情况。沈老当场提出：“请庭上一一指明，罢课发生在哪一天，哪一个学校？因为上海各大、中学校罢课的事情太多了，你这样含糊地问，叫我如何具体的答复。何况，国难

如此严重，民族危机威胁着每一个人，叫这班热血的青年怎么能安心读书？”审判长无话可说，即匆匆要沈老退庭。

10点45分，讯问章乃器“为什么要提出抗日问题？”章立即回答：“中国目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形势危急，凡是中国人，谁都有切身感受，‘要抗日’这句话，我想即使今天高坐在庭上的审判长也会同意的。”审判长无言可对，就说，“你们发表文章批评宪法，这算不算违法？”章闻言笑了一笑，然后缓缓回答：“谈到宪法问题，当宪法草案公布之日，政府曾公开登报，征求人民发表批评意见，而各界人民批评宪草的文章在报章杂志上也发表得很多，可是审判长少见多怪，才问出这样幼稚可笑的问题。”这一段话引起人们会心的微笑，而审判长也为此面红耳赤。

接下去，就传问王造时和李公朴。王曾留学美国，研究政治法律，所以当法官问到政权与政府的问题时，他以滔滔雄辩解释这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法庭几乎成了大学讲堂，王造时教授不是在受审，而是在讲学，闻者都敬佩。

李公朴先生那天穿了长袍，在回答提问时常常手理长髯，镇定异常。他谈了1936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大会上当场成立援助日本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和募捐的情况，十分翔实。最后，他说：“如果审判长那天也参加此会，听了罢工工人的紧急呼吁，也会慷慨解囊的。”

审问邹韬奋先生进行到一半时，已过12点钟，审判长宣布退庭，定下午2时续审。所有的辩护律师、被告的家属和新闻记者都应苏州律师界名宿张一鹏之邀，到他家中共进午餐。几位被告就在候审室中吃了一顿由法院向鸿运楼预定的丰盛午餐，但是被告中间对已审与未审的人是分批隔离入席的。

下午2时35分，继续开庭讯问邹韬奋。邹历举去年7月份在香港《生活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为证，声明他曾劝过大家不要再用“人民阵线”这个名词。2时55分，检察官翁赞年突然起立发言，强调救国会曾致电张学良，因此此案与西安事变有关。邹韬奋同志当场大声疾呼：“被告可以不侵犯检察官的权利，但检察官也不能禁止我作出解释的权利。为什么今天检察官只提到我们致电张学良将军，而独不提及我们在同一时间也致电国民政府和当时在察哈尔、绥远两省前线的宋哲元将军和傅作义将军？这是公开的事实，随时可以调查证实的。”最后，邹还拿出自己的著作《展望》，指出其中一篇他写的文章，题为《现代国家与民众运动》，说明他本人热望政府开展民众运动，增强御侮力量，决无危害之意。如果说到“危害”两字，只能说危害到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谈不上所谓“危害民国”！庭上默然无言。

3点5分，审问沙千里先生有关职业界救国会的事，沙对答如流，掌握分寸很恰当。继讯史良，时在3点20分。她身穿西装，足登革履，精神焕发地进行答辩，而且在发言中善作譬喻。当讲到救国会主张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时，她说：“这好比一家人家，有强盗打进了大门，叫家里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再不要自己打自己了，首先应当联合起来去抵抗那些强盗们，这有什么错？”又说：“时至今日，抗日两字，即使你随便去问哪个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除非法院的检察是日本人，才会判我们‘救国有罪’！”语颇刺耳，但义正词严，难以驳倒。

史良讲完后，被告辩护律师俞钟骆、俞承修两个相继发言，并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出版的《妇女救护十讲》和刊载上海纱厂工会书记段义林因被控

煽动罢工在上海第一特区法院审讯消息的一份《新闻报》，呈案请求调查。

这时，审判进入了高潮。沈老的辩护律师刘崇佑，虽年逾六旬，这时精神抖擞地站起来发言，声若洪钟，震惊四座。他说：“国家到了今天的地步，老实说，做中国人，有哪一个不要救国？救国，是一种义务，同时也是一种神圣的权利。谁敢侵犯这种权利？……”其他几位辩护律师继起发言，一致要求应向张学良将军作调查，以明确去年西安事变与被告的关系。那位检察官当时于足失措，大发脾气，竟说：“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等所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其中就有召开救国会议和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这两条，单凭这两条就可以构成‘危害民国’罪，其他的反动行为更不必论了。”

法庭上群情愤慨，沈钧儒等纷纷起来驳斥，审判长为此坐立不安，力劝双方保持秩序。这时，章乃器大声疾呼：“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他的职权是应当的，但我们还希望他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格，否则给他做一个中国人，也丢尽我们老百姓的脸！”

这句话单刀直入，促使检察官暴跳如雷，一面怒斥章乃器恶意侮辱，一面不断叫书记官：“记明笔录。”在好几声“记明笔录”中，全体辩护律师一致起立，严正要求庭上把军事委员会军事法庭审理张学良案的记录，调来作证。审判长对此不置可否，接下去提讯罗青、任崇高和顾留馨等三人。最后，辩护律师秦职奎再次发言。他说，以他做律师26年的经验，总极力避免与检察官作不必要的摩擦。不过，今天我们集体提出要调张学良案的记录作为旁证，这是一个合乎国法与人情的要求，务必请庭上注意这一点。

5点30分，审判长宣布退庭评议。律师们集中到休息室中交换意见，大家的话题都集中在议论检察官其人其言。

6点10分，又继续开庭。审判长朱宗周当众宣布：关于西安事变与救国会关系问题，候向军委会军事法庭调取张学良案记录再行审核，被告等其他要求调查事项，无调查必要，今后被告等尚有可供调查参考文件，可逕送法院备核。

退庭后，所有的辩护律师、被告的家属和新闻记者由当地刘祖望律师邀至朱家花园寓所晚餐。

此案不仅动员了上海和苏州两地的著名律师仗义执言，而且法庭公审的新闻报道，也使全国人民明了“救国有罪”一案的真相。

那次采访，我是6月23日就到苏州的，当天下午就到高等法院看守所去看望沈老等七人，他们都很高兴地接待了我，我除了向他们汇报一些工作问题外，特请他们逐一题字留念。

沈老用毛笔当场写下这几行字：

“我欲入山兮虎豹多，我欲入海兮波涛深。呜呼嘻兮，我所免之国号，你到那里去了？我要去追寻！”

沈老于诗词后，还亲自作了注解：“新生事件宣判之第四日，我自杭州返沪，车中写此诗于报纸角上，随吟随写，泪随声下，湿报纸。今两年矣！书此不自禁其感之深也！二十六年六月沈钧儒识于江苏法院看守所”

其他六个也都有题字，现照录如下：

章乃器：“正义感是我们这一阶层人为民族、为社会奋斗的发动机，但这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论做我们的舵。”

王造时：“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非全国一致不分党派，不分阶层，大家团结起来御侮不可。”

沙千里：“民族解放的斗争必得最后的胜利，爱国无罪，将为大众和历史一致的裁判！”

李公朴：“我们要使每个中国人认识自己有着抗日的任务，并要了解怎样能各就范围的去执行这个任务，更要加紧一般的政治训练，以增强抗日的力量。这样把广大群众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联合起来，把救国的工作和民众运动联合起来！”

邹韬奋：“为争救国无罪，不是为个人，而是为着救亡运动的前途。不许侮辱人格，也不是为个人，而是为了维护中华民族人格的光辉。”

史良：“除非把我幽禁到无人的荒岛，我才没有办法宣传和抵抗侵略者的残暴。但是我还要设法训练着不害人的野兽，准备有一天同侵略者作最后的决斗，因为侵略者的残暴实在超过野兽百倍！”

1937年7月31日，沈钧儒等七君子终于获释。

上海律师界为“七君子”

案辩护内幕

李文杰

- 27 位律师组成的辩护团
- 舌剑唇枪，据律讲理
- “这里象做喜事一般，太热闹了！”
- 爱因斯坦等联名关注救国入狱运动

欢呼声中走出看守所 1936 年 11 月 22 日，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将在上海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王造时 7 人逮捕，投入监狱，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案。当时我正在上海执行会计师业务，兼做律师，曾经参与上海律师界为“七君子”进行辩护的斗争。现在根据当时的日记并参考救国会编印的《救国无罪》和沙千里同志所著《七人之狱》二书，将此案经过忆述如下。

在上海高二分院的斗争

1936年11月23日清晨，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的救国会负责人潘震亚来旧法租界辣斐德路474号正诚律师事务所找俞钟骆和我，对我们说：“衡山（沈钧儒字）他们昨夜突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现在已由捕房向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解案，我不便代表出庭，请你们立即赶往法院出庭营救。”我们对于沈衡老及救国会其他领导人的爱国热诚素所敬仰，兼有交谊，前往营救自是义不容辞，当即驱车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出庭。赶到的其他辩护人，记得的还有张志让、蔡六乘、鄂森等律师。我们在开庭前查阅捕房“解案单”，了解到国民党反动派是以“被告”等有“赤化”嫌疑为理由，派遣特务会同公共租界捕房中西探捕于深夜前往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4人住宅将他们逮捕的（邹韬奋、章乃器、史良3人也同时被法租界捕房逮捕，于23日下午解送高三分院）。当时沈等4人已被捕房人员关押在法庭旁边一个小房间内，我们几个辩护律师无法同他们谈话，只得由他们自己或家属签具“委任状”呈庭。

法官（姓名已记不起）偕书记官开庭后，捕房律师甘镜先请求庭上裁定，准予羁押“被告”，进行侦查“罪行”，以便依法起诉。上海市公安局派来的律师和特务则要求将“被告”等移送南市上海市公安局转解苏州高等法院审讯（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以高等法院为这类刑事案件的第一审管辖法院）。我们几个辩护律师则以未见提出任何“犯罪”证据为理由，反对羁押和移送，强烈要求当庭开释。开庭前，法院旁听席上早已坐满了救国会动员前来旁听的爱国群众，面对法官、特务和捕房人虽，个个怒目相向。法官慑于爱国群众的声势，竟以案情重大为理由，宣布禁止旁听。旁听群众虽然被迫退出法庭，但仍聚立在法庭门外，以表示对法庭无理裁定的抗议。

开庭结果，法官在辩护律师义正辞严的要求下，终于被迫驳回捕房律师和公安局特务的请求，当庭裁定将“被告”等“责付”辩护律师张志让、俞钟骆、蔡六乘、李文杰等，保证以后开庭随传随到（记得俞钟骆和我分任沈钧儒、王造时的受责付人）。我们在受责付状上签字并完成必要手续后，就陪同4位爱国领袖昂首阔步走出法庭，守候在法庭门外的旁听群众便一拥而上，把他们团团围住，为这次法庭斗争取得的初步胜利而鼓掌欢呼。

11月24日上午，我们辩护律师去法院阅卷。下午开庭，我们为移提事又同法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我在这天的日记上写下这样一句话：“为沈王等事，在法庭上与审判官有龃龉。”

25日，公共租界捕房在特务的压力下，竟不经法院裁定，将沈钧儒等重行逮捕羁押，准备交公安局特务解往苏州。我们闻讯，立即赶到捕房，捕房竟然剥夺了我们辩护人得接见羁押中的被告的权利，不许我们进入。后来我们得知沈钧儒等又被秘密移解南市，乃急忙赶往上海地方法院看守所，要求接见被告，也被拒绝。于是我们又折回到高二分院向刑庭经办法官提出抗议，亦无效果。12月5日读报方知沈、邹、李、章、沙、王6位爱国领袖已被押赴苏州高等法院；他们于押解途中，在囚车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毕业歌》。他们这种高昂的爱国激情和不畏强暴的凛然正气，真使我感到无限的敬佩。史良于11月23日责付律师后，因回乡探亲，后又咯血，延至12月30日始自动去苏州高院投案。

关于 11 月 23 日法院开庭的情况，当天《华美晚报》和《大晚报》都有详细报道。这两份报纸我一直珍藏多年，文化大革命被两位南京来的外调人员借去，迄未归还，我至今引为憾事。

苏州高院开庭前后

1937年4月上旬，我们得悉苏州高等法院经过几次秘密审讯，已于4月3日由检察官翁赞年援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对“七君子”提起公诉，同案被告除“七君子”外，还有陶行知、张仲勉、陈道弘、陈卓（均未到案）、罗青（在押）任崇高、顾留馨（交保）7人。在南京同时被捕的救国会负责人曹孟群、孙晓村2人亦将受审。4月5日，各报披露这次消息，并摘录起诉书的主要内容：“各被告共同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依《刑法》第10条、第28条，系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6条之罪，除陶行知、张仲勉、陈道弘、陈卓等所在不明，已予通缉外，合依《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343条提起公诉。”

救国会的其他负责人和“七君子”的家属根据上述情况，通过各种关系，延请了在上海、苏州执行律师业务的27位律师，通力合作，担任“七君子”及其他几位共同被告人的辩护人，其中有刘崇佑（字嵩生，曾任旧国会议员，担任过周恩来同志在天津领导学生运动被捕后的辩护人）、江庸（字翊云，曾任北洋政府修订法律馆总裁，解放后曾任人大代表）、张耀曾（字熔西，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汪有龄（字子健，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次长，朝阳大学校长）、陆鸿仪（曾任北洋政府大理院院长，解放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顾问）、吴曾善（苏州律师公会负责人）、陈霆锐、刘世芳（曾任东吴法学院英美法教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华委）、唐豪（解放后曾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负责人）。此外，还有张志让、俞钟骆、鄂森等，我当时作为律师界的后进，也滥竽充数。

6月6日，传闻苏州高院即将开庭，在上海的救国会部分负责人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在香港路银行俱乐部4楼召开辩护律师会议，商讨案情及出庭辩护策略和要旨，历时4小时。参加者除辩护律师外，还有胡愈之、潘震亚、沙彦楷、钱俊瑞、沈兹九、彭文应等，以及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的家属沈谦、胡子婴、张曼筠、沈粹缜等。大家激于爱国热忱和对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义愤，争先恐后，起立发言，围绕着如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丑恶嘴脸，扩大宣传救国会的正义主张的作用和影响，唤起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等等要点，各抒己见。胡子婴转达了宋庆龄对本案的关切。刘崇佑、江庸、张志让、俞钟骆律师等就法律方面提供若干攻击和防御策略的见解。当时边开会，边由胡愈之走笔急书，写成新闻报道稿，会后立即送各报馆和通讯社，以便翌晨见报。会场气氛，极为热烈动人。会后，救国会还从筹得的款项中，送给辩护人每人旅费30元。

6月11日晨，俞钟骆和我带着法院的开庭通知书一同乘车去苏州。抵苏后，先到横街高等法院看守所探望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6位同志，向他们表示慰问。他们虽然过着羁押生活，但仍然精神饱满，谈笑风生。特别是那位年高德助，被称为“家长”的沈衡老，长髯飘拂，庄重慈祥，我不由回想起他老人家身着军装，与上海法学院师生一起在本校操场上和南市公共体育场上接受抗日军训检阅的动人情景。他们过着很有意义的集体生活，共同订定了作息时间表，每天早7点半起床，晚11点就寝，从早到晚读书写字，锻炼身体，从事译著，把每天的活动项目排得满满的。他们6位分住3个小房间，另有一间作为会客起坐的房间里，桌上堆满了上海、苏州各界爱国人士和群众团体代表送来的水果、罐头食品。听说不少社

会上知名人士都来看看守所探视 6 位同志，面致慰问，其中有张一麐李根源、褚辅成、黄炎培、江问渔、陶家瑶等。

6 月 11 日下午 2 时，高等法院开庭，被告 10 人（除“七君子”外，还有顾留馨、任崇高、罗青 3 位）被引进法庭，辩护律师 27 人，身着“法衣”，由刘崇佑、张耀曾、江庸、汪有龄四老领队，沿着法庭前甬道鱼贯进入法庭。审判长方闻起初宣布拒绝旁听，经“被告”和辩护律师以及聚集在法院大门外的群众的抗议后，他才被迫同意允许“被告”亲属和新闻记者进入法庭旁听。

开庭后，检查官翁赞年起立宣读起诉书，“被告”和辩护律师当即予以严正指驳。但是，庭长对于辩护律师和“被告”所提的有利于“被告”的论据 20 多点，论证“被告”等组织爱国群众团体，发表爱国言论和主张，不仅不是什么“犯罪”行为，而且是极端的正义行动，竟然以摇摇头，摆摆手的动作轻蔑地一一予以驳回。“被告”和辩护律师对此极为愤慨，当即协力同心，在陈述、举证、提问、答辩等方面使用舌剑唇枪，据律讲理，形成一条对反动法官们进行攻击和防御的坚强阵线，逼使他们特别是那位检查官面红耳赤，张口结舌，无法招架，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这次庭讯历时 3 小时以上，审判长最后宣告“明日续审”。辩护律师以阅卷和准备辩论意旨需要时间，要求延期续审，未被采纳。当晚，辩护律师在旅馆商量第二天作战方略，至深夜一时。熟悉《刑事诉讼法》的俞钟骆律师提出申请审判官“回避”的突然袭击手段，理由是审判官拒不重视，采用辩护律师所提出的有利于“被告”的证据，显系与检察官一鼻孔出气，故意偏颇，这样就可以《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依据迫使法院在申请未经裁定以前，不得不依法停止审判。我们决定采取这一办法后，当夜撰状，写状申请审判官回避，翌晨递进法院。

12 日上午，江庸、俞钟骆和我第二次去看看守所探望沈衡老等，同他们交换意见。他们对于我们昨夜决定采取的措施，报以会心的微笑。因天气转凉，承韬奋同志关心，借了一件毛背心给我。我们还去司前街女看守所看望史良同志，她正在烫发。我们对她这种从容不迫、出庭如吃喜酒的精神都大为赞佩。

当天下午 2 时第二次开庭时，因辩护律师已于开庭前代“被告”递状申请审判官回避，不及裁定驳回与否，依法必须停止审判程序。法官在庭上说明原委后，宣告退庭。

辩护律师为“七君子”撰写的答辩状，已于 11 日递送法院。这份答辩状长达 2 万多字，针对检察官起诉书内列举的十条“罪状”，逐条予以指驳。其他被告罗青、任崇高、顾留馨也分别于 11、12 日递进答辩状，各就共同部分和本人有关部分举证答辩。6 月 22 日，“七君子”又递进第二次答辩状，补陈政治意见。

23 日下午，辩护律师在上海海军青年会举行第 2 次会议，交流情况，交换意见。25 日去苏州高院出庭。这次开庭，法官易人，“更新”审理，审判长为朱宗周，推事为张泽浦、李岳，并准许旁听。10 位“被告”逐一陈述情况，下午 2 时再开庭，辩论的问题集中在西安事变与本案有无关系这一点上。辩护律师相继发言，主张必须传张学良（当时已被蒋介石扣押在南京）到庭作证。我就起诉书所指控的任崇高、顾留馨手持“危害民国”传单一点坚决要求检察官举出证据，其他律师也一齐起立，支持我的要求。检察官拿不出

证据来，弄得窘态毕露，狼狈不堪。这次庭讯，历时7小时，我在这天的日记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与检察官大开辩论，庭上空气，至为紧张。”最后，经过退庭评议后，审判长宣布，决定向南京军事委员会调阅审问张学良的案卷，再行定期开审。但自这次庭讯以后，即未继续开庭。

6月25日中午，全体辩护律师应苏州吴曾善律师之邀，在他的“小纯斋”花园住宅里会餐，张一麐先生亲临参加，对我们为爱国领袖仗义执言表示慰劳，并同我们合影留念。

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七君子”的法西斯暴行，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自从“七君子”被捕入狱以后，国内学者名流，抗日将领，以至国民党内部的某些人士，都纷纷通电营救，国际上负有声望的学者爱因斯坦、杜威、孟禄等人也联名来电表示关注。上海5千市民上书国民党当局请愿要求释放，各大城市的各种团体以及海外华侨慰问“七君子”的函电如雪片飞来。“爱国无罪”成为全国人民一致的强大呼声。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张宗麟、胡子婴、刘良模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具状苏州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一起羁押受审，声明：“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一时北平等地作家、教授、学生界、电影界，工商界都起而响应。7月5日，宋庆龄等12人自上海乘车前往苏州，请求立即入狱。这种正气凛然的行动，迫使国民党反动派更加慌了手脚。7月30日，苏州高等法院终于不得不裁定，将“七君子”交保开释。当即由张一麐李根源、陶家瑶、张一鹏等出具保状后，31日下午“七君子”在群众欢呼声中走出看守所；同案被押的罗青，亦同时保释。沈衡老对新闻记者说：“今天步出狱门，见抗敌之呼声已普遍全国，心中万分愉快，当不变初旨，誓为国家民族求解放而奋斗。”

此案距今已40多年。当事人多已作古，出庭辩护的27位律师，也多已谢世。作为一个见证人，仅就记忆所及，草为是篇，借以表达对各位爱国领袖的敬意。

半个世纪的囚徒张学良

张学良监禁之谜

张严佛

- 张学良神色不安下飞机
- 12月26日幽禁开始
- 军统局执行监禁任务
- 刘乙光其人
- 一字一泪，尽情倾泻满腹幽怨
- 释放乃空话一场

张学良于1936年12月25日自西安送蒋介石到达洛阳，26日到达南京，一下飞机张就被军统局监禁，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关于他的囚禁生活，我不完全清楚，但张学良开始被监禁，以及1946年11月由重庆解到台湾，都是我计划执行的，现就回忆略述如下：

—

1936年，我在南京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局前身）担任书记长。12月24日，戴笠从西安回南京来了，晚上9时，戴笠在鸡鹅巷53号找我和军统局特务队长刘乙光去，他非常高兴，一边笑，一边很严肃地对我们说：“张学良将于明（25）日送委员长到南京来，我已经和宋部长商量好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学良到南京的消息千万不可张扬出去，你们要特别注意。”他又说：“乙光赶紧在特务队挑出一个人来，要机灵可靠的、仪表好的，都穿蓝色中山服，佩带二号左轮，由乙光带到宋公馆去，看守张学良。”

25日下午5时，消息证实，蒋介石已经由西安到达洛阳，住在洛阳西工第一军分校，因天晚，改于26日回南京。张学良同蒋介石一起到洛阳的消息，经蒋介石面嘱洛阳军分校主任祝绍周并经祝绍同来电和戴笠取得了联系，严密封锁了消息。晚间，戴笠又找我同刘乙光去，他说：“委员长决定明日先到，飞机在明故宫飞机场降落。十分钟后，张学良的飞机到达，他们都到飞机场去照料，宪兵方面，乙光去和他们联络好，派一排人到飞机场警戒就行了。委员长离开飞机场后，除宪兵和特务队，任何人都不准在机场逗留。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和宋部长的汽车直开宋公馆，乙光带便衣警卫坐警卫车跟在后面。”

26日下午3时，蒋介石飞抵明故宫机场，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何应钦等簇拥去，只有戴和我们少数人还留在机场，宪兵特务重新布置了警戒，10分钟后另一架飞机到了，张学良神色不安的下了飞机，即由戴、宋两人拉扯着上汽车开走了。我到飞机场去是对张学良执行扣押任务的，自觉同他打照面最好，于是混在宪兵特务人群里，没有同他见面。这就是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到达南京在北极阁宋子文公馆被军统局幽禁的开始。此后，从1936年12月到1949年，军统局一直派刘乙光看管张学良，没有换过第二个

人，原先是戴笠指派的，由于刘乙光长年累月执行看管，毫不放松，并且把张学良的思想、生活以至片言只字点滴不漏地经常向军统局和蒋介石作了详尽汇报，从而得到了军统局和蒋介石对他的绝对信用。1946年戴笠毙命之后，就由蒋介石直接指定刘乙光继续看管下去，不准换别人。1940年，刘乙光升为军统局少将专员，除了几十名便衣特务，还有一连宪兵归刘乙光指挥，特务担任内层看守，宪兵负责外围警戒。张学良所在地划为禁区，与外界隔绝，不准老百姓接近和通过；入夜，围绕张学良的房子，通宵不离宪兵岗哨和便衣特务来回巡逻，窥伺室内动静。

张学良被关押后，张夫人于凤至同他住了一个时期，1940年张夫人和子女到美国去了，一直没有回国。从这个时候，经常同张学良住在一起，换上了赵四小姐，他们实际是夫妇，张学良却叫她四小姐，一般人也就这么叫。生活食用方面，抽烟喝酒，添购什物，不受限制。宋子文、宋美龄和张的亲友，不时还送他一些日用品、香烟名酒之类，通过特务检查，也可以和外面通信。国民党要人宋子文、吴鼎昌、陈仪、张治中、莫德惠等，有时去看望张学良，但当他们去看望的时候，特务跟着坐在一旁，名为照应，实际是蒋介石和军统局规定的暗中监视。1947年10月，张学良对我说：“1945年在贵州，莫德惠来看我，住了几天，老戴（指戴笠）派特检处长李肖白陪老莫来的，老莫和我一起，李肖白寸步不离，惟恐我同老莫谈私话，你想，我和老莫有什么可说的？我还能希望他些什么？”蒋介石吩咐戴笠搜集了不少书籍，其中大部分是线装书，供张学良阅读，也订有《大公报》、《中央日报》和经过审查的外国杂志画报等等，只是不准看马列主义进步书籍和当时的《新华日报》。张学良押在贵州、台湾时期，军统局派特务周念行等冒充学者同张学良住了一两个月，名之曰讲学，辅导张学良研究学问，实际是进行思想考察。又戴笠、宋子文都三番五次去探望过张学良，有时还住一两天进行考察。戴笠对张学良说：“派刘乙光跟你一起，是为了保护你的。”蒋介石不同张学良直接通信，却叫宋美龄写信给张学良并且馈送一些日用品衣物之类以表示关切。张学良被准许离禁区3、5里范围内散步、游泳、钓鱼、打网球等等。但张学良很少出来散步，他说：“每逢我出去散步，警戒森严，前后左右，都是宪兵、特务，他们提心吊胆，惟恐出事情，实在太紧了，也太麻烦。”张学良囚禁之初，一向跟他的随从副官和一个女佣还跟在他和赵四小姐身边，到了1946年冬，副官和女佣都被强迫弄走了。从1937年起，张学良由浙江莫干山、安徽黄山、湖南沅陵凤凰山、贵州修文县、开阳县、桐梓县等地辗转关押，在贵州境内有7、8年之久，1946年11月由桐梓赴重庆转解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继续监禁。

二

1946年11月，我在重庆担任军统局结束办事处主任，南京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来电称：“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

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湾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负责起解”等语。随后刘乙光到了重庆，我和他商定：“张学良到后，住在重庆西郊歌乐山松林坡戴笠生前的寓所，我指派办事处保管组长侯楨祥、警卫组长庞进祥协同刘乙光看守。同时，我派总务组长郭斌向航空委员会交涉由重庆直飞台北市的巨型专机。张学良由桐梓来重庆解台湾的消

息，对外封锁。因此，刘乙光押解张学良由贵州来重庆时，在离重庆市 30 里的九龙坡渡口过江，汽车不经过重庆市，以免被人发觉，张扬出去。一面对张学良诡称：蒋介石有电报来，送他到南京去，不把解往台湾的实在情形告诉他。松林坡戴笠生前寓所，隐僻幽静，附近没有居民。关于张学良到重庆后的生活，我指派侯桢祥专门照料。张学良到达松林坡住定后，我同我的爱人李兴黄邀同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主任李觉和他夫人何玫以及军统特务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徐远举等，去陪同张学良、赵四小姐打湖南纸牌、扑克，玩了三两天。张学良在重庆住了一个星期，专机已经交涉好了，决定起飞前夕，我到松林坡面告张学良：“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日拂晓，在离重庆 60 里的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直飞南京。”张学良信以为真，相当高兴。刘乙光向我说：“跟在张学良身边的×副官是他的心腹，又和宪兵厮混熟了，妨害看管，不能再让他到台湾去，明天动身之前，请你把这个人留下。”我同意了，立即指示侯桢祥、庞进科照办，并令把他押在军统局渣滓洞看守所。我为了欺骗张学良，防有意外，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就和我的爱人李兴黄赶到白市驿飞机场照料，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伪称来送行的。

三

1947 年 10 月，我在南京保密局担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局长郑介民、副局长毛人凤某天找我去，郑介民说：“张学良现在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他同刘乙光搞不好，闹情绪，而刘乙光的老婆又有神经病，夫妻吵闹；这个女人，还同赵四小姐处得不好。刘乙光已经把她送到台北市进医院去了，他要求请假一个月到医院去照料病人，也想借此休息一下，缓和他和张学良之间的空气。你与王新衡过去和张学良还好，但王新衡现任上海站长，不能抽身，打算派你去陪张学良住一个月，并对他进行考察（实际是派我去接替刘乙光看管张学良，怕我不肯去当看守，故意说得好听一些）。”我这个空头设计委员会主任，正无事可做，又跟毛人凤呕气，闷得慌，借机会到台湾去一趟也好，就答应了。郑介民叫总务处长成希超，准备美国货“加利克”牌香烟一巨听，白兰地酒一打以及其他食物，作为郑介民和我的礼物送给张学良。我由上海坐飞机先到台北市和刘乙光见了面，第二天坐火车到新竹，然后坐火车进入山区到了井上温泉张学良被监禁的地方。那里是高山族聚居之地，树木参天，峰峦起伏，风景优美，温泉硫磺质的，最适于疗养，井上温泉就以此得名。张学良连同刘乙光和一百多人所住的房子都是原先招待游人旅客疗养的住所，有网球场和温泉浴室，在那里两山之间还有一座铁索桥，面对高山，下横流水，足有四、五十丈高，十分壮观。我到后第二天，刘乙光就赴台北市休假去了。关于张学良的看守警卫日常工作，我叫刘乙光交给他的一个助手多负实际责任，以便我腾出工夫来和张学良攀谈进行考察。刘乙光暂时离开了，换上一个伪善者，张学良思想上稍为松了口气，比较高兴一些。刘乙光走的那晚，我在张学良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尽情倾泻了。他谈到了 10 年期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到了十几年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妻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抱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一字一泪，痛哭不止；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当晚，我们谈到深夜，足有 4、5 个钟头。第二天早饭后，我又到张学良房子里去，他用毛笔在信纸上写下了夜来他自己作成的一首诗交给我，他说：“你这次来

算是难得，这首诗就留作纪念吧！”诗是这样写的：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

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上款写严佛兄存念，下面写张学良敬赠。我在井上温泉1个月，张学良同我所谈的话，已经记不完全了，我现在把印象深一些的写出来。张学良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10年，无话可说，但10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我心中不平，希望你回到南京把这些话告诉郑介民，就说我要求你转达的。”他说：“老戴、老宋（指戴笠、宋子文）当初都对我说：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闭门修养，研究学问，派刘乙光是保护你的，为了你的安全，不得不如此，你尽可以在屋子里看书，也可以到外面去散步、打球、游泳、钓鱼，刘乙光不得限制你，我相信老戴他们的话，不应该是骗我的。但10多年来，刘乙光就把我张学良看作是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我们一到台北，陈仪主席陪我们来到这里，他当着刘乙光对我说，这个地方是委员长来电叫他找好的。我现在的几间房，光线、太阳和建筑都比较好，外面有宽阔的走廊，因为我不好随便到外面去，有了走廊，早晚可以散步，也可以看书报，免得刘乙光他们时时为我操心，岂不很好，而现在刘乙光一家住的那几间房，背着太阳，比较阴暗。陈仪交代刘乙光说，光线好的房间，给我住，刘乙允满口答应了。但陈仪走后，一转眼间，刘乙光就变了卦，他夫妻儿女竟占住了我现在所住的这几间，硬叫我和四小姐住在那边房，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只好忍受了。幸而不几天，陈仪又来看，他觉得刘乙光做的不对，叫他把这几间房让给我们住。初来的时候，有两名下女，陈仪雇来照料我和四小姐的，不几天，被刘乙光打发走了。十几年来，夫人（指宋美龄）和亲友送给我的东西，经常被刘乙光夫妇克扣，有时被截留一半，有时竟全部被没收了，与来信所写的对不上数，刘乙光公开大胆地这么干，被我们发觉了，他仿佛没有这回事，毫不在乎。我怕为了这些事和他们夫妻闹翻了，更受罪，只好不作声。我们每次吃饭，刘乙光一家6、7口，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都同我们一桌，他们吵吵嚷嚷地抢着吃。这些事不值得一谈，可是搞得太脏了，我同四小姐几乎每顿都吃不下饭。刘乙光的妻子有时还指桑骂槐地骂小孩，而暗地却是骂四小姐。可好，你来了，刘乙光一家暂时离开了，我们也可以吃几顿清爽饭，你看这样好的菜饭，难道是专为刘乙光一家预备的吗？这些，十几年了，我都向谁说去？”张学良说：“今年2月台湾人闹事（指1947年‘二·二八’事件），刘乙光也紧张起来了，那几天，他恶狠狠地盯住了我，好象要把我吃下去，话都不和我说了。他指挥宪兵特务不分昼夜，加倍警戒，如临大敌，宪兵特务来回不停地在我屋子周围巡逻，并向室内窥伺动静。深夜了，我还听见刘乙光同他的部下时而嘈杂喧嚷，紧急集合，时而又蹑手蹑脚地窃窃传话。总而言之，是一种应付非常事件的可怕现象。就在这个时候，刘乙光的部下和宪兵方面有人偷偷告诉我说：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为了防止我越狱逃跑和台湾人民把我劫走，他就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则称为台湾乱民前来劫狱的罪名。我实在不甘心，你不要以为我对你说鬼话，刘乙光的部下与宪兵有大部分人我都掌握得了，他们都会听我的话。

那几天我老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对我下毒手，我还是引颈就戮呢，还是我先下手把刘乙光杀了，或者我也同归于尽，都是我所极不愿意的，我张学良就这样的下场吗？准备混乱中把我打死。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够同你在这里见面。”张学良说完这段话，感情十分激动。我看他对刘乙光恨极了，也看不起刘乙光。我反问张学良：“你凭什么可以掌握刘乙光的部下，他们同你通声气，刘乙光能坐在鼓里？”张学良觉得说话走了口，有些后悔，于是他又说：“象刘乙光这个蠢才，他平日对待部下那样刻薄，一味死扣，加上他那个又蠢又恶的老婆，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两个人都那么狠，还能够得到部下心服吗？我张学良真要同刘乙光拼，我还拼不过他？这里面情形，我不应再向你说不下去了，我想你够相信我的，张学良决不是因为有了刘乙光看管我，才不敢越狱逃跑，才不寻什么短见！碰上了刘乙光不过多受些闲气，本来就算不得什么。我不把你当部下，你还有你的身份，算我们还是朋友吧，过去的事不过向你谈谈，消消气算了吧！”

以上是我到后，张学良头次向我倾吐的话。往后，张学良同我谈到了当前的时局，他说：“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带兵官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那时正当陈诚到了东北，提到陈诚，张学良就非常厌恶，他说：“陈诚到东北去，等于火上加油，更糟，东北的颓势，决不是陈诚可以挽回得了的。”张学良不止一次和我谈到了陈仪，他说，到了台湾后，陈仪看过我几次，对我非常关切，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我父亲向来敬重他的，我看他比较正派。”1947年2月台湾人民起义时期，省府主席是陈仪，但我到台湾从各方面了解，台湾人民并不恨陈仪，而对于执行血腥镇压的台湾警备总司令彭孟緝，则恨之入骨。当时台湾民间有这样一种传说：“一代不如一代”，指的是魏道明不如陈仪。我到台湾的时候，正是魏道明接替了陈仪当台湾主席。因此，张学良同我谈到了魏道明。他说：“魏道明是一个十足的傀儡，他完全受他的老婆郑毓琇摆布。很多人知道宋美龄受孔祥熙老婆宋霭龄的操纵而在幕后左右政局，却不知道郑毓琇还在幕后操纵宋霭龄。”我在井上温泉的时候，张治中先生偕同夫人、女儿看望了张学良，在那里吃了一顿饭，他两人谈了两三个钟头，我避开了，不晓得他们谈些什么，事后也没有问张学良，倒是张学良和我谈起了他的四弟张学思，他说：“老四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期生，当时军校教育长是张文白，因此，老四是张文白的学生。”他说：“张文白和我谈起老四，张文白说：‘张学思是你的兄弟，他逃跑了，你也有责任。’我说，‘老四是你的学生，你教出来的，他逃跑了，与我有什么相干’。”张学良说：“我相信老四，他是有前途的。”张学良以十分关切和怀念的心情不止一次同我谈起了张学思。我在井上温泉一个月，同张学良谈做诗，谈明史和历史上的人物，也同他打网球。他的饭量少得令人吃惊，经常每餐大半小碗，最多一小碗，饭后吃水果则特别多。他几乎完全秃头了，牙齿很坏。赵四小姐则满口都是假牙。1947年张学良不过47岁，看来他的身体在长期囚禁生活中，已经拖得很坏了。我到南京后，把张学良和我的谈话以及我对他的考察所得，连同张亲笔写给我的诗报告了郑介民，并由郑特报了蒋介石。

1947年12月，刘乙光到了南京，他见过蒋介石后对我说：“张治中到台湾同张学良见面，委员长很不高兴，当面吩咐我，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人不准去看张学良。”1949年春，蒋介石在南京被迫下台回到奉化，代总统

李宗仁曾经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所有的政治犯。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企图借此收买人心，也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可是蒋介石坚决不同意，所谓释放张学良落得空话一场。

· 张学良南京受审纪实

鹿钟麟

- 老蒋幕前一套，幕后一套
- 组织高等军法会审，李烈钧受命任审判长
- 张学良神色自若，直言不讳
- 老蒋交下来判决书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蒋介石终于接受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内战不再发生等条件。同月25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飞返南京。

蒋介石和张学良到达南京后，都对记者发表了谈话。蒋发表的谈话说：“……现在一切问题应候中央政府解决，余既为军队之最高统帅，对于西安事变，理应负责。此系由于余平时未能维持军队之纪律有以致之；私心至为耿耿……”张发表的谈话说：“今日仅愿与诸君见面，无可奉告。此来待罪，一切唯中央及委座之命是从。”

当时可见，西安事变虽取得和平解决，但是从蒋、张所发表的谈话看来，其中还大有文章，耐人寻味。蒋介石对张学良究竟怎样处置？一时便为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所注视。

当时国民党内部，对张学良的处置问题，显然存在两种意见：一派主要是属蒋嫡系的人们，认为张劫持“领袖”，罪大恶极，主张严加惩治。另一派主要是非蒋嫡系的人们，认为张既肯来京待罪，非无可宥，不妨从宽发落，这两部分人们的意见，从表现的方式上看，也有所不同：前者到处公开叫嚣，大有非此不可之势；后者多属私下议论，对外却都讳莫如深。此外还有一部分人，则模棱两可，严加惩治也罢，从宽发落也罢，好象都无可无不可。

当然这些人们的意见，无足轻重，不足为凭，只有蒋介石的态度，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的。蒋介石对张学良是幕前一套，幕后一套，的确令人眼花缭乱。虽然幕前看到的都象是大仁大义，宽大为怀，可是幕后所干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固然直接与其为人有关，主要还另有原因，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置，实有其难言之隐。一方面，在他离开西安之前，宋子文和端纳曾得到他的首肯，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这项诺言，几为人所共知，情势所迫，难以出尔反尔，不能不装出大仁大义，宽大为怀的模样。一方面，因为西安事变，使他感到个人“威信”扫地，且受尽惊惶，吃尽苦头，对张学良怀恨很深，戒心很大，极思乘机给以报复。西安事变以来，对张学良的处置，一直就是被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所决定。关于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的一幕，看来好象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来讲，无非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而且这套把戏不久便大白于世了。

蒋介石和张学良到达南京的当天，张即给蒋上了一封亲笔信，原信写道：“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罪，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肃敬叩钧安。”蒋旋即根据张的这封信抄同原件分呈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原呈写道：“谨呈者，此

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府）予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乞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所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遁免，现该员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以中正为所直属上官，到京后即亲笔具书，自认违纪不敬之咎，愿领受应得之罪罚，中正伏以该员统军无状，尚知自认罪愆，足证我中央法纪之严明，故该员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理合将该员来书录呈钧会（府）鉴核，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

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为处理西安事变有关事项，首先举行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由居正主席，即席表示欢迎蒋介石平安旋节的意思。蒋遂将西安事变的经过，作了简略的报告。然后就西安事变解决后应行结束事项，作出一系列的决定。最后提出蒋介石的“为西安事变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免去……本兼各职案”。结果通过了这样一篇充满阿谀逢迎的决议，说什么“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听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两度入陕，即以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接着举行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仍由居正主席，讨论的主题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移送军事委员会委员蒋中正，呈为张学良亲来都门，束手待罪，应如何办理请裁夺案”，并未作何讨论，即作出决议：“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当时，席间有不少人争相发言。异口同声地说：“国家以法令纪纲为重，主犯即同来，应开军法审判，以治其罪。”于是，在决议之外，还作了一项内部决定：推李烈钧为审判长，组织高等军法会审，饬军事委员会遵办。使人很自然看出，这一系列的布置，显然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同时也极易看出，这完全是奉蒋介石的“意旨”行事。

国民党中央散会后，军事委员会即呈请国民政府特任李烈钧为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的审判长，主持张学良案的审理，并令克日进行工作。接着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由冯玉祥主席，宣布开会理由说：“西安事变，全国震惊，中央既命组织高等军法会审进行审理，审判长已经任命李烈钧委员担任，审判官二人的人选尚未决定，究应如何处理，请各位发表意见。”何应钦首先发言：“关于审判官人选，应当尊重审判长的意见。”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同意。李烈钧在敦促之下，就与会人员中提名朱培德、鹿钟麟二人担任，并且说道：“朱系云南讲武堂高材生，鹿乃驱逐溥仪为张垣久共患难者，此二人烈钧知之有素，足堪胜任。且二人功在党国，又皆属陆军上将，尤为适当。”冯玉祥即席对李烈钧所提名的审判官人选发表意见，对提名朱培德首先表示赞成，对提名鹿钟麟则主张另推。而李烈钧坚持原议，并且说道：“此案重大，应使天下之人共见之，必须得北方之贤达参与审判，乃有价值。”经与会人员的一致支持，最后始得通过。冯玉祥所以作如此的表示固因鹿为其旧属出于谦逊，但这与当时他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处境也有关，且窥出组织高等军法会审无非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而已，别人徒供利用。散会后，军事委员会又由该会军法处调出军法官陈恩普、邱毓楨及书记官袁祖宪、郭作民，参加高等军法会审工作。

李烈钧受命后，即开始进行筹备。首约集朱培德及鹿钟麟，商讨了一切应行决定的事项；次召见陈恩普、邱毓楨、袁祖宪、郭作民，指示应行注意

之点及所负的责任。此外，复邀前任最高法院院长徐元浩及法律专家学者 20 余人，征询意见。其中徐元浩争先发言，说什么“委员长有伟大功勋于党国，全国人民，莫不景仰推戴，而张学良等在西安，非特不能护卫，竟敢威迫统帅，勿论其为正犯，抑为从犯，其为要犯无疑，斯事异常重大，应请审判长严予处置。”经过这样一来，别人都不便再持异议，纷纷随声附和，即告结束。

李烈钧受命主持这次高等军法会审，不会不明白蒋介石耍什么把戏。因此，他对朱培德保持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处处表示自己对这个任务的认真负责。他对鹿钟麟则不然，暗中一再露出没有信心，并且偷偷问过鹿：“瑞伯，这件事您看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办才好？”鹿曾答：“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我们应该力守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李一边点头，一边称是。

在高等军法会审开庭的前一日，即 12 月 30 日，李烈钧为此特往谒蒋介石请示。据李述当时情况，蒋见李至，先开口问李：“审判长对这个案子如何办理！”李坦率提出他个人的意见，说道：“张学良在西安似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意图，但能俊改，亲送委员长返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而释之。”至此李又逼进一步，说道：“我国昔有两士，一为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二为寺人披请见，此二者是否可作本案参考？尚祈核示！”而蒋听后的态度很冷淡，未作任何表示。李见话不投机，不得要领，忙把话头转过来：“国民政府既任烈钧出任审判长，一切当依军法办理。”蒋这时才说：“君慎重办理可也。”谈到这里，李便乘机辞出。

自从李烈钧出任审判长主持高等军法会审的消息传出后，一时李家门庭若市，不少所谓党国要人前来访问对张学良案处理的意见。当时据李说，其中特别是宋子文、傅汝霖二人最为关心，一再流露出请求为张缓颊的意思。

31 日，高等军法会审假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大法庭开庭。上午 9 时以前，李烈钧暨朱培德、鹿钟麟即陆续到达，军法官陈恩普、邱毓楨，书记官袁祖宪、郭作民早在此等候。李见参加会审的人员到齐，乃于休息室召开预备会，就军事委员会军法处预为拟妥的审问要点逐项交换意见，大体没有什么异议，只其中照例要问的几项，如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等，鹿认为对该案说来似嫌过于形式，为照顾事实，且免得张难堪，提出可否省出不问，径代填上，李颇以为然，当即采纳。至 10 时整，李偕全体会审人员走进法庭，分别入席。坐定后，李命鹿先至候审室巡视。当时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已在该室听传，鹿和张相见，先与之握手，继说：“汉卿，今天开庭，有话尽管说！法庭内不许携带武器，如身边怀有武器，可放在外边。”张答：“是的，身边并无武器。”鹿接着说：“好，请稍候。”鹿即返庭复命，回入原席。李旋宣布开庭。张学良被带进法庭，含笑直趋案前，李以张为陆军上将，所犯又属未遂，特赐以座位，而张则始终鹤立，没有就座。开始只就西安事变经过事实进行问答，共计八项。之后，李问：“你何以竟敢出此举动？”张答：“完全出自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要求。”李问：“你知道你的这种举动是为国法所不容吗？”张答：“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条款。”李给张看了陆海空军刑法，并给他提出所犯的“胁迫统帅”有关条款。然后，李问：“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抑自己所为？”张答：“完全出于我个人所为，自作自当，我决非任何人所能指使的人。”进行至此，张忽谓：“现在我想问审判长一句话，可以吗？”李答称：“可以。”张谓：“民国二年，审判长曾

在江西举兵申讨袁世凯，有无其事？”李称：“有。”张谓：“申讨袁世凯是否为了打倒专横独断呢？”李称：“正是。”张自负谓：“我在西安的所为，正是对中央的专政独裁，冀求有所谏正耳。”李叱责称：“胡说！委员长人格高尚，事业伟大，岂袁世凯所能望其项背？你不自省冒昧，演成西安事变，自寻末路，夫复谁尤？”朱培德及鹿钟麟见到双方渐趋僵持，又以李素患高血压症，遂请李宣布暂时退庭，陪李至休息室稍憩。顷刻之后，继续开庭，李正颜厉色地告张：“你在西安所为的根本目的究竟何在？是否有颠覆政府的意图？应该据实招供，否则，将会对你不利……”至此鹿打断李的话，插言道：“汉卿，审判长待人宽厚，你非不知，切勿失去这个良好的机会！”张称：“是，是。”李接着告张：“委员长勋业彪炳，待人宽厚，你何以会出此大不韪的举动？快快说来！”张直言不讳他说：“我在西安发动事变，确有颠覆政府的意图，而根本目的仍无非要求委员长团结御侮抗日救国。”李追问：“既然如此，又为何亲送委员长返京？”张接着说：“我在事变中，看到委员长的日记，从日记中看出委员长被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及恐日病等分子所包围，其本人还不是没有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想法，且委员长又答应了我所提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目的既达，个人得失，在所不计，特随节来京待罪，请给以应得的处分！”进行至此，遂宣告结案。书记官将记录呈李，李阅后对张说：“今天你所招供的话，都记录上来了。现在给你看一下，其中如有错误之处，可提出更正，如无错误，即签字缴回。”李把记录递给张，张看完对李说：“没有错误的地方，无须更正。”张签字后缴回。李将记录签署并交由全体会审人员传阅，分别签署后，便送请蒋介石核示。计算时间，恐尚未寓目，蒋即把军事委员会军法处根据此授意预为拟好的判决书发下，命令宣布判决。

宣布判决后，即由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将判决书连同早就备好了的呈文，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名义报请国民政府核示。翌日（元旦），国民政府以第一号指令照准。

高等军法会审退庭后，李烈钧以张学良在法庭上，神色自若，直言不讳，侃侃而谈，私下曾向人称道：“不愧为张作霖之子。”

当高等军法会审对张学良案按蒋介石交下的判决书“照本宣科”宣布判决后，紧接着蒋介石又迫不急待地罗列了一大篇理由，呈请国民政府，为张学良请求特赦，原呈这样写道：“呈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事变，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凛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10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自当，从轻减处，已见宽法。中正负疚在假，本不改有所陈读，惟念论事当究其所极，执法不害于施仁，国家设刑典所以做凶顽，立赦条所以待俊悔。此次该员中于荧惑，大触刑章，变讯传播，举国骇愤，若其遂过估改，竟复逆施冥行，在国家固不难制裁，然元气必更以耗竭，尚幸迷途迅复，悔祸及时，观此亲向中正涕泣自白，知良知激发，尚以国家为重，因一念转移之故，掇全局祸福之机，酌理原情，似宜上邀宽赦。当今国家多艰，扶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力富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倘复加以銜勒，犹冀能有补益，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迁善向上之路。昔我总理惩乱嫉恶，投法必严，而宥过施仁，涵容益大。中央矜恤育辜，当更使天下感动。为此不避罪嫌，贡此愚谬，敬恳钧府俯念该员勇于改悔，并格遵国法，自投请罪各情形，依据约法，更沛仁施，

将该员应得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要示逾格之宽仁。是否可行，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施行。”

蒋介石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于高等军法会审宣布判决后两小时，即当日下午2时送达国民政府。翌日（1日）上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便发交司法院核议。司法院顾不得新年休假，马上做了一番“虚应故事”的核议，当然不会持何异议，当日即以“尚属可行”呈复国民政府。新年休假期满，4日上午，林森召开国民政府委员会，出席的有：王伯群、邓家彦、马超俊、李文范、经亨颐、陈立夫、叶楚傖、宋子文、李烈钧、张继、冯玉祥及王正廷等。列席的有：居正、戴传贤、魏怀、吕超及陈其采等。由林森将蒋介石为张学良请示特赦的呈文连同司法院的核议，提出做了说明，旋付表决，一致通过准予特赦，并于当日下午由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张学良处10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

从此，张学良虽被特赦，而蒋介石却以“严加管束”为名，把张无限期地拘禁起来，剥夺了自由。所谓高等军法会审只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

张学良囚居秘闻

佚名

- 军情紧急，看管队迁徙不定
- 戴笠造访，密谈后心情愉快
- 待遇高出杨虎城 10 倍
- “保护”“监视”，亦步亦趋
- 闭云野鹤，皈依基督
- 埋首苦读，成权威明史专家

离开溪口踏上征途

那次看管队移动的目标，是往安徽黄山，在那里住了没有多久，即转到江西萍乡，嗣后再由萍乡移到距衡阳约四五十里的湖南郴州，更由郴州移到沅陵。最后又由沅陵到了贵州修文，因为息烽的名头大，而且也距离修文不远，日后人们就说张学良住在息烽。

在迁移过程中，卫队一行阵容庞大，行车颇不便，通常由一辆满载宪兵的车子作为开路的先锋，由它在前面行驶，并由应副官坐在那辆车子里指挥一切。后面跟着两辆卡车，上面架着对空高射机关枪两挺，以防日机的低空扫射；再后面是张学良和孙秘书乘坐的保险车，车上坐着两名队员，担任保护。

别的车都有司机，唯有张少帅自己坐的这部车子没有司机，由张学良自己和秘书轮流开车。此外，后面一辆小包车，坐着刘秘书、于凤至和王妈。

这位王妈，人真好极了，大伙都称呼她“王奶奶”，是于凤至娘家陪嫁过来的人，一天到晚笑嘻嘻的，从来没看见过她发愁！于凤至夫人根本就离不开王妈，有关她个人的事，都要由王妈招呼着。

在行驶途中，张学良有一次问孙秘书：“你带几支手枪？”“两支。”张少帅说：“好！给我一支。”孙氏就随手递给了他一支。以后刘秘书知道了此事，很不高兴。

此次迁移居处，依照任务分配，刘秘书负有总责，孙秘书专门负有保护张学良的责任。所以，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与张先生总是寸步不离！

在行车时，张学良也开车，如果换人时，张学良便注意道路两旁的情形；如果换上了他开车，他一定交代侍从要“注意旁边”。

在刘秘书那辆车子以后，跟着三四辆小包车，由队员们分别乘坐。那些小包车之后，又有十二三辆大卡车，由宪兵们乘坐，以资保护，堂堂行列、浩浩荡荡。

黄山小住后又迁萍乡

住在黄山的几天时间内，南京方面与黄山的长途电话，一直通着。直到蒋介石要离开南京往汉口去，并派出唐生智负保卫南京的责任以后，电话才不通。这一趟在黄山住了前后不到 10 天功夫，时间虽然短暂，玩得倒是十分痛快。在黄山脚下有一条小河，河里盛产鳊鱼，有一天张少帅感到无聊，提议去捉鳊鱼，并且照着黄山当地人捉鱼的办法，大家忙了半夜，居然满载而归。那办法是：先用石头在河畔堆起来一个圆圈，特别预备一个缺口，在石圈中间撒下许多用菜油浸过的白米，静候鱼儿入圈。一伙人在傍晚把石头堆好，撒下米去，张少帅也亲身参加。等到第二天一大早大伙又赶到河畔，先忙着把缺口补好，然后再向石头圈里去摸鱼，果然已经圈住了十几条鳊鱼，而且还有很多黄鳝。

看管张学良的卫队原以为在黄山可以多住些时候，所以于住进段祺瑞的别墅之后，就把从溪口出发时借来的小汽车，和保安处派来的那两部安装高射机关枪的大卡车，以及几部不适用的车辆，一概都归还了原借的机构，连宋子文送来的一辆保险车都原物奉还了。所留下的，只有张少帅自己的一辆篷车，和另外一部漂亮的小汽车，这辆车子也是宋子文派来的。另外，由屯汉公路局借来的 8 辆卡车，仍旧留用。

不料因为军情紧急，突然接到戴笠的一封电报，让张学良立即离开黄山，移往江西萍乡暂住。刚刚安顿好了，马上又要踏上征途，这么一来，交通工具又发生了问题。这时南京业已失守，黄山附近的情况，也渐呈混乱，看来是非走不可了，刘秘书等人决定找当地的县长去商量。

向清大的教授借房子住

黄山小地方那位县太爷看见这一行人神秘秘的，也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只记得蒋介石亲自同刘秘书通过长途电话，在他心目中，自然认为刘秘书的来头一定不小。刘秘书跑到县政府去打商量，县长对于这位神秘要人，哪敢怠慢，立即承应找车，不到两天，已把所需要的车辆征集好了。在这数天内，黄山附近的治安很坏，山下时常有抢案发生，山上由于警卫严密，没发生任何事故，不过晚间因为没有电灯设备，四下昏黑一片，无形增加了恐怖和不安气氛。车辆既已找妥，警卫队员巴不得早日离开。张学良对于自己的行动不能作主，上面有命令来，说走就要走。

到了萍乡，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要替张少帅物色一所合适的房屋。萍乡是一个不大的县份，实在找不到合用的处所，找来找去，毫无办法，结果发现城内有一间旅馆还比较可用，便通知当地县政府，要所有住客全部迁出，这样才算勉强地暂住下来，但是担任警队的那一连宪兵，还是容纳不下，迫得要在附近民房里另找住处。

暂且住定以后，又忙着派人四下去找房子，找了三四天，居然找到了一处。那是在距萍乡城三四华里之处，有一栋石建的两层楼小洋房，闹中取静，环境非常幽雅，房子虽然小一点，倒也勉强合用。房主人姓李，是位北平清华大学的教授，只有老夫妇俩带着一个女儿住在那里。秘书与房主人一商量，这位老教授非常通情达理，马上说，我们正寂寞得很，欢迎你们来住。于是老夫妇俩和女儿便自动搬到楼下一间小房里去住，把全部房子都让了出来。

一行人浩浩荡荡搬进去后，张学良、于凤至、刘秘书和孙秘书，都住在楼上，队员们住在楼下。宪兵们还是住不下，仍然要在附近另外找房子。

李教授是萍乡人，能说一口流利的国语，那位千金，年纪不过十七八岁，青春活泼，和于凤至很谈得来，慢慢地成为这个小集团中仅有的来宾，时常参加他们的游戏，给整个团体增加许多轻松气氛。

于凤至夫人因为喜欢听流行歌曲，随身带有一架留声机，和许多唱片，时常放唱片消遣，那位李小姐也能唱歌，对于唱片，倍感兴趣。最初，她是给于凤至写字条，要求她把某一张唱片多放两次；后来，于凤至在不听的时候，索性就借给她去听。

赶流行拍彩照解闷

住在郴州山上那段期间，侍从人员最伤脑筋的是水果的来源特别困难，除了长沙橘子外，其他的什么水果都运不到，至于外国水果，更是无法购得。为了这件事，他们曾经特地派人到广州和香港去买整批的水果运回郴州来。因为张学良在每顿饭后，必须吃一点水果，否则他会感觉这顿饭好像吃不舒服。

侍从人员和张少帅有时也玩玩照相机，因为于凤至带有一架最新式能拍彩色片的摄影机，那时候彩色片在中国还不怎样流行，他们住在山上，却先得风气之先。那架彩色照相机的长处是一切都是自动的，当它接受“感光”的刹那间，对于“距离”、“光圈”、“快慢”等，完全自动对好，只要照相的人用手一按开关，立即把景物摄入。它的短处是胶卷在中国还设法冲洗，必须整卷寄到美国去。张学良等人照过很多有趣的相片，其中人物先后有：莫德惠、张学良、戴笠、郑介民、伊雅格、于凤至、赵四小姐，以及刘秘书等人，甚至连那位家住萍乡的李小姐，讲古文的吴老先生也都包含在内。可惜寄到美国去冲洗的底片，从来未见有寄回来过，可能是被检查的人扣起来了。

幽居郴州，更是闷得生厌，张学良性情原是好动不好静，但自从离开溪口以后，在情绪上一直鼓不起劲来，迁到郴州后，除了刚搬上山那些天，游山打猎外，渐渐就不想外出了。张学良的这一转变，似与他的连连不得恢复自由一事有关。当七七事变发生之后，随从一班人都认为张少帅快要恢复自由，他自己虽然不作任何表示，但随从人员可以从他那种兴奋态度中，窥知一二。

只要不高兴就找小姑娘理发

住在郴州山上，理发也是一大问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张少帅每次理发，只好派车子到衡阳理发馆里去接理发师来。有一天，队员忽然接来了一位女理发师，一看之下，这个女理发师只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子，脸上微微有几颗浅白麻子，长得娇小玲珑，麻中透俏，而且能说会道，非常讨人欢喜！

在最初，随从人员怕这个小姑娘手艺不高明，经过试验后，居然很不错，大家便争先恐后地抢着理发。不久，她和张少帅每次东拉西扯也很谈得来，于是大家对她便不由得另眼看待。

这位小姑娘是初中程度，在谈吐中颇能保持自己的身份。随同人员知道张学良和她谈得来，以后凡遇张学良不高兴的时候，就理发，而且马上派人去把这个小姑娘接来。她一上山上就是一整天，她理发向例是不论人数，有人理就理，没人理就闲着，所以她有时参加玩牌，有时也参观打球。当她临走的时候，大家都是加好几倍地付给她理发费用。她上山的次数多了，看见山下有宪兵站岗，外围又有步哨，庙里面又有便衣，每人身上又都带着手枪，实在搞不清楚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从她怀疑的眼光中，可以了解她的心理；但是，这小姑娘非常聪明，尽管心中怀疑，嘴里从来不多问半句话，否则就大煞风景了。

武汉已经失守了，张学良在山上也知道破坏武汉工作，是由戴笠亲自指挥的。当敌人进入市区之顷，戴笠才伪装逃了出来。就在武汉要失守的前后，有两三天的工夫没得到戴笠的消息，张学良挂念得不得了，时时向刘秘书打听：“怎样？雨农有信吗？”那时，军统局的总部，已移到长沙，三天之后，才得到戴笠安全撤退的消息。

探访“桃花源记”古迹

旅途中，经过桃源县的时候，在公路旁边发现了一个“桃源洞”。据当地老百姓说，这个桃源洞，就是“桃花源记”中的古迹。张学良一听，为之大感兴趣，便说：“把车停下来，我们去凭吊一下吧！”停车后，孙秘书和刘秘书陪着张先生去寻桃花源，谁知不看还好，一看之下大失所望！走了不远，就看到山坡上有一座小庙，庙后面就是一个小洞，小得连狗都钻不进去，别说是人了，这便是古迹。张学良面对这个桃源洞，不觉苦笑起来，连忙说：“咱们下去吧！赶路要紧。”

这天启程时天刚亮，车子不停地开，到了傍晚，就抵达了沅陵汽车站，大小车辆都停在那里等候加油。因为一整天工夫赶到了沅陵，大家都认为是到了目的地，精神上未免松懈起来，司机们也纷纷下车休息。就在一不小心中，出了乱子！一辆宪兵队的车子，正在汽车站加油，流在地面的汽油不料碰到一个燃着的香烟头上，立即起火燃烧，沅陵车站是用土法加油，并没有新式加油设备。地面的汽油一经燃着，全汽车站顿成燎原之势，在很快的时间内，便把汽车站、厂房和停放着的一些车辆，全部烧光了。

车队的车子，因为抢救得快，被烧掉了三分之一。火势扑灭后，汽车站也完了，这时张学良向刘秘书等人说：“我们在沅陵不会住得太久的。”大伙忙问：“为什么！”张学良说：“你们想！在溪口中国旅行社不是因为一场大火很快我们就搬到黄山吗？这次意外的失火，可能是我们住不了多久的预兆啊！”对于张学良的说法，大家只好含笑着点点头。

这时已是1939年春季。张学良一到沅陵，认为凤凰寺环境甚佳，心情也宽敞得多，把在郴州时的不愉快情绪，立即一扫而空，又打起精神来计划每天怎样去游山玩水了。

张学良在沅陵凤凰山的日子过得多彩多姿，此地风景比溪口妙高台更好，凤凰山兀立在沅陵城对岸，比平地高出1000公尺以上，树木森森，苍翠一片，张学良住的凤凰山顶，山脚下便是蜿蜒如带的一条沅江，山色如黛，江水奔流，如此景色，比起郴州不可同日而语。

沅江的水平日很浑浊，在转弯抹角之处，则比较清澈，是游泳的好地方，张学良的泳艺，以前并不高明，到了沅陵，因为常常学习，颇有进步。

张学良在沅陵也培养起钓鱼的兴趣来了。为了要钓鱼，随从人员曾经特地派人到香港卖了许多日本式鱼竿，可是，到了沅陵之后，这些鱼竿都不适用了，原来在沅江钓鱼的传统工具，是用一个竹筒，在竹筒上面缠着很长的粗线，上面再拴着一个很大的钓鱼钩子，在一个大钩子上，又分出来三个小钩。张学良对于这种钓鱼方式很感兴趣，大伙也很起劲。他们初次钓鱼，在出发以前，先派人去租了四条木船，那种船比普通木船要大些，几个人乘船到江中，就把船停在江心，开始用竹筒垂钓。

于凤至船上打毛线陪钓

江中钓鱼的方式是，先把鱼钩上装妥肉类或虾蚯一类的鱼饵，再卷动竹筒把线放到江心里去，等候鱼儿上钩，一看见水面涌起波纹，便将粗线往回拉。有时凑巧，一放出去就碰上鱼来，很少落空，在这里钓到的鱼，通常都是六七斤重，较大的竟有一二十斤，一个人简直拉不动。有一天，张学良钓到了一条特大的鱼，合几人之力都拉不上来，结果只好叫船夫跳到江里，跟着那条鱼去游荡，等到那条大鱼挣扎到筋疲力竭的时候，才把它拉上船来，直把张少帅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一伙人以前多是吃过午饭去钓鱼，后来，因为兴趣越来越浓，天一亮张学良就嚷着要出发。午饭问题，只好吩咐厨房做好了送到船上去。沅江的鱼，虽然大的多，一二十斤重的很平常，但吃起来鱼肉仍鲜嫩可口。每次满载而归后，当天晚间就叫大师傅老刘表演他的烹调技能，清蒸、油煎、红烧、白煮等，上下人等，大快朵颐，皆大欢喜。

在沅陵时，只有于凤至夫人喜静不喜动，很少参加户外活动。有时张少帅对她说：“老在庙里闷着干什么呢？走吧，出去玩玩。”她为了不愿扫少帅的兴，也跟大伙去了几次，但她对钓鱼丝毫不感兴趣，独自留在船上，依然结她的毛线，在吃完午饭以后，随从就派人把她先送回山上。

引起艺专女学生的注意

迁到沅陵一个月左右，张治中曾来探望过张学良一次。没有多久，上海撤退来的上海艺术专校也搬到沅陵。该校选定的校址也是在沅陵城对面的凤凰山，与看管队住的地方，同在一条线上。这些学艺术的男女学生，都是性情浪漫、年轻活泼，因为张学良每天上山下山，都从艺专学校门口经过，日子长了，就引起那些女学生们的注意。

这也难怪！张学良和负责看管的这一班人，一个个都是年纪轻轻的，而张学良每次出来，又都是前呼后拥，威风十足，更要引起那些女孩子的好奇心。

从这时以后，凡是张少帅经过艺专的门前，那些女孩子们，居然成群结队地跑到学校门口看热闹。那时的湘西民风还不十分开放，一般女性十分矜持，但这些从上海来的女孩子，得风气之先，已经很普遍地穿起短裤衬衫，旁若无人。湘西的老百姓，几曾见过这一套，他们眼看那些女孩子们，裸露着一双玉腿，就谣传艺专的女学生是不穿裤子的。一传十十传百，成为当时沅陵城的大新闻。

严阵以待土匪攻城

在张少帅定居后不久，沅陵城里又传出土匪将要攻城的消息，张学良对于这个消息，起先是将信将疑，但受到过第一次土匪攻城的教训，也不能不信。最后商量之下，由孙秘书到城里去打听，再作计较。他到城里先去见警备司令打听消息，据说这个情报千真万确。上次土匪攻城，张少帅不在城里还好，这次，有了张少帅在山上，大意不得。孙秘书回到山上，将听到的情况向张学良作了报告。张学良笑着说：“以我们现有的武力来说，土匪如果是来侵犯我们，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们事先也不能不作点准备。”

大伙儿当然都同意张少帅的说法，立刻把队员中的各组组长以及宪兵连、排长召集来，说明情况，叫他们马上开始构筑工事。经过和宪兵连长的策划，随从人员的第一项目标，是构筑掩蔽物，马上派人进入防守；第二项目标，是封闭山下通往山上的道路。大家忙了大半天，准备得差不多了，便请张少帅出来巡视一番。他在巡视后，却说：“我们看小说，不是有什么滚木擂石之说吗？今晚土匪若来骚扰，我们何妨试试？”

滚木擂石引起大家的兴趣

张少帅这个主意很新鲜，宪兵和特务队员们听了相当兴奋，个个争先恐后地要去准备材料，似乎这一晚比过大年夜还要热闹。张学良这时又查看了一下地形，若据守庙宇外围，正好是踞高临下，觉得这个办法确实可行，于是便动员全部人马，分成两队：一队搬运石块，把它堆积在工事的前面，准备临时大量地使用；另一队就去砍伐树木，把木头截成一段一段的，作为滚木之用。砍下来的枝干，就作为鹿砦，用它来堵阻通往山上的道路。

一切布置就绪，入晚以后，大家各守岗位，准备予土匪以迎头痛击。张学良这时也无心上床安歇，一直和刘秘书等人谈天说地。于凤至胆小，听说土匪要来，这天夜晚也不敢离开张学良，她默坐一旁，一句话也不说，有时叹一口闷气，痴望着张学良。

不料这一夜，大家一等再等，始终不见土匪，一直等到天色已经发白，没有半个土匪的影子。

端阳竞舟倒数第一

沅江大水过后，没有多久就临端午节了，日本侵华这时已是第三年，虽然全国多处都有激烈战事，但湘西仍有竞赛龙舟。

张学良对于划龙船的兴趣很高，他叫特务队员也准备一条船，由年轻的队员先行练习，以使届期参加竞渡。

只要是张少帅喜欢的事，特务队这些好动的年轻小伙子，没有什么不同意的，于是，大家便挑选队员，立即开始筹备起来。筹备工作第一步是找船，第二步是操练，筹备妥当后，训练了几天工夫，就到了端阳。过节的那天，天刚一亮，就要开始举行龙舟竞渡，那些民间参加竞渡的船，一面打着锣鼓，一面用力划行，百桨齐飞，船如箭发。因为参加的船多，一条条的彩舫，翻腾江海，令人目不暇接。

竞渡将开始之前，看管队那条龙船也参与了行列，队员和宪兵们雄心勃勃，满想和湘西当地人在水上一较高下。张学良夫妇、刘秘书和孙秘书，也都齐集江滨，替自己的人加油打气。随后江面上一声号令，竞渡开始，刹那间，船桨如飞，锣鼓喧天，角逐之下，立刻就显出高低来了。特务队那条龙船划手，虽然个个年轻力壮，富有蛮劲，但技不如人，一瞬间便被丢在后面老远。张学良虽好胜，此时站在岸边，也只有干着急，急得他反而哈哈大笑起来。论成绩，那次军统队员的船却得了个倒数第一，划船的队员们见大势已去，索性不再在后面紧追了，慢吞吞地在江心划来划去，团团打转，尴尬情形，引得两岸看热闹的观众，扬起一片欢笑之声。

戴笠造访心情愉快

民国二十七年 12 月 15 日，长沙大火的第三天，戴笠忽然轻车简从地跑上凤凰山来看视张学良，偕来的只有戴笠的随从副官王鲁翹一人（王氏曾任台北市警察局局长）。那次戴笠在山上一共住了两天，除了和张学良大谈张治中火烧长沙的种种经过以外，在第二天，还召集队员们作个别谈话，连大厨师老刘、二师傅阿米，以及宪兵连长、排长等都分别召见过，至于那次戴笠和张学良单独谈了些什么话，外人无法知道，也不敢问。不过张少帅在那两天看来似乎很高兴，当戴笠在凤凰寺与队员们举行个别谈话时，张学良由孙秘书陪同出去游山玩水，留下刘秘书在寺里伴着戴笠。

戴笠走后，时局一无比一天紧张，有时侍从人员和张少帅闲谈，大家都觉得在沅陵大概不会住得太久了，为未雨绸缪计，曾经一度计划迁到芷江去，以后发觉芷江地方实在太小，根本找不到合用的房屋，才打消此议。可是这个小团体的人，上自张少帅，下至宪兵，已经有点舍不得离开凤凰山。

据看管人员观察，张学良自被管束以来，已搬了好几处地方，只有住在溪口和沅陵这两处时，情绪较好，一来是这两处的风景都不错，环境也好；二来是住在这里，一天到晚都有活动的余地，从来不觉闷得慌。

张少帅主张继续前进

贵阳土匪抢劫军车，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传到芷江车站后，那些从芷江经过的车辆，无不心怀戒惧，不敢贸然前进。

军统局特务队一行听到这个消息，刘秘书立即与张学良商讨行止问题。依刘秘书的看法，土匪既是这样的猖獗，居然公开抢掠，械劫军用车辆，可见他们的无法无天。为慎重计，还是在这里看看风头，再作计较为是。

张少帅听刘秘书这样表示，他也发表意见说：“依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土匪的目的，既然是为了抢夺东西，只要把东西抢到手，他们一定要赶快设法搬走，哪会停在那里不动，等我们派人去围剿呢？我看不妨事，我们还是往前走吧。”

刘秘书和别人考虑了一下，觉得张学良说的也有理，于是一行人冒险登程了。当车辆经过那处军车被洗劫的地方时，看见那部坏车子还停在那里，不过车上的东西已被搬得一无所有，车厢上还留下累累的弹痕，这证明了张少帅的判断十分正确！

黄屏小歇享受特产张尖帅一行自从由奉化溪口出发直到贵阳，一路之上虽然是兵荒马乱，但还没有一次遇到过土匪，这次路过芷江所听到的，还是头一次的耸动事件！车队由芷江驶抵黄屏时，计算路程，当天已经赶不到贵阳了，便决定在这个小地方渡宿一宵。这里只有小客栈，门首都贴着“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红字楹联。在途中，张学良倒无所谓，惟于凤至在这次迁移中，不但吃尽了苦头，沿途还要担心害怕，恐怕碰着土匪要开火。黄屏这个地方虽小，却有着两项特产：特产之一是洞箫，张少帅很欣赏，买了两支雌雄箫；队员们几乎每人都买了一支。特产之二是地瓜，这里所出产的地瓜，形状和洋山芋差不多，不过要大一些。张学良先尝了一个，相当的甜，连呼不错，就请大家也都尝一尝。更妙的是，黄屏的地瓜不须用刀子削皮，只要用手一扒，外皮就脱掉了，里面又白又嫩，而且水分特多，不但解渴，而且香甜可口。大家吃得很合味，于是便在黄屏大量地收买地瓜，反正物美价廉，尽量向卡车上装，留着慢慢地吃，乡人无端地作了一笔大交易。

暮色苍茫抵达贵阳这次的移动，因为接到命令非常仓促，而且下一步的居住地点也不能在预先获得指示，所以，就无从派出前站人员预先去安排设营工作。少帅一行抵达贵阳的那天，已经是下午了，加上那日天色阴沉，没有太阳，停下车来已经是暮色苍茫。又不能让张学良久耽在车上，结果，只好先去找妥一家旅店，让张学良夫妇进去歇息，刘秘书则立即去向局本部设法取得联络。原来军统局总部已经有了留交的电报，着车队于抵贵阳后，可移住修文附近，据说那个地方，就是昔年王阳明先生被贬的龙场驿，因为以后人口增加，才改名修文，并设县治。

修文这个地方，位置在由贵阳通往重庆的公路沿线上的一条支路里，要进入支路70多里才是修文，平常的交通车辆，除非是特别要到修文去，否则不会从那里经过。张学良一行抵达贵阳之日，这里还未遭敌机轰炸，市面上的秩序尚属良好。这一晚，大伙就马马虎虎地在贵阳歇宿一宵。不久，特务队员很快就在修文县城外的约里许之处，觅得了个甚合理想的住所，那是一座大祠堂，是该县为纪念明朝王阳明而建造的。祠堂的房舍相当整齐，而且宽敞，院落也很大。祠堂为依山建筑，在祠堂下面尚有个山洞，这个洞既大又高，光线也不弱，尤其十分干爽，便于我们住用，张学良对于这所祠堂

认为相当满意。

觅到了住所后，一行人马上便在祠堂内外开始了修葺和扫除的工作。这里的房屋用不着怎样大兴土木，除了张氏夫妇的住房需要修理裱糊一番之外，其余的房舍，只要略事打扫，便可入住。刘秘书安排了一下，张学良夫妇、刘秘书以及孙秘书和全体队员们都住在祠堂里面。至于那一连宪兵则全数住在祠堂下面的山洞里。由此可见这个山洞之大，竟能容纳一连人之众。

杨虎城待遇不如张学良

张学良在修文安置好了不久，西安事变中的另一主角杨虎城也被押解到息烽囚禁。张、杨二人不但那时都在贵州一隅幽居，而所居住的地方也相距并不太远，他们之间是咫尺天涯，此生却休想再见。

从他们两人的待遇上而言，张学良显然要比杨虎城高出十倍。杨虎城的生活情况，只是较普通囚犯稍微好一点而已，行动是绝对没有自由的。至于张学良的生活，军统局已有指示，只要张少帅高兴，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仅每月到了月终，向上面呈报一下就算了。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张学良的行动也可说自由。比方，住在沅陵时可以去逛长沙，住在修文时可以去逛贵阳，如再想走远一点，便不可能。总而言之，无论张少帅的生活过得怎样不错，但要勉强一个人长期地度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仍是人生痛苦事；更何况，他无论走到何处，必定有人亦步亦趋地陪伴着，是“保护”又是“监视”，那就更痛苦了。

张学良遇事都想得开，所以他能挨过悠长的岁月。移居修文之后，虽然他时常闹情绪，但在闲谈中，他会随对随从说过：“男子汉大丈夫，主要是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你想，过去的我和今天的我，环境的变化多么大？在精神方面应该感受到极大的痛苦了！但是你看，我不是照样吃得睡得吗？”

于凤至与赵四小姐最后一次“换班”

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平时轮替到张学良身旁照顾他的起居，顺便也为他分忧解愁，二人都是张学良的内室，只是赵四小姐一直没有正式名份而已，她对于凤至相当尊重，因此从来没有二人交恶的传闻。

民国 29 年，日军尚未侵入香港之前，赵四小姐便由香港飞赴重庆，并即赶到修文王阳明祠堂与张少帅共患难。赵四小姐抵达后不久，于凤至就带着于副官和王妈等离开贵州，飞往美国去了。从这时候起于凤至就一去不返；赵四小姐开始陪伴张学良直至如今。

于凤至和赵四小姐换班出于无奈，也十分残酷，似乎一切都是无数。这次于凤至和赵四小姐最后一次“换班”，事先本无征兆。本来八一三淞沪战火爆发后，赵四小姐由上海移居香港，张学良和负责管束的军统特遣人员一路西移，由浙江、安徽、江西，而湖南、贵州，一路烽火，始终不得安定。这次赵四小姐能够赶来修文换班，以及于凤至夫人之飞去美国，这些手续，当然都是事先经由戴笠所安排，而且必然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因为张学良的任何动态都要经过蒋介石批准，甚至宋子文也曾预闻其事，否则不会这么容易的。

赵四既来，自由日遥遥无期

在这两年中，张学良一路在西迁途中，所住的地方都是暂时性的，这回搬到贵州修文，显然上峰是指定张少帅要住在这里长期留置，于、赵两位恢复换班，这自然也是原因之一。赵四小姐在未抵修文之前几天，看管队已经接到通知，张学良在获悉赵四小姐快要来修文的讯息后，一方面是盼望，一方面又不免怅惘。因为另一陪伴的人既然特地从万里之外，仆仆风尘赶来和他重聚，可以推想他本人恢复自由之期愈益渺茫。当时不但张学良自己会这么想，连看管人员也都有类似的感觉。可是话说回来，不管如何，赵四小姐来了，在王阳明祠堂里的人，总要认为是一佳讯，在赵四小姐刚抵修文之时，王阳明祠堂内添了一位女主人，无形中热闹了许多，张少帅的心情自然也不同于往日。

赵四小姐抵达后，于凤至在未启程飞美之前，仍在修文住了一个短时期。张学良迁居修文不久，曾向当时县府要了一部修文县志，准备专心搜寻当年王阳明被贬龙场驿的一些事迹，从此，他真的对阳明学说发生浓厚的兴趣，他由研究阳明学说，更进而埋首研究明史。可是在那个小圈子里，能和张学良研究阳明学说的，只有刘秘书一人够资格。每当两人一谈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滔滔不绝，乐而忘倦。于凤至对于这一套枯燥乏味的论题，一直毫无兴味，可是她又无法不耐着性子坐在旁边听，有时实在听得腻了，只好不客气地打断他们的话头，请他们留点精神谈些别的有趣味的事儿。这种尴尬情景，常使张学良为之啼笑皆非。

自从赵四小姐来后，张学良对于阳明学说和明史的研究仍未间断，而且越来越上劲，原因是：研究一项历史，必须作札记，于是，这项动笔的工作，落在赵四小姐的身上，她胜任得相当愉快，对于张学良来说实在是一件高兴不过的事。

赵四小姐不但英语流利，中文程度也相当不错，她有时能够一天到晚陪着张学良，替张学良作札记而乐此不疲。修文小县固然荒僻得日子难过，但张学良自从有了“红袖添香、佳人伴读”的新环境，总算减少几许幽居生活中的苦闷！

三十载冰霜情终获相伴老

民国 29 年冬，他的夫人于凤至因患乳癌，政府还特别安排让她转道香港飞往美国就医。由此以后，张少帅和她 21 年夫妇关系，实际上已成永别！到 1964 年 7 月 21 日，台北各报均刊出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正式结婚的消息，联合报的标题为：

卅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

少帅赵四/正式结婚

红粉知己/白首缔盟

夜雨秋灯/梨花海棠相伴老

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了

他们结婚的日子是这一年的 7 月 4 日，新闻则是经过 17 天以后始行见报。报上并透露：在美国的于凤至夫人对赵四小姐照顾张学良卅年的情谊至为感谢，已于前此同意自己与少帅的离婚，让丈夫与赵四小姐成为合法的夫妻。这一年，张学良 62 岁，新娘子赵四刚过 51 岁。

原则上，张学良在民国 50 年已经不再有人“管束”了。这一年，当局准许他自己出钱在北投警察分局的对面山坡上盖了自己的家，由此以后，他可以轻车简从，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可是，他的故交半已零落，朋友在台的，不多，够资格让他看的人更少。于是，吃馆子遂成为他的最大嗜好，台北新开张的餐厅他总会带一群人去吃，对胃口的，他会多吃几次，不合意的，他也会见到朋友就说某家的菜不行。

金门前线远眺大陆

民国 69 年 10 月 21 日，各报登出张学良“在金门前线以高倍望远镜眺望大陆河山”的照片。这时他 80 岁，现在又过了 8 年，少帅” 87 岁了。半个世纪与世隔绝的生活，真是“往事不堪回首”了！

而在 1961 年以后，许多人，尤其新闻记者想访问他的，均尝了闭门羹。远远看他出门仍是前呼后拥，遂使人以为他依然在被“管束”之中。其实，那是他的一种“自闭”心理作用；他怕记者，更怕记者追问西安事变的往事。以后当他北投新居落成之后，自己要求政府给他派警卫，以免受到骚扰！同时，他自幼过惯了前呼后拥的生活，一旦身边没有人跟随反而觉得不自在，由政府给他派出免费的跟班，对他而言，更是何乐而不为的事。这一情形，作者从已故的立委王新衡口中，以及漫画家牛哥夫人冯娜妮女士口中得到相同的结论。

可以称为朋友的越来越少了

王新衡说：“确然，在官位上，张群算是做过他部下的人，在台湾的东北人，自莫德惠、冯庸死后，再没有他的平辈的人了！”又说：“最近他是很寂寞，老先生死了，蒋夫人去了美国，张群老了，黄仁霖、张大千都死了，没事就往我家跑！所说的，不是哪家餐厅什么菜好，哪家不好之类的话，有时在我家中看到我的孙子，他会爬在地下让我孙子骑在他背上玩半天……。”

漫画家牛哥的夫人冯娜妮女士，是冯庸的长女。冯庸则是张作霖老把哥冯德麟的儿子。冯德麟民六复辟之役，在东北的第二十八师部队给张作霖“吃掉”，但并未影响第二代——张学良和冯庸的交情；当张少帅在东北称王称霸的时代，冯庸在东北出资办了一家航空的大学，大学的名字就叫做“冯庸大学”，为中国空军人才最早的摇篮。抗战初期中国空军殉国烈士，多为“冯大”出身。如《笕桥英烈传》中的主角高志航，就是“冯大”的高材生。來台以后，冯庸曾任高雄要塞司令，官阶虽仅少将，但他仍是被张学良认定是“小兄弟”之一。冯娜妮说：“我父亲住新店文路时，张学良就曾去看他；我父亲病时，他也到过我父亲病房探病。”从以上两则见闻，可确定，张学良至少在他和赵四小姐婚后是无拘无束，可以自由到他爱去的地方去。他所以仍是神秘兮兮，让人感到如在云雾之中，无非是他可以称为朋友的人，已越来越少了！王新衡说：“东北人中，现在地位相当高的王铁汉，在九一八事变时，只是一位团长，有没有机会单独见到张学良似乎都是疑问，自然不是他可以谈的对象了。王铁汉尚且如此，何况其他！”现在，连王新衡也死了，张学良更没有地方可以串门子，自更不在话下了。

中秋双十两次露面 50 余年前的张少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度惊天动地的人物，40 年来息隐于山间溪边，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民国 68 年 10 月 5 日中秋夜，蒋经国于邀叙元老之余，也特别邀请了张学良与赵四伉俪前往大直官邸共赏明月。且当晚由中央社发布了这则消息，国内各报都有极简短文字报导。几天以后，民国 68 年双十节举行的大会，年已 79 岁的张学良，戴着眼镜坐在中央贵宾区观礼台上，一直兴致勃勃地看完所有游行队伍通过司令台，才随人群散去。由于认识他的人不多，所以未引起人们注意。69 年 10 月 20 日，张学良又由副秘书长张祖治和副参谋总长马安澜陪同访问金门。这些动态经过报纸报导，隐居多年的张学良在一夕间几乎又成了新闻人物。

从大陆初抵台省时，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蛰居在新竹山间，经常以研读明史与打打网球来安排他的时间，有时也到溪边垂钓，或登山健行来调剂他的生活。当时政坛中著名的东北政坛耆老莫德惠与刘哲，经常前往张氏寓邸晤访，畅谈天下事和东北乡情。新竹之后，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即隐居于台北近郊的北投山上，他们夫妇住在一所西式建筑的小楼中，过着悠闲的岁月。张少帅每个礼拜天，都到士林礼拜堂作礼拜，每星期五并在他的家中听周联华牧师“说教”。张氏的乡长莫德惠，也常在星期五到张家和他一块听道。原本张作霖部属的莫德惠与张学良过从最密，张学良常到莫德惠家中。莫德惠住在木栅沟子口考试院附近，庭园四周栽满了柳树，颇有北方农场情调，张学良很喜欢这个环境，他经常一套铁灰色西装，坐着一辆黑轿车就直驶木栅，莫氏也常回拜。以后莫德惠健康稍差，监察院副院长刘哲便成了“少帅”寓邸的座上客。所以莫德惠、刘哲相继辞世后，张学良结交了新的知交，即是众知的三张一王：张学良、张群、张大千和王新衡。

张学良自脱离军政界后，即潜心于明史的研究。他所以对明史发生兴趣，据说，是因为明代能推翻最强盛的元朝蒙古人的统治，显非易事；而研究明史又牵涉到蒙古人的史绩，因之，必须要涉猎蒙古史与错综复杂的明代各项史料，才能对朱元璋的兴起与衰落有正确的了解与评价。他在埋首苦读下，成了国内少数最权威的明史专家。

会晤女儿和女婿

隐居中的少帅，经常也会见过住在国外的亲人，民国 50 年 8 月 30 日的黄昏时分，在他的寓所中他即会见了他的长女公子张闾英女士和他的女婿陶鹏飞教授。这是 24 年来张学良第一次见到他久别的女儿和他迄未谋面的东床快婿陶鹏飞博士。

张学良早期会见他的女儿和女婿时，是经过事先的安排，因此，张少帅对于他女儿女婿的到访，并不感到惊讶，而是很沉着地闲话家常。他们父女见面时，少帅虽然很兴奋，但并没有流泪，据说，以前来台之初，只要一见到亲人他就会老泪纵横。

张学良的女婿陶鹏飞博士，是东北大学的毕业生，他在东北大学读书时，会见过当时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少帅，但那时陶氏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张学良的长女张闾英，为张氏元配于凤至所生。于凤至自赴美后，一度和她的女儿及女婿陶鹏飞住在一起。陶氏夫妇住楼下，于凤至住楼上。

据陶鹏飞这次会晤张学良后表示，张少帅个人不愿与外面接触，他现在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周都到士林教堂作礼拜。

养兰个中高手

张学良酷爱兰花，也养了不少名兰。过去，每当岁末年初，兰花盛开的季节，台北市及近郊的兰园经常接到“神秘”的电话：有位“赵老先生”要前往赏花。

约半个钟头过后，便会有一辆载着四男一女的白色轿车停在门口，四位男士鱼贯而入，其中一位年纪较长，高大的身材有时着灰黑色西装，时而穿藏青色的长褂，满头灰发，面色红润，声若洪钟，精神健硕，穿着黑色软质平底布鞋，步履轻捷，不凡的气宇与相貌约略可见年轻时候的俊朗。

这位所谓的“赵老先生”，事实上就是半世纪前叱咤风云的张少帅——张学良。而总是留在车厢中的女士，虽入中年，风韵犹存，高雅的容颜依稀可见昔日的风华，她便是张少帅的“红粉知己”——赵四小姐赵一荻了；其余的三位男士，一位是司机，二位护卫人员。

张学良喜欢观花类的兰卉及传统国兰，除了奇花之外，对新品种的线芝兰种并不特别欣赏，他尤其偏爱一种在坪林发现的白花报岁兰花“绿英”，这种花普通都是五种花瓣，他感兴趣的则是六瓣的奇花，听说内湖一位兰友有一株每当花期将届，便会以电话频频探询，其他的黄道、桃姬、报岁、春兰等赏花类花卉，他也种了很多。

在展览会或私人兰园中，若有中意的，张学良也会买下，由随行的人员付帐，但他也有所选择，价格大都在数千元之谱，而兰界人士知道他的身份，也都很敬重他，而不计利润，半买半送地卖给他。

在兰界口中，他对花极为内行，有一次他到一处兰园看中一盆奇花，主人见他是一位温文而相貌不凡的老者，将八千元的价格说成二千，不料他一口答应买下，使主人哑巴吃黄连。事后当这位后来曾任台北市国兰协会会长的兰园主人知道张少帅的身份后，高兴地大呼值得。

收藏字画除了读书、养兰、散步或户外活动以外，张少帅对中国艺术也能深沉研究，这几十年来，这位少帅可说是到了“知画、评画、藏画”三味的艺评与搜藏家的境地，使他能在宁静中过着艺术家的真、善、美生活。民国60年代时，台湾逐渐兴起一片艺术热，画廊开始林立，张学良经常前往艺廊欣赏画作。张学良最常去的一家画廊在台北敦化北路良士大厦一楼。当60年春，这家画廊推出了故宫博物院院长江兆申书画展。一日午后，立法委员王新衡陪同了一对年长的夫妇进入艺廊赏画。这位年长的先生对江氏所作每幅作品，都戴着老花眼镜仔细鉴赏，并且与王新衡不断讨论。

艺坛咸知，江兆申过去师从傅心畬大师。傅濡先生无论工笔、写意，都有其独到之处。傅氏自谦“字比诗好，诗比画好”，事实上傅大师诗、书、画在中国艺坛里是近代一大家，为世人所公认。江兆申从傅氏游，而江更苦下功力，他的诗、画已颇有“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之势，尤其他虽继承了傅大师画风，但他匠心独运，还有一番个人的创意，因之，江氏自成一家风格。

赵一荻雍容华贵少帅张学良别具慧眼，对江兆申作品欣赏备至，评价亦高。为此，经由王新衡的介绍与江兆申相识。而江兆申不独工于书画，且对明代四才子唐寅、祝枝山等有独到的研究。张学良得一艺坛知己，复对明代艺术有研究的学人，自属大快其心。因之，江氏展出作品约30余幅，半数均为张学良伉俪搜求而去，认为是平生一大快事。

当时张学良年近七旬，但他中等个儿茁壮的身材，步履矫健，走起路来虎虎有生气。赵一荻女士，被世人称为赵四小姐，亦被过去文人、记者渲染过是位风华绝代的美人，当时年近六旬的张汉卿夫人，保养得雍容华贵、磊磊大方，自是大家风度、不同凡响。她对艺术的鉴赏评论，也是入木三分，看得多、懂得多，令人深切体会到张学良几十年来对她用情之深、之专、诚非无故！

历史是无情的，半个世纪的岁月，张学良已然完全无复昔日少帅的英姿，过去那些戎马生涯、浊据紊乱的局面，俱往矣！然而在悠闲飘逸的岁月中，张少帅与赵四小姐，已然获得了许多在他们戎马生涯中无法获得的东西。

于凤至、赵媿夫坐监

汪树屏汪纪泽

- 惊闻变，于夫人回国陪监
- 长相随，赵四妹终身伴囚

于凤至回国

1933年，张学良被迫下野，于凤至携子女和赵媿起伴同张学良赴欧考察。后来张学良和赵媿回国，于凤至留居英国，一方面由于身体欠佳，不适合南北驰骋的军旅生活；一方面照顾子女的学习和生活。何况赵媿温柔贤淑，聪敏机智，不仅在生活上能对张学良体贴入微，而且在事业上也是张的左膀右臂，所以，于凤至对赵媿照顾张学良非常放心，自己在国外暂时休息一下身心，岂不更好。

张学良和赵媿回国后，国内局势变幻多端。于凤至很关心国家大事，在异国他乡，她只希望张学良平安无事，她也就放心了。

“双十二事变”发生之后，英国各大报纸皆有报导，但众说纷纭。于氏提心吊胆，终夜彷徨，时刻关心张学良的安危。等了几天，26日传出喜讯，告知“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与宋美龄、宋子文一起回南京，她心上这块石头算是落了下來。

可后来蒋介石翻脸不认帐，欲报西安“兵谏”之仇，把张学良送上军事法庭。然后，又耍了个花招，宣布“严加管束”，却又成了无期徒刑。

这个消息对于凤至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她心中一阵酸楚，眼前一片漆黑，倒在沙发上。身在大洋彼岸，异国他乡，千山万水之隔，又有什么办法呢？她忽然想起，宋氏老夫人是她的干娘，宋美龄是她的大姐姐，找她一定会有办法，于是，提笔拟写了电文：

亲爱的姐姐：张学良罪及委座，幸蒙特赦，仍须严加管束，不知如何得了？学良不良，我亦有责，甚为遗憾！可否把他文给我看管，送出国外，以了介公之责，请多帮忙，感同身受。

电报发出去，石沉大海，毫无消息，于凤至心中失望，在焦急中，忽然又想起了澳大利亚朋友端纳。他过去是张学良的顾问，现在是蒋介石的顾问，不如再给他发一个电报。正要写电文，王妈忽然递过一封信来。急忙拆开一看，原来是赵媿向她报告，蒋介石背信弃义，把张学良秘密囚禁在南京鸡鸣寺里，不许任何人会见。这不幸的消息，使于凤至万分悲痛，她决定立即启程回国，把孩子交给王妈照管。

在南京宋美龄的公馆，于凤至满脸泪痕地见到了私交甚厚的干姐姐，向她倾诉了自己回国的原由，并为张学良求情。宋美龄也很同情她，甚至还掉下泪来，劝道：“凤至妹妹，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也无能为力。我为汉卿的事，也不知和委员长闹翻多少次，事情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目前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她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样子，然后接着说：“他们是兄弟，委员长会照顾他，严加管束也不过是避避风头，怕他受共产党利用。”

于凤至心里稍微安稳一些，但仍是半信半疑。听宋美龄一番话，于凤至知道，就是自己亲自去找蒋介石，求他释放张学良，也是不可能的。她擦擦眼泪说：“既然委员长不肯释放张学良，我也无法回英国了，愿意陪他一块坐牢，来照顾他的生活，尽到做妻子的责任。”

宋美龄没有想到于凤至能说出这样话，原以为她求情是妻子的责任，让人们看看于凤至的贤淑。宋美龄安慰她说：“妹妹千万不要一时激动，坐牢可不是女人能受得了的，现在既然有赵媿陪他，你就回英国照顾孩子吧！”

“不，我是妻子，我救不了他，也应当分担他的苦难，我可以陪他一生，以尽妻子的义务和责任。”于凤至很气愤，坚决地说。

宋美龄摇摇头，“妹妹，你听姐姐的话，不要太固执，眼下委员长不在，我也做不了主。”

于凤至没等她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宋美龄马上电告在溪口为长兄蒋介石办丧事的蒋介石。因为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生死未卜，介卿怀念弟弟心切，瘫倒在地，不到3天就死了。由于兄长之死，蒋介石恨不得把张学良杀死，以报亡兄之仇。接到宋美龄电报，说于凤至要来陪伴张学良坐监，他心想，好，我叫你自投罗网，马上转告特务头子戴笠，接受于凤至陪监。

于凤至离开南京，经杭州来到奉化溪口，她不知道走了多远，也不知道经过多少困难，终于来到了雪窦山古寺。在特务陪同下，来到张学良住地，她心情激动不安，惊喜交加。想不到赫赫有名的张少帅、副司令，居然落到如此地步，我从大洋彼岸跑来，却用陪监的方式来会见丈夫。人事沧桑，感慨万千。

张学良和赵媿见到于凤至，真是喜出望外，人在难处想宾朋，何况在困难时候能见到自己的亲人呢！进屋之后，夫妻见面百感交集，抱头痛哭，抚今追昔，好似从天堂落入地狱。

张学良握着于凤至的双手说：“大姐，一路辛苦了，孩子们都好吧！”于凤至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点头。

张学良说：“大姐，我没有罪，我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我多次劝谏不从，没办法，才实行‘兵谏’。他答应我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亲自送他到南京，请罪以谢国人，使他恢复领袖威信。我来是宋子文、宋美龄、端纳三个人保证的，没想到他翻脸不认帐，竟如此对待我。”

于凤至哭了，她完全理解丈夫的心情，更同情丈夫的处境，可怜丈夫的遭遇。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越想心里越难受，只有扑到丈夫的怀里，大哭一场，才能使自己悲愤郁闷的心情好受些。赵媿和于凤至是一样心情，只是她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为了冲淡一下这凄楚悲伤的气氛。

晚上，赵媿费了许多口舌和特务队长刘乙光商量，算是弄来点吃的，给大姐接风。三个人边吃边谈，暂时的愉快，使大家忘却了囚禁生活的困苦。于凤至从内心里感谢赵媿，说了许多关怀、敬佩的话。

吃过饭三个人又谈起家务事及将来的前途，于凤至问赵媿张闾琳的情况，赵媿低头不语，似有所思。这勾起了她的伤心事，当时小闾琳才6岁，正需要母亲照顾，可为了张学良，她把儿子交给吴妈抚养。于凤至说：“这怎么能行，孩子小，不能离开母亲。你出去把孩子扶养成人，汉卿由我来照顾。”

“不，汉卿和大姐对我的好处，我是终生难忘的，为汉卿和大姐，我什么都可以牺牲的。我来陪监，大姐身体不好，几个孩子还在国外，大姐你走吧！还是我来陪监。”

“好妹妹，别争啦！我们这种关系还用客气吗？你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多的了，出去把孩子培养成人，是一件大事。”于凤至坚决果断地说，“你一定要离开。”赵媿默默不语，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这一夜，赵媿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几天之后，赵媿离开了雪窦山，张学良和于凤至含泪送行。赵媿说：“大姐，我一定听你的话，好好培养孩子，长大成人后，一定让他去看望你，侍奉你。”于凤至感动已极，热泪盈眶。张学良不能远送，于凤至一直送到山

下，二人洒泪分别。

1937年春天，蒋介石为其兄介卿先生大办丧事。宋氏兄弟一同去奉化溪口参加葬礼。自从张学良被扣押、软禁以来，宋子文与蒋闹翻多次，因为张学良亲自送蒋来南京，宋子文曾保证过张的安全。作为一个统帅，岂能言而无信，所谓“言必信，行必果”原是骗人的鬼话，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岂不是亵渎神圣吗？

宋子文应酬一番之后，特来古刹探望张学良。虽然南京一别不过三个月左右，可张学良精神不振，消瘦多了。宋一见张，感慨万千，二人紧握双手，张呜咽难言，宋子文也潸然下泪。他们谈了些别后生活问题后，宋便对张学良讲了东北军的情况。蒋为了解散东北军，电召于学忠、何柱国、吴克仁（原王以哲六十七军副军长，王死后吴为正军长）去南京受训，然后调东北军到皖北驻防，东北军官兵怨声载道，有的怀念少帅，有的怨恨少帅。

张学良听后，心情异常沉痛，大声疾呼，“是我张学良断送了东北军的前程，悔之晚矣！”“汉卿你也不要过分着急，身体要紧。”宋劝说。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寇侵占华北，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与共产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张学良心情激动，认为自己该有出头之日了，凡是关心张学良的人，也认为副司令这回可以恢复自由了。但事与愿违，张学良做梦也想不到，蒋介石那么关心他，走到哪里把他带到哪里，甚至于蒋介石死后，张学良也没能真正恢复自由。

张学良虽然在囚禁中，仍念念不忘抗日，现在既然全面抗战，就应当带罪立功，实现多年的愿望。于凤至也抱着很大希望，她也天天盼望蒋介石能起用他，率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然而这个愿望落空了。

雪窦山中国旅行社在雪窦山西边，是一栋两层小楼，有六间客房和餐厅，于1934年建成开业。1937年1月戴笠命令停止营业，把房间包下来整修。当时此处经理是钱君藏，修整完了之后，他才知道是张学良将军在此囚禁。随张一同上山的有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还有杭州市长周象贤，秘书赵媿小姐，两名副官和一名护士。周围有百多名宪兵，四十多卫士，特务队长为少校刘乙光。

张学良住下之后，蒋介石请来一位腐儒叫蒋周益，是一位老秀才，每天给张讲四书五经来洗脑。由邵力子伴读，陪着聊天。每天课程是非学不可，这为张后来学明史打下了基础。

中国旅行社停止营业，钱先生仍留下来管房子和照顾张学良生活。张学良好打网球，钱给他修场地；好游泳，钱给他找适合的溪水区。总之，张学良喜欢干什么，钱先生就给准备什么，因此钱很受张学良喜欢。但张的活动范围，东不能出镇海口，西不能出曹娥江，大概限在60里之内。

有一天张学良找钱君藏说：“你这个旅行社包下来，时间长了怎么能行。”钱说：“这没关系，有人付钱，你只管放心。”张说：“这不太好，我给你一笔钱，你给我另造一幢房子吧！”然后交给钱五百英镑。于是，钱根据张的意思，建造了三间楼房，余下的钱还买了许多东西。

钱先生和上海旅行社有工作关系，经常往返于雪窦山与上海之间。赵媿小姐下山之后，住在上海马思南路，张学良经常让钱捎信给赵媿，赵也让钱给张带些日用必需品。彼此关系甚好，钱也受益不少，当张学良转移时，钱在上海，张给他留了封信，一是感谢他生活上的关照，希望他能多照顾赵媿小姐；一是把自已在水洞岩所造的房子赠送给雪窦寺的当家和尚。至于张学

良走后，钱君藏如何处置就不得而知了。

1938年6月，奉上级指示，特务们秘密把张学良、于凤至夫妇转移到湘西沅水。张在溪口雪窦寺住了9个月，又转移到黄山，然后又到江西萍乡等地，一直到6月才算到了湘西沅水。这地方是春秋战国时楚国大夫屈原流放吟咏的地方。苏仙岭位于湖南南端的郴州市东郊，地势甚高，从山上到山下有二里多地，上下有一条石板路，张学良将军每周乘坐滑竿下山一次。

当时郴州瘟疫流行，疮痍满目，人到郴州不服水土打摆子

（发疟疾），马到郴州也得死。苏仙岭是徒有虚名的胜地，树木凋零，人烟稀少，当时张学良将军就住在苏仙岭山顶上苏仙观大殿东厢房里。

有一天张进城去洗澡，回来在途中遇到一位中校军官，他一见张，马上立正敬礼，其实张并不认识他，肯定是张过去的部下。

回来后特务们报告了刘乙光，刘怕这个秘密传出去，赶快请示上级进行转移，于是又转到湘西沅陵城外凤凰山去了。

岁月匆匆，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湘西郴州已经是一座繁华似锦的城市了。荒凉的苏仙岭已经是翠柏苍松，鸟语花香的胜地了，许多名胜古迹也焕然一新。张学良过去住过的地方，也恢复了旧观，陈列着当年将军的照片和所作诗词。该纪念室也命名为“屈将室”，到此旅游的人们，参观之后无不沉思遐想，真是“往事堪哀，对景难排”。

凤凰山在湘西沅陵县城的东南面，北面临江，东南西三面连接着起伏的山峦。古树苍松、重峦迭嶂的古寺，是明代万历年间建造的。蒋介石把张学良囚禁到这座深山古寺中，以避世人耳目。这里终年不见阳光，环境十分恶劣，再加上生活上的艰苦，精神上的折磨，思想上的苦闷，于凤至女士的身体日益消瘦，她面色焦黄，每天吃不下饭，经医生诊断为乳腺癌。

张学良心情沉重地凝视着妻子的面孔，无情的岁月，使她脸上现出皱纹，黑色的青丝已有些银灰色了。囚禁生活一年多给她带来很多痛苦，她夜里经常惊醒，有时还喊叫。一天夜里，张学良被她喊醒，他心情酸楚地问：“大姐，你怎么样，要水喝吗？”

“不行，我呼吸困难，出不来气，心里憋的慌，恐怕我不久于人世了。”

“大姐，别着急，我无论如何也想法叫你出去，把病治好。”张学良一面安慰妻子，一面流泪，此时他百感交加：我张学良失势，遭此磨难，悔不听虎城兄及东北将领之言，才有今日之难。

戴笠来探视，张学良便向戴提出，于凤至病情越来越严重，请求让她出国就医，不然我也无法生活。她走之后，可以换赵媿来照顾我的生活。

戴笠这个人脸长，人称马相，其貌不扬，但脸上浮有一层奸滑阴险之相，杀人不眨眼，但对张学良还是格外关照。因为过去张学良组织“四维学会”时，戴曾是张学良的下属，张把他视为知己朋友，戴虽当了军统局长，但对张也让三分。

当戴笠保卫宋美龄去西安时，他一下飞机，西安的卫兵就将他解除武装，没收了他的手枪。进城见到张学良，他便诉说委屈，张一听哈哈大笑，马上解开皮带，把自己的手枪摘下来送给他，并开玩笑地说：“你这个军统局长怎么当的，我西安发生这么大事，你竟一点也没得到情报。”

“我哪里敢搞你的情报。”脸一红戴又接着说：“真没想到，你会来这么一手。”

有这一层关系，因此，让于凤至出国就医，戴笠自然满口应允。但心中

暗想，赵媿青春貌美，才 26 岁，在香港过着舒适生活，还有个儿子，怎能到这荒山野岭来受苦，更如何能到山沟里来陪监呢？

于凤至走了之后，张学良心里安稳一些，却更陷于苦闷孤独了，他感到生活渺茫，失去了往日的欢快。

他想起了南唐后主李煜被宋太祖赵匡胤俘虏以后，幽居时所写的一首词：《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于是在无限感慨之中，他写了一首《自我遗憾》，以抒发自己愁闷忧郁的情怀。

万里碧空孤影远，
故人行程路漫漫。
少年鬓发渐渐老，
惟有春风今又还。

诗中的“孤影远”、“路漫漫”，表现出自己离开二十来万东北军，只身一人从西安到南京，又到凤凰山，深感孤单之苦，将军离开士兵，连孺子也不如。杨虎城将军、东北军将领，他们的行程在何方，大有“路漫漫其修远兮”之叹。全国形势变化，抗日烽火燃烧大江南北，自己却壮志未酬，只好感叹“少年鬓发渐渐老”。如今抗日武装在奋勇杀敌，正如春风一样，迅速吹遍神州大地。“春风今又还”，还是有希望的，充分体现了张学良将军乐观、宽大的胸怀，坚定不移地杀敌救亡的意志。

于凤至女士和张学良洒泪分别后，在上海略事休养，身体复原后出国。在美国经名医诊治，手术良好，由于生活条件好，一直活到 90 开外。

赵媿终生陪监

于凤至一再让赵媿离开雪窦山，出去照顾闾琳的成长，也是为了使赵媿不至于在此受苦，断送青春年华。赵媿离开奉化溪口回到上海。她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又回到香港。香港的住宅是一座乳白色的小楼，内部却是东方式的亭台，既美观又优雅。有吴妈帮她照顾幼子张闾琳及帮她管理家务，她很放心。生活是安适富裕的，但她的内心却是忧郁寡欢的，不知张学良何年何月才能释放，获得自由。过去朝夕相聚，过着豪华贵如“人君”的生活，如今自己逃出虎口，而张学良仍过着囚徒生活，心中自然无限惆怅。

赵媿接到张学良打来的电报，心情更是激动，她不贪恋富贵豪华的生活，更不考虑个人生活的安危，只是顾虑到儿子年幼，未满10岁，既无独立生活能力，又无亲人在香港照管，而自己一进牢笼，又不知何年何月能恢复自由，所以愁肠百转，极度苦恼。但能和张学良在一起生活，是自己一生最大的快乐，他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受苦受难的英雄，她恨不得马上能飞到张学良身边。她沉思默想了几天，忽然想起在美国的一位朋友，张学良曾将一笔财产委托他在美国代管。她想好了，决心把孩子交付给他，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更不能向任何人谈及这孩子的情况。她怕有人得知真相后，对孩子不利，更怕发生其他意外。

临别时刻，母子二人痛哭流涕，赵媿看见小闾琳哭成泪人一样，心如刀绞，泣不成声。送行的人提醒赵媿，孩子走的时间久，给孩子留个纪念吧！还不知哪年哪月才能见到呢！赵媿一听，止住了哭声，从手腕上取下当初和张学良相爱的信物，一只金表，给孩子揣在怀中。这只表是他俩人忠贞不渝的见证，它和生命一样，决不能丢失。今天和儿子分别了，相见无期，把这个最珍贵的信物，送给爱情的结晶——儿子，是最好不过了。赵媿送走了儿子，变卖了房产。香港，美丽、繁华的城市，再见吧！她无牵无挂地走了。

赵媿来到张学良身边，是1941年，当时华北已经沦陷，华中、华东也相继沦陷，湖南吃紧，长沙已失守。特务们又把张学良转移到贵州修文县阳明洞。阳明洞在修文县郊区一座山上。明代理学家王阳明在此设立罗网书院讲学。后人为纪念他，在书院旧址又修一座王文成公祠。张学良将军就住在右边殿内。

张学良最感痛苦的，不只是个人失去自由，而是在敌人猖狂进攻、国土沦亡的生死关头，自己却报国无门。他每天看报，关心国事，对照地图来看战事进展情况，看到胜利的消息，他笑逐颜开；看到疆土失守，他愁眉不展。由于生活上的摧残，精神上的折磨，思想上的苦闷，他逐渐消瘦，头发也脱落，形容憔悴。

由于修文县阳明洞和王阳明事迹的影响，他联想到明末政府的腐败，文官爱钱，武官怕死，外患纷争，国无宁日。他想从明史上找到答案。所以买了许多有关研究明史的书籍，准备埋头读书，并做心得笔记。每月按时给蒋介石寄去一份“读史心得”。

1941年5月，张学良不幸得了阑尾炎，送至贵阳中央医院就医，由赵媿和吴妈陪伴。一个多月，身体平复，即将出院。医院护理同仁商定，每人做一个菜，为张先生饯行，张学良和赵媿非常高兴。护理组一些同仁，对张先生平易近人、热情和蔼、坦率朴实的作风深有所感。在分手时，先生有些怆然，依依不舍。

张学良出院之后又转移到贵州开阳县刘育乡，一住又是三年多。1944年冬，日军攻占独山，贵阳告急，特务们又把张学良转移到川黔边境的桐梓县小西湖。地处偏远僻静的“小西湖”，在乱山环抱之中，它是仿照杭州西湖的格局修建的一个蓄水池，湖中央建有湖心亭，也有个“三潭印月”。湖心亭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一湖西子水”，下联是：“半壁桂林山”。湖岸上遍植杨柳。在西岸边也修了一处“柳浪闻莺”，附近修了网球场、篮球场，湖西边山坡上修了一幢新式平房，特务们居住。

赵媿来陪伴张学良一起囚禁，不但特务头子戴笠出乎意外，社会上很多知情人也出乎意料，就连于凤至远在大洋彼岸也万分感激，她说：“赵媿在汉卿身边，我放心啦！死已无憾。”

真正的爱情，不受任何东西所影响和阻碍，什么金钱、势力、地位。相反地越在苦难中受折磨，感情越深厚。赵媿一切都顺从张学良的意愿，你要吃什么，我给你做什么；你要打网球，我陪着；你打猎我跟着；你研究明史，我帮你查资料、记笔记。二人在漫长而又寂寞的囚禁生活中，一直是相依为命的。

岁月如流，在小西湖又过了一年多了。这一天，突然传来了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人们都在欢呼雀跃，张学良拿着报纸，越看越激动，眼中流出了热泪。他边喊边跑进屋去：“小妹，小妹，我们胜利了，日本鬼子投降了。”赵媿一下子扑到学良的怀中，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意味着囚禁生活快结束了，“汉卿，我们可以回家了。”

张学良搂着赵媿，看着她流出了兴奋和欢快的眼泪，不禁想起了杜甫的诗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袋。”

“汉卿，你该给委员长写封信了。”

“好，给他送什么呢？”

“把你从瑞士带回来的欧米茄表送给他，还有象征意义，让他看看时间。”赵媿提醒张学良一句。

信写好了，表也装好了，托人送给蒋介石。他们俩个人天天盼望，日日等等，在兴奋和希望中盼望自由的早日到来，计划着恢复自由后的宏图壮志。

不知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这一天副官兴奋地喊道：“副司令，委员长的礼品送来了”，张学良和赵媿俩人心情激动，眼里也充满了希望的光芒。

他们小心翼翼地接过礼物，原来是1936年的年历，还有精美、漂亮的几根钓鱼杆。赵媿看看张学良，看到他愤怒发抖的身躯，也悟出了礼品的意思。不要着急，养养病、钓钓鱼吧！再提醒一下，不要忘了1936年的无情岁月。

“七七事变”之后，我去过重庆，认识了一位朋友赵季恒，他是河北保定人，1946年曾任贵州桐梓县县长。他知道我和张氏的关系，便对我谈起了过去在桐梓的一段往事：

因为我是一县之长，特务团需要什么物资都得找我。特务团团长了刘乙光现在已是上校团长，我和他接触时，知道张学良将军在此地关押，心里很高兴，想一睹张公丰采，便向他表示，有机会希望见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

7月初，有一天刘乙光把我接去。当时张将军软禁在黑种乡，离县城只有十多里，在一个兵工厂里面。一进兵工厂，他发现四周电网密布，岗哨林立，使人不寒而栗，不像软禁，倒像囚禁。张将军住的是一排五间的平房，左边是小西湖，右边是跑马场，四周群山起伏，环境优美，气候也宜人，是避暑胜地。

我刚下车，就见到赵媿小姐，她做了自我介绍，让我在客厅里等候。我打量这位三十出头的知名少妇，身材苗条，体态轻盈，身穿栗色暗花旗袍。我等了一会，张将军从里面出来，身着白色短裤，连拖鞋也是白色的，显得那么潇洒英俊，神采奕奕，虽然有些苍老，但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雄风。寒暄之后，他请我到书房。

书房里边靠墙是一排书柜，各类书籍很多，排列相当整齐，书案上放着写完的条幅，看到张将军每天在练习书法，案角上放着一部《明史》。坐下之后，张将军对我来访表示欢迎，我说“不敢，冒昧”，心里想，我这个七品芝麻官在张将军眼里算什么，还不如张将军一个副官大，当然，老百姓眼里，我是父母官，一县之长。

我首先问，“张将军，你在这儿还习惯吧！需要什么，只管说话。”

他苦笑了一声，“还算习惯，什么也不需要，只是一听见梆梆声音，心里就不是滋味，不过这里很安静，读书写字挺合适。”

我看了一会张将军写的字，不由自主地欣赏起来，并希望能得到张将军的墨室，张答应以后给我送去。三天之后他们给我送来了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手书，下面署名为“毅庵”。我反复玩味，感到身陷囹圄的张将军，仍然在关怀天下的苦乐。对张将军言而有信的精神，我更是敬佩。

7月末，我再次拜访张将军，“谢谢将军赠我的手书”。他客气地说：“刚开始学写字，写得不好。”他告诉我，他已经46岁了，过去年年轻时过着戎马生活，读书太少，现在才体会到读书的重要性。在祖国大西南边境，很难遇到像你这样的北方人，我过去是一直不会见任何人。”

现在看来，张将军对我还是例外。我们相谈甚为融洽，不觉已到中午饭时间，吃的是家乡水饺，赵媿小姐说，再弄一个“豆瓣鱼”，张将军马上拿起鱼杆，邀我一起去钓鱼。他钓鱼的技术很高明，一会功夫便钓上三四条大鲤鱼，吃完饭，我告辞回城。

1946年9月9日，我又去看望张将军，告知外面的局势，国共和谈破裂，又开始打内战，共军势力逐渐增强，令人实堪忧虑。张将军说：“蒋先生不是说，以不变应万变吗？”日本投降之后，蒋仍对张将军监禁，使张将军心绪很坏，对蒋不抱希望，也就不屑听外面的情况。他说：“我们不谈国事，每次打牌都是三缺一，今天你来正好。”赵媿小姐找来刘乙光团长，我陪着打了四圈麻将，这就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

1947年初，一天下午，张将军派人给我送来一张便条，并带来两卷字画、一对波斯猫。我一看便条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两卷字画是他多年珍藏的王羲之的书法真迹，一对波斯猫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并嘱咐我，猫一定要关好，不然会跑掉，等熟悉以后就安心了，它很能捕鼠，过去有人说波斯猫不捕鼠是错误的。我看完之后非常诧异，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新的情况，是不是又要转移他处，是不是国民党对他要下毒手。我反复想着，彻夜无眠。

我决定第二天去看张将军，可惜我去迟了，在昨天下午，张将军被秘密押走了。我在回来的路上，无精打彩地想，我虽是一县之长，但在张将军眼里算不了什么，可是张将军坦率热情、平易近人，虽是萍水相逢，却对我这样信任，使我非常感动。我一定珍藏这两卷字画，好好抚养这对波斯猫，因为这都是他的心爱之物。

后来我托人打听，才知道张将军已转到重庆，我悬念多日的心，才算平

静下来。

上面是当时贵州桐梓县县长赵季恒和张学良相识的一段往事，谈完之后，我们二人不胜感叹。

1947年以来，张学良和赵媿随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到台湾，到今天已经四十多年了。先住在高雄，后迁新竹，最后迁至北投，过着隐居避世、受监视的生活。张平时深居简出，有时打打网球，有时携夫人在园中散散步，由于耳聋眼花，已很少看书写字，但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我国已故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经常去张学良处做客，二人50年前在北平时就有交往，张学良年轻时嗜爱书画，与当时名画家多有交往。故友往来，宾主甚为欢快。

有一次张大千大师造访，赵媿兴奋地说：“我们在禁中，无佳肴美酒奉献大师，真过意不去。”

大千先生开玩笑说：“你泡的茶，要比佳肴美酒有味。”接着又说：“时间过得真快，几十年倏忽而逝，但赵媿小姐风韵仍不减当年。”

“大师可真会说笑话，时间能不催人老吗？年岁不饶人。”赵媿笑着说。

张学良在旁无限感慨地说：“这么多年苦了她啦！你看她穿的衣服，都成了乡下人啦！脚上的鞋子都是她自己做的。”

张大千一听，有些愕然，他领会错了，以为张学良生活困难，手中缺钱用。“汉公，你们是否要钱用。”

“不！不！”张学良一边摆手一边说：“大师，我们不缺钱用，在美国的几个儿女生活都不错。有个孙子还是电脑专家，经常给我们汇钱来，钱花不完。”

赵媿也接着说：“在这里有钱也没地方花，我和汉卿要钱也没多大用。”

沉静片刻，大家在品茶。张大千边喝边感慨地说：“汉公三十多年来受此苦难，多亏赵媿小姐一直陪伴你，同甘共苦，相依为命，这样的女性世间不可多得，我深表敬佩。”“我看你们二人应补行婚礼，名正言顺，以慰赵媿小姐多年来的苦心。”

赵媿小姐忙说：“大师可别这么说，美意我领了，举行婚礼万万使不得，凤至大姐仍健在，况且待我如亲生姊妹，我怎敢有此奢望。”

张学良接着说：“这事，我早已想过，凤至大姐在美国定居，况且远隔重洋，何况我们所处的境遇，她也不可能回来生活，我多年来一直考虑如何向她提出离婚的请求。”

“那可使不得，对大姐该是多么大的打击，我能陪伴你一生，就是大姐成全的，现在我已经很满足了，不敢再有正名的想法。”赵媿感慨地说。

“你看我一提这事，她左一个不同意，右一个不赞成，说什么也不肯。”张学良向张大千解释。

张大千接着劝赵媿小姐说：“我认为你和汉公已经是多年夫妻，早已成为事实，应当正名。如今社会上又是一夫一妻制，我们岂能越轨，也不应违犯法律。但是于凤至女士远隔重洋，早已成为有名无实了。”

喝了一口茶，他又接着说：“汉公必须和于凤至先联系，我想于女士深明大义，对这件事不会不同意的。”停了一会又说：“现在这种情况和离婚又有什么两样？何况她也七十多岁啦！”

“大师说的很对，但在人情上说不通。我们结婚必须大姐同意，不过你看，几十年来我们不是也生活得挺好吗？”说着，赵媿走了出去。

大千先生接着说：“不，不，结婚这个形式有无并没什么关系，赵媿小姐的贤淑善良、品德高尚是人所共知的，当年就连看守你们的特务都深有所感。戴笠就不相信她能抛弃青春年华和舒适生活到被囚禁的地方来受罪。”

“唉，这些年来确实苦了她啦！”张学良深有感触地说。

在几十年的艰苦优郁的生活中，最后张学良和赵媿在精神寄托上找到了基督，他们在晚年想做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张学良在受洗礼的时候，宋美龄对他说：“依你现在的情况，是不够受洗礼的资格，因为你和于凤至还有夫妻关系，又和赵媿小姐同居几十年，等于同时有两个夫人，这是教规所不许可的。”接着又说：“你应该只有一个夫人，可以给于女士去信，说明情况，看看她的意见。”

于凤至 1940 年因病赴美就医，病愈后一直住在女儿张娴英家中，在距旧金山四十里的一个小镇“多树城”。女婿陶鹏飞博士也经常赴台湾看望张学良与赵媿小姐。宋美龄的话，打开了张学良心灵上的窗子。于是，张学良给于凤至写了封信，托朋友带到美国，目的是就便让这位朋友帮助做做工作。

于凤至女士看到信以后，心情很激动，也很难过，自己因病从 1939 年底离开贵州修文县阳明洞，算来已经 20 多年啦。自己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深感内疚。而赵媿小姐 20 年多如一日，把整个美好的青春年华都为汉卿而牺牲，这种忠贞不渝的爱情，使人敬佩。至于离婚的事，她不但毫不犹豫地同意，而且还感到惭愧，应该自己先提出来才对。

于凤至写了一封长信，从结婚开始写到西安事变，一直到囚禁，到今天。她不但完全同意接受离婚请求，并祝贺他们永远幸福。她写了很多对赵媿小姐表彰赞美的话，对赵媿的高风亮节、牺牲青春、任劳任怨、终生陪监，表示万分感谢。

张学良和赵媿接到信之后，边看边流泪，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深为于凤至坦荡无私、胸怀宽广的高尚情操和祝福他们的深情厚意所感动。

1964 年 7 月 4 日，他们在台北市杭州路，一位美籍友人的家中举行了婚礼。由于事前没有通知，所以参加的来宾寥寥无几。虽然客人不多，却都是极有身份的人，政界的张群、王新衡、何世礼，艺术界的张大千，还有几位外籍朋友，总共有十来个人。

婚礼仪式简单而庄严，请来一位美籍牧师证婚。新郎已经 64 岁了，眼睛也花了，头发也脱落了许多，但精神饱满、神采奕奕。新娘 50 岁，但看上去不过 40 的样子，风韵不减当年，面貌秀丽、体态轻盈，很有风度。

他们二人相携从外面慢慢走进来，向左右来宾点首示意。这就是 26 岁任陆军上将、兵团司令的少帅和天津名门闺秀、美貌多姿、才华出众的赵一荻小姐的结婚大典。他们同居 35 载，今天终于正式举行了婚礼。

这不能不说是奇特的婚礼，他们在一起生活了 30 多年，并在几十年的囚禁生活中相依为命，同甘苦共患难。

赵媿今天特别兴奋，几十年的梦想实现了。几十年不明不白的身份结束了，几十年的艰难困苦换来了正式夫人的称谓，她怎能不高兴呢？

他们两个人感慨万千，如果要在 30 多年前，年轻时候结婚，能如此简单吗？能如此冷落吗？26 岁的兵团司令、上将军、“四大公子”之一的张学良和名门闺秀举行婚礼，那种豪华、排场、宾客是不可想象的。当年张学良主持别人的婚礼时，毫不吝惜金钱，慷慨解囊、大操大办，为部下办喜事，在所不惜，他的秘书朱光沐和朱五结婚时，就是他亲自主持的。抚今追昔，张

学良感慨万千。如今，若是说良心上有所负疚的话，就是很对不起赵媿小姐。她一直跟我受苦，到今天年过半百才取得夫人这个地位，几十年的囚禁生活，为我受苦，她没有一句怨言。一想到这里，张学良就觉得，对赵媿的人情债，今生是难以补偿的。

赵媿知道张学良的心事，她赶紧说：“汉卿，今天我太高兴了，我陪你走回家去吧！”

下午，他们二人告别了各位来宾朋友，又回到了北投。在夜色来临的时候，二人对坐谈心，心情格外激动，久久不能入睡。

张学良说：“我们共患难30多年，今天终成真正夫妻，可真不容易呀！你仍旧是30多年以前美丽漂亮的赵四小姐。”

赵媿苦笑一声，“时光不饶人，现在已经成了老太婆了。老太婆当新娘，晚了两辈子，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们离开大陆二十多年，离开家乡已30多年了。”

赵媿与张学良二人经历30多年甘苦与共，正式结为夫妻，于凤至女士成人之美，顾全大局，令人称道。张学良的两个女人，贤德出众，一时传为佳话。

1930年赵媿17岁时所生一子，叫张闾琳，今年已60岁，一直在美国。他娶妻陈淑贞，是陈济棠侄女，可谓门当户对。生育有二子，长子张居信，1962年生人，1984年在美国史坦佛大学电机系毕业，曾发明一项电脑软件，拥有专利权，每年可得3万美元，才华出众。次子张居仰，生于1967年，现高中毕业，天资聪颖、

大有前途。

张闾琳夫妇俩每隔一年半载，必定千里迢迢由异国他乡来台湾探视。张学良夫妇有此后人、可以告慰晚年赵媿小姐曾获得特许，可以前往美国探视，她每次去都不超过3天，唯恐张学良生活上有困难。由此可见赵媿对张学良的深厚感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现在张学良已90岁，赵媿76岁，赵媿十几年前曾患癌症，手术后身体康复甚好。除了在生活中照顾张学良起居饮食之外，赵媿还很喜欢读书，过去经常帮张学良做明史笔记，现在为张学良读报。她生活朴素，经常布衣、布鞋，一洗过去年轻时豪华、讲究时髦的脂粉气，生活使她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时间过得真快，几年过去了，几十年过去了。已经走过来的日子，回想起来真如弹指间；可盼望的日子是慢的，希望和未来一向是遥远的。张学良将军如今已是90岁高龄，耳聋、眼花、秃顶、步履蹒跚，他的秘书、情人、妻子赵媿，也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五十多年来，她心甘情愿地和他一起生活在囹圄中，来照顾他的生活、顺从他的志趣、安慰他，这样的女人是非常难能可贵、令人惊奇赞叹的。

爱国将军杨虎城

杨虎城将军之死

许矛

- 壮志未酬身陷囹圄
- 义正辞严被押荒谷
- 不堪虐待百感交集
- 触景生情百感交集
- 释放命令一纸空文
- 垂死挣扎暗施毒计

1949年9月6日，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这天晚上，浓浓夜色笼罩着重庆小歌乐山松林坡。山峦、松林、房屋，整个大自然都象披上了丧服，凄凄惨惨。孤零零地耸立在半山腰松林中的“戴公祠”，几束昏暗的灯光鬼火似地闪烁着。就在这里，几个幽灵般的人影出出进进，进行着一场谋害忠良的罪恶活动。

上午，三辆汽车在贵阳通往重庆的公路上急驰。在前面的一辆黑色小汽车中，坐着国民党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曾经和张学良将军率部活捉蒋介石，逼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杨虎城将军和他的次子杨拯中，坐在第二辆车上，这是一辆白色的救护车。第三辆车内坐着杨将军的秘书、共产党员宋绮云夫妇以及他们的小儿子，即小说《红岩》中的“小萝卜头”；还有杨将军的小女儿以及两个副官阎继明、张醒民。

年近花甲的杨将军，紧闭着刚毅的嘴唇，用他那双深沉的眼睛直视着前方。此时他的心情最为激动，他知道，这次重庆之行将最终决定他今后的命运。他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20多岁就满头白发的儿子和儿子手上捧着的骨灰盒，心头一阵酸楚，喉头蠕动着，视线渐渐模糊起来。

整整12年了，这12年中他们一家经受了多少折磨和侮辱，度过了多少个非人的日日夜夜呵！

壮志未酬身陷囹圄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将军，又借口派杨虎城去欧美考察，逼他辞去了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1937年6月29日，杨将军偕夫人谢葆真和次子杨拯中及秘书等随员，被迫登上“胡佛总统号”客轮离开祖国。他人走了，心却时刻惦念着被日本侵略者蹂躏和践踏的祖国。

7月8日上午，客船在烟波荡荡大海上行进着，划破碧绿的海面，掀起一层层白色的浪花。身材高大魁伟的杨将军，笔挺的腰板显示着军人特有的风度。他站在甲板上凭栏远眺，久久地凝视着在那海空之间自由飞翔的海燕。高尔基曾把它喻为革命风暴的渴望者和呼唤者。他在西安事变时不就是渴望抗日风暴的海燕吗？而如今在全国抗日风暴即将到来之际，自己却被迫离开了祖国，离开了抗日风暴的中心，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呵！

突然，广播里传来了七七事变的消息。他紧紧地握着栏杆，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渐渐地他那细长的眼睛睁得又圆又大，愤怒的目光如两道利剑直视前方，仿佛侵略者就在他的眼前。此时，他心潮起伏，象那狂怒的海浪。祖国在受摧残，人民在铁蹄下挣扎，战士们在浴血奋战。而自己这个经历20余年戎马生涯的革命军人，曾立志要象岳飞那样“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赶走侵略者，可如今却在这江山破碎、人民遭涂炭之际出走国外，满腔抱负不能得以施展，难道还有比这更让人痛心的事吗？他激动得满面通红，两手紧紧地握着铁栏杆，好像要把它捏碎似的。

七月九日，客船一到达火奴鲁鲁，他就急切地驱车前往当地中国领事馆查询华北情况。并致电宋子文，询问战事。宋子文回电：

“芦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

听到日寇增兵，国民党准备对日作战的消息，他更是归心似箭，迫不及待地想回国参战。他迈着军人特有的坚定脚步，在室内来回走动，然后，双手叉腰，站在今公桌前口述一道电文：

“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第一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委座。”

杨将军如此赤子之心，却并不能使蒋介石回心转意。回电说：

“以目前情势观之，诸稍缓返国。”

他又两次去电要求回国，均未得到准许。他哪里知道，蒋介石根本不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执意排除异己。对曾逼他抗战，扣留了他十几天的杨将军，更是恨之入骨。他怎么会同意杨将军回国呢？

随着国内战局的扩大，杨将军早已无心继续在美国参观。他决定离美去欧洲，进行抗日宣传后返国。他在欧期间，以巴黎为中心，四处奔走，呼吁各国政府和反法西斯团体给中国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同时决定取道苏联秘密回国。由于国民党方面从中作梗、阻挠，以及苏联方面的种种原因，他未能成行。

后来，杨将军在欧洲的抗日宣传活动，引起了蒋介石和四大家族的不满，说他有“左倾言论”，让宋子文以个人名义“请”他回国。消息传开后，许多朋友、侨胞、留学生接踵而至，到他下榻的旅馆看望他，有人担心蒋介石对他进行报复，劝他不要回国。他异常激动地说：

“不到海外，不知国弱的耻辱。弱国的侨民，无时无刻不盼望祖国的强大。在国外这段期间，多少侨胞拉着我的手，声泪俱下地说‘将军回国后，

定要规劝各方，枪口一致对外，打走日本鬼子，这将是我们的海外侨胞的莫大幸福！’我身为革命军人，岂能坐视日寇肆意横行？日本军国主义在九一八之后，又发动了七七事变，妄想侵吞中国，独霸东亚，这血海深仇，岂能不报！我恨不能马上就到前线去，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一席话，激动着在坐的每一个人，许多留学生即表示要随杨将军一道回国参战。

1937年10月29日，他终于不顾个人安危，登船离开马赛回国。就在听到他启程回国的消息后，蒋介石立即召戴笠去南昌。他面色阴沉地对站在他面前的戴笠说：“他回来得正好，你马上布置人把他抓起来，看他再跟我作对！”戴笠奉命赶到武汉，派军统特务队长李家杰精选20余名便衣警卫，去南昌布置。他煞有介事地一个个传见了他们，详细作了交代。蒋介石还不放心，又加派了一个宪兵连，负责事后共同押解、看守杨将军。这时，他们最担心的是杨将军直接回到西安，所以又在香港作了周密的安排。

11月26日，杨将军一行终于到达香港。前往欢迎的人很多，有特地从西安赶去迎接的一七七师副师长王根僧，杨将军的原秘书、共产党员王炳南同志等；有香港的爱国同胞及朋友；也有戴笠派去的便衣特务。杨将军刚在九龙半岛酒店下榻，就先后收到蒋介石、戴笠的电报。蒋介石电嘱他去南昌见面，戴笠则电约他去长沙会合，再一道去南昌。宋子文也及时送来去长沙的飞机票。

这时，杨将军的部下已经发现在酒店周围有人手摇折扇、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贼眉鼠眼地监视着来往行人。他们担心蒋介石存心不良，劝杨将军先回西安。他们说：

“十七路军官兵日夜盼望你早回西北，领导他们抗日。我等就是带着这种愿望来欢迎你的。”

杨将军若有所思地答道：

“我既是奉命出国考察的，回来了，当先去南昌汇报。我已电告蒋和戴笠，明日起飞，所以不能再缓。回西北大后方，只好放在第二步了。”

部下告诉他蒋介石不讲信义，爱记私仇，有必要多加考虑。杨将军坚定而严肃地说：

“我回来心地坦白，只为抗战，别无他求。宁使蒋负我，不能使我负国家、民族。个人利害，在所不计。”部下见他态度如此坚定，即决定王根僧陪同前往，其眷属等人先回西安。

杨将军在长沙未见到戴笠，又赶到武汉。在武汉，戴笠表面上组织人热烈欢迎，暗地里早已派特务严密监视。戴笠陪杨将军到南昌后，便把他们安置在百花洲寓二伟路的一幢小洋房里。住进之后，王根僧就发现房屋四周布满了岗哨。他对杨将军说：

“看来我们已被监禁了。”

一向胸怀坦荡杨将军，根本没想到让他来南昌正是蒋介石的诡计。他不相信地说：

“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

“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往往是不正确的。”王根僧不放心，就挟着衬衣、手巾，佯装出去洗澡，想去试探一下。他刚走到门口，就被持枪的卫兵拦住，说外面风声不好，不能出去。他折返楼上将情况告知杨将军。杨将军习惯地双手叉腰站在窗前，然后一只手拍着自己的脑门，长长地叹了口气。

气，半晌没答一句话。这时他才明白，自己确实是被软禁了。

不久，戴笠借口敌机常来轰炸，城内不安全，把杨将军迁往乡下，还不让王根僧跟去。临别时，杨将军握着王根僧的手，嘱咐道：

“速返前线，告诉十七路军官兵，要上下一心全力杀敌。”

王根僧激动地连连点头说：

“请放心！望多保重！”

十七路军官兵得知杨将军被无辜监禁，义愤填膺。为了能照料杨将军的生活，决定让杨将军夫人谢葆真前去。这也正是杨夫人自己的心愿。她便携次子杨拯中一起来到了杨将军身边。

看到夫人和爱子，杨将军感慨万分，他抚摸着爱子的头对夫人说：

“想不到壮志未酬，却身陷囹圄。”

义正辞严被押荒谷

1939年，南京沦陷。杨将军一家被迁押在贵州息烽县阳朗坝看守所。这期间，蒋介石曾多次派戴季陶、朱绍良等人去诱骗杨将军写“悔过书”，都被杨将军顶了回去。

戴笠亲自出马了。他一到阳朗坝看守所，就让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请杨将军共饮。席间，戴笠谈笑风声，对杨将军倍表关切。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

“你老兄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共产党不知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糊涂了，跟委员长作对。看看，现在你是满腹雄才不得施展，何苦来呢？我说你呀，不如来个声明，把共产党在双十二事变前欺骗、挑唆你的事揭出来，那什么事也就一了百了啦！”

戴笠也是奉蒋介石之命前来劝杨将军悔过的。让他承认西安事变是受了共产党的欺骗，想以此来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作为诬陷共产党的政治资本。

听到戴的一番话，杨将军把举到嘴边的酒杯“哐”的一下放在桌上，猛地站起身，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背对着戴笠，站在窗前说：

“我和汉卿发动事变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争取委员长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我有什么错？从国外回来，我无非是想当一兵一卒，上前线杀敌。可人家竟不让我上前线，还要我悔过，说我受了欺骗。到底要我悔过什么？到底是谁欺骗了我？！”

他越说越气。他想起自己同共产党多年的交往。自北伐战争起，他的部队里就有不少共产党员。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进行“清党”时，他还在部队里秘密留下一批共产党员。他自己虽然没有参加共产党，但他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坚决拥护孙先生关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多年来，他一直与共产党保持联系，深知共产党是真正为国为民的。在西安事变时与共产党合作完全是出于自愿的。早在1933年，他就在部队里公开提出了“摒绝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的口号，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现在要他写什么声明，岂不是自欺欺人吗？想到这里，他转过身对正盯着他的戴笠说：

“我问心无愧，没有什么可悔过的。”

阳朗坝看守所位于群山峻岭之中，远处山谷中那高大的监狱围墙上布满纵横交错的电线和铁丝网，还有荷枪实弹的游动哨兵。那冷酷森严的气氛，令人触目惊心。被杨将军碰出来的戴笠，在特务队长李家杰的陪同下，气恼地在山坡上走着。当他看到远处山下公路上来往飞奔的各种车辆时，不由得摇摇头，转身对李家杰说：

“这个地方离公路太近，太不保险了，你们另找一个地方，好好看押他。他太顽固了。”

戴笠的话对特务们就是“圣旨”。他们终于在距息烽县城十几里远的深山峡谷中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地方。这是一个位于半山腰的天然大山洞，人称“玄天洞”，有十丈多高。一块大岩石从洞口向外突出，象要崩塌下来。洞内有一座道士庙，只有一个大洞口可供出入。特务将道士撵出，强占了这个地方。洞外的岩石上下，长满了枝丫弯曲的野生杂木。四周连绵起伏的山峦，长着野生的小树和荒草，渺无人烟，荒僻凄凉。只有在洞口处一块不大的较为平坦的地方，特务们盖了一排房屋，供自己和宪兵们居住。杨将军一

家被押在洞内的寺庙里。

玄天洞本来就位于终年不见人的深山峡谷之中，戴笠仍觉得这里的监狱气氛还不浓，他又亲自布置、精心策划，有意对杨将军一家施加精神摧残。他除在杨住宅四周设有便衣特务看守外，外层宪兵也分两层布岗。宪兵连连部设在后山高地，控制着后山和杨住宅；特务队设在前面上山的路口处。白天岗哨的距离，彼此都能看得清楚，晚上则缩小距离，并采用传更办法：就是用一个大竹筒当梆子，每隔一定时间，就由第一个岗哨先敲几下，梆声刚落，第二个岗哨便接着敲打。这样轮流着一个个敲下去，梆声响彻高山深谷，直到天明。彻夜不停的“梆、梆”声，搅得杨将军一家人夜里一刻不得安宁。

玄天洞内，终年不见阳光，寺庙里阴冷潮湿。杨将军一家在气候干燥的西北生活惯了，很难适应，身体常常生病。杨将军曾多次提出让他们搬到洞外去住，特务们根本不予理采。杨将军只好提出自己出钱在洞外盖房子居住。特务队长李家杰。一向贪财如命，听到他愿意自己出钱盖房子，认为有机可乘，便极力向戴笠请求。戴笠点头后，李家杰就让杨将军拿出四百元美金，偷工减料地修建一所非常简陋的房子，他从中捞了一大笔钱。杨将军生活历来简朴，在国外时，为了节省经费用于抗日，他常常是在不接见外国要人时，就住在价钱便宜的旅馆里。而今却被特务无端地敲了竹杠，心中非常气愤。

可是，特务们并不肯就此罢休，他们除敲榨勒索外，还在生活上、精神上继续对杨将军一家百般折磨。

不堪虐待夫人病逝

夏去秋来冬将至。秋风、落叶、枯草，使荒谷显得更加凄凉。

谢葆真这时正身怀有孕，她坐在床前缝补杨将军的棉衣。这件棉衣已穿了好几年，棉絮已板结成毡子一样。特务们借口径费不足，不但伙食质量越来越差，而且连件新棉衣也不肯给换。谢葆真一边缝补棉衣，一边轻轻地叹息。她看着在屋内无言地走动着的丈夫，又看着正在聚精会神地练习书法的爱子，她不由得难过地摇了摇头。

杨拯中虽然刚 11、2 岁，但深山荒谷的囚禁生活却使他越来越变得沉默寡言，完全失去了儿童应有天真和欢乐。他曾经是一个非常活泼、爱说爱笑的孩子，而今他不能出去上学，除了面目狰狞的特务、宪兵外，又难得能见到一个生人。每日里，他除了看书、练习书法外，常常一个人默默地站在山坡的石头上发呆。他目光深沉、忧郁，小小年纪就有了白发。

杨将军自幼家贫，没有念几年书，深知没有文化的苦衷。他在主陕期间，非常重视教育。如今，他的爱子早已到入学年龄，多次申请送子出去上学，特务们说怕走露风声，就是不许可。杨将军爱子心切，只好求人买来《百科全书》、《万有文库》等书，用自己的全部精力教孩子读书、识字。但他深知这终非长久之计，为爱子的前途十分忧虑。

谢葆真性情较为刚烈，她作为母亲和妻子，内心的苦痛可想而知。她深为丈夫长期无辜被押而愤怒，为爱子的前途、学业而苦恼。为此，她常常大骂蒋介石背信弃义、愤怒斥责那些特务、宪兵禽兽不如。

特务们一直认为谢葆真是共产党员，杨将军的许多行动都是受了她的影响，所以对她的言行特别注意，经常故意地刺激她、折磨她。

1941 年，杨夫人生了一个小女孩，身体异常虚弱。特务们借此机会变本加厉地虐待她，对她的态度粗暴得令人难以忍受，供应的饭菜也粗劣得无法下咽。

有一次，李家杰摇摇摆摆装模作样地走进他们的房间，正在吃饭的杨夫人只说了一句：

“这菜怎么这么难吃？”

李家杰嘿嘿冷笑两声，阴阳怪气地说：

“杨夫人，别忘了这里可是息烽，不是西安。”

听到这冷嘲热讽的话语，看到他那副得意的样子，杨夫人气愤极了，抓起桌子上的饭碗就朝李家杰打去。他一看不好，拔腿就跑了。回去后，他向戴笠打了报告，硬说她患有严重的精神病，要把她同杨隔离，以免“妨碍”杨的生活。

戴笠很快就批准了这个建议，硬要叫谢葆真同杨分居，一个人回到玄天洞寺庙内居住。无论杨将军如何解释、要求，都无济于事。杨将军看到妻子产后的身体是那样的虚弱，怕她受不了洞里的阴冷、潮湿，就请求自己搬进去住，让夫人住在洞外的自己出钱盖的房子里。特务总算勉强同意了，但规定不许夫人和杨将军见面，也不许到屋外活动。

愤怒、忧郁，使杨夫人真的精神失常了。荒僻的山谷中，常常回响着她那凄厉的呼喊声和咒骂声。

妻子的精神失常，儿子的忧郁，如两把尖刀插在杨将军的心上。每当听到妻子的呼喊声，他总是紧紧地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暗暗流泪。有时孩子哭

闹着要找妈妈，他就一边亲吻着孩子娇嫩的小脸哄她，一边任孩子的小手在他那满是泪痕的脸上拍打。

杨夫人的病越来越重。特务不但不找医生给予治疗，反而在一旁幸灾乐祸。杨将军花钱托人请当时息烽监狱里的医官张静甫去给她治病。

张静甫是军统临澧训练班的特务。过去学过几年医，但没有临床经验。监狱里的犯人就成为了他的试验品。他装模作样地给杨夫人治病，病没有治好，却从医药费中捞去不少油水。杨将军只好又托人请当时息烽训练班的医官和老中医给她治疗。直到1944年，杨夫人的病才有所好转。

这时，杨将军自己也因长期忧虑和饮用了玄天洞里杂质过多的泉水而患了严重的胆结石病，常常痛得满头大汗。

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消息传到息烽，杨将军一家人高兴得跳起来。多年来杨将军从没有这么兴奋过。他托人买来了酒菜，举杯庆贺抗战胜利，划拳祝酒之声，响彻了寂静的山谷。他为祖国和人民摆脱了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而激动，为自己一家人可能获得自由而高兴。

在杨将军看来，当初正是为了要求抗日才发动了西安事变，现在日本人投降了，他也被蒋介石关了8年，这下蒋介石对他的宿怨总该消除了吧？

他天天站在山前的路口上，盼望着有人给他带来获释的好消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却没有一点动静。他还以为蒋介石忙于抢收胜利果实，把他给忘了，几次动笔想写信给蒋介石和自己的老朋友于右任，希望能早日释放出去。可是每次都是写了撕，撕了又写，内心很矛盾，总希望蒋介石能自动释放他。

1946年夏天，杨将军突然接到要他全家迁往重庆的通知，听到这个消息，他高兴地一拍大腿说：“总算盼来这一天了！”其实，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打算释放他们。因为军统在息烽的单位要全部迁往重庆，所以才决定把杨将军一家转押到重庆杨家山继续囚禁。到重庆后，杨将军终日长吁短叹，不知这牢底何日才能坐穿。

杨夫人对蒋介石的这种做法更是气愤异常。她经常大骂蒋介石和特务。杨将军知道这样会招来更大的不幸，总是按捺住自己的痛苦，耐心地劝慰她。

8年的苦难折磨，8年的精神摧残，终于使杨夫人又一次病倒了。无论杨将军怎样请求，特务也不找医生给她看病，反而故意刺激她。杨夫人终于不堪虐待，于1947年含恨去世。

谢葆真夫人的死，对杨将军的打击太大了。他们俩不仅是夫妻，而且是同志。自1927年结婚以后，在部队的保守与进步的斗争中，她一直是站在进步一面。他俩的感情一向笃好。杨夫人在生病期间，他曾亲笔给她写信，信中说道：

“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但又无从说起，也无法说完，我甚么都能牺牲了。只是这个爱字离不开我，日夜只祝祷你的病好……”

杨夫人死后，杨将军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常常抱着幼女，两眼直呆呆地，一动也不动地直视着骨灰盒；有时老泪纵横，吃不下，睡不着。连睡觉时，他也把骨灰盒放在自己的枕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身体渐渐消瘦下来，原来说话的声音非常洪亮，现在也变得异常低沉沙哑。痛苦把他身体压垮了，他的胆结石症突然急性发作，险些丧命。

当时，有人把杨将军的这些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听了后只把双臂抱在胸前，极为得意地笑了一笑。

触景生情百感交集

杨家山、幽静而俊美。它山势平缓，秀丽，终年郁郁葱葱，是歌乐山下的一座不甚高大的小山。山前有一条公路蜿蜒曲折地通向重庆市区。这里曾经是个居民区，1942年被国民党特务圈入中美合作所。从此。乌云笼罩，人走屋空，分外阴森、凄凉。

抗战胜利后，特务把杨家山改为囚禁特殊犯人的地方。1946年，杨将军一家被囚禁到这里。

在夫人去世，自己大病一场之后，杨将军意识到不能就此消沉下去，必须振作起来。他想起司马迁说过的一句话：

“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古人尚知人生的价值，自己一个堂堂的革命军人岂能如此脆弱？！从此，他每天坚持锻炼，认真读书、看报，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发展。

一天清晨，他象往常一样，踏着沾满露珠的野草，顺屋后的林间小路上山锻炼身体。清新的林间空气使他心旷神怡。下山时，他忽然想去后山转转，就钻进树林，信步往后山走去。

突然，他看到在林间的一块空地上，有一座已经发黄的石牌坊。他好奇地走过去一看，牌坊下杂草丛生，其间有一座几乎快平了的坟堆，坟堆前立着一块被蔓草遮了一半的石碑，他刚撩开野草，“杨氏佳城”四个大字，清晰地出现在眼前，他不由得一震，忙把手收回来。一只手扶着石碑的栏杆，想到：怎么这么凑巧，同我的姓名只一字之差。他不由得抬头看看石牌坊上面，上面刻着“龙蟠虎踞”四个字，一种凄切之情，油然而生。他双手叉腰，抬头望着远方天空，长叹一声说：

“我的姓名这里早有了，今天我住在这里，将来也必死在这里无疑了……”

这位历经沧桑的将军非常感慨。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杨怀福因反对清政府统治惨遭杀害。他青年时期就参加农民反暴斗争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此，南征北战，驰骋沙场，立志要卫国安民。他曾在诗中这样写道：

万姓倒悬我心忧，
满地烽烟何日收？
联欢民众撑危局，
扫尽群魔定神州。

其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雄心壮志显而易见，而今，日寇虽已被赶走，但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己身死并不可怕，只是“恨私心有所不尽”，因为盼望中的祖国富强，人民安乐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呵！

这天，他心情沉重地回到山下住处。当他看到报纸刊载关于西北战场上解放军一举歼灭胡宗南三个旅的消息时，他的情绪又激动起来。

他虽然曾是国民党部队的将军，但多年的历史事实告诉他，国民党勾心斗角，祸国殃民，而共产党却是襟怀坦白，为国为民。当年发动西安事变，与共产党合作期间，他进一步体会到了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腐败和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常言说：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蒋介石早

已丧尽民心，岂有不败之理！

想到这些，他又为自己将可能无声无息地死在杨家山，不能再度与共产党合作，为祖国和人民贡献力量而惆怅。那座与自己名字相近的坟墓上的石碑又像阴云一样蒙上他的心头，他不信天数，只恨自己将会无所作为地了此一生。

释放命令一纸空文

1949年1月，蒋介石的上百万大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被消灭了；全国人民反蒋浪潮不断高涨；反动派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愈演愈烈。

蒋介石为了缓和局势，宣布自己“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实际上他自己却是“退而不让”，仍然控制着国民党中央的决策大权。

李宗仁上台后，为了笼络人心，以显“政德”，宣布释放政治犯，还特别下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将军。

《中央日报》刊登了这一消息。举国上下尽人皆知，亲朋好友奔走相告，为张、杨两位将军即将获释而庆幸、高兴。

这天，杨将军吃过早饭像往常那样等待着特务把报纸送来。可直到中午，仍旧没见到报纸，他并没有特别在意，因为特务们忘了送报纸也是常有的事。

下午，他亲自找到特务队去要报纸。特务队部就设在杨将军住房的东头。他刚走到队部门口，见几个特务正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见他来了，特务们忙停止议论，象看陌生人一样看着他。他冲着当时的特务队长龚国彦说：

“喂！今天的报纸怎么没给我呀？”

特务队长皮笑肉不笑地告诉他，报纸还没送来。杨将军一向讨厌见到这些特务，只说了声：“报纸来了，就赶快给我！”便转身走了。

几天之后，别的报纸都按时送到了，唯独那天的报纸一直没有看到。他知道，当时的战局天天在变。三大战役的失利，蒋介石的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情况定会有新的变化。他联想到那天特务们交头接耳的情景和几天来特务们对他稍微和气的表情，就觉得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于是他找到龚国彦，非要那天的报纸不可。

原来，龚国彦因事先未得到上面的通知，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也不知该怎么办。他就把当天的报纸扣下来了。在杨将军的一再追问下，龚国彦不得已只好把那天的报纸送来了。

杨将军拿到报纸，一眼就看到了李宗仁下的释放他和张将军的命令。他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一声，说：

“总算盼到了今天！”

当时他心中的激动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他觉得被释放是没有问题了，就忙收拾东西，作好出去的准备。

他哪里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李宗仁“代而无权”，蒋介石是“退而不让”。尽管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下了命令，但蒋介石不点头，任何人的命令也是等于零，根本有没人执行。

自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飞机在南京附近失事后，毛人凤便接替了他的职位，并把军统改组为保密局。他事事以戴笠为榜样，对蒋介石绝对忠实。这时，他正忙忙碌碌地率领保密局的特务往上海撤退。对李宗仁的命令根本就不予理睬。

李宗仁一看命令不能兑现，便直接打电报给重庆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将军。杨森回答说：“毛人凤不在重庆，我不知杨将军被关在哪里呀！”

为了欺骗民众，当时重庆的报纸还登了这样一条新闻：“毛人凤在那里？”内容大致是说：据杨市长谈，因为找不到毛人凤，也不知杨虎城关在那里，所以无法执行代总统的命令。其实，杨森非常清楚杨将军被押之处。

之后，杨森怕事久有变，无法向蒋介石交代，有意把杨将军暂迁别处。他坐上汽车亲自到周养浩，把这一建议告诉了他。他立即打长途电话给毛人凤，转告了杨森的意见。毛人凤取得蒋介石同意，决定将杨将军迁押贵阳。

几天来，杨将军的心情特别兴奋，他把一切都准备停当，只等着被释放了。这天，突然听到特务队长说要把他迁移到贵阳，这消息如晴天一声霹雳，顿时他的脸气得通红，怒不可遏地把桌子一拍，对着龚国彦嚷道：

“代总统有命令放我，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我不走，要死就死在这里！”

龚国彦为了完成使命，只好央求杨将军，但任凭他好说歹说，杨将军就是不走。

12年来，杨将军恨透了军统特务，但对周养浩却有点好感。在息烽监狱被囚禁时，当时周养浩是监狱的主任。他经常去看杨将军，陪他喝酒、打麻将消磨时间，而且待他一向态度友好。

龚国彦见劝说无效，只好请周养浩亲自出马。周养浩装出不知道杨将军要被押往贵阳之事的樣子，一进门便拱手向杨将军贺喜。

杨将军满面愁容地对他说：

“代总统的命令顶个屁，他们又要把我押往贵阳。”

“哦！真有这等事？我如今在公产管理组工作，不了解这里边的事。我去问问怎么回事。”周到了特务队，伏在龚国彦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

不一会儿，特务们就在杨将军的屋内摆好了酒菜。周养浩随着也走了进来，笑着说：“来，我们边吃边谈。”

席间，周养浩和颜细语地说：

“情况弄明白了。因为代总统与委座向来不和，毛局长担心，如果按代总统的意思释放你，怕委座脸上不好看。他想过了这一阵子，劝说委座亲自下令释放你，这对你将来也会好一些。否则他也不好办。依我看，老兄不妨再忍耐一下，到贵阳暂避一时也好，这样对各方面都有利。”

听了周养浩的话，杨将军沉思良久。他觉得这话也有理。毛人凤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他是决不会释放他的。他想，若得不到释放，那什么事也谈不上。只要释放了自己，走什么路，那就由不得蒋介石了。他一向认为，“士为知己者用”。他过去为蒋介石卖命，得到的却是家破人亡、多年被囚禁的下场。而自己曾与共产党合作，深得他们的信任。就在他被迫离职出国时，周恩来同志还亲自冒着危险从西安坐飞机送他到上海。深情厚意，使他久久难忘。想到这些，他决定先“顺从”特务以赢得释放的机会。于是他端起酒杯，猛地把酒喝下去，然后把酒杯一放，说：

“好！我听你的！不过得依我三个条件。”

周养浩满脸堆笑地连声说：

“可以，可以，我一定负责转达。”

“第一，把龚国彦撤了，这混蛋太可恶了，第二，把宋绮云夫妇调来随我一同前往。”

“宋绮云夫妇是共产党呵，就怕不好办。”

“我不管他究竟是什么党，我只知道他过去是我的秘书。如不肯调他们来，那我不去！”

“好，好，我一定转达。”

“第三，得请你老兄送我们去贵阳。在这帮人中间，我也只信得过你，

怎么样？”

三个条件，毛人凤都点头答应了。于是，杨将军又被押到了贵阳麒麟洞看守所。原中美合作所所长张鹤接替了龚国彦的职务。李宗仁代总统的命令便成了一纸空文。

垂死挣扎暗施毒计

几个月后，周养浩又来到了贵阳。他比以往显得更加热情、亲切。他对杨将军说：

“这下可好了，委座到了重庆，要见见你，可能要送你去台湾，到那里就释放你，”

杨将军多次受骗，不相信在全国即将解放之际，蒋介石还要会见他，他不相信地摇摇头，一言不发。周养浩仍打着哈哈说：“老兄，这次可是真的啦！”他每天都陪杨将军上街，逛公园，探朋友，令他开心，又一次骗取了杨将军的信任。

9月6日，杨将军终于答应了和周养浩一起回重庆，一路上，周养浩心怀鬼胎，坐在车内不时看看手表，盘算着下一步的对策。

这天中午，杨将军一行人乘坐的三辆汽车到达四川和贵州交界的松坎，在那里吃午饭。饭后，周养浩看看表，很关心似地对杨将军说：

“坐了这么久的车，你们也辛苦了，反正快到重庆了，在这里睡睡午觉，休息休息吧，不要累坏了，”

杨将军也确实累了，他感激地点点头。

其实，这时候周养浩正在把杨将军引向死路。

8月间，蒋介石从台湾飞到四川，想利用西南的险要地形再与共产党较量一番。

蒋介石一向杀人成性，在这作垂死挣扎的时候，他更是穷凶极恶。他一再对毛人凤说：

“今天之失败，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

一天，毛人凤在蒋介石下榻的地方向他请示：“杨虎城如何处理？”他眼睛一眯，面色阴沉地把手一挥，说：

“杀掉，留他做什么！”

毛人凤毕恭毕敬地说了声“是”，转身就往外走。蒋介石叫住他说：“注意！要押回重庆，秘密进行。”

毛人凤奉命后，立即召集保密局西南区区长徐远举，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和周养浩等人，仔细研究了秘密杀害杨将军的行动方案，并派周养浩去贵阳骗杨将军来重庆。

按特务们的预定计划，杨将军一行人应该是天黑以后到达重庆。在他们从贵阳动身之前，周养浩就偷偷打电话通知重庆方面作准备。到松坎时，周养浩见天色尚早，故意让杨将军先休息一下，借以拖延时间。

下午4点左右，他们才从松坎出发。这次，周养浩坐的小汽车跑得飞快，把另外两辆汽车远远地甩在后面。天刚黑，周养浩的车子就到了重庆海棠溪渡口。

一个特务拦住了车，鬼鬼祟祟地递给周养浩一封信。信是毛人凤亲笔写的，其中写道：

“轮渡已准备好，过江后就回家去，等待消息，一切都安排妥当。”

晚上10点多钟，杨将军的汽车也过了江，在特务队长张鹤的指引下，向小歌乐山的松林坡急驶而去。11点多钟便来到了松林坡下，停在写着“戴公祠”三个大字的铁栅栏门外。听到汽车声，两个特务立即把铁栏大门打开，

汽车直驰进院内，停在一个石台阶前。

杨将军父子走下汽车，不由自主地向四周看了看。周围黑洞洞的，左边是汽车间，右边有一台阶约一米多宽，顺着松林坡的山势向上延伸。台阶两边的松树林，在夜幕中就像两座拔地而起的小山。只有远处的山头 and “戴公祠”大门口有几束昏黄的电灯光。

杨将军疑惑地看了一眼从驾驶室里钻出来的张鹤。张鹤若无其事地说：

“准备在这里住两天，等候蒋总裁接见，同时等待去台湾的飞机。”说完，他就打着手电，引着杨将军顺台阶往上走去。杨拯中双手捧着他母亲的骨灰盒，紧紧地跟在后面。

“戴公祠”正房在汽车房的右上方。人字形的水泥台阶约有三百多级，真通到正房庭院的大门口。大门两旁高大的院墙，向两边延伸，隐没在山坡的松树林中。

张鹤领着杨将军父子刚走到庭院门口，两个特务从院内迎了出来，假装客气地把他们迎上正房的走廊，让进正厅。

正厅正面靠墙的地方，摆着一张八仙桌，上面供着戴笠的灵牌。正厅两边各有一个卧室。一个特务引着杨将军向一个卧室走去，另一个叫杨进兴的特务，拦住跟在后面的杨拯中，指指另一边的卧室，说：

公子请在这间卧室休息。

杨将军父子刚走不久，第三辆汽车就来到了，从汽车里下来的只有宋绮云夫妇和两个孩子。

原来在过江后，特务们说毛人凤要了解杨将军的生活情况，就把杨将军的两名副官阎继明、张醒民带走了，将他们押进渣滓洞监狱。后来在重庆大屠杀时他们也被杀害了。

宋绮云夫妇被特务们领着向汽车间旁边的平房走去。刚一走进门，两个手持匕首的特务正在等着他们。宋绮云夫妇惊愕地瞪着双眼，刚一明白是怎么回事，特务已把他们逼向墙角，凶狠地把匕首刺进了他们的胸膛。

两个蹦蹦跳跳跟在后面的孩子，被这突然发生的场面吓呆了，他俩不约而同地搂抱在一起，“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不准哭！”特务们厉声地喝道。

凶手从未绮云夫妇身上拔出鲜血淋漓的匕首，向着两个孩子走去。他们狞笑着往前一窜，匕首从一个孩子的背上穿到前胸。另一个孩子惊叫一声，扑过去抱小伙伴，只见寒光一闪，他也倒在血泊中。

四周的山峦、松林、天空都静得出奇，仿佛都被特务这种惨绝人寰的罪恶行径，惊呆了。

就在宋绮云夫妇被害之前，当杨拯中进入卧室时，跟在他身后的杨进兴迅速地将匕首刺入他的腰间，他凄厉地惨叫一声“爸”，扶住门框，挣扎了一下就倒下了。

这时，走到另一间卧室的杨将军，听到儿子的惨叫声，知道事情不好，急忙转身去看。就在这一瞬间，跟在他身旁的特务，猛地把刀刺进了杨将军的腹部，他瞪着眼睛，无比愤怒地用一只手指着特务，特务吓得倒退了两步。杨将军一只手捂着鲜血直流的伤口，踉踉跄跄地向儿子惨叫的方向走了几步，便也倒了下去，壮烈地牺牲了。

做贼心虚的特务，为了掩盖他们的暴行，把镪水倒在杨将军父子的脸上，毁坏他们的面容，偷偷地把他们埋在“戴公祠”的花坛里，妄图毁尸灭迹。

巴山蜀水，森林大地，都默默地低下了头，深深哀悼这位因坚持爱国民主立场而牺牲的千古功臣。

1949年11月，解放的炮声终于驱散了黑暗，迎来了光明。在举国上下欢庆全国解放的时刻，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历史功臣。很快就找到了杨虎城等人的遗体，并在延安、重庆等地，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深切悼念这位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全国抗战的民族英雄。

1950年，1月16日下午，嘉陵江畔磨儿石码头显得分外庄严、肃穆。烈士的忠骸移上了摆满洁白花圈的“庆华号”客轮，离开重庆，前往西安南郊韦曲少陵墓地安葬。

杨虎城将军壮烈地牺牲了，他的英名彪炳史册，千古不朽。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唁电中所说的那样：

“杨虎城将军因坚持爱国民主立场牺牲，这个牺牲是光荣的。杨将军的英名将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

土皇帝韩复榘蒋韩交恶真相

孙桐萱

- 叛冯投蒋
- 与蒋明争暗斗
- 孔祥熙斗不赢
- 保实力哪管国土沦丧
- 老蒋诱韩入瓮
- 韩平常得罪人太多
- 落井下石
- 身中7弹而亡

1938年1月间，蒋介石召集华北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在开封开会，韩复榘率领我和我的参谋长刘书香、处长张国选，以及旅、团长等数十人前往参加。韩在开会时被扣。关于扣韩的情形和蒋、韩之间的矛盾。以及矛盾产生的前后过程，现就我回忆所及，分别记述如下。

—

韩与蒋介石政权的矛盾很多。韩的第三路军到山东后，军政部连年积欠的军饷已达一百多万元。韩迭次向军政部军需署交涉。均无效果。该署曾表示，一次可付给八十万元，作为付清。韩不承认，说：“要都给，要不给都不给。宁可都不要，也不能马虎。”因此造成僵局，致使韩部发饷非常困难。韩乃以断然手段将全省所有国税机关和盐务机构，尽换自己私人掌管，税收不交南京一文。孔祥熙曾亲自到济南与韩磋商，规定由税收项下拨交军费，始告解决。

韩当初叛冯投蒋时，贺耀祖代表蒋常驻开封，曾为韩说话，帮了韩不少的忙。后来贺在北平任蒋介石的驻平代表，有次给韩来信说，南京同事大家薪水都不够开支，向韩借十八万元，以便清还债务，韩不肯借。我因事见韩时，韩对我提起这件事，说他没有这么多钱。我说不能多借可以少借，需要应付一下，敷衍敷衍面子。韩仍不同意。此事不但得罪了贺本人，当然也得罪了南京方面另外的一些人。

西安事变发生后，韩曾发出“马电”，主张召集在野名流开“国是会议”，国事由国人共同解决。此电发出的次日，宋哲元由北平来山东，在泺口车站与韩会面，又联名发了“漾电”，不主张用兵，而主张用政治解决。这两个电报都是不利于蒋的。此外，韩又派参议刘熙众赴陕西会见张学良。张派专机到济南接刘，因飞机发生故障不能起飞，刘乃去洛阳设法赴陕。刘辗转到达太原的时候，蒋介石已被释放。蒋对韩的这些举动，也不会不知道，特别是对于韩发出“马电”一事最为怀恨。蒋、韩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实自此始。事后，我们曾问过韩关于发出“马电”和“漾电”的经过。韩说：“那是给张汉卿捧场的，因为他过去在我们打刘珍年时帮了咱很大的忙。后来宋明轩找我商量对时局表示态度，又发了一个‘漾电’。‘马电’的电稿是何克之（何其巩字）由北平到济南和我商谈时局问题时拟交给我的，当时我并

没有细看，事已过去，我想无甚关系。”

七七事变后，冯玉祥率同鹿鍾麟、石敬亭到华北指挥抗战，在冀鲁交界的桑园设立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津浦线北段地区各部队统划归冯指挥。

第三路军在抗日战争初期，改编为第三集团军，下辖两个军、一个独立师、一个独立旅。一个军是第十二军，辖第二十、第八十一两师，我任军长兼二十师师长，第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另一个军是五十五军，辖第二十九、第七十四两师，曹福森任军长兼二十九师师长，第七十四师师长李汉章。不久又增编一军，为第五十六军，辖第二十二、新四两师，谷良民任军长兼二十二师师长，新四师师长吴化文，该师是总部直属卫队旅改编的。

蒋介石明知韩前曾叛冯，冯对韩有芥蒂，韩心里也对冯有所畏惧，不愿再听冯指挥。蒋唯恐宋哲元部被冯抓住，故利用萧振瀛到来处造谣，说冯想更换来哲元、冯治安。因此冯玉祥到桑园召见宋哲元，宋托病赴泰山休养；召冯治安到桑园见面，冯治安亦不去，使冯一筹莫展。

宋哲元部由沧州一带作战败退时，刘多荃、庞炳勋等部均接连溃退，冯玉祥的长官司令部退到黄河南岸，驻在距涿口桥数里的一个庙里。我和总部参谋长刘书香，到涿口桥查看阵地，听说冯到，乃同去看冯。我问冯前方战事如何，冯说：“溃退了。”我问冯怎么办，冯说：“没有办法。”我向他建议，赶快与韩商量一下，由山东派队伍援助。冯说：“韩复榘肯出兵吗？”冯第二天到济南，要韩出兵，韩说出兵也不能挽救败局，不如等前方溃退的部队撤完后，山东的军队开上去再打。冯对韩不满，他在此调动不灵的情况下，只有愤愤回京。

冯回南京后，山东地区划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李驻徐州，后来韩与李的关系处得也不好。

二

当宋哲元部在沧州作战时，韩将展书堂师开驻德州、禹城一带。宋哲元、庞炳勋、刘多荃等部由沧州败退时，韩将曹福林军由胶东潍县调至鲁北增防，防守惠民、齐东一带。

1937年11月间，沧州之敌向鲁北进攻，我军在德州、惠民、齐东之线与日寇展开激战。韩率卫队旅第一团亲赴前线指挥，相待月余。有次韩在济阳城关被敌人装甲车多辆配合飞机数架包围，韩部奋力抵抗，卫队团伤亡殆尽。韩率随从突围，几被敌俘，回到济南时随从人员仅剩数名。在这次战斗中，曹、李、展等师也牺牲过半，调鲁西济宁整理补充，韩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此时我军防线，已转移至黄河南岸。京汉线刘峙指挥的部队，已由石家庄一带撤至河南彰德，刘峙退驻郑州，全面形势日趋紧张。

济南以北黄河防线，由我率第二十师担任。胶东周村以北黄河防线，由谷良民率第二十二师担任。韩命该师由我和刘书香统一指挥。这时于学忠的部队，防守潍县、高密一带。

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南京、浦口即行沦陷，李率同参谋长张任民来到济南，与韩会商战略问题。李提出要第三集团军以沂蒙山区为后方，必要时将弹药给养物资等运往山区，准备打游击战。韩不同意，说：“浦口已失，敌人即将打到蚌埠。他们节节撤退，我们没有了退路，岂不成了包

子馅吗？”李不答。这次会谈，使李颇为难堪，结果不欢而散。

李回徐州后，又数次派人向韩要调回原由中央配属韩部的炮兵团。该团有卜福斯山炮两营，闻系蒋介石新由外国购来，是韩前向蒋借来加强黄河防线的。李要将该团调赴蚌埠，韩坚决不放。韩对来说：“这个团是我直接要来的，你们自己可以向中央要。这团炮在抗战时期，绝对不能给你们运走。”后蒋伯诚也从中斡旋，劝韩交出，但韩始终执意不肯。此事在韩被扣后我去见李、白时，李还非常气愤地提到这个问题。

12月间，日寇由周村以北黄河渡口，集中炮火强渡黄河，攻打周村，谷良民师溃退博山。敌人占领周村、博山等县后，顺胶济铁路向济南前进。泺口北岸同时发现敌人向南岸炮击，济南西面亦受到敌人威胁，情况渐渐紧张。在这情况下，韩因无兵可调，当时想到于学忠部队驻潍县，拟请其援助，暂为支持，然后再将曹、展两师调来增防。韩命我打电话向李宗仁提出此项请求，被李拒绝。李叫我转告韩说：“于学忠部已决定调蚌埠，不调不行。”因此韩对李也很不满。此后，李宗仁指示韩节节抵抗，撤守兖州。韩接李令，偕蒋伯诚竟直到济宁，令曹师在济宁布防，命我向曹县集结，因此造成津浦线徐州以北的空虚，徐州异常恐慌。李宗仁当时来电，责问韩为何放弃泰安，韩在电报上批：“南京已失，何况泰安。”参谋处照原批字眼向李复电，使李更加恼火。

韩在济南危急时，将弹药、给养、医院、修械所及伤病人员、官佐眷属等等，仓卒用火车运送河南漯河以西舞阳等县，事先亦未呈报。车过徐州，五战区来电阻止，并责问说：“豫西非第三集团军的后方，为何运往该地？”韩亦在电报上批：“开封、郑州亦非五战区后方，为什么将弹药、给养存在该地。”韩的参谋处也按原批字句复电。李接电后，非常气愤。据说李将韩的两个复电均转给蒋介石，并说对韩无法指挥。蒋介石认为韩的部队退到河南。将与四川刘湘勾结在一起，乃策划扣韩。

三

济宁布防后，韩驻矩野。一天，蒋介石亲自给韩打电话说：“我决定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在开封开个会，诸向方（韩复榘号）兄带同孙军长等务必到开封见见面。”当时韩的处长们曾坚决劝韩不要亲去，主张派代表参加，而蒋伯诚却竭力怂恿，韩意已决，无法阻拦。韩在起程的那天，先到我的防地曹县，在我军部休息片刻，午饭后同到柳河车站，换乘一列钢甲车开到开封。我和各旅、团长住在省府东边路南指定的一个旅馆，韩偕刘书香、张国选等住盐商牛敬廷的房子内。韩次日迁至孔祥榕（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家里，卫队分驻牛、孔两处。韩随后叫我搬到牛宅，与刘书香、张国选同住一起，以便办公。次日午后约两点多钟，韩到我们住处，和我们一同乘车赴开封南关袁家花园内礼堂开会。

会场内约有数百人，将领中有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于学忠、刘峙、张钫等。蒋介石在讲话中最后提到：“有些人不听命令。你不听命令，你的部下怎么能听你的命令。”散会后，我与刘书香、张国选及旅、团长十余人，同去饭馆吃饭，饭后各回住所休息。

当天夜间两三点钟，蒋伯诚忽然进来对我们说：“向方被扣了！”我三人均大吃一惊。蒋对我说：“你走吧！蒋先生叫你去。”我同蒋伯诚走到门

外，始知军警已将我们住所包围，气势汹汹地将我们拦住，不许出大门。经蒋伯诚给侍从室钱大钧打电话联系之后，始得出门，我到袁家花园见了蒋介石，蒋说：“韩复榘不听命令，不能叫他再回去指挥队伍。”我对蒋说：“他在过去北伐时期作战有功，给国家出了很大的力。不过他的个性太强，有不周到的地方，请委员长原谅他，无论如何留他的性命。不叫他指挥部队，叫他休息休息也好，留在钧座身边，教他力改前非，以观后效，或叫他出国。”蒋介石说：“好，好。考虑考虑，考虑考虑。”接着，他将几个手条拿出来交给我，说：“你当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曹福林当前敌总司令，于学忠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你听于学忠的指挥。你马上回曹县，整顿队伍继续抗战。”蒋同时也召见了于学忠。

我退出后，蒋伯诚、何竞武（陇海铁路局局长）同我乘汽车又去见李宗仁、白崇禧。李、白和方振武三人正在闲谈，我请求他们在蒋介石面前为韩说情。李、白都很生气，说韩不服从命令等等。我一再要求他们念韩北伐有功，多多对韩原谅，李、白含糊其词地勉强答应了。这时有个传令兵告我说，鹿鍾麟几次来电话找我，要我无论如何务必到他那里见见面。我由李、白处辞出后，对蒋伯诚、何竞武说：“鹿鍾麟找我，我去看看他。”蒋、何竭力阻拦，并云：“你千万别去！如果你去，于你不利。”当时火车已经备好，蒋伯诚将我拉到车站，同上火车，当夜返回曹县。据说第二天，蒋继续开会，不但提出韩的罪状，还假惺惺地说如果有人作战不力，向后一跑数百里，均应重办。宋哲元当时眼看着于学忠，两人均立起给韩求情，请蒋从宽处理。这天会后，并未闻有旁人受处分。由此可知，那次开会是为扣韩的。

后来据李汉章对我说，他在韩被扣第二天，即接到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信内云：韩复榘不听命令，由韩个人负责，其余无关，等语。足见蒋对第三集团军其他将领，均直接有所拉拢。

四

我回到曹县后，因蒋伯诚与我同住一室，谈话不方便，就暗中另找一处空房，约刘书香、李树春、王向荣、曹福林等开会，研究救韩的办法。我主张一面打电报要求将韩释放，一面加紧抗战为韩立功赎罪，并说：“如果不行，即集结兵力在黄河边，作强烈的抗争。”大家听了我的话之后，都闭口不言。我对他们说：“我们跟韩多年，都受过他的培养，要赶快营救，才对得起他。”曹福林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说如果这样，部队我们指挥不了。李树春、王向荣说：“今后我们拥护鹿先生吧！”他们对救韩的事均一字不谈。我说：“拥鹿是一回事，救韩又是一回事。我坚决主张打电报救韩。”于是大家始点头同意，随即拟好电报发出。

集会刚完，蒋伯诚派李文斋（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来了解集会情形，曹福林全盘相告，蒋伯诚即据以转报蒋介石。

接着冯玉祥派其亲信孙副官（名字忘记）到我防地，住在吴化文师部（曹县南乡），托吴邀我到师部见面。该副官大哭说：“我是冯先生派来的，蒋介石要杀韩复榘，你们赶快打通电拥护鹿先生当总司令。”我对孙说：“你们与曹福林和各师长先谈谈，只要他们同意我就办，拥护鹿先生我是同意的。”随后鹿鍾麟带着参谋长张知行和参谋、副官、卫队等一行数十人也来到防地，住在曹县东乡。吴化文来给我送信，我对吴说，就请鹿吃饭，酒席

都已备好。因时间未到，我去隔壁与刘书香说话，嘱咐我的副官等鹿到时即去叫我。不久，鹿锺麟乘车到我住处，进门口一看我未在，回头就走。我的副官连说我就来，请他稍坐，底不答，径直走了。迨副官给我送信，我与刘书香急忙跑去迎接时，鹿已返回东乡，我乘车赶到鹿的住处，见鹿道歉。鹿说：“请客嘛，不在家！”我约坐半小时，鹿对救韩事一字未提。我辞出去看张知行等人，对韩事也未谈一句，仅作普通寒暄。鹿在乡间住了两天即返回汉口，似对我有隔阂。隔阂原因何在，当时我不了解。嗣后据说当韩被扣后，刘熙众赴汉见冯请求营救，冯说最好由军队内部想办法。但是在这错综复杂的环境里，我再也找不出救韩的好办法，因而老早就由张钺（韩曾常派他当代表）携款六万元赴汉口活动，多方托人设法救韩；并嘱咐张，如款不足，需要若干，当继续接济。张自汉口返回曹县云：“见到了何应钦、何成浚等人，他们都表示不敢说话。韩平常得罪人太多，无法再托别人。”据说，韩于被扣当夜即由特务人员用专车押赴汉口，关在一所小楼房楼上，禁止与外人接见。

我们保韩电报发出后大约第三天，于学忠到曹县就职，带有参谋长谢珂及参谋、副官、卫士等约四、五十人。于在曹县住数日，仍回蚌埠，留其参谋长等在曹县总司令部办公。

这时曹福林提出，撤换五十六军军长谷良民和二十九旅旅长赵心德，理由是谷失守周村、博山，赵失守千佛山山口。影响山东战局颇大。曹并说，如不撤换他们，我们不能合作。我因曹系当时前敌总司令，为顾全当时的团结，不得已才请准将他二人撤职，将五十六军番号撤销，第二十二师师长由副师长时同然升充。我感觉对不起谷良民，送给他五万元。谷后赴重庆经营商业。

沈鸿烈同时在曹县就山东省主席职，韩任内的民政厅长李树春、财政厅厅长王向荣、教育厅长何思源等仍连任。

蒋伯诚来到山东，名为联络，实系监视。按当时情况，我自己无法单独行动；如果单独行动，连我也有被牺牲的可能，对韩仍然无补。

接着，蒋介石派张之江由汉口来到曹县给队伍讲话，叫大家遵守命令、竭力抗敌、争取立功，旨在安抚韩部。他住了两天就走了。

根说，我们要求释放韩的电报发出后数日内，蒋介石即命何应钦、何成浚、鹿锺麟提韩审问，判处死刑。会审后有人见鹿，鹿说主审人是何应钦，并举了何，韩问答的三件事：（1）何问韩：“你有两个老婆，为何还娶日本女人？”韩愕然，说：“那是沈鸿烈（青岛市长）葛光庭（胶济路局长）他们与我开玩笑，叫过日本条子，逢场作戏。”（2）何问：“政府三令五申禁鸦片烟，你为什么还贩卖烟土？”韩说：“那是宋明轩老早送给我的一千两，家里女人们存着的。”（3）何问：“山东民团枪支，你为何擅自收编？”韩说：“那也许是民团指挥张骧武、孙则让、赵明远他们办的吧！”鹿锺麟在说完这段问答后顿足叹惜说：“你看韩复榘，这不是逐条承认又是什么！真象小孩子一样！”

据我所知，沈鸿烈、葛光庭常会济南，陪韩打牌，亦曾邀韩去青岛，对韩联络无所不至。沈在韩被扣时曾去汉口，颇有对韩落井下石之嫌。后来沈即继韩为山东省主席。

1937年旧历12月23日，蒋介石命令看守韩的特务人员，在韩被禁的楼房内，用手枪将韩杀害。后来听说，当时经过是这样的：有二名特务上楼，对韩说：“何部长请你说话。”又问韩家里有事否，并说：“你写信，我们可送到。”韩说：“我没有家。”遂起身下楼，特务跟在后边连发七枪。韩被杀害后，由孙连仲备棺装殓，运至鸡公山葬埋。

据说蒋在杀韩前，曾请冯玉祥见面。鹿鍾麟、石敬亭向冯说，一定是为韩事，最好不去，故冯托病未去。韩妻高艺珍曾去找冯说情，冯未见。

第三路军由济南运往河南漯河以西舞阳等地存放的物资、弹药、给养、医院、修械所等，于韩被扣后均被后勤部俞飞鹏没收。

后来李宗仁将我军分开作战，在台儿庄会战时，命曹福林率二十九、七十四师，赴滕县以北袭击敌人后路；命我率二十师、八十一师，防守金乡、曹县及以北黄河沿线；命吴化文部乘济南敌军南下、后方空虚时，袭击济南。

台儿庄、徐州沦陷后，日寇顺陇海路向归德进攻，李宗仁退到平汉路以西，薛岳来豫东指挥，任兵团总司令，我为副总司令。薛驻杞县，黄杰率数师防守是德，桂永清军防守兰封黄河。日寇土肥原部渡过黄河，桂军贵退，我师副师长张测民率两旅前往支援。敌人夜间炮击归德，黄杰未察明敌情，夜间一人跑来曹县。我问他前方情况如何，他说溃退了。我在第二天派人去归德侦察，始知归德并未失守。黄杰要我将他送回归德，又防守了数日。归德、兰封沦陷后，敌向开封进攻，薛岳亦退京汉路以西。他临走时给我一电，内有“黄杰、桂永清无耻，不数日连失重要阵地”等语。开封、归德的日军经过杞县、太康向许昌进攻，蒋伯诚也离开此地去汉口。从此这个“瘟神”才离开第三路军。

约4、5月间，我离奉命开往许昌集结。我经兰封、太康的敌后到达许昌以东时，副师长张测民比我早到。我们乘黄河决口，洪水横流，与向许昌进攻的敌人作战。敌人约千余名，撤退不及，被我军打死及淹毙的约四、五百名。我军在许昌驻了不久，即奉令开赴江西瑞金。

韩复榘被扣目击实录

吴锡祺

- 蒋介石宣布：韩擅自撤退、扣交军法讯办
- 蒋欲杀韩，蓄意已久
- 开封会议，仿效刘邦伪游云梦扣杀韩信
- 宋哲元求情
- 韩向来六亲不认，谁替他说情！

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对日抗战毫无准备，战争进行了四个多月，南京即告沦陷，他指挥的军队，从各方面纷纷后退。当时国民党在华北的军队，也各自为保存实力，争先恐后地向河南撤退。蒋介石为了挽救这种分崩的局势，于1938年1月11日，在开封召集北方各将领会议。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驻在新乡，奉命前往参加，我以高级参谋身分随行，兹将目睹韩复榘被扣的一些情况写出，以供参考。1月9日我们乘专车到达开封，宋哲元、秦德纯、过之瀚等下车住在开封图书馆，我和其他随员即住在火车上。次日上午忽然发出了空袭警报，我们当即下车疏散躲避，先听到了炮声咚咚两响，继闻机声隆隆，均以为敌机来到，但紧接着却解除了警报，弄得大家全莫名其妙。事后才获悉，所听到的机声，正是蒋介石的座机，并不是敌机前来空袭。事情是这样的：开封防空司令（姓名记不清了）是蒋军大将刘峙的一位老同学，为了在蒋到时警卫上的方便，临时发出空袭警报，以便断绝交通。不料这个办法，事前未向高射炮队说明，以致在蒋介石的飞机到时，误认成敌机，当命开炮射击，幸而打的不准，没有命中。蒋介石也不知道。只是刘峙把这位老同学撤职了事。11日下午即通知开会，会场在开封南关的袁家大楼，到会的约三、四百人。我随宋哲元出席。会场为礼堂式，宋坐在第一排的座位上，韩复榘坐在宋的左侧，我坐在第二排宋的后边。会议开始后，蒋介石在台上讲话，他手里拿着一本书，先问大家，谁带有步兵操典这本书，结果几百人中，只有一人带有此书。蒋说，在俘获敌人的身上，常常发现带有步兵操典，而我们带这本书的却很少，足见我们不注重战时的教育训练。接着说：“国际形势很好，抗战是有‘把握’的，但是我们要顶得住，大家一定要服从中央和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没有命令，绝对不准擅自后退。要不怕牺牲，如有损失，我一定负责代为补充。”说了些欺骗人的鬼话。中间休息的时候，蒋派人请韩复榘到讲台后边的休息室谈话，刘峙也陪着去了，去后即未再回到会场。约半小时之后，蒋又出来讲话，随即宣布：“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总指挥韩复榘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现在已经把他扣交军法讯办。”当时到会的人，均为之愕然，宋哲元接着站起来，迟迟钝钝地说：“韩复榘不听命令，罪有应得，委员长原谅他是个粗人，没有知识，请从轻办他。”随后宋又回过头来，请大家站起来为韩复榘求情，当时前边的一些人都站了起来，蒋介石连声“嗯嗯，好好”，遂即散会。至于蒋所说的“违抗命令，擅自撤退”，是指的这样一段事实：当日寇向山东进攻的时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电韩说，津浦路方面的敌人，兵力并不大，命他坚守济南。韩竟复电说：“所谓敌人兵力不大，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便擅自放弃了济南。随后又命他守兖州，他也未遵照执行，竟擅自退到鲁西。他的后方物品，大批

地运送到河南的漯河、舞阳一带。李宗仁命令他送到归德，不得逾越战区的范围，他不但未听，还说：“到这个时候，还分什么界限。”当时李宗仁对韩很是不满。蒋介石召集这个会，主要是为了扣韩，借以吓唬北方的一些杂牌军队，进行其借抗战以消灭杂牌军队的惯技。至于蒋要杀韩，可以说是蓄意已久，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在“双十二”西安事变时韩复榘给张学良有个马（21日）电，出诸他的旧友何其巩的手笔，大意是称赞张学良的举动，说他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主张停止内战、共同对外，是一个英明的壮举，表示同情。另外说：“他的部队曾奉南京的命令向西开动，请于接触时勿生误会”等语。在22、3日，蒋伯诚自南京赶回济南，见到韩的马电原稿，马上对韩说：“现在委员长就快出来了，怎么还发这个电报呢？”韩知事情不妙，遂对蒋说：“这都是何克之（何其巩字）搞的，我也没仔细看，就发出去了。”将责任推在何的身上，同时告何说，南京要追究他，叫他当日离开了济南。韩在事变发生后，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以为张学良擒虎容易放虎难，绝不致一下子会释放蒋介石，复张电云拟派代表刘熙众前往西安晋谒，张表示欢迎，并派飞机来接。不料飞机到济发生故障，19日刘改坐火车到了洛阳，找到了空军负责人王某，说是为营救委员长拟搭机赴西安一行，王说正有架飞机拟去西安，刘遂搭乘起飞，想不到飞机降落后，到的不是西安，而是太原，有阎锡山的人在机场迎接。刘乃随机应变地说，他是为了商救委员长而来。当时黄绍竑等均在太原，于是随声附和地参加了营救蒋介石会商，掩饰住自己的身分。不久张学良释回了蒋介石，刘才回返济南。至于韩派刘赴西安的用意，主要叫他到那里先看一看情况，如形势好，即作进一步的拉拢。其次，即在抗战开始时，韩与四川的刘湘已有勾结，负责奔走其间的是和刘湘有关系而又与西北军有渊源的郭春涛（在1927年曾任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经过郭的拉撤，韩即力图保存实力，立意退赴川陕边区，所以韩始终未作抗战的打算。最初，韩拟将后方物资运往河南南阳一带，曾向南京报告，并云有一部分新兵也开到那里训练，南京未直接批复，而是命第五战区予以制止。所以当韩的物资和部队（鲁东专员张向武部的两个团，是抗战开始后由鲁东民团扩编的）经过归德时，战区不准通过，韩不听从，结果还是运到漯河、舞阳一带，准备进一步再向川陕边区靠拢，与刘湘打成一片。这是蒋介石最忌恨的一点。他前前后后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蒋伯诚的耳目。况且在过去7年中，与蒋介石的关系，闹得非常坏，蒋方已经把他列为早晚必除的对象，加以抗战后的所作所为，更足以促成杀他的动机。此时，恰巧有李宗仁告他不听命令，于是以此为借口，决心下毒手。当时大家说，开封会议，是蒋介石仿效汉高祖伪游云梦扣杀韩信的老办法。韩被杀以后，不久刘湘亦死，当时有一种传说：杀了韩复榘吓死刘甫澄（刘湘字）。

在宋哲元到开封之日，当晚韩复榘偕蒋伯诚去看宋，韩向他介绍蒋伯诚，说这个人如何热情，如何诚恳。那时我们全知道，蒋伯诚是蒋介石派去监视韩，并且从旁作他的工作的；而韩竟以心腹人目之，我们全认为韩早晚要吃他的大亏。后来才知道，那次韩去开封之前，并不是没有戒心，最后还是在蒋伯诚的怂恿和保证下才去的。当晚宋、韩二人约定11日下午联名请客，不料是日韩即被扣，届时只剩下了一个主人，客人到的很少，席上彼此面面相觑，均未谈到韩被扣的事。饭后宋和我们几个人，研究营救韩的办法，当时有人说：“韩这位先生，向来六亲不认，我们在河北抗战，他不但袖手旁观，冯先生（冯玉祥任第六战区长官）叫他出两旅人，他也置之不理。当我们撤

到德州的时候，他不但不予支应，反下令不准客军入境，界限分的很清。可是到他撤退的时候，就不讲界限了。他和各方面的关系，闹的全很坏，现在谁还肯替他说话。即使有人说话，也没有一点用处。”宋说：“现在不能谈那些了，他只管不仁，我们不能不义。”随后有人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或可救他不死，就是请他的部下几位师长去个电报，说这次济南的失守，我们全有责任，自请处分，替韩分过，这么一来，蒋不能没有顾虑。”宋很同意这个办法。当即派人（谁去的记不清了）赴鲁西曹县，去找孙桐萱、曹福林等。不久回来向宋复命说，并未完成使命，其经过是：初到那里之后，韩的参谋长和另外一些人，也全赞成这个办法，不过蒋伯诚在那里早已作好了下层的工作，并且把持的很紧，以致这个替韩分过的电报，无法发出。

五虎上将卫立煌卫立煌归来纪实

赵荣声

- 丢失东北的替罪羊
- “杀卫立煌以挽士气”的鼓噪甚嚣尘上
- “战争罪犯名单”帮了卫立煌的大忙
- 大年初一伪装出逃
- 致电毛泽东
- 走向新生

—

卫立煌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以后，他就被扔在一旁，孤独的住在北平东城汪芝麻胡同孙连仲公馆，门前冷落车马稀，除掉傅作义常与晤谈，问长问短，很少有人上门，他似乎被人忘记了。

这时蒋介石匆匆忙忙飞往徐州，去作保卫南京外围——黄淮平原最后决战的准备去了；在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人人自危，害怕东北的解放军即将入关，谁也顾不上去注意他了。他就乘着这个混乱的机会，自己包了一架美国陈纳德“民航队”的飞机，由北平飞到上海，在上海住了一夜，次日又由上海飞往广州。行前没有通知过别人，只给吴忠信发了一电报，说他要离平南下。

到了广州以后，卫氏一家及其随从，下榻于当时广州最高级的旅馆爱群酒店，准备逃往香港。由于卫立煌本来有个对蒋介石不买账的毛病，这次他们一家由北平到达广州，又一路没有受到阻碍，不免有些粗心大意。进了爱群酒店以后，一下子开了十几个房间，来来往往，进进出出，排场很大，在旅客姓名登记本上，是用卫立煌的小儿子卫道然的名字登记的。哪里来的这么个卫道然，到了广州最豪华的酒店包了这么多的房间？他们这些人绝大部分又穿着军装，佩带了手枪，更引起人们的注意，保密局的特务就化装茶房前来探询。

卫立煌自己和夫人、儿子住在爱群酒店的九层楼，其他人员住在较低的层次，卫立煌从第九层楼打电话给下面的青年副官，让他先到香港准备寓所，没想到这些话都被保密局的特务从电话中窃听去了，逐级向上报告，说：

“卫立煌到了广州，要在香港逃跑。”

这时南京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也发现北平和南京均没有看见卫立煌，一听到他到了广州，便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同时叫广州的特务们严加监视，不要让卫立煌活着跑掉。蒋介石闻知此事，即密电广东省主席把卫扣留。广东省主席即派宪兵和特务，将卫立煌所住的一层楼围住，跟着让宪兵团长出面，请卫暂住沙面卫的老部下某人的花园楼房内，外面由宪兵把守。接着由南京派来飞机一架，声称：“总统接你回南京，派专机来了。”

这时跟在卫立煌旁边的有二、三十个部下，看见监视在四周的特务们样子实在可恨，有的主张拔出手枪来拼一场，让卫乘乱逃脱，上那珠江边的轮船，或乘汽车由小路去香港。他们都知道卫立煌青年时期在广东打了几年的仗，熟悉道路，公推卫道然去征请乃父同意。卫道然是卫立煌的小儿子，幼

年丧母，一直跟在他父亲身边长大的，自幼就由乃父教会使用枪支，这时虽然只有 16 岁，已是很高明的射手，平时和卫的随从人员们很是投契。他把这些老部下的主意告诉卫立煌以后，卫立煌说：“不可轻动！开火必有伤亡，你就是神枪，寡不敌众，白流无辜的血，也是无用。我回到南京，他不敢拿我怎样，你要好好劝解大家。”次日卫立煌带着夫人及两名随从，乘专机飞南京。留下的家属和随从人员撤到沙面旅馆内。

二

卫立煌回到南京上海路他自家的住宅，门外已经来了一排宪兵，岗哨密布。卫的随从们询问：“你们这些人来干什么？”

宪兵们回答：“我们来保护总司令。”

卫立煌前脚踏进家门，宪兵司令张镇后脚就到了，装扮成挺恭敬的样子和卫立煌见面，随后向卫宣布蒋介石的面谕：

“你是听候查办的人，在未见到总统以前，不许出门，不许和任何人见面，不许通信、通电话。”

自此，卫立煌就失去了自由，电话线被掐断，卫宅和外界完全隔绝。

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是卫立煌的同乡、老朋友、老前辈，卫立煌初到广东时在吴忠信部下当兵。他过去是蒋介石的盟兄，现在是蒋介石总统府日常事务的负责人，在蒋面前很有力量。他认为卫立煌到东北是蒋介石亲自说过责任不由他负的，怎么现在又对他禁闭呢？跑去问蒋，蒋推不知道，吴忠信又询问张镇：“总统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派宪兵到卫家去呢？”张镇惶恐不知所措，也没有回答出一句话来。

蒋介石所以幽禁卫立煌，中心是一个丢失东北数省责任由谁来负的问题。国民党军队如此惨败，是国民党前途不利行将崩溃的一个显明预兆。对于一些吸尽民脂民膏、富贵尊荣的达官贵人来说，对于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来说，真是惶恐悲哀至极，他们在南京鼓噪起来：

“杀卫立煌以挽士气！”

“杀一儆百，为丧师失地者戒！”

这一股喧闹来热汹汹，看样子，蒋介石确实想枪毙他所不喜欢的卫立煌，发泄自己大打败仗的怨怒。要把东北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卫立煌身上，让他替自己当一个替罪羊。但是蒋介石手下也有人看到：卫立煌杀不得。如果作战失利就落得这样一个下场，现在整个形势被动，还有谁敢带兵打仗？卫立煌跟蒋介石 30 年，出生入死，立过不少汗马功劳，国民党全部军队有很大部分受过他的指挥，很多军官都和他熟识，有交情，现在明明不听卫的意见而失败就要杀他，将要引起很多军人离心离德，没有好处。蒋介石虽然恨卫，觉得这种意见也有道理，只好暂时不杀卫立煌，把他幽禁起来，先让他背着黑锅，以后再说。

这时卫家不但外边有宪兵包围，里面也钻进来十来个歪戴帽子敞开领口的保密局便衣特务。这些特务升堂入室，占了客厅当卧房还不算，还嚷着要上楼，要把铺盖搬到卫立煌和卫夫人的套房外间来往。这时卫的上校副官丁志升出来交涉，坚持拒绝他们上楼。丁副官说：“楼上住着两位年轻小姐，你们上楼不方便。至于要进卫先生和夫人的套房外间，那就太过份了，我们身上的手枪都尝过人血。卫先生身上还佩着手枪，他的枪法杀你们像玩儿似

的，不费事。他的脾气发作，你们先要出血，他也可以以自杀来抗议，将来总统追究责任。你们就吃不了，兜着走。”特务们看见讹诈失败，只好不上楼。从此卫宅逐渐变成这么一个阵线：卫立煌身外包围了三层人物，最外层是宪兵，中间是特务，最内层是卫的多年随从，有从外地赶来自愿保护他的。

睡到半夜，楼下鼾声如雷，没有别的声音了，卫立煌悄悄起来，在一个箱子里，找出一包他珍藏多年的心爱东西，走进卫生间。他揭除一层一层的包袱和锦盒，在微弱的灯光之下把这些东西仔仔细细地看了再看，然后准备销毁。他是多么舍不得，觉得难分难舍啊！这一包东西是四十多封信件和十几张照片，那是从前在延安与毛主席合摄的、和朱总司令在山西前线合摄的。有笔走龙蛇的瘦金书，那是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有规规矩矩的正楷，那是林柏渠同志所写“黄河保卫中原，先生保卫黄河”的勉励语，有其他共产党重要人物的信，其中多数还是朱总司令亲笔写的信。这些信凝结了珍贵的友谊，这些信曾经鼓励和指引过他，他们是一些大公无私、真心真意救国救民的豪杰，他们多么诚恳，多么值得怀念。这些照片和墨迹将来都是应当送入历史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卫立煌保存了十年到了今天没法再保存的时候，实在是舍不得。舍不得也是留不住，最后只好一一把它们销毁了。

特务们一夜没有上楼，到了第二天早晨阳光照到楼上的时候，特务蹑手蹑脚沿着楼梯轻轻爬上来，在卫氏夫妇居住房间的房门钥匙孔中，往室内窥视。旧式门锁的钥匙孔比较大，在室内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钥匙孔中有一颗眼珠在的溜乱转。卫夫人看了觉得害怕，等这个窥视者离去之后，问卫立煌：“他们老从钥匙孔里在里面看，是什么意思？”

卫立煌说：“这个意思你不懂？这是因为这些特务都是些年轻人，还不认识我，要是一天上面命令下来，叫他们执行任务，他们怕枪打错了，报不了功，领不到赏，所以一个一个都来看一下，验明正身，”

卫夫人听了这些话，看见桌上放着手枪，床上放着手枪，卫立煌身上揣着手枪，手里捏着手枪，卫立煌向来喜欢收集各种名牌手枪，现在都拿出来用以自卫了，实在紧张极了。卫夫人想到张学良从前也不过说是软禁一下，一软禁就没有出头的日子，我们今天到这一步，哪是人过的日子啊！

以前官盖如云车水马龙的卫公馆门前，出现了十分寂寞的景象。但是仍然有些不避嫌疑不怕沾惹是非的老朋友和老部下，要求进来看看卫。有的没开口便被宪兵挡驾走了，有的交涉半天也进不了大门。其中有一个关麟徵，黄埔一期学生，飞黄腾达比较早，已成为兵团司令级的将领，也没有闯进来。关麟徵在一怒之下把他自己佩挂将军领章的军装上衣脱下来丢在地上说：“凭这个都进不了这个门，这个不值钱的东西，我不要它了。”

有资格自由进入卫立煌家中不受阻碍的只有一个参谋总长顾祝同，顾祝同来了之后没有别的事，只是叫卫快作准备，到台湾去。这时淮海战役已近结束，蒋介石几个精锐兵团相继被歼灭，最后一点本钱快要输完了，南京高级官员纷纷收拾黄金美钞和细软之物，飞往台湾。凡是不打算逃往台湾的大官都被认为想投降共产党，特务们要进行暗杀，一个不留。顾祝同自己家里东西已经搬完，连一床棉被也没有留下，他现在秉承蒋介石意旨并以老朋友的身份，来劝说卫立煌快走。卫立煌听了这话，不置可否，只是带他进入卧室先去看看卫夫人韩权华。

这正是韩权华休克躺倒的第三天，三天没有吃什么，奄奄一息，正在抢救。从她极度衰弱的病容上可以看出她的病情非常严重。顾祝同说：“横直

是不行了，让她留在这里，你自己先走吧。”卫立煌说：“这样的病人能够长吗？我看她是活不了，等她死了，办了后事，料理一下就走，要是能够活过来更好，我带她一起走。”顾祝同见她面色象黄蜡一般，呼吸微弱，象个快死的人。医生也说病情严重，好歹很难说。顾祝同没说什么就走了。

特务们不管这些，按照他们上级的指示，要对不去台湾的大官进行暗杀，决不留情。说也侥幸，12月25日解放区电台上公布了战争罪犯名单，在43名国民党战争罪犯当中，卫立煌的名字赫然列在13名，这就帮了卫立煌的大忙，使反动派最担心怀疑他“通敌”者，不能自圆其说。在特务看来，你敢不走？共产党来了也饶不了你。从此之后，特务们对于卫立煌的监视似乎有点松懈，听任他去抢救韩权华。

淮海战役打的干净利落，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相继被歼灭；守在徐州的杜聿明、邱清泉非常天真的等待解放军在四郊合围。那么他们就能在空军配合之下，凭着钢筋水泥的工事和机械化队伍对解放军来一个大歼灭战，发挥最猛烈的火力，把来攻者杀光。事实上他们的梦想完全落空。徐州紧紧被围，完全孤立，城里没有吃的，蒋介石只好下令撤退，几十万人夺路而走，到了徐州以南的永城全部被包围，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毙，蒋介石所依靠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全部完蛋。在这种情形下，全盘战争的胜负已完全定局，蒋介石见大势已去，没法挽回，只好改变策略，演出另一幕丑剧，他自己宣告下野，退居奉化，让李宗仁出来当代总统，高唱和谈，企图用这种办法拖延时日，苟延国民党的统治。

三

李宗仁登台宣称要采取几项进步措施，一新耳目，改变国人对于国民党的不良印象。其中比较迎合群众心理也比较容易做到的一项就是释放政治犯。1月24日，李宗仁代总统特饬行政院，取消戒严令，释放政治犯。这时候蒋介石本人虽然走了，但是实权并没有交给李宗仁，李宗仁想释放政治犯也释放不了。比如李宗仁有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意思，蒋介石连理睬也不理睬。李宗仁释放不了政治犯，但是他的有限权力也允许他做一件好事，就是下令撤走了卫立煌住宅外边的一排宪兵，把截断多日的电话线又给接通了。

1月25日，卫家的电话铃声又叮叮地响了，拿起电话筒一听，第一个打电话来的乃是代总统李宗仁自己。这位代总统在电话中对卫立煌说：

“俊如兄，委屈你了！我已下手令恢复你的自由。”

卫立煌连忙道谢，表示对代总统的感激。此时卫立煌听说他家门外的宪兵已经撤走了，樊笼拆除了一半；但是大门以内的特务仍然没有走，仍然在执行监视任务，这些特务说他们只听命于逃往台湾的特务头子毛人凤，在毛人凤没有给他们以新的指示以前，他们不敢擅自撤离卫宅。所以卫立煌在电话中要求和李宗仁见一面，并请李宗仁派人派车来接他。片时之后，代总统的车子来到，车上坐有总统府的参军，卫宅里的特务不敢阻挡，卫立煌便被接到傅厚岗李代总统的官邸中去畅谈一夜。10年以后，李宗仁在美国口述其生平历史，由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唐德刚帮助他笔录而成为《李宗仁回忆录》一书，其中记有卫立煌被“释放以后，卫氏感激涕零，特来向我拜谢，一夕长谈……”一段。《李宗仁回忆录》可议之处不少，但对于国民党在东北战

败的经过和原因写得还是客观公正，描出了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这本书中写道：

东北在大势已去之后原不应死守，而蒋先生一意孤行，下今死守到底，实犯兵家大忌。最后锦州之战，如蒋先生从卫立煌之议，不胡乱越级指挥，则国军在关外精锐不致丧失殆尽，华北亦不致随之覆没，则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或可再苟延若干时日。蒋先生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将全部战败责任委诸卫立煌一人。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立煌释放。卫氏感激涕零，特来向我拜谢，一夕长谈，我才明白东北最后战败的情况，原来如此！

卫立煌和李宗仁畅谈之后回家，看见在他家中的特务还在那里。不过在门外的宪兵们撤走之后，形单势孤，色厉内荏，神魂不定罢了。

门外没有宪兵，绿衣送信人就敲门而入，特务们拿到信件乱拆一气，随便看看又随手扔了。其中有一封信是江北第一大丛林扬州高旻寺某长老写给卫立煌的。20年前卫立煌参加龙潭之役，击退北洋军阀孙传芳，曾经驻扎在这个风景幽美的第一大丛林里，与这个高僧结成了朋友。如今这位和尚听说卫立煌兵败回到南京，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建议他重来高旻寺玩玩散散心。特务们看了之后，叫女仆把这封信送往楼上，并说“有人请卫总司令去当和尚”。卫立煌看了这封信以后心中明白，这分明是江北的朋友借用和尚名义劝他渡江，这时长江以北完全都在解放军的控制之下，渡江就到了解放区。这个写信的朋友的好意是可感的，但是这时江防严密，两岸之间不见舟楫，渡江是不可能的，他只有望江兴叹。

李宗仁在接见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时，把释放卫立煌的事当作他的一项德政，告诉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师大校长袁敦礼和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三位校长离开傅厚岗李代总统官邸之后就来到卫立煌家，探访这个重新获得自由的老朋友。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为卫夫人韩权华的五姐。梅贻琦和卫立煌有连襟的亲戚关系，袁敦礼和韩家也沾一点亲戚关系。他们到了卫家便直接上楼，进入卫立煌的房间。寒暄之后，校长们就很关心地询问卫：“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卫立煌说，“顾墨三（顾祝同）正在逼我去台湾，我不想去。”

梅贻琦说：“当然不能去，去没有好结果。你不象我们，我们只有跟国民党殉葬了，没有办法。”

袁敦礼说：“你为什么不去呢？”

卫立煌说：“楼下还有几个特务守在这里……”

顾毓琇说：“这些人还不容易打发？这是什么时候了，南京眼看守不住了，他们不想逃跑？我看啦，送几个旅费就打发走了。”

三位校长刚走，一个短小精悍、满口江北口音的汉子，昂首走进大门，略事招呼卫的随从，径直跑上楼去。此人乃是在北伐前就和卫立煌熟识的李明扬。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第三战区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寒暄了几句以后，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卫立煌：“坚决不能去台湾，坚决不能去台湾，我们跟了蒋先生几十年还不了解他？到了台湾一定要下你的毒手！”

“那么你认为怎么办好？”卫立煌问。

李明扬附耳说：“快逃跑，外边的情况我知道，一出南京城，就脱离了危险。现在整个京沪沿线都有新四军，一路平静无事，你乘汽车到上海，只要上了外国轮船，就算脱了虎口。”

李明扬走后，卫立煌先和韩权华商议，然后又全家商议，订出逃跑的计划。吸取了前次在广州对蒋估计错误的教训，拟定了完整的脱逃方案，设想

在哪些地方会遇到危险，考虑了应付这些危险的对策。

第一步准备工作是让张学诚副官向特务们发动进攻，压一压他们的气焰。这个张学诚副官从北伐以后，跟随卫立煌 20 多年，此时已经升至上校，也是一个身经百战，临阵骁勇、枪法娴熟的人。此时乘着李宗仁撤除宪兵的风势，在盛气之下去找特务领班说话。他开言道：“现在李代总统已有手谕，撤出总司令家的一切军警，包括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走？想在此地捞什么油水！”特务们见宪兵走后，人单势孤，本已心虚，见此架势更是心慌，硬着头皮说：“我们也听上级命令行事，大家都是在外面混饭吃的，没有命令怎么敢撤离。”

张学诚又说：“现在李代总统的命令就是最高命令，你们是不是军人？总司令已说，限你们四小时撤走。老子们打日本还怕，枪林弹雨都经过，难道还怕你们？我一个人一发火就能把你们全都撂倒，你信不信？”

特务们住在卫家多时，对于卫家的随从都已熟识，知道从厨房里的大师傅到勤杂人等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军人，副官和卫士更是一些年富力强的射击手。特务领班衡量了一下力量的对比，他们 10 个顶不上卫宅 30 个能打的，要是冲突起来，自己要先送性命，立刻回答：“大家都是吃公事饭的，有事好商量。”这么一来，特务们都搬到一间汽车房里去住了，同时向某处上级请示。卫宅有几个汽车房，这是一间离正房较远的，把特务们挤入此处，就有活动的余地了。

第二步准备工作是试用汽车。司机借故把停放了多时的汽车开出去溜一圈，看看汽车有没有毛病。试验结果很满意，司机回来不动声色地将汽油加足，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完。

转眼之间已经到了阴历除夕（1月29日），蒋山青，秦淮碧，曾经做过六朝都会的南京城，向来都有热热闹闹过春节的风俗。每个家庭都要办些丰盛的食品，团聚全家的成员，共进春酒，预祝明年一切顺利。但是今年的卫公馆里，人家不象人家，冷冷清清，谁都无精打采，个个长吁短叹。到了这天晚上 8 点多钟，厨房里还没有开出饭来。剩下 8 个住在房里的特务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显得百无聊赖，就有四个家住南京的特务自行离去，回到自己家中和老婆孩子共吃年夜饭去了。最后剩下四个特务都是江北人，回不了家，也无处可去，等着开饭，可是厨房里到了 9、10 点钟还没有动静。不要说没有酒菜，就连平常的饭也没有开出来，他们饿的难受，自己叹息：“这一行真他妈不是人干的。”这时就由唱白脸的丁志升副官乘机和他们攀谈，“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人总是家里过年合适。这个时候，能够和老老小小在一起，就是穷点，也比一个人在外头混强。”

特务说：“我们也是这样，谁愿意在外面过年？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共产党来了活不成；共产党不来，上面一不高兴就枪毙，也不是人过的日子，在外边死不如回家死，回家死骨头还能葬到祖坟里。”

丁副官说：“为什么不象你们那几位弟兄一样回家去呢？”

这 4 个小特务说：“不瞒你说，我们混到今天，混得买一张车票的钱都没有。”

丁副官看见这 4 个小特务的确没钱，就答应帮忙给他们筹钱买车票，并且想法子代他们找几个零花的。这样丁副官和他们最后达成协议：特务回乡。

一直到 11 点才开出晚饭来，特务们吃完饭马上便走了。

四

特务走了之后，卫立煌才算解除了束缚，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他们全家行动起来，看看附近有没有暗藏的特务，出门有没有人盯梢。卫立煌自己也进行化装，穿上蓝色棉袍子，头戴瓜皮帽，围上蓝围巾，足登老棉鞋。最重要的是在脸面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把留了几十年的一撮胡须剃掉了，并且带上了眼镜，太阳穴上贴了一张头昏膏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20多岁在粤军当营长时，人称“小营长”，有轻视他年轻的意思。他为了表现老成，从那时起就留起了一撮胡须。从此，这一撮胡须便成了卫立煌的特征。今天，他打扮成这个样子，让人看了怎么也联想不到是卫立煌。

到了夜间4点钟，卫立煌带着几个随他久经战阵的亲信随同，另外还有一个到上海为他安排住处落脚的多年友人朱映霞女士，在夜深人静当中缓步走向他的汽车。上车后，卫立煌问道：

“都准备好了吗？”

在车上几个全副武装的随从都回答：

“准备好了。”

这是卫立煌的口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马达轻微一响，即刻转动。卫平素喜爱汽车，所以他的汽车性能最佳，总保持在最佳状态。汽车开出门口，凡是知道这一行动的旧部，都肃立在车旁，目送卫立煌上路，并且祝愿他一路顺利。这也许是最后见面了，卫立煌不觉热泪盈眶，挥手和这些多年共生死的部属告别。

汽车一出门，经过几条大街，即直奔公路，向着东方驶去。在平常的年代，按照旧风俗，元旦尚未天明之际，是市民们酒醉未醒，燃放鞭炮，忘其所以，或者是打了一夜麻将牌、倦极欲眠的时候；现在兵荒马乱，正在天翻地覆的紧要关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或无限欢欣，或悲痛欲绝，家家关门，户户紧闭，显得十分沉寂。此时国民党的一些残兵败将，最害怕的是解放军强行渡江，沪宁一带的一些队伍都摆在沿江一线，非常恐惧地注视着烟波浩森的江面上的动静，对于背后公路上的交通则无暇过问，看见是高贵的小汽车则更不去注意。后来汽车到了镇江以东，路上车马喧闹，行人擦背挨肩，卫立煌的车子无人查问，到了华灯初上之前，很顺利地进了上海市区。

这时上海也是乱纷纷，汤恩伯的队伍集中上海，骗人的说法是“保住上海半年，国际间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就能直接参战”。其实是争取一段时间，保卫上海这个码头，把储存在上海的大量黄金、白银及其它各种值钱的物资尽皆抢窃运送台湾。特务们此时在上海也准备要暗杀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张澜先生等等，对于计划以外汽车中人则无暇多管，所以卫立煌的车子安然开到上海市区中朱映霞女士的亲戚家。朱映霞女士是什么人呢？她的丈夫江先生原是卫立煌的老部下，朱映霞自己则是卫立煌前妻朱韵珩青年时期在镇江崇实女校就读时的同窗好友，一向往来频繁。1939年，卫夫人朱韵珩因医疗事故卒于成都，朱映霞见卫立煌远在洛阳，她好友的子女幼小无人照顾，便在成都卫宅帮忙照顾过一个时期。1946年底卫立煌与韩权华远游欧美，又请朱映霞帮助看家，朱映霞实际上成了卫府上主持家务的负责人。这时卫立煌的汽车所开到的朱映霞的亲戚家是一所很宽敞的资本家的住宅，除去尚有一位老先生留守，其余的成员都已去香港，房屋空闲着。卫立煌暂时

就在这里待避，同时由他的随从到码头上去买船票。

五

南京的卫公馆里，在元旦这一天，一切和平常一样，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之处。有个家住南京的特务放心不下，大约在上午10点钟左右摇摇摆摆地来了，察看这里有何动静。丁副官听见电铃响前去开大门，这个特务和送报的同时进门，丁副官连忙招呼特务请坐喝茶，同时拿着报纸向女仆高喊：

“报纸来了，送到楼上总司令那里去。”

这个特务见到卫家安安静静，总司令还在楼上看报，就放了心，没坐稳就走了。

这天上午，卫立煌的长子卫道杰和平常人家的青年一样，穿上过年的新衣服到电影院看电影，遇到另一个昨晚回家的南京特务，点头问好。这个特务问道：“总司令好？”

卫道杰说：“很好，没事。”这个特务看到卫道杰悠然出外看电影而总司令又好，想必无事，就没有再来卫家。

这天下午3点，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打来电话，要卫立煌接。此时卫立煌不在，只好由卫夫人韩权华接。吴忠信传达蒋介石的指示，要卫立煌赶快去台湾。韩权华回答说：“我们正准备去台湾，俊如要和老太太一齐走，现在自己到芜湖去接老太太去了。”吴忠信知道卫立煌事母至孝，抗日战争期间曾把她接到成都，抗日战争胜利后，老太太思念故里，回合肥去了。现在卫立煌去台湾要接她同去，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吴忠信就没有再问。

不久，卫家的汽车由上海开回来，司机报告韩权华说：“一路平安，没出事情，船票也买好了。”当晚韩权华料理家务，让司机好好休息一夜，到了阴历初三的早晨，卫家的汽车再一次驶往上海，韩权华也告别了南京城。

卫夫人到达上海，卫立煌和她分头登上英国轮船，他们就算安全脱险，此时就是国民党特务发现，也不敢到外国轮船上捉人。不久，轮船启航，次日驶过台湾海峡，卫立煌和夫人庆幸，他们现在已经从罗网中飞出来了。

六

他们初到香港，用了假名字住在旅馆里，不敢出门。后来找到韩权华一位亲戚，是个当医生的，正好其寓所的楼上有一层楼房要出顶，卫氏夫妇立刻顶下这层楼安居下来。进出不敢走正门，凡有客人来访，都要先在后门上的了望镜中看一看，必须是认识的人才开门，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特务在香港非常猖獗。

卫立煌就这样韬光养晦在香港当上了海外寓公。他对于国内的时局变化仍然非常注意，一连写过三封信给他的老部下陈铁，叫陈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时机。他不知道这时陈铁在贵州已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人员接上头，就要起义了。

1949年9月19日，天气很热，卫立煌夫妇到海边兜风去了。回来后，家人告诉他们：“有两个客人来访：一个客人高个子、方面大耳，一个客人留胡子，象日本人，都没有留下姓名。”卫立煌一想：这个方面大耳的高个子一定是杨杰，这个象日本人的一定是贺耀祖（号贵岩），就立刻到铜锣湾

去访问这两位客人。杨杰是卫立煌的至交，盟兄弟，1945年他曾帮助卫立煌制订远征军收复滇西松山的战役计划，平日无所不谈，现在他从大陆上尚未解放的地区来此，一定带有不少那些地方的消息。

卫立煌到了杨杰的寓所，杨杰也不在家，只好给杨杰留下一张纸条。杨杰见了条子预备再来找卫，尚未出门，又有两个人来找杨杰。这两个人自称是云南总商会派来的，给他带东西来了，要求亲见杨杰的面。杨杰看见信封上笔迹是他的熟人所写，就让这两个人进去。这两个人进去以后，一言不发，拔枪对准杨杰的胸膛射击，又复对准脑侧开了一枪，当场把杨杰打死于藤椅上，当时杨杰若是再到卫立煌家中去了，当天可以不死；卫立煌这一天若是久留杨寓，说不定也受波及。

卫立煌鉴于他的好友、思想接近的杨杰的受害，感到香港不是安全的地方，平日深居简出，很少和别人来往，他订了数十种报纸和杂志，不断买些新书，特别是北京出版的新书，每天在家中细细阅读，重要之处还加以圈点。

“民革”的同志们当中有人了解卫立煌和蒋介石的关系已经决裂，过去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八路军合作得不错，便告诉卫立煌：如果他本人愿意，“民革”可以介绍他到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商量国家大事，建设新中国。卫立煌谢绝了这一邀请，他说他现在去还不是时候。如果象他这样一个背着失守东北黑锅的国民党将领去北京，必然成为一件引人注目的新闻，而蒋介石正可以把他自己打败仗应负担的全部责任轻轻推卸到卫某身上，这样反给了蒋介石以反宣传的材料。卫立煌郑重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等等再说吧。”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卫立煌非常兴奋，广播听了又听，报纸看了又看，政治纲领都符合人民的要求，人才尽皆一时的俊杰。想起11年前到延安和毛主席见面，想起多少次和朱总司令彻夜长谈，想到共产党的道理久已为他所折服，看到百年动乱，到今天才有一个真正独立自主、不受外人凌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出现，实在高兴得了不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特地买了几瓶好酒自己低斟浅酌。他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新中国要缉拿归案的“战争罪犯”，就自己拿起笔来起草了一份电报，经过香港的中共的有关组织，发到北京向毛主席致贺，他是多么向往这个新的国家哟！

电报的原文是这样的：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江“江”

按韵目为3，此电是10月3日发的。

七

卫立煌寓居在香港数年，小心谨慎，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呆在家里，看看书报杂志，除会见几个熟悉的老朋友外，与外界绝少往还。有时在家里实在烦腻，携带夫人和子女一齐出外散散步，听见道旁人言，“这不是卫立煌吗？”他连忙拉着家人走远，他说：“不要回头，一回头反而被人家认清了。”因为蒋介石所派遣的在香港的特务，一直对他盯梢、监视。

蒋介石部下的将领，尤其是嫡系的将领们，大多数都跟随他逃到台湾，

唯有卫立煌这样一个高级将领不去台湾，使蒋介石非常不快。他几次派遣吴忠信做说客到香港，企图把卫立煌连哄带骗，引诱到台湾去，杜绝他返回大陆公开反蒋的可能性。卫立煌对吴礼老（吴忠信号札卿）一向很尊敬，但是他们经过寒暄，谈过一些泛泛的闲话之后，酒酣耳热，卫立煌禁不住敞开心胸，当着吴礼老的面，历数30年来，蒋介石怎么对他无情无义，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卫立煌说，抗日战争要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八路军处在华北最前线。我主张分配给八路军的作战任务和弹药补给，和各军一样，问问全中国的人，这有什么不对呢？蒋先生不但不叫这么做，反而说我偏袒八路军，撤去我的职务，在成都两年，还派人监视。最后东北之战，陈诚完全没有办法了，蒋先生硬叫我去背黑锅，他向我保证，东北的得失不由我负责，保证这保证那，说了多少好话，我到了东北之后，他三次亲自到沈阳指挥作战，每个师的使用他都要管到，对于东北将领们的话一句不听，明明做不到的事情他硬要做，东北失败的责任完全在他自己，还能够怪别人吗？他把我无辜软禁在南京，我连自由都没有，家中被宪兵特务围上两层，你老都实在看不过去，亲自去问他，他还当面对你说他不知道，虚伪到这种程度的人，你一生见过第二个没有？……。吴忠信被卫立煌说得无从置喙，只好辞别而去。

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很多，暗杀过不少人。例如有一个曾被张恨水取作小说《虎贲万岁》题材的国民党将领余程万，后来被暗杀在离卫立煌寓所不远的地方。卫立煌深知蒋介石是个最残忍最不讲道理的人，担心蒋介石让他去台湾他不去这件事会激怒蒋，下毒手派人来刺杀他，所以平日小心门户，深居简出。有一个时期，他迁居到元朗地区的唐人新村，就有人猜测说香港新出版的《金陵春梦》一书出自卫立煌的手笔，香港只有他这样的人对于蒋家王朝的内幕才知道的最清楚。并讲他平常没有笔名，唐人二字，大概是他借用了他寓居地方的地名，就象寓居东坡的苏拭取名为东坡居士一样吧。事实上外面这些猜测都猜错了，《金陵春梦》一书出自老家住在浙江吴兴县太湖中间洞庭东山岛上，当时担任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的严庆澍手笔，这个新闻记者出身的唐人与卫立煌毫无关系。

后来据随卫立煌到香港的副官柴生春回忆：卫立煌在香港，长期是心情忐忑不安的。一面是怕蒋介石派人来下毒手；一面向往祖国，又怕新社会的人民对他不谅解。他常常对柴生春说：“老柴啊，我真想回去看看。一来怕腿痛发作，二来怕四八年去东北的真心没有事实表现，怕得不到谅解。”

他平日看报很仔细，对于中国解放后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最为高兴。百年以来，中国受尽各个帝国主义的凌辱，差不多每战必败。自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名义上成了“民国”，实际上受到列强势力的瓜分，为人鱼肉。后来日本公然侵略，铁蹄踏遍半个中国，血流成河。美国援助，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各种不平等条约，处处束缚中国，使中国为其殖民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独立自主，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戳穿了世界上最凶的美国纸老虎，被全世界尊为新兴大国，这不正是孙中山先生百年以来所企盼的吗？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真能扬眉吐气了。

卫立煌对于国内各地建设的消息，也非常愿意知道。数十年来，从广东到东北，他都留过许多足迹，他对于许多地方的风俗人情、地理环境非常熟悉。今天这些地方蓬蓬勃勃的建设起来了，他常常拿着报纸，或是开着收音机，神魂飞越，如同回到了这些地方一样。有时他还高声朗诵苏东坡的名句：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最有意思的是报上刊登鞍山三大工程完工的照片，使他惊奇。1948年春季，他到东北不久，视察沈阳外围各据点，曾经到过鞍山。那时候这个中国少有的工业基地一片荒凉，烟囱不冒烟，厂房被糟塌得七零八落，有点象《桃花扇》最后一出中苏昆生所唱的曲子：“残军归废垒，瘦马饿空壕，城廓萧条。”怎么今天变成这么雄伟的样子，出现这么多的劳动模范，出现这么多的英雄事迹呢？只有共产党能把中国治好，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富强，真是事实胜过雄辩。

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浙江沿海的鱼山列岛、披山岛等岛屿，最反动的美国国务卿社勒斯吓得要命，为了要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公然出面进行了干涉。1月18日，我国海军解放了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美蒋订立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企日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1月24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一个《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揭穿美帝国主义的阴谋，郑重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

周总理发表的严正声明，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受到广大海外华侨的拥护，也受到世界上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只有香港几家蒋记报纸跟在美国佬的尾巴后头，唱出不同的调子。这些报纸不但污蔑这个声明的本身，并且对中国报纸上报导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等人发表谈话也加以攻击，漫骂张治中等人是“传声筒”，听着中共当局说什么也跟着附和什么，是“奉命表态”，不是他们自己的真心话。卫立煌看了这种报纸以后，大大不以为然，当着一些朋友说：“这些话真是岂有此理！是非自有真理，我在香港也要发表和张治中同样的意见，我奉了谁的命呢？没有谁要求我怎么讲，我的话完全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话，爱国的中国人就应该这么说，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有什么不好！”

此时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闻知此事，来和卫立煌见面，支持他的爱国行动，鼓励他仗义执言。同时告诫他，香港特务很多，可不能自由讲话，并和他商量，如果愿把这些意见写成文章公开发表，那于对解放台湾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在发表文章的时候，卫先生本人必须要藏匿起来，不然定会遭到蒋帮特务的迫害。往哪里躲藏好呢？发表文章以后返回大陆如何？

此事传至北京，周总理赞同卫立煌发表文章同时返回大陆的办法。周总理认为卫立煌的爱国心思很好，现在是回来的时候了。但是恐怕韩权华不同意，周总理和邓大姐找韩权华的六姐韩循华来商议。此时邓大姐的秘书生病请假，由一个1948年进燕京大学读书的女青年韩德庄代理，这个韩德庄是韩权华的侄女，周总理就叫韩德庄执笔给卫立煌写信，说是姨父曾在太原结识的朋友叫她写信的，请姨父和姨母回来。

卫立煌一见此信，非常高兴，知道是周总理叫他回来，1937年忻口战役以前和以后，卫立煌在太原和周总理几次接谈，情形历历如在目前。他在周总理的鼓励和教导之下，对于抗日建立不少功勋。长期以来，周总理的音容笑貌，他记得非常清楚，报纸上时常发表有关周总理的报告和消息，他总要细读一番，从中吸取一些新的知识。现在周总理请他回去，那再好也没有了。

来洽谈的香港中共人员询问韩权华：“有顾虑吗？”

韩权华非常坦率地说：“有。我觉得我们已经成为无所作为的人了，不如流落香港，了此残生。”

韩权华接着说：“我们现在的地位，无论对于哪一方面说来都不好。对于台湾来说，是撤职查办，在逃的犯人；对于大陆来说，是没有归案的战犯。”

卫立煌充满信心地说：“不要紧，革命不分先后，这些都会改变的。”

韩权华又说：“在生活上我也有顾虑，在大陆上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人人劳动，我一直有病，我怕到了那里劳动不了。”

来洽谈的同志详细介绍了大陆上人民生活的情形，解除韩权华的顾虑；大陆上的人都把劳动当作光荣的事情，各尽其力，共同来建造新社会；但是也要看各人不同的情形分配不同的工作。象你这样的情况，可以酌情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对于疾病我们是会照顾的，不象在香港看病要花很多钱。

卫立煌听至此处激昂地说：“我愿意用我的余年报效国家，我要革命，别的什么也不想。”因为卫立煌和共产党交往多年，知道共产党的政策，处处为人民着想，合情合理，不会有这样的或那样的难题。香港一些不明真象的人所持的那些顾虑，他是没有的。

八

在卫立煌返回大陆问题商量决定了之后，即接着研究如何越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如何应付旅途中可能发生的问题。由于许多国民党特务都认识卫立煌，由香港坐火车经过广九铁路回来目标太大，是很危险；容易出毛病的；只有坐船到澳门，由澳门乘坐汽车到广州的办法比较稳妥。最后决定经由澳门这一条路线。

来洽谈的同志又告诉韩权华，东西尽量少带，以免引人注目，什么用品国内都有。随行者只带柴生春，汽车司机在香港有眷属，只好不带他同行。此事对任何人都严守秘密。

卫立煌息影香港5年，行吟泽畔，眷怀祖国，不胜寂寞。今日由香港乘船到澳门，踏上归国的航程，重见南海上的波涛，珠江外的风云，都觉得另有一番神采。回想他自己早年第一次乘海轮由上海到广州，离今天正好整整40个年头。这40年中，中国经过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任人欺凌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骑在老百姓头上的旧军阀新军阀都一扫而光，而他自己的这40年也历尽曲折，备尝甘苦，这一回再到广州参加革命，真是百感交集，他们在澳门登陆之后，即有人接送到一家商业公司里休息进餐，今天韩权华匆匆忙忙，连早饭都没有吃过呢。

他们又从这家商业公司门前乘上汽车，风驰电掣，驶往广州。这一天为1955年3月15日，是卫立煌新生的日子。

他们一到广州就受到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的欢迎。卫立煌发电报到北京向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副主席致礼，报告他已经回来了，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给新华社发表。

他们在广州稍事休息，就接到毛主席来电，那电报是：

卫俊如先生：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三月十七日

卫立煌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全文抄录如下：

台湾袍泽们、朋友们：

祖国近五年来，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凡百设施，突飞猛进，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对外在国际上国家声望日高，对内使各民族融洽共处，形成空前未有之大团结，以西藏数十年之离异，现在又重回祖国。祖国经济建设一日千里，达到从无到有，自少而多，如钢、铁、煤、油等重工业之大量开发与建设，治淮、荆江分洪以及各地水利之兴修，康藏、青藏两公路及成渝铁路之筑成、宝成、陇海铁路之增筑，包兰、成昆铁路之测建，中蒙国境铁路之完成，以及自造飞机、火车头、轮船等等。尤其在人事方面，不论过去如何，凡对国家有所贡献者，均能奖励扶植，一视同仁（如程颂云、翁文灏、张治中、傅作义、陈明仁、郑洞国等等）。以视蒋介石时期，在外交上俯仰随人，厚颜谄媚；在政治上视国为家，排除异己；经济方面则将国家命脉置于四大家族之手；人事上嫉贤忌能，非亲莫用，真乃泾渭分明，善恶立判。凡此铁的事实，无论为爱为憎，都是不能加以否认的。

现在蒋介石不惜出卖国家及民族，勾结美国力量，妄想反攻大陆，各位军政方面曾身当其冲的，所知当然深切，试想以他当年具有海陆空军四百万之声势与美国数十亿之军经援助，尚且逃不了溃败逃台，目前以他几十万老弱残兵，而图反攻，岂不是痴人说梦，自昼见鬼吗？

台湾是中国领土，乃是历史上和外交上文件所具载，任何人不能歪曲事实，加以否认。美国欲以式力强据台湾，乃其别具帝国主义者侵略野心，无论他如何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也不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台湾之于中国，正如夏威夷之于美国，如有其它国家舰队霸占夏威夷领海，他们美国人民又将作何感想？何况解放台湾，是讨伐中国的罪人蒋介石，纯是内政问题，是世界上主持正义者所同情的。今蒋介石乃与美国订立美蒋防御公约，图借外力负隅拒抗，真是出卖主权，引狼入室，这种行为不但为六亿同胞唾弃，更为具有天良、心存爱国者所切齿！各位已看到了韩战时祖国坚强军力迫使美国停战之事实，台湾最后必定解放，无论按哪一方面说，都是必然之理，既成之势。

各位朋友，各位袍泽：我现举两项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使各位更知蒋介石如何卑劣。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五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战，故凡八路军（解放军前身）担任之任务与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遭蒋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认为不可，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没。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国人指责，乃竟向部下诿卸责任，诬为系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并由宪兵司令张镇告诉我，未见蒋以前，最好不要接见其他客人。后经吴礼卿先生向蒋提问此事，蒋竟诿称不知。吴先生事后又问张镇何以总统不知道卫长官家中住有宪兵，不许见客，张镇闻言，惶恐不知所答。以上二事，不过就我亲身经历中较大者而言。我同蒋介石共事三十余年，他都肯作出这种丧心病狂，例行逆施，背信弃义，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

我自辛亥投笔从戎以来，即决心献身革命，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旧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只因蒋介石窃据领导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图千方百计巩固私人权势，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以致数十年光阴虚耗，未能如愿以偿，既恨且愧。自从我在香港住了五年以来，闭门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观察实际，寻求革命真理。回想过去蒋介石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比起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五年来的建树，使我更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从。所以我觉得这几十年误随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实在愧对国家、愧对国人。现在祖国正在进行解放台湾，于我们大家一个效忠革命，为人民尽力的机会，以赎前愆。遥念在台湾数十年共患难的袍泽们、朋友们还在蒋介石魔掌之下，不忍坐视诸位随蒋沉沦毁灭。故特掬试坦告，深望诸位及早醒悟，对于有功子解放台湾者，在有形无形中，各自乘机量力而为，则台湾解放

之日，祖国及国人必不有负于诸位，肺腑之言，敬希谅解！责任艰巨，诸维珍重！

卫立煌

1955年3月15日

九毛主席的电报来到后，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和卫立煌商量了一个旅行计划，先到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的江南，散散心，解解憋在香港数年的郁闷，并慰卫立煌怀念旧游之地的渴望。

他们在广州停留了两日，受到了广东省党政当局的欢迎，驱车游览五羊城。看到城市变化，看到许多革命历史古迹被保护起来进行修整，想到1948年他们曾经在这里被蒋介石派飞机送回南京，卫立煌和韩权华不禁相对苦笑了几声，之后又爽朗的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乘火车北出韶关，过大庾岭，卫立煌沿途对韩权华讲说当年几次北伐的故事。然后经过湖南和江西，车窗外的远山近水，雄关故垒，引起卫立煌更多的回忆，讲了更多的故事。南国春早，许多农民在田里辛勤耕作，太平年代的农民真是幸福，和过去兵祸连年民不聊生相对比，完全是两个天地。

他们到达浙江，在杭州稍事停留。绿波如绫，温风似酒，六桥三竺之间，湖光山色，令人心旷神怡。祖国的确是天堂，从海外流浪回来更觉得天堂可爱。在祖国的怀抱中欢度幸福的晚年，能够再尽力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实在是再美好不过的事情了。卫立煌想到自己的许多老同事老朋友，被裹胁到了台湾，疑惧不敢回来，实在是自己误了自己，不说别的，光是西湖莼菜和松江鲈鱼，就不引起你们的乡思吗？

他们在西湖上停留数日，到达上海，略作参观游览，又到无锡，准备在太湖旁边多休息几天。他们下榻的地方是解放前民族资本家荣家的一所别墅，依山傍水，地位绝佳。绕屋都是高大的桂树，枝叶繁茂。生长在北方的韩权华过去没见过，虽此时不逢开花的季节，也引起她的喜爱。他们又乘船畅游太湖，想起“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之类的诗句，他们的情绪十分悠然，畅适。

4月4日，他们忽然接到北京的电话，说周总理有要公即将出国，想在临行前会见卫立煌及夫人，他们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美丽的无锡。当晚即搭乘火车北上。此时他们两个人的心情都非常激动兴奋，卫立煌想到能和北伐及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朋友、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见面，非常高兴。韩权华的心情更是非常激动，能够见到青年时代的老同学邓颖超大姐，这是以前从来没能预料到的事情。一路上，他们嫌火车跑得太慢。

4月6日上午火车到达北京时，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亲自到车站迎接，使他俩十分感动。当日下午5时，即蒙周总理接见，并设家宴招待。总理亲切地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回来的经过，并和卫立煌重叙了两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旧谊。邓大姐热情地和韩权华谈起往事，使得他俩毫不感到拘束，就象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周总理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贡献力量。他们看到总理和邓大姐是那样诚挚、健谈，听说总理第二天就要动身出国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他们更是感动。在总理出国前夕，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和他们做长时间的谈话，而且是那么从容不迫，精力充沛，谁也想不到总理当时刚作了手术还不到一个星期呢。

在总理出国期间，邓大姐亲自过问卫立煌夫妇的住房、生活、参观筹各方面的安排。总理从万隆会议胜利归来后，又和陈毅副总理宴请卫立煌，在席间谈到有关解放台湾的问题和一些党的政策问题。陈毅副总理还特别针对韩权华离开香港前的想法，解释从前宣布战犯名单时为什么把卫立煌也列入其中……

1955年6月，卫立煌夫妇从北京饭店搬到政府为他们安排在北京东单麻线胡同的新居，总理又亲自到他们家来看望他们。他们的新居是什么样子的呢？据后来香港《文汇报》上中国新闻社记者杨木所写的报导中介绍：

那是一所富有民族风格的建筑物，画栋雕梁，髹漆鲜明。客厅前面，是一个花园，假山清池，有树有亭，……

当大地春深、绿满枝头的时候，红亭一角，实具庭园幽趣。

卫立煌归来了。

卫立煌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的尊重。不久，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先后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务委员。

二级上将陈仪死难揭秘

汤恩伯与陈仪之死

宋子亢

- 师生之友情同父子
- 策动汤恩伯起义
- 汤恩伯卖师告密
- 汤恩伯四处求人，企望忠孝两全
- 老头子杀人立威
- 骂名之下，汤恩伯忧郁病重，死于庸医

陈仪，字公侠（1883—1950），浙江绍兴东浦人，初为绍兴怡丰钱庄学徒，后入杭州求是学堂（浙大前身）攻读。1902年后。二次东渡，卒業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辛亥革命，任浙江都督府军政司司长；军阀混战时期，由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任命为浙江省长，历时3月，险遇不测；大革命后，奉蒋介石命，率团去欧洲考察军事，归国后任兵工署署长 11933年福建事变后，出任福建省主席，主闽7年，创立了新的人事制度，使县政出现新的面貌，他愤恨特务横行，曾枪杀军统头目张超，并处决临阵脱逃的金门县长，1945年，抗战胜利，代表国民政府去台湾受降，并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二·二八”事件被罢黜，回上海作寓公。1948年6月，又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淮海战役前夕，他策动当时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旧部汤恩伯起义，被汤密报于蒋介石，1949年2月17日，广州行政院会议突然通过改组浙江省政府，“陈仪免职，周岩主浙”的决定。2月21日陈仪于参加省会各界人士为他举行的欢送大会后，乘专车去上海，即失去自由。为汤恩伯所软禁，一周后被押解于衢州，4月27日由衢州移解台湾基隆，1950年6月18日蒋介石下手令以“勾结共党，阴谋判乱”的罪名，被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终年68岁。

陈仪一生的经历综错复杂，功过不一。但他为人清廉方正，淡泊名利，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毅然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是陈仪在50年宦海生涯中极为可贵的一步。关于他的被害经过，全国政协、浙江省政协与福建省政协合编出版《陈仪生平及被害经过》，内容甚详。他为策动汤恩伯起义而被出卖以致被害，毋庸置疑。按陈仪与汤恩伯关系之密，江浙父老知之甚深，度汤恩伯决不会出卖陈仪，故出事以后，民间即有“被军统告密，以致败事”的传说。现根据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任内的第二处长毛森（军统）所回忆资料（《台湾传记文学》52卷4期《陈仪迫汤投共始末》），承认这个案件是他所主办的。他认为汤恩伯拒不接受陈仪起义的劝告，并向蒋介石告密，这固然是事实，但汤恩伯用心良苦，并不想杀害陈仪，最终导致陈仪杀身之祸的是（军统局长）毛人凤。以下是毛森撰述当时经过的情节，虽属反面史料，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抗战胜利时，我奉调汤恩伯部工作，汤发现我的为人与工作能力，委我重任，对我推心置腹，相遇恨晚，无论大小公私，都和我商谈，我们间已无任何隐私。民国三十八年（1949）初，东南吃紧，我临危受命，接任上海市

警察局长。有一天汤私下告诉我陈仪迫其投共这件事，我非常惊讶，我问他有无告诉过别人，汤说：绝对没有，只告诉你一人而已。我续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要求把陈仪迁住我家，不准其自由行动。我说：陈是封疆大吏，亲友甚多，他要出去访友，或友来访他，或打电话，怎能阻止，一旦被人知道我把他幽禁家中，我怎么应付？且我家生活设备极简陋，无法招待大员，我一口拒绝。当时我对汤的想法，还有点怀疑，因他俩亲如父子，无话不谈，可能言语冲突，对陈的一时气话。汤说：“绝非气话，陈的思想早已变了，他自台湾铩羽归来，即促我去北方率领十三军独立（汤的基本部队，似驻热河，由石觉统率）。那时我认其是牢骚气话，我和林蔚商量，推荐他出任浙江主席。我们对蒋公说，陈是政治大才，热忱工作，今赋闲无聊，如委其主浙，必能为家乡做一番大事。蒋果任陈为浙省主席。陈在主浙之初，因忙于工作，较少晤谈，不久他又要我准备和谈，停止军事行动，我才认定他的思想确实变了，恐其闹出大事来，我私下对蒋说，陈已年老，恐难应付大动乱，并推荐驻浙军长周岩接任主席，蒋一一照准。我把陈接来上海为他夫妇安排住所，照顾其生活，原意可以朝夕承欢，让其韬光养晦，安定快乐，享享清福，不料他火气更大，骂我不识时务，大势已去，还作无望的挣扎，我实无法对付。我说：“他年将古稀，投共之后，难道还会给他比省主席更大的官吗？”汤说：“这个老糊涂竟明对我说，并非为自己打算，是为我向中共找条出路，再提拔我一次，我向他表白，我是军人，追随蒋公几十年，决不能弃他投共。他骂我没有头脑，不识时务，不为国家人民保留元气。每次见面，总是将我痛骂，无法向他解释。”

其实，我与陈仪的关系也极密切，他主闽时代，我任省会警察局特警组主任，帮他做了许多大事，所以对我推心置腹。抗战开始，我奉调北上，离开了他。其后陈仪接任浙江省主席，尚未与我晤面，即发表我兼浙江警察保安处处长（编者按：指前浙江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长）。

陈仪个性刚愎自用，但学殖颇深，听说他是日本陆军大学第一名毕业，被誉为卓越的兵学家，其见解亦甚独特，与众不同。……

当时我曾对汤说：你不要接受策动，不理他算了，他光棍一个，让他去投共好了。汤气呼呼的说：“他不断打电话叫我去见他，一见面就骂我不识时务，不识抬举，要我派架飞机送他会共区，我实在受不了。”我看出汤、陈争吵已濒决裂，汤已不愿再见陈仪，我又不愿接除去我家居住，实无法处置。

汤命我即在陈寓软禁陈仪，不准他自由行动，禁止会客，但可陪其上澡堂、理发、购物、上街散散步，他发脾气时，只好逆来顺受。我乃率领刑事处长郑庭显及干警多人，亲去虹口谒陈仪，进入陈寓后，我手下即令陈之副官交出佩枪，陈之副官初想抗拒，见我在场，即听命缴枪，我向女佣表达拜望陈主席，陈即下楼接见，我对陈说，“时局不宁，我奉令派人保护陈……”陈仪当然明白已被监视了，默然颌首。我即指派陈浩泰、甘觉两组长，日夜轮流监护，然后恭恭敬敬向陈鞠躬辞退。现有人说我们在陈寓翻箱倒柜进行搜查，谅其只是想当然耳。陈是廉洁官员，无身外财物，住的是汤寓，食用的全是汤所供应，迫汤投共的信件已铁证如山，还搜查什么呢？

我与丁名楠在蒲石路汤公馆见过面，汤介绍说，丁是陈主席的外甥，系陈介绍来沪担任汤的秘书，以后似又见过，但所见的是丁或另一人胡帮宪，我已记不清了。汤私告我，丁、胡是共方人员。并说：陈仪思想转变，也受

其秘书沈仲九的影响。要我设法阻断陈与丁、胡及沈等的来往，只是怕他们继续打扰陈仪，并无对丁、胡追踪逮捕之意。

我们办理陈案与办理一般“刑事”、“政治”案件完全不同，绝未追究“余犯”、“同谋”、“图谋”。因陈已明迫汤投共，公然手谕“应做纲要”，还有什么可以追究呢？至于丁名楠、胡帮宪（现名允恭）只是连络人员，陈要汤委其任秘书，只是便于秘密连络及刺探军情，主犯既不能法办，自无法只办其传信人。我们还怕因汤不听陈命，对方为了逼上梁山，故意泄漏风声汤通中共，以打击人心士气，使汤无地自容，故才决定采取行动，将陈软禁。

其时南京政府系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蒋介石退居奉化，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暗中指挥各地军政长官行事。汤之本性对蒋尽忠，对陈纯孝，到了忠孝不能两全时，把他难倒了。几经考虑，认为兹事体大，不能私了，他身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不能去奉化请示，我建议派其心腹陈大庆或石觉为代表。汤说，“陈是淞沪警备司令，石是上海防卫司令，都有重要公职，且不知全案经过，不适宜去，他最后问我能走得开吗？我回答说，现在币值狂跌，物价飞涨，治安混乱，时刻准备应变……这时我忽然想起了毛人凤——李宗仁代总统时向中共要求，撤去毛的军统局长职务及该局外勤工作，改派徐志道为局长，毛为人谨慎服从，颇得蒋介石器重，故蒋仍指派其担任‘黑’局长，闲住上海。”于是我建议由毛人凤代表去奉化请示，汤认为恰当，立刻同意。

我偕毛人凤去见汤恩伯，汤即面告毛人凤关于陈仪要其投共经过，并将陈给他的信件一并给毛（编者按：即陈仪促汤起义亲笔信件，内容是促汤释放政治犯，停止修建工事，保护一切公家财物，改编部队，迎接解放等条文），转递蒋介石。汤的唯一要求，是保全陈仪一命，由其奉养天年，并口头表示对蒋决尽忠到底，不屈从李宗仁命令，尽力装运物资去台湾，坚决反共作战到底云云。汤派专机送毛人凤去奉化后，毛很快就回上海。毛说，蒋介石听报告后，嘱善待陈仪，好好看护他，一切照我们的意见办理。汤再问起，蒋有无答允保全陈的生命。毛说：“当然没有问题”。从此，汤也放心了。

大陆情况紧急时（编者按：指1949年4月下旬），陈仪被送去台湾，幽禁基隆要塞司令部。国民党官员去台后，汤恩伯很是怀念陈仪，其本人不便去探望，特派陈大庆携带日用品去请安，大家以为就这样了。陈可享天年了。不料1950年6月间，因时局关系，蒋介石突然下令要审判陈仪，汤恩伯知情不妙，往求见蒋，传话者转示，蒋已去台中。汤四处求人营救，大家都摇头无能为力，拜请当年在沪共患难的谷正纲、雷震、方治及上海市长陈良等人转求缓颊。雷震说，老头子为了杀人立威；谷等认为蒋要用陈仪的头颅镇压人心；陈良认为陈牺牲定了。汤又请毛人凤求蒋遵守“诺言”，饶陈一命；毛特来汤府复命说，“天威难测，我已恳求过了，没有用。”辞出后，我在送毛人凤回家路上，埋怨他：“你做事没有肩肿，不负责任，当时汤讲好的，唯一的要求是要“保全陈仪一命”，蒋既曾允诺，你应据理力争才是。”毛人凤被责怪之后，却耸耸肩说：“你忘了吗？陈仪是杀军统局福建负责人张超的仇人，我还会救他吗？”依毛人凤的语气看来，当时他受托飞溪口向蒋介石报告时，可能当做大功一件，而并未向蒋提出汤所要求“保全陈仪生命”的条件，致陈死后，使汤恩伯蒙受“卖师求荣”的骂名。

按张超，福建人，原为军统局福建负责人，抗战开始，组织游击队，只表孝忠于蒋介石和戴笠，目无地方长官。陈仪心腹省会警察局长李进德对其尤为深恶，怂恿陈仪除张。陈求治心切，费尽心力，平定了有小四川之称的

福建各股民军，自不容张超再组织地方武力。陈自命公正廉明，不畏权贵，以迅雷手段秘密电蒋，请准将张超就地正法，才伏下本身日后杀身之祸。

陈仪死后，蒋始召汤恩伯。蒋似余恨未消，训汤大义灭亲，还哭什么，不得立牌位祭奠。从此汤落落寡欢。汤本有十二指肠溃疡病，据医言，情绪忧郁时，将增剧病情。汤病情日增，亲友劝其去美就医。因筹不出费用，即在日本草率动手术，死于庸医之手。

陈仪被扣内幕

陈达

- 想做傅作义第二
- 被出卖却毫无察觉
- 秘密幽禁
- 解台湾饮弹毙命

1948年秋，国民党军统特务浙江省警保处长兼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毛森得到这样一件情报：国民党政学系重要分子之一、浙江省主席陈仪受了他的某些“左倾”部属的煽动和影响，对“戡乱”前途失去了信心，反共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对浙江省内某些明知和共产党有关系的人采取庇护态度……。毛森把这份情报分别报告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和衢州绥署主任汤恩伯等。随即接到毛人凤等的指示，要毛森设法展开对陈仪的特务侦查活动。

同年12月，毛森获自陈仪左右的某内线的情报，大意是陈仪曾对他的亲信分子透露，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整个完蛋了，国民党政府已经无能为战，只有和共产党妥协谈和的路可走。陈仪曾上书给蒋介石，其中有云：当年之势已是敌强我弱，只可言和，不可言战矣。蒋不以为然，由于蒋陈之间政见不同，陈不愿和蒋一道同归于尽，准备自行通电起义，但昔于手中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起义安全无保证，因此，总想串连一些军队和他同时起义，这样就不可以确保起义安全，而且还能壮大起义声势，为在共产党方面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创造条件。

当时盘据浙江、上海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统归汤恩伯指挥。1948年间，汤系浙江衢州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1月后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陈仪和汤恩伯系浙江同乡，汤曾为陈的旧部，得过陈的提携，私人恩惠甚厚。陈仪满以为凭借这些关系，可以策动汤恩伯率部和他同时起义。在1948年冬天，陈仪在上海晤见了汤恩伯，对他进行了起义的鼓动活动。事后，据汤的重要帮凶毛森对我说：“汤先生（汤恩伯）告诉我，陈公侠（陈仪别号）见徐蚌会战失败了，认为大势已去，发生了动摇，想做傅作义第二，居然劝汤先生投降共产党，这个老糊涂，真岂有此理！”毛森又说：“陈仪为什么要劝汤先生投降？他是因为手里没有军队，如果他通电投降共产党，汤先生只要用一个师的兵力，马上就可以把陈仪所能掌握的几根破枪全部解决。他真把汤先生看得太简单了，汤先生是珍惜自己的‘革命历史’的，对党国，对总统（蒋介石），无论如何是要尽忠到底的，那会听陈仪这一套鬼话呢？汤先生已经打电报给总统，请求免掉陈仪的浙江省主席，并嘱咐我们要切实注意陈仪的行动。”

不久，蒋介石果然免掉了陈仪的浙江省主席的职务，派了他的忠实心腹周岩接替浙江省主席。毛森从那时起，更加注意陈仪的一举一动，而且也注意陈仪和汤恩伯的接触。

陈仪被免去浙江省主席后，即闲居上海。但他尚不知免职原因系汤恩伯向蒋介石密报的结果，也不知毛森派了特务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因而毫无警惕。而他想投向共产党的念头，则仍很强烈。1949年3月间，李宗仁代表

蒋介石出面的假和谈被戳穿后，人民解放军将要大举渡江时，汤恩伯奉蒋命，指挥几十万兵力于江南一带，妄图阻止解放军渡江南下，扬言什么长江天堑，至少可守6个月，而陈仪却比较看清了当时的形势，仍出于爱护汤恩伯的一片好心，在上海又忠告汤恩伯，应为自身的前途着想，放弃防守长江的打算，及早率部起义。据毛森事后对我说：“陈仪又公然劝汤先生投降共产党，说什么长江那么长，怎么能守得住，大势已去，不是一条长江能挡住共产党的，与其将来兵败名裂，作阶下囚，不如早向后转，还能成为共产党方面的座上客。这个老混蛋，真没有气节，政学系的人就知道投机做官。”毛接着又说：“陈仪看来是属于中央系的一名高级人员，其实他对我们中央方面一向是别扭的。抗日初期，他在福建当省主席时，曾枪毙了我们福建站（军统福建站）站长张超。戴先生（戴笠）曾为这件事大伤脑筋，曾经要求总统惩办陈仪，总统碍于当时政治环境，没有对他怎么样。这回该到和他总算账的时候了。汤先生已电报总统，为了不让陈仪在沪煽动人心、影响大局，请求将他立即扣押起来。”

不数天，蒋介石由奉化电令南京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要他会同汤恩伯将陈仪扣押起来。毛人凤随即指示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这时毛森已由浙江省警保处长调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就近商洽于汤恩伯，执行扣陈任务。

1949年3月中旬，毛森在取得汤恩伯的同意下，亲率特务数人在上海陈仪家里诱捕了陈仪。当时汤毛二人考虑到：上海位于前线，将陈关押上海，有所不便，便由汤恩伯派了一架飞机，从沪将陈仪押解浙江衢州秘密监禁起来，所谓陈仪的起义想法，至此即结束了。

汤恩伯于1948年任衢州绥署主任时，修了一所临时公馆于衢州城（距衢州文庙不远），陈仪就被幽禁在汤恩伯的那所临时公馆里。

当时我在衢州任第九编练司令部二处三科科长，是代表毛森掌握第九编练司令部的特务情报活动的。第九编练司令官张雪中，系汤恩伯所属将领之一，陈仪解到衢州时，汤曾有信给张，瞩张妥加照管。张雪中令所属特务营派出武装士兵一个班，由一名排长带班，驻汤恩伯临时公馆担任武装警戒，同时，毛森也给了我指示，命我负责看管陈仪。从上海解陈仪来衢州的，有军统特务3名，均浙江人，曾在军统浙江站工作过，已忘其姓名，他们来衢州后，即留在衢州担任看守工作。毛森规定他们每天要向我汇报看守情况，由我转报上海毛森。据这3个特务说：“陈仪刚从上海起飞时，曾对飞机驾驶员说，国民党已经要完蛋了，希望你（指驾驶员）今天能把我送往北平或延安去。吓得我们心惊胆战，深恐驾驶员听信陈仪的话，把我们一道送到共产党那里去。我们注视了飞行方向，心想：如果真的飞往北平或延安，我们就准备先把陈仪打死再打死驾驶员。”我指示这3名特务：“看守陈仪，既要严密注意他的一言一行，不能让他和任何人接触；又要在态度上对他尽量客气一些，不要刺激他。他如果问到你们是那里派来的，只说是汤总司令（汤恩伯）派来的，不要说是保密局方面的。他曾经枪毙过我们的‘同志’，如果知道今天落到我们手里来了，会更加恐惧，这样就会增加你们看守的困难，到将来对他进行审讯的时候，和他算一算老账也不迟。”这3名特务根据我的吩咐，对陈仪进行了表面客气而实际严密的看管。嗣后据他们汇报，陈仪显得抑郁不乐，整天做诗哼诗，还多次要求和他上海的女儿通长途电话。通话时，负责看守的特务在旁监听，随陈仪自沪到衢州的还有一名为陈仪做饭的私人厨师，这人在衢州也受到了特务的监视，防备他替陈仪对外通风报

信。

当时，我们认为对陈仪的幽禁做得很秘密，其实，还是有不少人知道陈仪被扣在衢州。曾有陈的旧部等多人来衢州要求会见陈仪，但均被我一一拒绝。

1949年5月初，浙江全部解放的前夕，汤恩伯又派了一架飞机从沪来衢州，随机而来的一名中校军官（忘其姓名）把汤的命令交张雪中，他说：汤先生命令将陈仪转解台湾去，台湾已经准备好了房子。他对我口头传达了毛森的指示：看守陈仪的几个工作人员（即3个军统特务）随机解陈赴台湾。当天下午，陈仪自衢州被押解到台湾，他的私人厨师亦随陈行。

解放后，传闻陈仪在台湾被蒋介石枪毙了。果尔我是应负一定的罪责的。

陆军总司令半生被囚

孙立人的戎马生涯

文湘朱家琪

- 淞沪抗战初露锋芒
- 练兵都匀羽翼渐丰
- 扬威异域声震海外
- 反攻缅甸凯旋班师
- 奉调东北参加内战
- 明升暗降赴台练兵
- 升任台湾陆军总司令
- 被诬“兵变”，半生软禁

孙立人原籍安徽舒城，客籍庐江金牛，生于1900年。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赴美就读于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后转入费吉尼亚西点军校学习，结识许多美军高级将领。如史迪威等人，为其以后的升迁打下了基础。

1928年，孙立人毕业回国，在蒋介石侍从室干了一段时间，因不是黄埔、陆大出身，也不是国民党员，更不是蒋的同乡亲戚，所以得不到重用。于是，就投到宋子文的门下，在上海任税警总团四分团团长，后升为总团长。税警总团隶属财政部，经费宽裕，服装、粮饷，轻武器都超过了国民党正规部队的标准。所以，在国民党部队招不到兵的情况下，进税警总团当兵则要经过考试挑选，一般文盲不要。因此，部队素质较好。其干部来源，大多出自税警总团的教导队。教导队的训练方式，是由孙立人把中国传统的军事教育方式，同美国军校的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制定的，形成了一套与国民党其他军校不同的训练操典，即所谓“孙氏操典”，教导队毕业的学员充当该团下级军官，根据资历、表现，逐年升迁。他们虽属于行伍出身，但其文化水平和所学到的学科、术科以及其专门的缉私技术，比起科班黄埔学生，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黄埔学生分配到该团当中下级干部的，则要放弃黄埔的那一套。仅以立正、稍息、向右看齐、枪上肩，枪放下等基本动作而言，黄埔的操典就和该团的“孙氏操典”不一样，其他不同的地方就更多了。孙立人就这样在税警总团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班底，以后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凭其精明才干，终于以非嫡系的身份，跻身于国民党军界上层。

淞沪抗战初露锋芒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原防守淞沪前线的国民党中央军（人十八师等）伤亡重大，增援不及，便调税警总团（部队驻地在杭嘉湖一带）参加战斗，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支非正规部队，没有战斗力，但实际上这支部队是财政部的武装，武器装备远比一般国民党军队优越，中层以上军官大都是留美的少壮派，士兵中有文化的多，部队平时训练严格，军风纪比国民党的其他部队好，再加上民族战争伟大的感召力，所以税警总团在淞沪前线打得很顽强，给日本侵略军以很大的杀伤，并且一直坚持到正规军第三十六师赶到接防。

在这次战斗中，孙立人多次负伤，由宋子文把他送到香港治疗。1938年秋，孙立人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保卫战，二次立功，从此在军界崭露头角。

淞沪抗战，武汉保卫战两次战役以后，税警总团虽消灭了不少日本侵略军，但其本身也被打得七零八落，只剩番号。蒋介石退到重庆后，收集残余，重整旗鼓。宋子文乘势提出重建税警团。因上海、武汉两役，孙立人立了战功，又曾赴美留学，便于和盟军合作，所以，扩建缉私总队（部队名称以后又改还原为税警总团）的计划一决定，就派孙立人为总队长，同时晋升为少将。孙立人接到蒋介石的召见电报后，立即飞赴陪都觐见蒋介石，与宋子文等议妥有关扩建部队的详细计划，并决定以湖南长沙为总队部驻地，1938年11月起，正式扩建缉私总队。

孙立人选定长沙为扩军基地，其一，因为长沙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便于收容各路部队的散兵游勇。其二，原税警总团的官兵中，湖南人居多。在战斗中，湖南人勇敢善战，深得孙立人赏识。因此，希望多招募一些湖南人。

缉私总队队部设于长沙岳麓山，孙立人任少将总队长，副总队长叫齐学启，湖南宁乡人，曾任江苏保安团团团长。第一团上校团长贾幼慧，山西人，是孙立人清华和弗吉尼亚的同学，曾任原税警总团炮兵营长。第二团上校团长唐守治，湖南零陵人，曾任某部队宪兵营长。第三团上校团长葛南杉，江苏人，留法生。工兵营中校营长王之，留美生。通信营少校营长文芝龙，黄埔毕业。孙立人依靠这些骨干，招募和收容兵源，扩大自己的势力，不到半年，就招集了三千多人。以后逐渐扩充到五个团，还有工兵、通信、特务等三个直属营和一个教导队，实际已有了两个师的兵力。

练兵都匀羽翼渐丰

孙立人在湖南建军，原以为离前线尚远，可以好好地扩军训练。不料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弄得日夜不宁。于是，他急忙电告重庆，请求转驻贵州。蒋介石、宋子文也想保存这部分力量。所以，很快就批准了入贵州的请求，指定缉私总队驻贵州都匀训练。

1938年底，孙立人率领他的缉私总队由湖南长沙开赴贵州都匀，开始训练。孙立人的练兵方法和一般国民党部队不同，他特别注重士兵的素质训练，极力提倡体育。他的部队专门没有体育处，有专职体育教官十余人，官衔由上尉到中校，体育设备也比较完善，无论体操、田径、游泳以及各种球类，应有尽有。在都匀训练期间，每年都开一次运动会，鼓励各单位培养优秀选手。对运动员的伙食及比赛服装，都特殊照顾，由体育处统一管理。部队除了正规训练科目外，还专门开设体育课。贵州天暖，水源比较丰富，孙立人给部队规定：每年3月到9月，必须坚持天天游泳。因此，部队始终保持良好的体育风气，不仅普遍提高了部队素质，也养成部队紧张活泼的生活作风。士兵们的业余时间都有正常的体育活动，而没有闲暇去赌博、酗酒，保持了较好的军风纪。

此外，他还办了通讯训练班、司号训练班、炊事训练班等等。这在其他国民党军队里是没有的。每年春节放假时，他让炊事兵假休3天，要别人做饭给他们吃。这样，既使炊事兵感到长官的关怀，也促进了做饭人同吃饭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有利士兵之间的团结。

国民党部队的制式教育、战斗教育，从黄埔军校开始，都是抄袭德、日军事训练的一套。但孙立人却不完全按照陆军典范令的规定，而是自己编发一套教练实施草案，首先在教导队实施，然后推广到各连排。

1939年，缉私总队又改还原为税警总团，总团部设教导队，分士兵队和军官队两类，每期3个月。军官教导队除训练在职军官外，还招收高中毕业生，经8个月训练，毕业后给准尉待遇，在连排当见习军官，成绩好的就按正式军官晋升。即使是国民党其他军校毕业的军官，分配到税警总团来，也必须入军官教导队接

受这一套“孙氏训练”，否则，到什么时候都被认为是“外江派”，得不到升迁和重用。

税警总团也和国民党正规部队一样，设有政治处，团部有政治室，营部有教导员、训育员，但连里没有指导员。偶尔到连里上课的是营部的教导员或训育员。上课的内容主要是三民主义。部队里有国民党组织，也发展党员。但孙立人对这些事很冷淡，在一次纪念周上曾说过：我不管什么党不党，一个军人能为国家民族尽一份力量，就是好样的。1940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中央曾严令各部队彻查共产党人，税警总团没有任何举动。事后得知一个姓张的副营长是共产党员，也只是一走了事，并未追究。

从1938年底，到1940年底，税警总团在都匀整整训练了两年，使这支非正规部队成为当时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孙立人也一举成了一位兵精粮足、羽翼丰满的实力派人物。

扬威异域声震海外

但孙立人并不满足于税警总团少将总团长的头衔。他得知中国将派出远征军出国作战的消息，认为是自己出头的好机会，便向蒋介石上了请战条呈。蒋介石也觉得出国远征，和美英盟军协同作战，孙立人是最好不过的人选了，所以条呈一上，立即批准，并电召孙立人至重庆，面授机宜。

1940年冬，税警总团正式改编为三十八师（甲等加强师），隶属六十六军，奉命开赴贵州兴义集结，待命出发。

出国前，蒋介石令军事委员会派出点校小组，分赴远征军部队集结地点校。点校小组在重庆还没有动身，孙立人就接到通知。于是，马上紧张起来，进行操练预演。三十八师里当时正好有个即将结业的教导队，都是各团和各独立营的军士、军官，刚刚训练完毕，孙立人就拿来应付点校。他亲自督导演习，每次演习完毕，还要进行讲评，总结优缺点。本来已是训练有素，又经过短期的突击训练，更是锦上添花。点校以后，几十个点校委员个个满意，人人叫好。唯有六十六军军长张轸，是他的顶头上司，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他在讲评时说：“演习是不错，只怕不能打仗……。”这句话把孙立人气得要死，但出自上司之口，他也无可奈何。等到点校委员和张轸走了之后，他马上召集部队讲话，发泄不满，并嘱部下要在战斗中争这一口气。

张轸，黄埔毕业，蒋介石的嫡系。他把孙立人的队伍看成是杂牌军，对孙立人的那种洋里洋气的派头也瞧不起。而孙立人自恃中央有人，又有留美资历，对他也不买账。而且三十八师原为财政部的税警总团，不归军政部管辖，虽在编制上属于六十六军，但仍有相当的独立性。就这样，张轸自以为是，瞧不起孙立人，一句话脱口而出，却使孙立人记恨在心，两人之间从此形成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不久，孙立人接到命令，限时率部开抵缅甸八莫。时间紧，路途远，又缺少交通工具，孙立人命令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赶路，有时还来一阵强行军。一路上部队吃了苦头，士兵、军官叫苦不迭，终于如期到达八莫。正赶上守八莫的英军被日军包围，危在旦夕。孙立人立即带领先头部队——三十八师一二团的400余人，抢占高地，火速投入战斗，从侧后方出敌不意地发起猛打，犹如神兵天降，锐不可挡。日军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打退了。

这是中国远征军出国后的第一仗，不但给中国人争了气，也使孙立人一举成为举世瞩目的人，这一仗，打死打伤日军数千名，救出英军第一师和皇家战车旅约七千余人，坦克数十辆，大炮数十门，辎重及其他军用物资无数。并从根本上扭转了盟军的战局。

英军当局对孙立人部给予的救援，感谢不尽，赞不绝口。因此，对于孙部所需补给——粮米、服装、械弹等，及时而慷慨。各华侨团体也因祖国打了胜仗，觉得增光不少，纷纷送来了慰问品——罐头、饼干、奶粉、香烟、毛巾等，应有尽有。从此部队的给养有了很大的改善。全师官兵的情绪十分高昂，对战争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但是，由于指挥上的错误，中国远征军自1942年初陆续开入缅甸，苦战5个月，受到很大挫折，至8月底几乎全军覆灭，10万大军在曼德勒被日军团团围住，指挥官史迪威和罗卓英临阵坐飞机先行撤走，远征军群龙无首，无所适从。于是分数路突围，一路向东北强行通过日军占领区，伤亡惨重。一路走向北。从密支那西侧北上，然后转向东，往横断山脉之高黎贡山原始

森林区，过怒江回国。这时，正值雨季，森林内暗无天日，毒蚊、瘴气、蚂蝗等，直接威胁人的生命。再加粮食断绝，饿死病死的人数超过了战斗中死亡人数的几倍。整个缅甸战役中阵亡的师、团以上干部 4 人，4 师、团以下官兵 2 万多，而从原始森林里撤退途中死去的竟达 4 万多之众。

在一片惨败声中，唯独孙立人率三十八师基本上沿着英军西撤之路，于 5 月底到达印度边境。这里的英国驻印边防军提出：中国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以难民身分才能进入印度，孙立人只身前往谈判，并要求英军派人来参观三十八师的军容。驻防该地的英军正好是被三十八师救过的英军第一师，而三十八师的五千多官兵，个个经过理发、修面、洗补军服，擦亮了武器、钢盔，严阵以待，英军司令见了大为吃惊，因为没有见到运输工具，问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大腿一拍说：“就靠这双腿”。于是，该司令马上握手言欢，再也不提解除武装的事了。

7 月底，杜聿明率第五军军部和廖耀湘的二十二师两千余人，从密支那北向西，翻过人迹未至的野人山，经印缅交界的新背洋，到达印度雷多。然后与三十八师合并，成立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孙立人任军长，开赴加尔各答西北方 2 百多公里的兰姆军营，接受美式训练。准备反攻缅甸，打回祖国去。

中国驻印军武器给养是美国的，军服是英国人早年为印缅做的，绑腿是在印度现做的，军帽、军徽、军衔是国内运会的。训练开始时，全部是美国教官，因为翻译不够，效果不理想。孙立人便逐渐从美国人手中接回训练权，军部成立了教导总队，相当一个团，孙立人自兼总队长，一批一批到国内去招学员。1942 年以后，大后方号召青年学生从军，到新一军去的大中学生近 5 千人。孙立人在教导总队用的还是战前税警总团教导队那一套，只是增加了美式武器，英语和亚热带丛林作战的教育。

反攻缅甸凯旋班师

1943年春，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反攻，新一军第三十八和新六军第二十二师首先出师。这次反攻，中国军队前进一步，中美工兵团紧跟在后边，武器给养源源运到前线，美国空军又大力协助，战斗进行很顺利。驻缅北日军十八师团未料到中国军队这么快就反攻过来，而且来势凶猛，虽拚死抵抗也抵挡不住，被迫退出胡康河谷第一道防线。战斗中，三十八师还救出被围的美军一个团，这个团据说是从菲律宾撤退后，调回美国专门受过丛林作战训练，特地调来缅甸参战的。他们看中国军队在前面打得很顺利，也想到前方捞个便宜仗打打，结果被日军包围。如不是三十八师及时赶到，难免全军覆灭。这一仗使孙立人威名更大。

第二仗是孟拱河谷的战斗，仍是二十二、三十八两个师担任主攻，敌人是十八师团残部和第二师团。孟拱是缅北重镇，为水陆码头，两岸高山密林，易守难攻，日军在这里筑有永久性工事，但在我军强大攻势下，伤亡五千，弃城而逃，连司令部的关防也被我军缴获。这次战斗，我军又第二次解救了英国皇家战车旅。该旅旅长亲来三十八师感谢救命之恩。

缅北的最后一仗是八莫围歼战。如八莫攻下，则通往中国的大门便打开了。这时，新六军的十四师、二十二师先后调回国内，留下的五十师划归新一军，与三十师一起在后方整休，仅三十八师一个师担任主攻，孙立人亲自指挥。日军接受以前的教训，修了三个坚固的永久性大工事，有几道壕沟相联。壕沟呈蛛网放射状，连接大型街心工事十余座，在所有的道路、桥梁、码头及森林边缘，都筑有永久性的碉堡。大树上设阻击手，都是挑出来的一等射手。树上掏有大洞，洞内贮藏弹药、口粮和一大汽油桶的饮水，阻击兵可坐、可卧、就是不能下来。因为他的小腿是被锁在树上的，一定要坚守到规定的时间，才由带班军官来开锁换班。地面上的钢筋水泥碉堡群，一般是一个碉堡三个枪眼三个士兵，军官把他们连同弹药、干粮、水送进去，再用石块水泥封死。他们只有守到有人来更换，否则，就是打死或饿死。据被俘的日军讲，凡死守完成任务被换下来的，可以回国受勋。但实际上都为“天皇”效忠了。

尽管日军如此顽强抵抗，也阻挡不住中国军队的进攻。在空军、炮兵、战车的配合下，碉堡被一个个地解决，鏖战近一个月，终于拿下八莫。守军除极小部分逃窜外，全部被歼。孙立人常以此夸耀说：八莫是缅北守敌工事最强，决心最大，武士道精神最充分发挥的一个堡垒，我军仅以百余人伤亡的最小代价夺取了它。自此以后，缅甸敌主力被歼殆尽，腊戍、新维、贵街相继收复。1945年元月，中国驻印军与滇西反攻过来的远征军于畹町国境线上胜利会师。滇缅公路被打通，满载物资的卡车，源源不断地开进中国，远征军取得辉煌的胜利。

1945年5月，新一军先头部队回国。7月份全军抵达广西南宁，准备大反攻。这时，德国已投降两个多月了，艾森豪威尔邀请蒋介石派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军事考察团，到巴黎参观点考察西欧战场，并指名要孙立人参加。

8月初，新一军已抵西江南岸粤桂交界处，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于是，顺江而下，接收了广州、深圳。孙立人不忘缅北抗日死去的烈士；胜利后不久，举行了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和二一师师长戴安澜的追悼会，孙立人亲自写了悼词表示哀悼。并强行从全军官兵薪饷中扣出一部分钱来，利

用日军俘虏，在广州白云山上修筑了新一军缅北抗敌阵亡将士纪念碑，碑上有一只鹰图案和他的题字。

奉调东北参加内战

抗战胜利后，蒋又令孙立人率部北上，准备内战。此时，新一军在广东经过半年时间休整，配备了美式装备，接收了日式武器和医药物资。招募了大量的新军，扩大了教导总队，成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并进行了寒带作战训练，随时准备进犯东北解放区。

1946年3月，新一军四万多人马辐重，借道香港，在美国军舰护送下，开向东北。首先在秦皇岛登陆，然后乘火车到锦州一带集中。途中受到东北民主联军的袭击，伤亡颇重。这一年初，孙立人又一次出国考察，此时尚未回国，全军由副军长贾幼慧率领，辗转迂迴到沈阳外围。在四平街，新一军同东北民主联军激战了一个月，伤亡惨重，却攻不下一个小小的四平街，蒋介石非常不满。这时，孙立人已经回国，急忙从关内赶来指挥战斗。也是他运气好，东北民主联军在保卫四平街的战斗中，赢得了时间，正作战略转移。因此；新一军一举而下吉林，长春、德惠，陈兵松花江畔。这又给孙立人镀了一层金粉。

明升暗降赴台练兵

但孙立人既非黄埔弟子，又非陆大学生，在国民党部队中自成一系。且孤芳自赏，自命不凡，仗着美国人的撑腰，有时连蒋介石也不放在眼里。所以，蒋介石对他也很不满。适逢云南部队六十军一八四师在东北起义，投向共产党那边，使蒋介石愈加感到非嫡系部队不可靠。云南部队的后台是龙云，蒋介石曾以明升暗降的手法，把龙云调到中央，削掉了云南王的兵权。于是，便使用同样的手法，提升孙立人为东北第四绥靖区司令，接着又升为东北九省保安长官司令部副司令长官，把他调离长春到沈阳与杜聿明共事。而把他辛苦经营数年赖以起家的新一军，交给了黄埔出身的五十师师长潘裕昆。

孙立人对这种人事安排当然不满，但又没有办法，只能暗中怨恨。后来经过一番活动，由美国人出面，以孙立人练兵有方，调往台湾去训练新兵，并从新一军军部及三十八师调去几百个在税警总团和印缅时期的亲信随同前往，另起炉灶。三十八师也脱离新一军另成立新六军，以李鸿为军长，归郑洞国领导，仍驻长春。新一军军长潘裕昆率五十师及新编入的其他部队驻防沈阳。

1947年7月，蒋介石正式委任孙立人为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军官训练班（驻台湾）主任、长沙、武汉、洛阳、西安、成都、桂林、广州等地都成立训练处，统归孙立人指挥。1949年，孙立人又出任台湾防卫司令，1950年3月升任台湾陆军总司令。这是孙立人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

但好景不长，据《参考消息》报道，1954年6月，孙立人被免去陆军总司令职务，调任“总统府参军长”，旋即因其一名部属郭廷亮少校的所谓准备发动“兵谏”的罪名，被当局看管侦讯。同年10月31日，台湾当局宣布对孙立人的处置：“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孙立人从此被软禁，至今已达30年之久。

被软禁大半生的陆军二级上将

石言

- 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
- 非黄埔系出身，倍尝嫉妒倾轧之苦
- 美国政府视美国祯、孙立人为一文一武之干才
- 与“郭廷亮案”的关系，至今谣诼纷纷

孙立人是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初期，为蒋介石收拾残部，稳定军心的过渡将领。他于1950年3月接替顾祝同，出掌台湾陆军“总司令”，到1954年6月卸职，调任“总统府”参军长，成为有职无权的空头陆军上将。次年因受部下“郭廷亮案”牵连，被蒋介石终身软禁，成为举世可数的追随蒋介石而身受囹圄、遗恨千古的“笼中虎”。

1950年初，蒋介石带着他的家班余党和50余万残兵败将，退守台湾。这个弹丸小岛，一时兵马拥挤，机构庞杂，人心浮动，军心混乱，急需人帮着收拾残局、站稳脚根。这时蒋介石看中了受美国宠爱的少壮派将领孙立人，一则可以帮他收整残部，二来可以通过孙与美国的关系争取一些援助。所以蒋介石于1950年3月1日复任“总统”的当天，同时发表孙立人为台湾陆军“总司令”的命令，可见当时蒋介石对孙立人是何等的重视。

孙立人，1904年生，原籍安徽省舒城县，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至后保送赴美国，进入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获得工程学学士学位，又转入弗吉尼亚军校与美国的乔治·马歇尔元帅是先后期同学。学成归国后，先进入党务学校任军训队长，不久后调“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副总队长。宋子文成立“税务警察总团”时，邀请孙出任该总团“特种兵团团团长”。

“八·一三”中日在上海发生淞沪战事期间，孙立人率领的税警第四团参予这次战役，在温藻滨中弹负伤，送香港养和医院医治。不久“新税警总团”在湖南长沙成立，孙立人又重新任团长，后来该部调往贵州省都匀地区驻防。1940年11月，税警总团改编为国民党新编38师，孙立人出任师长，翌年远征缅甸。在滇缅战役中，孙立人率师仁安羌解救英军之围，打通雷多公路，反攻缅甸北部。孙立人作战英勇，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荣获英国皇家勋章。他在北缅反攻日本军队大获全胜，因战功升任新编第1军军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奉调东北，曾任第四绥靖区长官兼长春警备司令。四平、长春战役之后，因与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意见不合，蒋介石偏听杜聿明意见，将孙立人解除兵权，命其只身南下，闲守南京。

孙立人从东北回到南京，心情抑郁，意兴阑珊，最不甘心的是受黄埔系的排挤和欺压，在南京闲居不久就调往台湾，任编练司令，负责新兵训练。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为了重整旗鼓，重申所谓“明耻教战”的决心，并且为争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确保台湾澎湖诸岛，才又打出孙立人这张已经冷藏下来的王牌。1949年，任命孙立人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长官是陈诚），兼任台湾防卫司令。次年3月招升为陆军总司令兼保安总司令，1951年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孙立人虽然是国民党军队将领群中的一位俊杰之才，但因他不是黄埔系，故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处境自然不顺畅。他自美国学成归国那天起，的确

倍尝嫉妒倾轧之苦。在国军将领中，派系既多又特别的复杂，有留日派、保定军校系、黄埔军校系，惟留学英、美的形单影只，没有派系，在军队中只能当“受气官”，或“听用”官，各派系之间，门户森严，互相排挤，明争暗斗，各派只是培植自己势力。孙立人如果不是宋子文成立税务警察总团，他可能毕生只能从事军事训练，斯人樵悴，再如孙立人没有在缅甸和盟军并肩作战的机会，也不可能显示他的军事干才，更不可能中外驰名。跟孙立人的背景差不多的西点军校出身的温应星将军，只当了一阵子税务警察团长，即销声匿迹。至五十年代，温参加香港的第三势力，跟蒋介石隔海对抗，也是派系作怪的例子。

孙立人是中国名牌大学出身，又留美深造，学识渊博。在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的特殊情况下，他的才华成了他的负数。蒋介石 1940 年前，不让孙立人进入野战军带打仗，不给他立功晋升的机会。其实孙立人是一位很优秀的带兵军官，据一位跟随孙立人多年的老部下对孙的评价说：“孙立人是非常优秀的带兵军官，指挥打仗很有一套，但他不是一位领袖。”讲人际关系，同辈中几乎没有人与他合得来，但他对部下，大有爱兵如子之风。孙在任陆军总司令期间的每周军事汇报会，他从来未准时出席，其理由非常可笑：他不愿意向当时的参谋总长周至柔上将敬礼，迟到能避免，因为“总统”在场，只给“总统”一个人敬礼。

孙立人在台湾历任过陆军总司令之职的诸人中，出身背景最为特殊，最受争议，而下场也是最凄凉，由于 1955 年涉及所谓“匪谍郭廷亮案”，使他的下半生形同监禁，直到现在年岁高达 84 岁，仍无公开活动。更不公正的是，在台湾陆军总部军史馆中，悬挂在墙上的历任陆军总司令任职历史简述中，竟不顾史实删改历史，连孙立人的名字也划掉了。

1949 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为保住台湾，蒋介石当时看中了在台湾训练新兵有成就的陆军中将孙立人，起用力陆军总司令。孙接任后，大事改革，大办“军官训练班”，颇有心机。他以美式的训练、新一套领导干部为主体，为国民党陆军作了换血的工作。他大胆起用青年军官，也淘汰了大陆时代的残兵败将，打破了军阀部队的余风，对军队国家化、现代化，影响很大。

孙立人于 1954 年 6 月 24 日交卸权柄，辞去陆军“总司令”职务，而所谓“匪谍郭廷亮案”则发生在 1955 年 6 月。其时，孙立人已调任为“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照理应已同他无关，但孙却仍受波及。

孙立人被蒋介石整肃，据了解内情人士透露，因涉及军中派系及国际背景，王要是孙立人为非黄埔系出身，且留学美国军校，爱穿马靴，作风美式，黄埔出身之将领，对孙立人早就多有不满。而当时的美国政府，对孙立人期望很高，将之与吴国桢同视为一文一武之干才，有意加以培植，终于埋下了孙被整肃的契机。

1955 年 6 月发生的“郭廷亮案”，本来就同孙立人不大相干。这个案子的主要当事人是郭廷亮，原籍云南省人，生于 1921 年。郭廷亮系国民党税警总团干部教练所学员队 2 期毕业。当时孙立人任团长。该团改为新编 38 师，郭是该师一名中尉排长，该师改新一军后，孙升任军长，郭升少校营长。1948 年 6 月，新一军驻守沈阳，郭与米店主人白经武结识，经白介绍，郭营长跟李玉竹女士结婚，白借机“以共产党言论宣传”。不久沈阳解放，郭要求白经武协助取得路条，白介绍其兄白经文。白经文当时任人民解放军吕正操部队联络科科长，白经文嘱郭到台湾时，须为共产党工作，郭廷亮因顺利离开

沈阳，经天津，到上海转到台湾。郭廷亮到台湾找到了老上司孙立人，还是任孙部少校营长，又历任陆军总部搜索组大队长、步校教官、陆军总部第五署督训组组长。但郭廷亮在去台湾后的头几年，即 1954 年 8 月以前，并没有积极进行活动。还是在这年 6 月孙立人交出兵权之后，某一天晚上，有一位大陆北方人姓李的来到郭家拜访，李说：大陆白先生要你积极开展活动，不久白先生要来台湾。郭廷亮才又执行李某转达的白先生交代的事宜，利用他跟孙立人多年的长官和部属关系，在军队中联络了一批中、少尉军官，预备在适当时机，向蒋介石发动“兵谏”。

孙立人交卸陆军总司令时，曾令陆军总部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造册，把各军、师、团单位的联络人（在大陆时期的旧友部下）名单送孙。1954 年 8 月和 10 月，孙立人的确两次召见过郭廷亮，了解了一些旧部属的情况，并表示对郭的关怀。

据说，“郭廷亮案”除主犯外，还有五名从犯，他们是：时年 37 岁的江云锦，曾任陆军官校干部训练总队大队长，到台湾后任陆军总部“第五署督训组副组长”。江活动能力极强，他借到各部队督训机会，在每个团中，指定职阶较高、学识较优、年资较深的官校同学旧友为负责人，与部队中各同学联络；时年 30 岁的田祥鸿，是四川人，时任上尉情报官，接受郭的指示，“把在去台湾后的军训班（即第 4 期军官训练班）全体同学联络起来，组成一股力量”，向台湾国民党政府提出改革事项；时年 29 岁的刘凯英，安徽合肥人，曾与郭廷亮同在一个部队供职，任第 4 期军官训练班学员联络人；时年 34 岁的陈良垵，是福建省林森人，是孙立人的随从参谋；还有中校督导官李成亮。郭廷亮联络的都是大陆去台湾的青年军官。

据说，6 月初，国民党军队在台南地区举行“总统”亲校检阅仪式，孙立人等高级将领都要陪蒋介石参加这次检阅，所以孙才选定为发难日期。郭廷亮于 5 月 15 日，专程到台北市谒孙，把他发动的情况向孙作了报告。郭选定××部队将在 5 月 22 日至 6 月 2 日开始团教练，在这个休息时间里为采取行动的最佳之期。孙立人计划他本人于 5 月 25 日左右南下，以×××处为指挥所，定于 5 月底或 6 月初有所行动。但情况发生变化，孙立人定于 28 日去台南，但又奉上谕于 30 日与蒋介石同坐一架飞机。郭廷亮则已在 25 日被捕，仅由陈良垵于 28 日乘车南下，沿公路通知各路人马。

6 月 6 日，南部地区 7 万多部队，举行检阅，来宾有专程自南朝鲜抵台湾的美国第 8 军军长泰勒中将和蔡斯团长。受检阅部队，规定于清晨四时半前，抵达东屏机场受检位置。预定上午 9 点半正式开始检阅，但延至 11 点 30 分，才开始举行。检阅台前，工兵两度用扫雷器进行反复检查。

也有人说，孙立人谋事不机密，已先后有 20 余人向当局告密，导致郭廷亮于事发前 12 天被捕，情治单位早就掌握了同谋人的动态；或说某部炮兵连突然奉命携带弹药，引起某炮长的怀疑，偷偷溜出营房向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亲手把持的情治系）阮成章报告了，于是毛人凤奉命乘专机南下，事败案发。因为这件案子，是孙立人的部下军官密谋的，所以在台湾就叫做“孙立人兵变”事件，就有理由把孙立人整一辈子。

但是，“郭廷亮案”究竟与孙立人有多大关系，至今仍是谣诼纷纷，被台湾当局视为禁忌。其事实，乃是因为孙立人“军训班”的部属郭廷亮等，企图在蒋介石阅兵时，以武力实行兵谏，要求蒋整饬周至柔等军队中的腐化官僚，当然多有愤激之语；当时并拟以机枪、大炮对准阅兵台。事发后，孙

立人被指控为“纵容部属武装反叛‘国家’窝藏匪谍密谋犯上”，而予以议处。虽然这些准备起事的人都是他一手训练、提拔起来的青年军官，但没有查出孙直接指挥他们肇事的证据，所以孙立人不能负连带责任；可又因他不是黄埔系将领，只落得个遭软禁一生。是非内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蒋氏父子都死了，毛人凤也死了，如何公正评判是非，只好留待将来历史去作结论了。

后记

风云乍起，辛亥首义揭开近世中国的沉重帷幕，铸就近代中国一页页凝重而冷峻的历史篇章。本丛书以真实为原则，以实录为主要方式，精心组织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文章，力图客观再现中华民国近 40 年（适当延及台湾时期）和中国国民党近百年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历史面貌。在组织稿件的过程中，得到许多作者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在出版前未能与个别作者取得联系，编者对此诚致歉意。本书出版后，希望速与我们联系，我们将按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稿酬。

编者

1994 年 6 月

